

2020

年度  
概览

INDEX of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Articles

#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

文章目录 摘要 关键词 精华版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 01 | 2020年第1期 [主题] 健康视野下的老年宜居环境
- 20 | 2020年第2期 [主题] 为收缩而规划：范式转换和关键议题
- 44 | 2020年第3期 [特稿] 城市更新与地方经济：  
全球化危机背景下的争论、反思与启示
- 66 | 2020年第4期 [主题] 历史制度主义的空间规划研究
- 87 | 2020年第5期 [主题] 德国乡村内生型发展与功能活化
- 107 | 2020年第6期 [主题] 国际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模式研究

## 《国际城市规划》相关信息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主办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 编** 王 凯

**副 主 编** 陈 明 孙志涛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立 于涛方 王 兰 王兴平 王红扬 王缉宪 王 德 龙 瀛 吕 斌 刘 健 孙施文  
孙 晖 李志刚 李和平 杨贵庆 杨家文 吴志强 冷 红 沈 青 张 兵 张丽君 张京祥  
张庭伟 张 勤 林文棋 林 坚 卓 健 罗震东 周江评 周 俭 郑德高 赵万民 赵星烁  
袁 媛 夏 青 柴彦威 徐 江 徐 苗 唐 燕 崔功豪 韩笋生 谭纵波 颜文涛

**编辑部主任** 孙志涛（兼）

**编 辑 部** 许玫 王枫 张祎嫻 顾春雪 高淑敏

**编 务** 徐荔鑫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0 号东楼 E320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86-10-58323806 / 58323803

**查 稿** 86-10-58323835

**发 行** 86-10-58323820

**电子邮箱** upi@vip.163.com

**网 址** <http://www.upi-planning.org>

**总 发 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 本刊官网

**邮发代号** 82-363

**期刊价格** 38.00 元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5583/TU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3-9493

**本刊微信公众号**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编辑出版：《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枫

集册时间：2021 年 4 月

## 2020 年第 1 期文章目录

### 本期主题 健康视野下的老年宜居环境

于一凡 /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认识基础与方法探讨

安·福赛思, 詹妮弗·莫林斯基, 简夏仪, 著; 于一凡, 译 / 改善老年人的住房与社区环境:

规划设计如何应对衰弱与独居的挑战?

伊藤增辉, 周燕珉, 秦岭 /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配置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吴丹贤, 高晓路 / 居家失能老人照护的未满足需求分析——基于空间资源链接的视角

张灵珠, 晴安蓝, 崔敏榆, 曾文馨 / 立体化超高密度亚热带城市的老年群体休憩用地使用偏好研究

孙羿, 凌嘉勤 / 城市空间易行性及其对老年友好城市建设的启示: 以香港为例

### 城乡研究

万丹, 黄勇, 葛国钦, 蒋迪, 邓良凯 /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及跨海通道影响机制研究

马敬然, 王浩锋 / 弹性网格: 曼哈顿城市形态及合并街区特征研究

林青青, 何依 / 分形理论视角下的克拉科夫历史空间解析和修补研究

刘泉 / 轨道交通 TOD 地区布局模式的形态演变

吴亮, 陆伟, 于辉, 顾宗超 / 轨交枢纽站域步行系统发展的模式、逻辑与机制

——基于三个亚洲案例的比较研究

### 规划研究

赵珂, 李忠蔚, 夏清清 / 真实+价值: 欧洲空间规划的可视化语境支持

鲁钰雯, 翟国方, 施益军, 周姝天 / 荷兰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及其启示

屠帆, 胡思闻, 赵国超 / 荷兰工业用地利用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

公共土地开发模式与可持续的土地开发利用

肖竞, 曹珂 / 英国保护区评估方法解析——以格拉斯哥历史中心保护区评估为例

董晓颖 / 适应多元居住需求的住房规划管理体系——日本住房制度变迁的启示

### 专题研究

李强, 汪伟, 张健 / 美国金县乡村空间规划管控

郑宇, 方凯伦, 牛通, 袁媛 / 新加坡城市设计审查制度



2020 年 第 1 期

#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认识基础与方法探讨

于一凡

**摘要：**良好的环境有益于居民的身心健康，对于长时间逗留在居住环境里的老年人而言意义尤其重大。针对衰老带来的一系列健康问题，规划设计应关注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个体活动机能的支持与补偿，发掘环境要素在促进健康行为、发挥康复作用等方面的潜力。由于建成环境和人群健康分属于两个影响因素众多的开放系统，现阶段，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相关探索在认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尚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环境压力模型和积极生活生态模型作为理论基础，以循证策略作为研究方法，以中介效应作为分析手段开展研究工作，旨在为健康视野下老年宜居环境的探索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

**关键词：**建成环境；老年人；健康；循证研究；中介效应；老年宜居环境

**引文格式：**于一凡.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认识基础与方法探讨[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1-7. DOI: 10.19830/j.upi.2019.669.

#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配置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伊藤增辉 周燕珉 秦岭

**摘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养老设施的普及配置已刻不容缓。然而由于部分相关概念未能明确统一、设施体系尚不完善、配置标准灵活性不足等问题，导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味追求养老床位数达标，却忽略了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求，造成大量社区存在设施供给与服务需求脱节的现象。世界上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从 2006 年开始构建社区统合照料体系。在设施配置规划上，从原有设施体系中独立出小规模社区嵌入型设施体系，两个体系并存互补，使设施配置更具弹性，有助于灵活应对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在老年人熟悉的社区中实现高质量养老服务的精准配送。通过推动小型化设施的普及配置，实现了设施在既有社区内的渗透发展。本文以日本的官方开放数据为基础，通过梳理其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的配置和发展状况，揭示了这一规划举措对日本在高度城市化地区实现“在地养老”制度理念的关键意义。在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完善设施体系、因地制宜确定配建指标和设施规模、充分发挥设施区域协同作用等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设施配置；社区嵌入型；在地养老；弹性指标；多元化养老服务

**引文格式：**伊藤增辉, 周燕珉, 秦岭.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配置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20-28. DOI: 10.19830/j.upi.2019.670.

# 居家失能老人照护的未满足需求分析——基于空间资源链接的视角

吴丹贤 高晓路

**摘要：**在全球老龄化进程中，照护需求难以被充分满足已成为居家失能老人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对于活动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的失能老人，空间因素会对其照护需求的满足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点在国内外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空间资源链接的视角，本文分析了居家失能老人照护需求的满足状况并探讨了未满足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个人照护还是生活照料，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满足程度远低于自理老人；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空间资源等使能因素均对其照护需求的充分满足发挥重要作用；相比

资源存量，空间资源的有效链接才是提高需求满意度的关键。本文建议通过营造“使能环境”，促进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优化居家老人的照护服务组织。本文“空间资源链接”的分析视角可较好地补充与完善已有理论，同时为全球老龄化议题提供中国的案例研究。

**关键词：**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未满足需求；空间资源链接；使能环境；老年友好型社区；决策树分析

**引文格式：**吴丹贤，高晓路. 居家失能老人照护的未满足需求分析——基于空间资源链接的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29-35. DOI: 10.19830/j.upi.2019.673.

## 立体化超高密度亚热带城市的老年群体休憩用地使用偏好研究

张灵珠 晴安蓝 崔敏榆 曾文馨

**摘要：**香港的一项调查显示，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从年轻人到长者逐渐增加。就老年群体而言，小型公共空间的规模、数量、可达性、品质和设施等均会对其使用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对香港湾仔和沙田两个地区50处小型休憩空间的分布可达性与流量潜力、规模、品质及其使用进行了比较，通过网络分析技术、无监督机器学习分类、三维室内一室外完整步行网络、现场调研以及精细化模拟步行路径选择度等研究方法发现，小型休憩用地的面积、可达性等都对其设计品质和长者的使用情况有显著影响。以香港为例，本研究对老年群体的休憩用地使用偏好进行了探索，以期对内地城市老龄化视角下的公共空间系统规划提出启示。

**关键词：**老年群体；公共空间；小型休憩用地；超密度；香港

**引文格式：**张灵珠，晴安蓝，崔敏榆，等. 立体化超高密度亚热带城市的老年群体休憩用地使用偏好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36-46. DOI: 10.19830/j.upi.2019.672.

## 城市空间易行性及其对老年友好城市建设的启示：以香港为例

孙羿 凌嘉勤

**摘要：**城市空间易行性是建设老年人友好城市必须考虑的环境指标。易行空间促进步行和体能活动，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益。本文选取居住区密度、道路联通性和用地混合性三个指标测度香港城市空间的易行性，发现城市中心区（港岛和九龙）的空间易行性明显高于新界。相关性分析指出易行性与人口密度和第三产业就业率存在正相关，与家庭收入和地块面积存在负相关。通过专家访谈，本文分析了不同空间易行性背后的规划思路。早期城市规划推崇的小地块发展模式使中心区地块面积细碎、街道狭小，促进了居住密度和用地混合度，这是造成易行性高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隐患，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不利。文章指出，未来城市规划要在地块划分的面积与多样性之间求得平衡。定量测度需结合其他研究方法探讨完善步行空间、提高宜居性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对策。

**关键词：**老年友好；步行；易行性；城市规划；策略；香港

**引文格式：**孙羿，凌嘉勤. 城市空间易行性及其对老年友好城市建设的启示：以香港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47-52. DOI: 10.19830/j.upi.2019.677.

##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及跨海通道影响机制研究

万丹 黄勇 葛国钦 蒋迪 邓良凯

**摘要：**在海洋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背景下，湾区城市群往往成为一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头部区域，对一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格局态势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在对近代城市群空间关系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从网络整体、节点城市两个层面，对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进行综合研判，并对跨海通道的空间关系影响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大湾区在整体格局、节点城市空间关系权重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各大湾区跨海通道的建设对城市群空间关系改变显著，其影响模式与程度并不与设施距离构成简单线性关系，而是与湾区陆海空间架构、节点城市与设施的空间分布方式、路网格局等要素存在复杂关联。本研究提出的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测度方法体系，有助于深入理解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策略的制定和优化，具备科学参考价值。

**关键词：**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复杂网络；跨海通道；粤港澳大湾区

**引文格式：**万丹，黄勇，葛国钦，等. 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及跨海通道影响机制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53-61. DOI: 10.19830/j.upi.2019.064.

近年来，笔者带领重庆大学山地城乡复杂结构研究组，从显性的城镇基础设施生命线网络，到隐性的历史街区社会关系网络，做了一些探索工作。目的是试图找到某种可量化的途径，来表征城镇系统内在的支撑性结构。这个命题，或有着近似于物理学大一统公式的恢宏美感，也可能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工作。城镇系统毕竟不同于单体的建筑。建筑的结构存在可见的物质载体，有从属于重力法则的逻辑边界与功能属性，也因此建立了自身清晰的概念内涵。相对而言，城镇系统的结构，是一个多源、多维、多义、多态和时变的“混沌”系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保持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是有价值的。本研究既发端于此，又逢港珠澳大桥通车，遂考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子，开展一个实证研究。

本研究的建立，也是基于对全球空间体系演进趋势的两个大致判断。一是世界范围内，大城市所引导的城镇群，将再次成为一个国家空间战略的头部区域。近 300 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发生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兴起，这是工业化和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第二次是小城市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区域的国际竞争力。换

言之，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竞争，将主要由城市群网络这一空间物质载体来承担。

二是我国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与挑战，对国家空间体系，尤其是头部区域，提出了新的适配性要求。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 99 万亿元，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际发展经验表明，推动知识经济和科技革命的产业集群升级，是实现突围、避免掉入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以美国过去和我国新近的城市发展事实来看，科技革命有着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产业体系需要怎样的空间载体来支撑，创新人才对空间品质有哪些新的要求，是城乡规划学科需要迅速厘清和响应的重要课题。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选取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国际范围内城市体系相对成熟的三大湾区为参照，梳理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规律。研究视角上，确立从网络结构切入湾区城市群空间关系实证的整体方向。技术路线方面，选取复杂网络理论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内容上，注重分析网络结构整体格局及节点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类型和作用。城市群空间关系表征载体上，选取高等级道路网络作为对象，因为高等级道路可以从整体上反映区域内城市的空间组织关系，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潜在趋势，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衡量系统内节点单元的位序等级和作用差异。

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结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个。

第一，湾区城市群大都存在“功能”与“网络”的“失配”现象。湾区的陆海地理格局，决定了城市群经济外向发展的总体态势。滨海的节点城市具备优良的出海条件，是承载经济外向发展的主要载体，但在网络关系中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使得空间关系权重居于弱势。当然，这一认知也跟本文选取的城市群网络关系表征局限有关，主要选择了陆路而没有考虑海路。一旦加入海路，整个关

系网络可能有新的变化。这也是接下来我们想去探讨的一个点。

第二，理论层面上，我们再一次验证了在城乡网络结构中此前多次发现的一个规律。即不管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如何巨大，只要某些关键节点实现直接连通，则会对网络整体结构造成巨大影响。这可以启发我们，在湾区等城市群空间战略规划与实践，尤其在大型节点工程的前期论证等阶段，有必要通过城市网络模型的动态推演，对可能产生的城市群空间关系效应变化，开展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更客观的科学依据。

## 弹性网格：曼哈顿城市形态及合并街区特征研究

马敬然 王浩锋

**摘要：**研究应用空间句法考察了曼哈顿城市形态演变及曼哈顿街区合并对城市局部及整体城市形态的影响，以探讨其背后反映的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曼哈顿城市形态具有弹性特征，使其在因街区合并等带来的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可达性，同时形成了具有多中心性及多样性的城市形态。不同功能合并街区呈现的差异化空间形态表明，城市形态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本研究对中国高密度紧凑城市中的物质空间形态规划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合并街区；网格合并；空间句法；城市形态；空间社会逻辑

**引文格式：**马敬然，王浩锋. 弹性网格：曼哈顿城市形态及合并街区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62-70. DOI: 10.19830/j.upi.2018.273.

曼哈顿是现代网格城市的典范，其城市形态以严格正交的均质网格为基本框架，具有街区规模小、道路密度大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有效支撑了该地区高密度的社会活动和经济集聚，也激发了良好的城市活力。在均质网格的基础背景下，曼哈顿网格中存在着部分由街区合并（指由相邻若干原始网格街区合并成为统一开发地块，且该单元内原有车行道被去除的开发模式）引起的网格变形现象，合并街区也广泛分布于曼哈顿岛各个区域。合并街区是组成曼哈顿城市形态的重要异质性元素，对其进行研究能更深入地探讨曼哈顿城市形态特征及其与社会经济要素的互动关系，为理解曼哈顿城市空间与功能之间的互动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利用空间句法，分析合并街区的分布特征及

其与城市形态的关系，研究不同功能合并街区的空间特征及其背后的空间社会逻辑，探讨城市形态对高密度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撑作用。

在应对过度郊区化、改善城市环境等社会背景下，合并街区的开发模式被用于现代城市建设。而曼哈顿网格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及弹性，在实施合并街区开发模式时，能在保持城市形态稳定性与较高交通可达性前提下，一方面回应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面积用地或高开发强度需求，另一方面也能解决曼哈顿这样高强度高密度开发的紧凑型城市较易出现的土地供给与使用失衡的问题。

研究分析了不同功能的合并街区的几何特征、空间句法整合度及选择度、内部人行道路设置方式、周边开发强度等。

在形态及分布上，合并街区的规模普遍较小且没有集中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域，而是趋向布置在网络边缘即海岸线附近，保持了城市中心的街道密度，保证城市更广泛的区域具有良好的可达性，从而维持了曼哈顿城市中心性结构的稳定性，但又以合并街区的模式推动形成了城市结构的多样性，在空间上呼应了不同层面的社会经济需求。

在功能上，不同功能的合并街区体现出独特的空间社会逻辑：如住宅、大学及政府设施类合并街区仅体现为局部中心，将与城市的交流界面维持在街区外部，保证了适度私密性；而公园及商业设施则与此形成明显差异，其合并街区周边具有更高的开发强度，嵌入状的街区形态呈现一定的节点意象性，与城市的交流界面深入到街区内部。如公共设施、办公设施及交通设施类合并街区具有较强的公共可达性，且从街区尺度上营造出独特意象，并满足了演艺中心、博物馆、交通设施等建筑或构筑物

对大街区的需求。

合并街区在空间特征上呈现的共性与分化差异均体现了城市形态对各类型社会经济活动具有的重要支撑作用。本研究再次验证了空间句法关于空间社会属性的理论，即空间的使用与空间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会推动空间以不同的方式组构或者使用。在曼哈顿中，无论是宏观上网格形态的变化，还是微观上合并街区的内部结构，都体现出街道网络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其形态蕴含着承载不同空间社会逻辑及不同功能开发建设需求的特质。最后，尽管曼哈顿城市形态具有强烈的独特性及不可复制性，但对其合并街区的探讨依然能对我国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不仅为具有结构弹性的高路网密度街区制规划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还强调了在城市功能设施选址布局时要考虑不同功能设施用地本身的空间社会特征，及其与城市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

## 分形理论视角下的克拉科夫历史空间解析和修补研究

林青青 何依

**摘要：**研究表明，城市的形态和结构具有分形性质，复杂的分形结构提高了历史空间的稳定性，有利于激发历史空间的活力。本文以波兰历史城市克拉科夫为研究对象，对古城历史空间的分形结构与分形特征进行解析。其中包括了两个研究层次：其一，以克拉科夫古城为样本进行历史原型分析，通过分形元与分形秩序，解析古城的分形特征，提取分形结构中具有优越性的分形元素与设计方法；其二，以克拉科夫卡齐米日旧城区复兴为例，从多层次叠合、小尺度连接、多功能混合、各时段叠加四个方面，通过层次化增加不同尺度上的结构，形成在所有尺度上均丰富而复杂的城市肌理，从而激发旧城区的活力。基于分形理论的城市历史空间修补可为其他历史城市所借鉴，尤其对我国的“城市双修”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分形理论；分形元；分形秩序；历史城市；空间修补；城市双修

**引文格式：**林青青，何依. 分形理论视角下的克拉科夫历史空间解析和修补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71-78. DOI: 10.19830/j.upi.2018.137.

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有如叶脉，以树叶为代表的城市结构便是分形城市（fractal cities），复杂的分形结构具有自相似性、多重连接性和持久的适应力，提高了历史空间的稳定性，有利于激发历史空间的活力。

波兰（Poland）中世纪古城—克拉科夫（Krakow）是二战时期波兰境内唯一免受战火毁坏的城市，克

拉科夫古城完整保存了中世纪古城的空间格局与历史风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8 年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分形城市是由无数个基础空间单元的“分形元”构成，按照一定的“分形秩序”叠加衍生而成的，本文以克拉科夫古城为样本进行历史原型分析，克拉科夫古城分形结构体现在“庭院围合、层级嵌套”

的分形元和“多层拓扑、虚实相接”的分形秩序，即建筑围合成的四方庭院和多级庭院嵌套的组合形式，若干相对独立的庭院通过半公共性庭院按照一定的嵌套方式进行组合，构成古城分形结构的空间基础。

因此在空间肌理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城市中，以分形元为基础单元，遵循分形秩序的内在逻辑，可在小规模、渐进式的城市微更新中引导空间“生长”，实现城市的自我调整，有利于保持新增组织与肌理原型的相似性，新建筑与传统建筑的和谐性，实现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在发展中的动态统一。

卡齐米日（Kazimierz）旧城区拥有欧洲最集中的犹太遗产，是克拉科夫旧城改造与城市复兴计划的主要复兴地段。本文提取克拉科夫古城分形结构中具有优越性的分形元素与设计方法，对卡齐米日旧城区破碎的历史空间进行修补，从多层次叠合、小尺度连接、多功能混合、各时段叠加四个方面，通过层次化增加不同尺度上的结构，产生出在所有尺度上均丰富而复杂的城市肌理，从而激发旧城区的活力。

历史城市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在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优越性的分形结构。因此，城市规划不应该随意抹去历史城市的结构，然而 20 世纪以来的城市更新或改造方法正好相反，大拆大建造成了时间的扁平化和社会历史网络的断裂。“我们在 20 世纪采用了没有生命力的城市与建筑类型，而现在这种建成环境教育我们将这个世界理解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模式。”（Alexander, 1977）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就需要改变单纯依靠复制历史来修补城市的方式。基于分形理论的修补利用分形元和分形秩序修补历史空间，使历史肌理得以延续，在空间维度上展示了和谐完整的历史风貌，在时间维度上也营造了可识别的城市结构；分形结构提高了历史空间的稳定性，有利于激发历史空间的活力；分形秩序所规定的小尺度分形元的修补，避免了大规模拆旧建新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和拆迁安置问题，小尺度的空间修补更具有可操作性。基于分形理论的城市历史空间修补可为其他历史城市所借鉴，尤其对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双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轨道交通 TOD 地区布局模式的形态演变

刘泉

**摘要：**TOD 地区规划设计的基本布局模式主要包括基于小尺度街廓的方格网模式和环形放射模式，均能从 TOD 概念诞生以前的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发展历史中梳理出演变脉络。1990 年代，卡尔索普提出的美国式 TOD 理念在规划中延续了上述两种基本的布局模式；此外，新加坡发展出了基于大街廓的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布局模式。这三种模式对我国的 TOD 规划实践均产生了影响。本文以布局形式和街廓尺度为重点，结合国外案例及国内实践，对 TOD 地区的规划布局模式的形态演变进行解读，将三种模式整理为六种主要的布局形态，并总结布局模式的规划设计重点。首先，坚持采用小尺度街廓模式进行 TOD 规划设计；其次，重视方格网模式的基础作用；再次，突出 TOD 地区的空间可识别性，在中心地区和重要站点地区，采用环形放射布局依然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最后，大街廓模式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因而需要重视这一模式带来的问题。

**关键词：**TOD；城市形态；布局模式；街廓尺度；规划历史

**引文格式：**刘泉. 轨道交通 TOD 地区布局模式的形态演变[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79-87. DOI: 10.19830/j.upi.2017.158.

在 TOD 规划设计中，由于轨道站点数量众多，批量设计和整体管理是 TOD 规划的重要特征。基

于道路网结构的布局模式是空间规划设计的基础，特别是在新建地区，规划初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

对后续建设过程中规划区的用地效率、空间形式、功能与强度分布乃至规划建设实效的发挥均会产生长期影响。因此，在大规模 TOD 规划建设的背景下，对轨道站点 TOD 规划建设地区布局模式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对未来具体的规划工作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990 年代，卡尔索普提出的 TOD 模式作为经典模板，成为后续相关规划设计模仿的对象。但 TOD 规划并非一定要模仿卡尔索普模型的布局手法才能体现 TOD 的原则和价值。事实上，在实践中采用其他布局模式成功塑造 TOD 开发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并不新奇。然而，对于空间布局模式也有不同的声音，如笔者在学术会议中现场听到过某市规划管理部门的领导因为设计单位的方案看上去不像 TOD 模式而提出质疑。

那么，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理解 TOD 地区的布局模式？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模式？不同模式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历史研究是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即是从历史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总结。

TOD 地区规划设计的基本布局模式主要包括基于小尺度街廓的方格网模式和环形放射模式两种形式，均能从 TOD 概念诞生以前的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发展历史中梳理出演变脉络。

最早意义上的轨道站点地区开发是伴随着铁路和电车等轨道交通建设同步进行的，方格网模式可以上溯至 19 世纪的美国铁路站点地区规划建设，如 1831 年规划建设的萨默维尔和 1834 年规划的艾肯。

当时的铁路站点地区规划设计已经体现出标准化、模式化的特征。如伊利诺伊州在铁路沿线 33 个站点地区的开发中，采用同一团队、同一标准，完成了形态统一的方格网规划。这一时期，美国铁路沿线出现了数百个城镇，绝大部分的站点地区建设规模不超过 30~60 个街廓，每个街廓则分成 6~16 块用地。刘易斯·芒福德即认为，方格网规划结合公共交通网建设，构成支配 19 世纪城市发展的两个主要活动。

环形放射模式在轨道站点地区的应用同样有

较为悠久的历史，19 世纪末欧洲火车站前地区即经常采用放射形的古典主义设计结构，如法国斯特拉斯堡市火车站站前地区、1920 年代日本东京的田园调布地区和 20 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规划等等。

不仅在欧美地区，我国东北地区近代铁路附属地的建设同样具有标准化、模式化的特征，空间布局模式也以上述两种方式为主。

1990 年代，卡尔索普提出的美国式 TOD 理念在规划中延续了上述两种基本的布局模式，强调在站点地区的规划建设中，向传统的空间设计方法和布局模式靠拢。达拉斯等地的 TOD 规划设计实践及部分学者的研究也将 TOD 地区的空间布局总结为这两种基本模式。

此外，新加坡发展出了基于大街廓的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布局模式，如义顺和蔡厝港的街廓外边界形态并不规整，尺度一般为 200~600 m 不等；而榜鹅新市镇则采用了边长为 300~400 m 的方形街廓。

这三种模式对我国当前的 TOD 规划实践均产生了影响。以布局形式和街廓尺度为重点，结合国外案例及国内实践，可以将三种模式整理为六种主要的布局形态：正方形方格网、长方形方格网、方格网+放射线组合、方格网+放射线叠合、环形放射和大街廓。这些布局模式的应用可以从天津中新生态城、昆明呈贡新区、广东省在珠三角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城际轨道站场 TOD 综合开发规划相关工作中得到印证。

从 TOD 地区布局模式的形态演变可以发现，近代时期轨道站点地区基本的规划布局模式对后来的 TOD 地区的规划设计形成了重要影响，相关规划设计并没有突破既有的基本布局模式。在我国，诸多 TOD 规划研究与实践对卡尔索普的 TOD 模型进行了诠释和发展，而新加坡新市镇的模式则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地得到了再现。总体上，小街廓的方格网模式和环形放射模式以及大街廓模式依然是 TOD 地区主要的布局类型，虽然大街廓模式存在诸多不足，但受到各方面条件的约束，这一模式依然会在实践中被采用。这些模式都是 TOD 地区普遍采用的布局方法，各自的特点和问题值得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探讨。

# 轨交枢纽站域步行系统发展的模式、逻辑与机制——基于三个亚洲案例的比较研究

吴亮 陆伟 于辉 顾宗超

**摘要：**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背景下，轨交枢纽站域步行系统面临转型重构问题，一些亚洲高密度城市的发展模式可资借鉴。大阪梅田枢纽、香港中环枢纽和新加坡政府大厦枢纽分别代表了站城一体、广域互联和活力导向的步行系统发展模式。通过系统归纳与比较分析，它们在结构、功能和品质层面上体现出层化与网络、内化与关联、包容与持续的共性特征，而在具体的建构方式上又呼应了不同建成环境的有机差异。这些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依赖于有效的城市设计运作与导控机制，三个案例在持续推进、协同组织、精细导控等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现代城市设计实践与制度创新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轨交枢纽；步行系统；发展模式；建构逻辑；城市设计机制

**引文格式：**吴亮，陆伟，于辉，等. 轨交枢纽站域步行系统发展的模式、逻辑与机制——基于三个亚洲案例的比较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88-95. DOI: 10.19830/j.upi.2018.133.

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背景下，轨交枢纽站域步行系统面临转型重构问题。作为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典范，大阪、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城市的站域步行系统实现了与建成环境和步行需求的积极适应，其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深层规律可以为我国内地城市提供借鉴。

## 1 发展模式：三个亚洲案例研究

大阪梅田枢纽的“站城一体”模式。梅田枢纽通过发达的地下街系统、地面步道和广场、空中路径和平台等多层次步行基面将轨交车站与城市空间紧密关联，形成“站城一体”的发展模式。地下街系统将区域内 7 个轨道交通站点相互连通，形成便捷的换乘网络，并与大型商业设施的地下空间进行了一体化整合；地面人行步道是轨道交通与巴士系统联系的主要纽带，以“站南广场”和“梅北广场”为主要空间节点；空中步行路径由三部分接续构成，位于不同标高的公共平台通过连续的步行路径相互串接，形成多层次、主题化的公共空间节点体系。

香港中环枢纽的“广域互联”模式。中环枢纽依靠致密的街网和场所遗产以及全域化的空中步道系统逐步建立起与高密度环境和“旅运链”相适应的“广域互联”网络。中环街道系统致密狭窄，街区形态规整，核心区域分布的一些历史文化场所提供了近人尺度和多元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全长超过 3 km 的空中步道系统主要分布在香港站与中环站的交接区域以及中环站东南部区域，通过平行、对接和穿越三种模式将商业、办公和交通设施在二层（局部三层）基面上连为一体。

新加坡政府大厦枢纽的“活力导向”模式。新加坡以“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步行友好型物质环境”为发展理念，对政府大厦枢纽站域步行系统进行了以活力为导向的精细化设计。以地面层为基础，向地下和空中错位拓展，形成一个具有良好可达性和舒适性的空间网络。为保证步行系统的活力和吸引力，面向主要街道和公共空间的建筑首层必须用作零售、餐饮、康乐等能够促进活动发生的功能类型，即形成“活力引导区”；临滨海湾的大尺度开放空间为站域步行系统提供了不同特色的节点空间和花园般的视觉景观。

## 2 发展逻辑：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大阪、香港、新加坡三个案例均为亚洲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地铁枢纽，在步行系统建构理念和逻辑上体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同时又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回应了环境模式、枢纽类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

层化与网络。从步行系统的结构逻辑分析，三个案例都建立了多维基面的立体化步行系统。地面与非地面层的步行网络相叠合，形成具有更高密度和层级的空间网络，同时每个层次的步行系统都是一个完整、连续的空间体系。由于环境模式的差异，步行系统结构层次的拓展在三个案例中又表现出地下主导、空中主导和多维主导等不同的倾向性。步行系统的多层网络结构适应了地铁枢纽站域的可达性需求，解决了由高架轨道、城市干道等导致的城市空间割裂问题，而且实现了公共活动空间的“增量”式发展。

内化与关联。从空间使用方式分析，三个案例

的步行系统都包含较大规模的“室内化”步行路径，以及对建筑屋顶和地下空间的利用，体现了站域步行系统的复合化倾向。无论是空中系统的内化空间还是地下系统的关联开发，三个案例的发展经验都清晰地表明，站域步行系统与商业系统之间具有一种相依相存、共荣共生的紧密关联。通过城市与建筑、外部与内部的复合开发，步行系统的交通功能能够引导和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协同发展；同时，步行系统本身的空间结构也不必依赖于道路系统而得到优化，步行空间的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也可以得到提升。

包容与延续。在社会意义上，三个案例中的步行系统通过与周围环境和人的需求发生互馈，产生了空间特征的多样性、生态性和人文性，集中体现在一系列节点空间的营造中。大阪梅田枢纽结合建筑空间体量组织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节点体系，营造包容性空间环境的同时注重与自然生态、地域文化的融合；香港和新加坡案例的历史文化氛围浓厚，将一些历史形成的重要公共空间整合为步行系统的一部分，使其成为提升步行空间环境品质、激发和维持枢纽地区城市活力的积极要素。

### 3 发展机制：城市设计运作与导控

大阪、香港和新加坡三个案例步行系统的成功

不仅源于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还依赖于具有实效性的城市设计制度，都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自上而下”的城市设计运作体系不断推进而逐步形成的，是一项“有意识”的复杂系统工程。

大阪梅田枢纽的城市更新经历了枢纽形成、地下街的兴起、步行系统的一体化、站城一体开发四个阶段，在持续进程中站域步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日趋完善，与周边地区的关联逐步强化；香港中环空中步道系统是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开发运作的产物，通过公私联合开发模式实现了交通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效应”；新加坡市区重建局专门制定了枢纽地区城市设计导则，从地面步行网络、街区内部路径和视觉通廊、地下步行路径、架空步行路径四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各类步行空间的具体控制要求。

### 4 结语

大阪、香港和新加坡三个轨交枢纽案例的建成环境之间有一定差异，但发展均较为成熟、各具特色且广获赞誉，体现了与环境要素相适应的发展逻辑。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内地城市解决转型期步行系统的优化问题、提出系统的适应性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真实+价值：欧洲空间规划的可视化语境支持

赵珂 李忠蔚 夏清清

**摘要：**自然资源部成立后，以“空间规划”为核心的空间类规划体系将迎来新的变革。但空间规划作为新的具有综合性和统领性的规划类型，其编制体系、编制内容、编制方法等，在原有多项空间类规划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尚未修订之前，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针对“在不确定性条件中探索空间规划的确定性内容”这一命题，本文在已形成近 40 年的欧洲空间规划发展历程中，发现“沟通协商”“富有交往理性的协商规划”是消除欧盟各国空间规划差异性的基石和理论基础，具有展现“真实”与“价值”双准则语境的“可视化沟通协调平台”是欧盟各国空间规划都具有的确定性内容和最重要的决策支持，并总结展望能同时体现“真实”与“价值”双准则的可视化语境营建方法，希望能为我国空间规划研究提供确定性的支持。

**关键词：**空间规划；交往理性；协商规划；可视化语境；真实；价值

**引文格式：**赵珂，李忠蔚，夏清清. 真实+价值：欧洲空间规划的可视化语境支持[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96-101. DOI: 10.19830/j.upi.2018.546.

## 1 沟通协商：欧洲空间规划的基石

在 1999 年《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 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框架下, 欧盟各国开始展开空间规划研究和实践的 30 年中, 关于空间规划的定义、政策依据、编制体系, 各国都存在较大的差别, 能达成的共识主要体现在规划核心、规划重心和规划中心三大方面。

ESDP 明确提出“将地域作为欧洲政策的一个新维度”。该政策首先要突破行政区划界线, 在真实存在且利于理解经济联系、环境承载和生活日常时空格局的功能性空间中进行规划, 这个功能性空间就是“地域”。空间规划的核心, 就是以“3Cs”(cohesion, coherence, cooperation) 为目标, 以“地域融合”理念确保所有地区的和谐发展, 确保这些地区的居民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地域特性, 将地域多样性转化为资产, 以利于全欧盟的可持续发展。

贯彻地域融合政策的欧洲空间规划, 属于“治理”范畴, 而不是“管理”。但它并没有脱离土地利用规划和战略发展规划, 而是针对顺应时代的新目标, 反思传统规划的失效, 通过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将土地利用规划和战略发展规划中好的规划要素整合在一起形成既区别于传统规划又植根于传统规划的综合规划类型。规划的重心主要是整合与协调多部门政策, 从对用地空间的技术“管理”转变为场所生产(place-making)的“治理”。

空间规划是一种通过对地域发展的管理, 协调各部门政策对空间的影响, 引导“对空间保护与利用的管制, 对不同部门政策在空间上协调”两大行为。基于前述概念共识, 欧洲空间规划不是一个法定规划, 也不是凌驾于其他规划之上的“总体规划”, 它最大的作用是以 3Cs 目标为中心, 为各层次地域、各部门以及居民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协调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 不同的利益者能看见不同地域的资源特点, 也能看见不同利益的矛盾, 有助于通过彼此的沟通, 达成矛盾协调的共识, 并共享战略的前景。

## 2 真实+价值：协商式空间规划的可视化语境支持

协商式空间规划的重点是建立无语言障碍、以

图式表达为主体的“可视化语境”。该语境具有三大决策支持能力：(1) 对规划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等的决策支持；(2) 为决策者过滤出大众关注的问题；(3) 对问题和需求的觉察能力, 同时, 可视化语言的表达必须保证交往活动的“可理解、真实、诚恳、合理”四个合理性前提。

可视化语境, 由反映“真实”、理性的地图制图(cartography)和体现“价值”、富有创造性的信息制图(infography)共同营建。

地图制图, 是以富有数据的地图形式, 旨在为可视化语境提供理性、客观、体现“真实”的表达。但是否“真实”, 是通过在图形和概念两大层面, 对数据进行选择、简化、夸大、替代和融合等处理的地图综合过程(generalisation)而决定的。

信息制图, 是以地图制图形成的底图作为基础, 针对不同的情景, 创造出不同的艺术性概念符号, 提炼出明确的“价值”图景, 唤起情景中相关利益者对“价值”达成共识, 从而寻求获得价值的路径。情景, 是基于对主要关系和驱动力的内外一致性假设, 对未来发展作出的可信性描述。

欧洲空间规划中的情景包括三类：(1) 描述性情景或趋势情景, 展现已存发展趋势的持续性和在没有政策干预下的地域影响；(2) 纲领或策略情景, 是表明具有前瞻性空间引领意识的规范化情景；(3) 替代性情景, 展示在一定的行动和政策影响下, 与当前情况相比更有利的空间结构。与三类情景对应的“价值”图景包括：总体规划图景、真实图景、任务宣言图景和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理想图景等。

## 3 结语

在欧盟各国, 地域多样性导致空间规划在定义、体系构成、目标导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但欧盟并没有刻意去消除这些差异, 而是秉承“交往理性”的原则, 以营建一个既能反映“真实”又能反馈“价值”的可视化语境为确定性内容, 致力于搭建欧洲空间规划的“沟通协调平台”, 对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并监督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荷兰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及其启示

鲁钰雯 翟国方 施益军 周姝天

**摘要：**作为一种战略性、基础性的规划手段，空间规划可以通过影响城市结构或土地利用等降低城市面对的多重风险及影响。传统规划对于空间如何应对变化、冲击及不确定性的关注有待提高，“韧性理念”在规划中的引入为协调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安全底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荷兰空间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挑战和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本文结合荷兰空间规划实践，探讨空间规划政策中的韧性理念和特征，以及如何通过规划应对风险和挑战。研究表明，虽然不是所有的韧性特征均能在荷兰空间规划中得到体现，但韧性理念始终贯穿于各级空间规划，且不同层级空间规划所关注的韧性侧重点不同。在研究基础上，建议将韧性理念应用于我国空间规划，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安全发展背景下完善和优化空间规划提供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韧性；空间规划；荷兰；规划实践；适应性

**引文格式：**鲁钰雯，翟国方，施益军，等. 荷兰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及其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102-110. DOI: 10.19830/j.upi.2019.059.

荷兰空间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挑战和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文结合荷兰空间规划实践，探讨其空间规划政策中的韧性理念和特征，以及如何通过韧性规划应对风险和挑战。在研究基础上，建议将韧性理念应用于我国空间规划，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安全发展背景下完善和优化空间规划提供思考与借鉴。

## 1 荷兰各级空间规划实践中的韧性理念

### （1）国家级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

荷兰政府在历次洪涝灾害中逐渐重视起韧性发展。例如增加洪水风险管理系统的韧性，为水安全制定可持续和综合的长期方法以抵御海洋风险；列出长期“气候保护”政策指导方针以提高“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通过“水土整合”“创造韧性空间”等规划设计手段使规划保持足够的灵活性；确定适应和缓解措施是中心支柱，将荷兰建设得更加便捷、宜居和安全；提出围绕雨洪安全、淡水供给、水质提升的适应性空间规划方案；进一步与空间适应性相融合，提出对空间规划进行调整，将韧性理念、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融入规划建设，达到整体预防灾害的效果。

### （2）省级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以格罗宁根省为例

格罗宁根省受到气候变化、水灾害及能源紧缺等多重影响，力图通过提高空间规划的韧性来适应

气候变化和解决能源枯竭问题，将韧性理解为区域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的能力，并将“适应性”纳入空间规划中。在空间规划前期，通过绘制该地区海平面上升风险图和能源发展等地图，将该区域水资源、农业资源、能源资源、海岸线保护、生态发展和城市发展等在空间规划中整合，生成格罗宁根省气候适应图，提出韧性空间战略干预策略。侧重战略干预和政策引导，强调为未来威胁和发展创造空间，通过利用复杂自适应空间系统韧性，使该区域在空间上能够主动适应新的环境和发展。

### （3）市级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以鹿特丹市为例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鹿特丹空间规划思维也从传统的工程导向变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韧性空间规划，将韧性理解为提升城市在冲击和扰动下维持基本功能的能力，侧重具体的结构性规划或更为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表现形式更具体。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和脆弱地区，将水问题作为空间规划的重点。提出多种与水系协调发展的方式，在河口地区为未来预留空白用地；打造韧性水系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 2 经验与启示

首先，构建面向韧性发展的空间规划框架。依托韧性前瞻性、灵活适应性、创新性、协作性、自组织能力和自学习能力等特征，提出可预见性更高、

规划目标更长远的韧性空间规划目标。通过韧性监测、韧性评估、韧性实施、韧性管理等步骤，将韧性理念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建设进行耦合。

第二，明确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关注的韧性重点。国家级空间规划应注重战略与目标导向，突出韧性发展目标，提出韧性指标，侧重预防型和非结构型的韧性特征。省级空间规划应重视韧性管控和引导发展，注重构建多级联动的韧性综合管理平台和多元参与模式。市、县、乡级规划侧重结构性韧性空间规划，将韧性理念落实到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

施规划等详细规划层面，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第三，建立空间规划韧性监测、评估和预测平台是我国空间规划的基础和韧性发展的前提。通过收集整理规划现状情况和韧性关键指标的跟踪反馈，建立韧性监测平台和韧性空间量化评估模型。

第四，重视规划的实施和管理，强调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协作，形成多层级协作的实施管理机制。

### 荷兰工业用地利用政策演变与对中国的启示：公共土地开发模式与可持续的土地开发利用

屠帆 胡思闻 赵国超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荷兰公共土地开发模式应用于工业用地开发的背景、特征和改革方向，对比中国工业用地中土地开发模式同荷兰的差异和存在的问题，探讨其对中国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启示。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发现荷兰工业用地开发利用中公共土地开发模式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改革方向聚焦于存量工业用地开发、可持续土地开发利用和提高工业物业质量。中国与荷兰在工业用地开发利用上的共同点在于政府主导工业用地供给，差异性在于中国工业用地的地价远低于土地成本价，无法实现成本回收。因此，中国工业用地政策需要改变定价方式、推动工业不动产的业态形式多样化并提升物业质量，新增工业用地面积应与存量工业用地面积相挂钩。

**关键词：**公共土地开发模式；工业用地；存量土地开发；土地价格；荷兰

**引文格式：**屠帆，胡思闻，赵国超. 荷兰工业用地利用政策演变与对中国的启示：公共土地开发模式与可持续的土地开发利用[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111-117. DOI: 10.19830/j.upi.2018.432.

公共土地开发模式（public land development model）是荷兰实现城市规划目标和战略的核心，在此模式下，通常由市政府购买待开发的土地，开发成熟地后出售，通过销售建筑物地块回收土地开发的成本。

中国与荷兰虽然在土地产权制度和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但是在工业用地开发模式上有高度的相似性，因而分析荷兰公共土地开发模式的政策演变、政策工具、存在问题和改革方向有助于推进我国对于工业用地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荷兰政府介入土地开发始于二战前，1875 年《侵害法》（The Nuisance Act）通过土地分区降

低了环境风险，1901 年《住房法》（The Housing Act）保障地方政府进行工业区开发，这些为政府征用土地提供了依据。现代荷兰政府的公共土地开发模式始于二战后，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推进，荷兰政府积极供应土地和提供补贴确保工业用地需求。直到 1990 年代初，荷兰一直以公共土地开发模式为主，私人开发商对工业用地开发不感兴趣。由于荷兰的《强制购买法》（Onteigeningswet,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Act）保证了市政府在土地开发中的权利，同时较低的土地市场价值水平降低了市政府在公共土地开发中购买土地的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出售地块价格与市场价值间差异较小。

由于荷兰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公共土地开发模式在保障工业用地供给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是工业用地供给过量。现有工业用地预计已经可以满足未来 10~2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需求。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工业用地面积远远大于居住用地面积。

二是工业园区老化。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园区现在面临着建筑质量下降、老化和公共空间质量下降的问题。现有工业厂房建筑面积的 33% 被标为质量“恶化”(deteriorated)，必须进行必要的投资以恢复工业建筑质量和园区环境。

三是政府间竞争产生工业用地价格偏低。荷兰工业用地中，约 75% 由公共机构提供。由于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提供工业用地，使得工业用地价格较低并接近成本。

四是工业用地过量供应造成景观破碎。工业用地的大量发展带来景观的负面外部性。在过去

15 年中，工业用地对城市蔓延的影响非常大，远高于居住用地，居住用地反而有供应不足的迹象。

为了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荷兰在工业用地改革方向聚焦于存量工业用地开发、可持续土地开发利用和工业物业质量提升。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是工业用地的供给主体，这一点与荷兰的公共土地开发模式相同，中国和荷兰也都存在区域层面的用地指标控制体系，但是两国也存在差异。荷兰虽然工业地价不高，但地方政府仍可以实现成本回收，而在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下，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用地市场化政策、最低限价政策以及旨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政策，但绝大多数工业地价无法实现成本回收，工业用地利用率较低。

鉴于荷兰公共土地开发模式及可持续利用改革方向，中国工业用地政策需要改变定价方式，推动工业不动产业态形式多样化和提高质量，将新增工业用地供应数量与存量工业用地面积相挂钩。

## 英国保护区评估方法解析——以格拉斯哥历史中心保护区评估为例

肖竞 曹珂

**摘要：**文章剖析了英国保护区保护与评估的制度架构与管理程序，并以英国格拉斯哥历史中心区评估为例，从登录信息核定、历史沿革梳理、形态肌理识别、建筑特色提炼、特征风貌区划、边界范围修订、管理实施建议等方面系统梳理介绍了英国保护区评估的内容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出“强调价值关联、重视特征提炼、关注变化影响、提倡保用平衡”的英国保护区评估特色，以期为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评估与管理工作提供经验启示。

**关键词：**保护区评估；格拉斯哥历史中心；评估方法；价值关联；特征提炼

**引文格式：**肖竞，曹珂. 英国保护区评估方法解析——以格拉斯哥历史中心保护区评估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118-128. DOI: 10.19830/j.upi.2017.484.

## 适应多元居住需求的住房规划管理体系——日本住房制度变迁的启示

董晓颀

**摘要：**目前我国住房的核心矛盾已经从供需不足转为供需不匹配，相应的制度亟待改革。本文参考经历过类似转变时期的日本，从完善法律体系、供给体系及规划实施体系三方面入手进行考察，探讨做什么、谁

去做以及怎样做三个问题。首先，相对于管理，日本住房体制更关注保障居住权利，并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各方责任，形成权力制约。其次，政府并不直接提供住房，而是鼓励多方合作，从刚性“管制”转为弹性“引导”。最后，通过完善的统计系统和监督体制、相对独立的住房规划体系、切实可行的居住质量和居住面积等指标体系来确保有效提供住房。日本所有的住房政策都明确地指向一个目标：解决不同人群的多元居住需求，并通过细致严谨的规划管理体系保障实施，这对于我国从居住需求角度出发改革住房制度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住房政策；住房规划；居住需求；居住标准；规划实施

**引文格式：**董晓颀. 适应多元居住需求的住房规划管理体系——日本住房制度变迁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1): 129-136. DOI: 10.19830/j.upi.2018.040.

住房是民生的基本问题，一直被社会广泛关注。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15 年我国住房总量已经超过人均一套，住房供给看起来已经饱和；但实际上，这是我国住房供给的核心矛盾从供需不足转向供需不匹配的信号。不匹配包括两层，一是地域不匹配，大城市缺房，小城镇房地产过剩；二是需求不匹配，房价高企，低收入阶层甚至中等收入阶层都很难获得具有一定居住品质的住房。

日本同样经历过类似的时期。本文试图考察日本住房制度和规划管理体系的变迁，文章结构分为完善法律体系、供给体系及规划实施体系三方面，实际上就是探讨做什么，谁去做，以及怎么做三个问题。

首先是做什么的问题。我国虽然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去年更出台了针对住房租赁和销售的法规《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但其重点在“管”，规定了责任，而没有完全解决“保”，即保障居住权利的问题。日本住房基本法律《住生活基本法》确定了“为促进安定的居住生活的保障和改善”，以及“在促进国民生活安定向上和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目标，并相应出台了多项相关法规，以适应多元居住的需求；在保障中低收入人群住房的基础上，也照顾到特殊人群，如老人和残疾人。

确立了目标，就需要解决谁去做的问题。日本

政府经历了从刚性“管制”到弹性“引导”的职能转化。日本也曾经通过政府或相关机构提供公共住房，但由于公共住房缺乏应对市场的灵活性，成本难以控制，存在质量缺陷，同时政府财力有限难以持续。居民需求导致条件更好的民营房屋占据了市场主体地位。政府通过反思，开始管“租”不管“建”，注重监督和服务，摸索出国家引导、市场主导、个人和地方团体共同合作的制度体系。

确定权责后，就是具体怎么做，怎么做好的问题了。日本有独立的住宅规划体系，横向注重与相关规划协调，纵向保证从中央到地方进行有效传递，其核心是易于实施和监督，同时又具有良好的弹性指标。一系列居住水平标准除了保证住宅本身质量的住宅性能指标，还包括居住环境质量和居住面积。居住环境标准涵盖安全防灾、绿化景观和公共空间的优美丰富性，环境负荷的持续性和特殊人群的使用。居住面积指标也十分细致，分为最低标准和改善标准，同时考虑到地域差异，大都市区有相应的减少。面积指标从单身开始，根据家庭人口递增。最低使用面积为单身 25 m<sup>2</sup>，三口之家 40 m<sup>2</sup>；大都市区的改善标准则是单身 40 m<sup>2</sup>，三口之家 75 m<sup>2</sup>。

日本所有的住房政策都明确地指向一个目标：解决不同人群的多元居住需求。而其规划管理体系相当细致严谨，对我国从居住需求角度出发改革住房制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 美国金县乡村空间规划管控

李强 汪伟 张健

**导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试点的规划实践为空间规划改革和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国乡村地域面积辽阔、用地类型多样、土地产权复杂，目前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三区三线”和统一的用地分类标准难以实现对乡村的用途管控。本文通过资料调查、案例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研究了美国金县的规划体系和思路，以期为我国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乡村规划管控提供一些建议。

**引文格式：**李强，汪伟，张健．美国金县乡村空间规划管控[J]．国际城市规划，2020(1): 147-153. DOI: 10.19830/j.upi.2019.174.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试点的规划实践为空间规划改革和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国乡村地域面积辽阔、用地类型多样、土地产权复杂，目前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三区三线”和统一的用地分类标准难以实现对乡村的用途管控。本文通过研究美国金县的规划体系和思路，提出对我国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中乡村规划管控的思考。

美国的县域分为自治地区和非自治地区，自治地区是城市政府管辖的区域，非自治地区是县政府管辖的区域。因此，其非自治地区相当于我国的乡村地区，其规划管理由县政府负责。

一般而言，美国的县规划体系可分为三个层面。以金县为例：州层面，华盛顿州政府制定《增长管理法》指导区域层面和县层面的规划，旨在解决规划不协调和城市无序增长的问题。区域层面，普吉特湾地区包含金县在内的4个县政府共同编制了区域的《2040 发展愿景》，同时金县政府和其管辖内自治地区各政府共同编制《县域规划政策》。最后在县层面，金县政府编制其管辖内非自治地区的战略规划、综合规划、区划等。

美国县政府对乡村地区的规划管控主要通过

综合规划和区划来实现。综合规划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线，即城市增长区边界线——既能够防止乡村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增长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城市土地和设施的集约高效利用。二是统筹了各类功能规划中的发展性内容和环境敏感区等保护性内容，并反映到土地利用规划图中。区划由区划地图和区划条例构成。区划地图在衔接土地利用规划图的基础上，形成了三级土地用途分区体系。区划条例通过对各类用途分区的使用性质、开发类型、开发强度以及保护要求的规定实现对乡村地区的规划管控。

美国金县规划体系与方法对我国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中乡村地区规划管控有三方面的启示。第一，县域空间规划应在宏观层面把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平衡各类规划的空间需求，实现规划的统筹协调，从战略高度构建乡村地区建设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空间格局，从根源上解决乡村地区的规划冲突与矛盾问题；第二，应划定并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以防止城市蔓延和乡村无序建设；第三，县域空间规划应衔接用地规划，探索出合理的地块划分机制和分区方法，并规定地块允许的具体用途和相应条件，以及各种建设管控条目。

## 新加坡城市设计审查制度

郑宇 方凯伦 牛通 袁媛

**导读：**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入新常态阶段，城市建设和发展更加注重内涵和品质提升。2017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规定“城市应结合具体情况在城市总体层面、重点地区层面、街道和街区层面开展城市设计，并纳入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性规划中予以落实”，不仅明确了城

市设计工作的重要性和编制内容,更强调了城市设计应被纳入法定的规划编制和管理中,保障其可实施性。现代城市设计审查制度源于美国,新加坡在整合欧美城市设计思想基础上结合本土特点,有侧重地确定了城市设计关注方向和工作方法,特别是重点开发地区必须通过设计审查进行控制和协调,为政府、开发商和市民之间的有效沟通提供了平台和基础,这已成为新加坡城市设计的重要特征。本文在梳理新加坡城市设计控制体系各阶段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重点从审查机构、审查标准和审查流程三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城市设计审查的管理内容,并结合新加坡汇锦园(RiverGate)项目剖析了城市设计审查的豁免案例,旨在为中国城市设计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与借鉴。

**引文格式:** 郑宇,方凯伦,牛通,等.新加坡城市设计审查制度[J].国际城市规划,2020(1):154-158. DOI:10.19830/j.upi.2019.065.

现代城市设计审查制度源于美国,新加坡在整合欧美城市设计思想基础上结合本土特点,有侧重地确定了城市设计关注方向和工作方法,特别是重点开发地区必须通过设计审查进行控制和协调,为政府、开发商和市民之间的有效沟通提供了平台和基础。

### 1 新加坡城市设计控制

新加坡的规划体系分为“概念规划—总体规划—通则和专项导则—地块开发”四级,分别体现了概念规划、总体规划和规划实施三个过程(表1)。而城市设计控制贯穿其各个阶段,对开发者选择地块和项目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 2 新加坡城市设计运行——城市设计审查

**审查机构:**根据城市设计的项目性质及开发特点,新加坡设立了相应的设计审查机构对城市设计个案进行审查,审查机构依据城市发展需求进行部分调整,例如2017年,审议机构包括国际专家小组、设计咨询委员会、保护顾问小组、设计导则豁免委员会等。

**审查标准:**新加坡城市设计导则承担了控制引导城市形态、审核相关设计方案、管理开发申报等作用,将开发控制与设计控制合为一体。作为设计审查的主要标准,设计导则主要通过对修订土地利用、步行交通、照明系统、户外美观及商业活力、设施遮蔽、激励政策等方面进行设计控制,导则的针对性强,保障控制核心设计内容(表2)。

**审查流程:**新加坡的城市设计控制从项目审议、投标、申诉等方面明确了各责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促进了城市设计管理过程的有序运行。管理流程主要包括土地销售与开发控制(表3)。

### 3 新加坡设计控制案例:汇锦园的建筑高度豁免案例

汇锦园(RiverGate)是一个建于2009年的永久产权租赁开发项目,位于罗伯逊码头区域,是新加坡首个因创新设计方法而被市区重建局称为地标性建筑的住宅项目。

**建筑方案与城市设计导则的冲突:**汇锦园位于城市设计指引中的新加坡河片区(Singapore River)内,城市设计指引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滨海生活方式,并建设行人友好型步行径。按照设计师理念,这里应成为整个新加坡河的绿色主题标识空间。开发三栋43层的高层建筑,违背了设计导则“建筑不超过10层”的控制要求。

**设计导则豁免委员会审议:**汇锦园居住区虽然突破建筑高度的要求,但其广泛使用绿色植物的设计手法在当时看来相当创新。因此,设计豁免委员会提出:“建筑高度提高到43层,同时取消建筑贴线和首层骑楼的设计要求,使开发商可以在地面提供开敞的绿化空间和沿河开放空间;取消坡顶的要求,代之以隔栅和飘板屋顶,配合其高层建筑及新颖的造型,并要求在屋顶进行夜间的亮化,以增加标志性;对沿河界面提升城市活力的功能要求进行修改,不再要求所有的沿河界面具有这样的功能,以创造开放性的界面。激发城市活力的功能被要求设置在地块的一角,即靠近罗伯逊河桥的一角设置,以作为连续活动的一个端点”。最终,汇锦园设计以其大胆的建筑设计、苍翠的多层空中花园以及与新加坡河长廊无缝结合的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成为新加坡河沿岸的地标,也成为首个通过新加坡设计导则豁免委员会审议的开发项目。

表 1 新加坡城市设计层级及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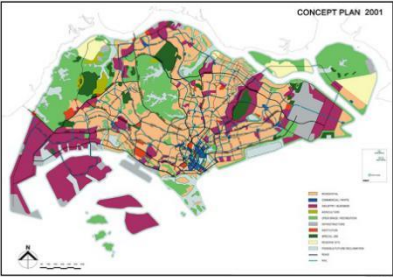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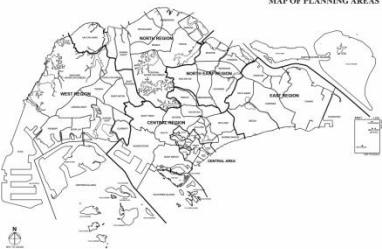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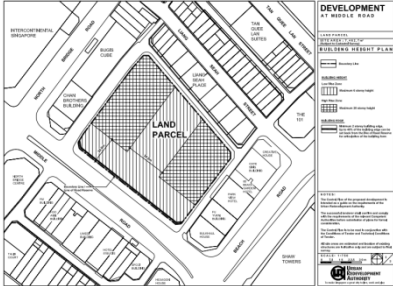
| 规划阶段   | 规划类型                    | 设计内容                                                                         | 规划图纸示例                                                                                                  |
|--------|-------------------------|------------------------------------------------------------------------------|---------------------------------------------------------------------------------------------------------|
| 概念规划阶段 | 概念规划（非法定规划）             | 新加坡概念规划制定之初就融入了城市设计思想与策略，明确城市设计的关键要素                                         | <br>概念规划图             |
| 总体规划阶段 | 总体规划（法定规划，相当于中国控制性详细规划） | 总体规划（master plan）以及详细规划（control plan）体现了重要城市设计要素的控制，划定了市中心区内的城市设计分区，形成设计控制框架 | <br>总体规划分区图           |
| 规划实施阶段 | 通则和专项导则（政府公文）           | 制定设计控制要求；分区城市设计导则：由一系列与该区设计问题相关的导则组成                                         | <br>城市空间和高层建筑景观更新导则图 |
|        | 地块控制导则（土地出让技术条款）        | 落实设计控制要求；土地租售计划所涉及的地块，以城市设计总图（或）导则的形式提供补充的开发控制条件；有些导则还特别明确了设计审查的评判标准         | <br>土地出让中建筑高度条件     |

表 2 新加坡城市设计导则主要内容

| 导则类型   |         | 引导内容                                                     |
|--------|---------|----------------------------------------------------------|
| 修订土地利用 | 街区规划修订  | 规定土地利用类型、容积率、高度、建筑形式、后退红线及建筑边缘、服务设施区、屋顶形式、机动车入口、停车位等相关内容 |
|        | 建筑高度修订  | 放宽居住建筑高度限制                                               |
|        | 居住转酒店用地 | 土地功能由居住用途转为酒店用途                                          |
| 步行交通   | 步行道     | 规定新加坡河滨步道设计要求                                            |
|        | 地下步行走廊  | 鼓励乌节路和 CBD 地区建筑间地下连廊建设                                   |

|           |              |                                                |
|-----------|--------------|------------------------------------------------|
|           | 市区室内和户外步行道设计 | 指导市区室内和户外步行道设计，分庆典路线和遗产路线规定地铺材料等               |
|           | 城市阳台         | 定义城市阳台，图则化规定了城市阳台的结构、尺度和设计材料等                  |
|           | 二层连廊         | 定义二层连廊，图则化规定了二层连廊的位置、结构、设计等                    |
|           | 一层连廊         | 定义一层连廊，图则化规定了一层连廊的位置、结构、设计等                    |
|           | 地铁通廊         | 规定加建与改建过程中加设的地铁通廊并图则化规定了地铁通廊位置                 |
|           | 建筑边缘         | 规定乌节路沿街建筑要遵循统一的建筑边缘，40%的建筑立面要形成衔接，创造多样的空间和建筑立面 |
|           | 活力激发         | 规定建筑底层的商用特征和具体形式                               |
|           | 乌节路城市设计导则    | 针对乌节路地区的空中连廊、城市阳台、立面衔接等进行导则修订                  |
| 照明系统      | 夜间照明         | 各区域的照明设计方式和光温要求                                |
|           | 建筑照明         | 列表规定了不同建筑类型、不同景观类型的照明申请细则                      |
| 户外美观及商业活力 | 户外标识         | 规定了市中心区建筑广告招牌等多种户外标识的安放位置和设计形式                 |
|           | 户外零售亭和餐饮区    | 规定户外零售亭和餐饮区的规模、位置、结构和铺装形式等                     |
| 设施遮蔽      | 机电服务设施及停车遮蔽  | 图则化规定屋顶机电服务设施的遮蔽设计细节以及地面层以上的停车位的遮蔽形式           |
| 激励政策      | 艺术奖励         | 奖励开发公共空间艺术的开发商额外的建筑面积，规定了适用地区、计算方式以及艺术品的申请条件   |
|           | 照明奖励         | 通过现金奖励和建筑面积奖励，鼓励开发商提供外部夜间照明，规定照明范围和激励条件        |
|           | 景观替代面积       | 定义景观替代面积、计算方式、种植要求及树种参考等                       |
|           | 地下步行连廊现金奖励   | 规定连廊激励现金奖励的申请条件，连廊位置、规模和功能                     |

表3 新加坡城市设计控制程序

| 流程   | 审批类型                  | 审批内容                                                                                                  |
|------|-----------------------|-------------------------------------------------------------------------------------------------------|
| 土地销售 | 正选清单 (Confirmed List) | 销售的土地分两种，包括位于备选清单 (reserve list) 内的土地和位于正选清单 (confirmed list) 的土地。位于正选清单中的土地可参与投标，通过比较多方价格高低来确定中标者    |
|      | 备选清单 (Reserve List)   | “备选清单”是指尚未确定具体用途的场地。被列入备选清单的投标的潜在开发者必须提交设计方案并接受评估，以作为是否有资格参与投标的先决条件，即“双信封投标程序”                        |
| 开发控制 | 一般审批程序                | 依据《规划法》(第232章)，“开发”指在土地上或土地下进行任何建筑、工程、采矿、土方工程，或进行其他作业，或对任何建筑或土地用途作出实质改变。所有开发工程均须按照《规划法》要求获得市区重建局的规划许可 |
|      | 重点地区的设计审查             | 不同时期设计审议程序有所区别，但共同特点是通过组织专门的审议机构对个案进行控制。这些机构主要包括设计顾问委员会，设计导则豁免委员会，并针对特定地段设立专门委员会对个案进行特别审议             |
|      | 申诉                    | 当申请人质疑开发控制或设计审议的结果时，可选择进行申诉程序                                                                         |

## 2020年第2期文章目录

### 本期主题 为收缩而规划：范式转换和关键议题

西尔维娅·索萨, 保罗·皮诺, 著; 雷链, 周恺, 译 / 为收缩而规划：一种悖论还是新范式？

周恺, 刘力奎, 戴燕归 / 收缩治理的理论模型、国际比较和关键政策领域研究

周恺, 戴燕归, 涂嫒 / 收缩城市的形态控制：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耦合框架

杜志威, 金利霞, 张虹鸥 / 精明收缩理念下城市空置问题的规划响应与启示

——基于德国、美国和日本比较

高舒琦 / 精明收缩理念在美国锈带地区规划实践中的新进展：扬斯敦市社区行动规划研究

沈瑶, 朱红飞, 刘梦寒, 木下勇 / 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城市收缩时代的规划对策研究

伊琳娜·巴拉舍娃, 冷红, 宋世一 / 严寒地区的收缩城市研究

——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三个极地城市为例

### 城乡研究

林伟斌, 孙一民 /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对我国城市适应性转型发展的启示

周聪惠 / 公园绿地绩效的概念内涵及评测方法体系研究

李艳霞, 武玥, 王路, 王超, 石邢 /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比较研究

冉奥博, 刘佳燕 / 日本城市为何不是千城一面？——基于城郭的城市空间特色塑造

王超深, 赵炜 / 首尔大都市区职住空间演进规律探究及启示

### 规划研究

张和强, 王欢, 李晨, 盛鸣 / 从改革到构建：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发展

邢忠, 汤西子, 顾媛媛, 周茜 / 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规划与管控：美国圣克拉拉谷地的经验

林雄斌, 徐媛, 董美璇, 林培楠, 黄赞, 徐可 / 大都市公交导向开发的规划与政策：

深圳与西雅图的对比

李泽, 侯英裕 / 城市废弃铁路更新的融资机制解析——以美国亚特兰大环线税收分配区政策为例

### 实践综述

肖锐琴, 刘雷 / 香港空中步行系统的规划实施运作研究

### 专题研究

蒋敏, 卢峰 / 艾伦·雅各布斯的复合型林荫大道



2020年 第2期

## 为收缩而规划：一种悖论还是新范式？

西尔维娅·索萨 保罗·皮诺 著 雷链 周恺 译

**摘要：**已经有大量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文献加入到城市发展问题的学术讨论，它们在多种多样的（甚至差别极大的）城市发展背景下研究制定相应规划政策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收缩的学术争论仍然势力微薄并且片段分散。这也许是该话题本身的特点，或因为城市收缩还是个相对新颖的概念。对于如何为收缩的城市制定规划，学术界目前还缺乏一个明确、详尽和全面的理论讨论框架。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收缩的内涵和意义，思考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作用，以及思考为收缩而规划时所面对的冲突和矛盾，即收缩规划中的“悖论”。规划应如何应对收缩？相应的规划政策应该是什么？收缩规划就是为人口减少而制定的规划吗？或是为了管理人口减少的规划？还是一如既往，是为了恢复人口增长的规划？管理收缩到底意味着什么？本文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初步的结论。

**引文格式：**西尔维娅·索萨，保罗·皮诺. 为收缩而规划：一种悖论还是新范式?[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1-11. DOI: 10.19830/j.upi.2020.015.

早在 2012 年，《收缩的城市》中文译本的序言中就发出呼吁：“中国的城市规划师不仅应肩负起‘为了增长而规划’的职责，也应该准备好‘为了萎缩的规划’，两者结合方能实现更健康的城市和区域发展”。

随着我国城镇化开始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步调，“收缩城市”如今逐渐获得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城镇发展中阶段性、周期性、持续性的收缩情景可能会出现。因此，有必要展开收缩期的规划方法探索，弥补我们在应对这一情景时的技术储备不足。

本期主题“为收缩而规划：范式转换和关键议题”，涉及城市收缩应对中的思维转换、国际比较与政策议题，试图讨论收缩规划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1）范式转换方面。第一篇译文《为收缩而规划：一种悖论还是新范式》详细介绍了有关为收缩规划还是为增长规划的争论，在国际发展语境下开展了对收缩应对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论述，引出了本专辑的核心话题“为收缩而规划”。第二篇综述文章

《收缩治理的理论模型、国际比较和关键政策领域研究》，延续了译文的话题，通过理论模型介绍“增长与收缩是城镇化的一体两面”的核心观点。并且结合中国当前国情，比较和讨论了国内外城市收缩应对策略和方法（收缩治理）。

（2）关键议题方面。本专辑文章涉及的政策方法横向覆盖了：“收缩城市形态管控”——《收缩城市的形态控制：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耦合框架》、“收缩城市的社区行动”——《精明收缩理念在美国锈带地区规划实践中的新进展：扬斯敦市社区行动规划研究》、“土地和住房空置问题治理”——《精明收缩理念下城市空置问题的规划响应与启示——基于德国、美国和日本比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城市收缩时代的规划对策研究》等多个领域。

（3）本专辑涵盖多个收缩城市研究典型国家和地区：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中东欧，还包括一篇在英文文献中尚研究不多的俄罗斯收缩城市原创论文：《严寒地区的收缩城市研究——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三个极地城市为例》。

## 收缩治理的理论模型、国际比较和关键政策领域研究

周恺 刘力奎 戴燕归

**摘要：**如何保障城市在人口收缩情景下实现平稳的发展转型，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长历史时期和大空间尺度看，城市的生长和收缩是高度关联的过程。基于这一点认识，文章首先解释了收缩城市文

献中常引用的三种理论模型：生命周期模型、启发式模型和政治经济模型，它们为学者理解、总结和归纳收缩治理政策提供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维度。其次，在综述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中东欧部分国家的收缩治理模式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其城市收缩特点、关键政策行动以及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内外部条件。最后，本文在发掘全球收缩城市共性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收缩的现实情况，提炼出对我国收缩治理具有借鉴价值的三个政策领域：福利治理、形态管控和吸引力提升。

**关键词：**城市治理；收缩城市；精明收缩；城市政策；城乡规划

**引文格式：**周恺，刘力奎，戴燕归. 收缩治理的理论模型、国际比较和关键政策领域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12-19. DOI: 10.19830/j.upi.2020.050.

这是一篇有关“收缩治理”的综述论文，其中大部分信息出自 2018—2019 年间在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访学观感。这次访学以中美收缩城市比较研究为主题，合作研究者贾斯汀·霍兰德（Justin Hollander）教授也一直致力于分析收缩城市的规划应对，研究积累丰厚。除了教授和学校提供的丰富研究资料以外，北美东北部地区各种收缩城市（镇）案例，也让这一年的考察收获颇多。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文章内容之外的花絮。

## 1 收缩城镇考察和国际比较

考察的第一个感慨是这里城镇收缩的历史悠长。除了那些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案例，美国东北部还有很多收缩中的中小城镇：枪火生产基地和汽车配套产业中心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 MA）、水力造纸工坊霍利奥特（Holyoke, MA）、捕鲸和鲸油加工港口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 MA）、北美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城伍斯特（Worcester, MA）、玻璃产业小镇科宁（Corning, NY）等等。这些城镇大多崛起于 19 世纪美洲工业革命期间，在百年的演化中经历了多次起伏，有些成功地升级了产业（如科宁），有些逐渐转型了发展动能（如伍斯特），有些已经没落并艰难维系（如新贝德福德），有些仍然在衰退中挣扎（如斯普林菲尔德和霍利奥特）。通过进一步阅读文献，我发现很多美国大都会也都经历过若干次繁荣和萧条的轮替。即便是如今无比繁华的纽约市也曾经历过消沉的 1960 年代，那个时期的曼哈顿是萧条、破败、危险的代名词。人们对中心区生活的再度认可实际上仅是近 40 年间的事情。在拉开了考察城市发展的历史跨度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崛起—兴盛—危机—衰退—萧条—复兴—繁荣”的循环是美国城市发展历程中的既定规律（如芝加哥）。由

此可见，城市的“增长”和“收缩”可能都只是阶段性、交替性、必然性的历史事件，我们既不该为增长而疯狂，也不必因收缩而气馁。

此外，非常巧合，访学期间办公室还有一位来自捷克的访学学者，雅罗斯拉夫·寇茨基（Jaroslav Koutsky）教授，也是因为关注收缩城市慕名而来。两人坐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比较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收缩城市研究。我们发现，城市收缩的“现象”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差别并不明显，无非是各种驱动因素不同方式和比例的组合，人口流失的“后果”也都大同小异，真正千差万别的是各种城市治理制度下的政策“应对”。于是我们饶有兴趣地交换了各自的观察和观点，并合作开始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比较它们的异同。这也是本文第二部分内容的由来。

由此，便形成了本文从稍大的“时间跨度”和稍广的“空间尺度”上来考察城市收缩的基本框架，相应的文献梳理、信息汇集以及观点论述进而展开。

## 2 收缩治理手段及其成效观察

既然城镇收缩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收缩治理也就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事情。作者考察期间有意无意走过了很多收缩城镇，这些市政府实施或规划中的城镇复兴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以斯普林菲尔德市（也称“春田市”）为例，这是经济繁荣的马萨诸塞州政府最为关注的一个收缩城市，可以看到很多为了振兴它作出的努力。例如，作为篮球运动的发源地，1957 年城市设立美国篮球名人堂（Basketball Hall of Fame），由于来访量超过预期，于 1985 年在滨河地区耗资 1 100 万美元建成新馆。

再如，春田市也是作品风靡全美的儿童漫画作

家西奥多·苏斯·盖泽尔【Theodor Seuss Geisel, 1904.3.2—1991.9.24, 常用笔名苏斯博士(Dr. Seuss)】的诞生地, 他 1950 年代发表的富于想象力和哲理的儿童漫画书影响了一代代美国儿童, 直到如今。

2017 年, 春田市利用位于核心地段的历史建筑群, 改造建设了瑟斯博物馆(The Amazing World of Dr. Seuss Museum)和雕塑花园, 成功地吸引了不少人流, 同时也巧妙地利用“童趣”给原本衰败的中心区增添了鲜亮的一笔。

此外, 为了缓解这个收缩城市的财政困境,

2018 年位于市中心商业区的“赌场酒店综合体”项目建成开业。同时, 在麻省州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 2015 年中国中车集团在中标波士顿 5.67 亿美元的地铁车辆项目以后, 最终也将制造工厂选定在春田市。春田市政府给予该项目很高的期待, 希望能通过它来部分重现其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荣光。

通过对各种收缩城镇的治理成效进行观察和评价, 我们也希望在诸多成功或不成功的经验中, 总结一些通用的政策领域, 这也是本文第三部分主要讨论的内容。

## 收缩城市的形态控制：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耦合框架

周恺 戴燕归 涂嫒

**摘要：**城市—乡村建成环境之间的过渡是连续且分阶段的过程, “精明增长”策略建立了一个“断面模型”来控制 and 规范不同类型的城市形态, 并使各“生态区”断面之间产生连续的平滑衔接。基于这一认识, 本文探索将“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结合的可能, 即城市在收缩阶段进行“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低效资源的整合退出”的过程中, 用该模型控制和调整空间形态中“空间要素的合理分配”和“生态区的平滑过渡”。首先, 文章通过解析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概念和内涵, 从核心价值、控制对象、运作方式等层面建立两者的耦合框架。框架为断面模型应用于精明收缩提供了依据, 也描绘出基于断面模型的精明收缩与精明增长的技术路径。其次, 文章通过案例研究, 分析与探讨美国相关收缩地区基于断面模型的规划实践, 以此证明将断面模型应用于精明收缩的可行性。本研究希望通过耦合框架的提出以及相关案例的解析, 确立精明收缩目标与形态控制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 完善“增长管理”和“收缩管理”理论, 引导并管控城市形态的正向(增长期)与反向(收缩期)有序演变。

**关键词：**断面模型; 精明收缩; 精明增长; 收缩城市; 城市形态

**引文格式：**周恺, 戴燕归, 涂嫒. 收缩城市的形态控制：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耦合框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20-28. DOI: 10.19830/j.upi.2020.052.

全球收缩城市背景下, 空置和遗弃给城市和社区带来了美学和环境困惑, 同时也破坏了财产价值, 削弱了城市 and 社区的吸引力和凝聚感。比如美国的一些旧工业城市, 长期面临人口减少、经济衰落、工厂倒闭和住房空置等收缩问题, 形成了城市风貌衰败且空间形态混乱的收缩景观。显然, 这种极度萧条破败、消极负面的外部环境又继而影响了仍居住在当地人们的生活品质, 导致人口的再次流失与经济的进一步萎靡。

2019 年在底特律考察时拍摄了收缩社区的现状: 闲置空地上放满了各种废弃的家具和其他物品,

房屋零星地散置在街道两旁, 有些空置房屋正在打着售卖标语, 还有一位居民正在人行道上孤身走着……这种收缩景况引发了我们对收缩城市形态控制的新思考, 收缩城市 and 社区急需一种方法来有效解决或避免此类问题。

为了找到这种方法, 我们阅读和翻译了国外许多有关收缩议题的文献, 最终在霍兰德(Hollander)写的《被灼伤的城市》(*Sunburnt Cities*)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他提出的“反向断面模型”思想正是本篇文章的主要灵感来源。

断面模型是由建筑师安德烈·杜安尼(Andrés

Duany) 与伊丽莎白·普莱特·赞伯克 (Elisabeth Plater-Zyberk) 等新城市主义者共同发展的理论, 他们创新地认为断面模型中的每个生态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征, 各区等级不分伯仲, 且各区之间可相互转换和调整。因此, 断面模型既可正向运作, 也可反向, 这打破了传统的城市化发展逻辑路径。新城市主义者可以利用断面模型作为精明增长的工具来限制无约束的增长, 引导并管控城市形态的正向 (增长期) 紧凑发展; 亦可以利用断面模型进行精明收缩, 通过恰当地规划和管理衰退, 实现城市形态的反向 (收缩期) 有序演变。

城市的生长与收缩其实是一对孪生概念。基于此, 增长的管理工具 (断面模型) 与收缩的治理需求 (精明收缩) 存在耦合的可能。因此, 本文从核心价值、控制对象、运作方式等层面建立断面模型与精明增长的耦合关系, 让城市在收缩阶段进行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低效资源的整合退出时, 利用该模型对城市空间要素的合理分配和生态区的平滑过渡进行控制和调整。

基于两者耦合的理论支撑, 文章选取了美国底特律、弗林特和布法罗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收缩城市案例, 分析并探讨了 2010 年以来的相关规划实践, 以此证明将断面模型应用于精明收缩的可行性。每一代表案例都有其偏向的实践特征: (1)《底特律未来城市》规划注重具体形态与相应用途的融合, 并结合空置率梯度配置空间要素; (2) 弗林特在形态

与功能要素合理分配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了底特律的形态分类管控思想, 构建了“强度轮”模型, 其既可维持现有生态区的稳定发展, 同时也注重向邻近地区转换和过渡的可能; (3) 布法罗在 2010—2017 年间一直在制定并发展区域与城市层面的形态引导与管控策略, 其政策实施与前两个案例相比, 体现出了多空间尺度协同运行的特点。

将断面模型作为精明收缩的工具, 提出耦合框架, 解析相关案例, 确立精明收缩目标与形态控制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 可望有序控制收缩城市的形态问题。当某些地区出现收缩衰落时, 可以: (1) 通过资源优化重组重新激发本区活力, 维持其持续平稳发展 (例如城市更新、空置片区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计划); (2) 通过对低效用地资源的整合退出实现生态区反向转换 (例如住宅拆除、都市农业、绿地化、开敞空间化等措施); (3) 以上两种收缩策略并举。

断面模型为城市和社区管理物质空间衰退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 让形态衰败地区可以通过建筑改造、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等来保持城乡断面的完整性、多样性和连续性。《清明上河图》记载的城镇生活图景与断面模型类似, 现今国内的城乡空间关系也基本与断面模型的生态区相对应, 我们希望通过文章的探讨, 可为国内收缩城市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一种可行的参考。

## 精明收缩理念下城市空置问题的规划响应与启示——基于德国、美国和日本比较

杜志威 金利霞 张虹鸥

**摘要:** 受金融危机冲击与产业经济转型的影响, 我国部分城市出现了以人口减少为标志的城市收缩现象。如何处理和应对由于城市收缩引发的空置问题是当前空间规划和城市治理值得研究的课题。精明收缩提倡的“更小的用地范围内、更少的人口规模”的规划理念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由于制度背景和规划文化的差异, 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态度与应对策略存在显著区别。本文通过梳理德国、美国和日本典型收缩城市形成的背景与动因, 结合关键时间节点, 分析这三个国家在应对城市空置问题的态度和演变, 重点讨论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众等角色的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厘清精明收缩理念在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的适用性, 并为我国城市如何合理应对人口收缩下的城市空置问题提供经验启示。

**关键词:** 空置; 精明收缩; 收缩城市; 城市规划; 公众参与

**引文格式:** 杜志威, 金利霞, 张虹鸥. 精明收缩理念下城市空置问题的规划响应与启示——基于德国、美国

和日本的比较[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29-37. DOI: 10.19830/j.upi.2020.047.

“精明收缩”所倡导的“更小的用地范围内、更少的人口规模”规划理念,已经成为欧美国家应对城市收缩带来空置问题的一种治理方式,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的精明收缩规划实践经验表明,不同国家在应对城市收缩的政策态度和响应策略有着显著差异,并深深植根于本国政治背景与规划文化中。

本文重点关注德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在应对城市收缩和处理城市空置问题的态度及演变,探讨主要层级政府(国家、区域、地方等)与不同行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在应对过程中的角色作用,为我国规划领域如何应对人口收缩背景下的城市空置问题提供经验启示。

德国常常被视为国际收缩城市话语的发源地,其城市收缩主要集中于东德地,主要原因是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所引发的企业倒闭与人口外迁。得益于多层次规划系统,德国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规划方式相互交织,使得城市精明收缩成为现实,通过将空置建筑拆除恢复为城市绿地或其他公共空间,适应收缩的现实。

美国的城市收缩往往归因于郊区化和去工业化,在城市中心遗留下许多破败房屋和废弃地块。不过,在增长范式导向下,城市收缩问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美国精明收缩的实现主要来自于地方层面的努力,较强的个体主义特征促进地方领导者、非营利组织和公众形成合力来解决城市空置问题。

在日本,老龄化、低出生率和严格移民政策引发全国人口持续下降,即使像东京和名古屋这样的大都市在未来也将面临人口收缩。由于中央政府对城市规划的高度集权,地方政府更多是城市规划的参与者,以至于缺乏应对空置问题的灵活性,精明收缩仍然尚未真正纳入国家议程。

尽管收缩城市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空间表征,但应对城市空置问题时需要考虑其制度文化和社会经济状况,形成具有个性化的渐进式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三点规划建议:

- (1) 建立富有弹性的城市空置利用机制;
- (2) 重视社区参与在处理空置问题中的作用;
- (3) 利用绿化策略刺激空置用地修复。

## 精明收缩理念在美国锈带地区规划实践中的新进展：扬斯敦市社区行动规划研究

高舒琦

**摘要：**近年来,尽管以精简建成空间规模从而适应人口收缩为特点的“精明收缩”理念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其在规划实践领域的进展,尤其是在中微观的社区规划层面,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在收缩城市中,人口的迅速流失往往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大量房产出现空置与废弃的现象,并进一步导致了社区的衰败。如何在规划实践中对此进行积极应对,是目前国际收缩城市研究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聚焦于全美第一个颁布“精明收缩”总体规划的扬斯敦市,关注其近年来为了应对上述问题颁布的社区行动规划。通过深入剖析社区行动规划的编制过程,以及实施中采用的两种政策性工具——税收止赎与法规实施,及其实施管理机构的运作模式,本文展现了美国收缩城市如何将应对房产空置与废弃的技术工具与社区规划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以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最后,本文就美国经验在我国的适用性与可借鉴性进行探讨,从而提出未来我国收缩城市在应对房产空置与废弃上的相关制度和规划改革建议。

**关键词：**收缩城市; 社区规划; 房屋空置; 物业税; 精明收缩

**引文格式：**高舒琦. 精明收缩理念在美国锈带地区规划实践中的新进展：扬斯敦市社区行动规划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38-46. DOI: 10.19830/j.upi.2020.049.

相信对收缩城市研究领域比较熟悉的朋友们, 应该不会对扬斯敦市这个位于美国铁锈地带俄亥

俄州的小城感到陌生。扬斯敦市于 2005 年颁布的《扬斯敦 2010 年规划》(Youngstown 2010 Plan) 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了“精明收缩”的规划理念,承认城市的人口正在收缩且将继续收缩,规划理念从“增长导向”转向“更小也可以更好”,将城市中大量居住用地规划为绿地和开放空间。

然而,受制于美国法律对私产的严格保护,老工业城市错综复杂的特许使用区划(Permitted Use Zoning),地方政权的频繁变动等一系列原因,导致扬斯敦市地方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实施《扬斯敦 2010 年规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精明收缩”不可能通过颁布一个颠覆性的规划就得以实现,唯有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慢慢实现目标。同时,收缩城市的市民也已经发现,没有一种“万灵药”可以解决由于城市收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比于“喊口号式”的规划宣言和理念,他们更希望规划可以解决切身的实际问题。

在收缩城市中,与城市规划和当地居民关系最为紧密的问题是:建筑与土地的空置、废弃和衰败。由于扬斯敦市和其他许多位于铁锈地带的美国收缩城市一样,在财政与人力资源上捉襟见肘,因此无法一次性完全处理所有的空置与废弃建筑,必须有选择性的挑选一部分进行优先处理。

自 2014 年起,在地方政府和扬斯敦市社区发展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扬斯敦市已经颁布了十余个旨在解决建筑空置等实际问题的《社区行动规划》(Neighborhood Action Plan)。《社区行动规划》主要依靠两种原则确定需要优先处理的空置建筑。

第一,空置住宅状况评估。在扬斯敦市以及其他美国城市中,地方政府为了掌握城市中空置与废弃建筑的衰败情况,同时为了对市民的相关投诉做出判断,会定期对城市中的空置与废弃建筑进行普查。根据对景观/草坪、窗户/门、外墙/饰面、管道等八大类要素现状的评估,扬斯敦市将空置住宅的状况分为 5 级(表 1),其中 F 级,即严重衰败的住宅,是社区行动规划首要解决的对象。

第二,社区公众参与。在《社区行动规划》编制的公众咨询会议上,每个参会的代表被要求向规划编制者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社区中你必须要有

解的一件事”。随后,会议组织者将以开放的形式与社区代表共同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其中与空置建筑相关的问题就包括:“如果我们只能优先在你的社区中处理 10 个空置的建筑,你认为应该是哪十个”。

通过客观的空置住宅状况评估分级与主观的社区公众参与意见问询,《社区行动规划》的编制人员确定了社区内需要优先处理的空置与废弃建筑。与其他美国城市相仿,扬斯敦市的空置与废弃建筑的处理手法,根据物业是否滞纳房产税而分为以下两种:第一,如果滞纳房产税,那么,将根据相关法律流程,等待滞纳房产税达到一定时间后,由地方税务部门没收,随后转入土地银行进行相关操作;第二,如果没有滞纳房产税,那么地方政府将依据建筑或区划条例,对业主因物业缺乏维护而造成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置,如果业主对此没有回应或者空置的建筑行将倒塌,那么地方政府将可以根据“警察权”而立即实施拆除。

在公共资源极为有限的美国收缩城市中,一次性全部拆除或者彻底更新空置与废弃的物业,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而,只能通过渐进的方法逐步解决问题。以往由于缺乏规划的引导,拆除空置与废弃的建筑一方面缺乏透明性,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高发地;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拆除行为缺乏明确的目标,土地银行和地方政府的法规执行人员,在领导意志和公共意见的双重指挥棒下,疲于奔命却收效甚微。

美国扬斯敦市的《社区行动规划》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通过“公众反馈—现状分析—目标设定—规划方案—公众评估—调整方案”的规划编制与实施流程,扬斯敦市将减量的决定权交还给社区。通过综合公众意见和客观的空置建筑状况评价这两方面的信息,规划给出了单体建筑层面的精细化减量建议。而土地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建筑/区划条例实施部门,则分别通过处理税收止赎物业和违反法规物业,将减量提质的规划目标与政策性工具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为了监督《社区行动规划》实施所成立的社区行动小组,以及定期召开的社区行动会议,为行动规划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实现了行动规划的动态调整。

总体而言，在社区层面，扬斯敦市的《社区行动规划》，较好地实现了“精明收缩”的目标。但是，在整个城市层面，由于市议会和选区制在美国城市的普遍存在，迫使地方政府在社区行动规划的编制对象选择上，无法在各方博弈的情况下根据清晰的目标选择规划对象，最终导致《社区行动规划》难以脱离一直以来的美国社区规划的窠臼——一方面带有福利主义色彩，帮助相对衰败的社区重振旗鼓；

另一方面带有保守主义色彩，规划不触及真正衰败的社区，而一旦相对衰败的社区在清除了空置与废弃的建筑后，将进一步隔绝社会的流动。

由此，不禁让人对“精明收缩”的目标——“更小也可以更好”——提出了以下的疑问：更小应该让谁变得更好？有关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有待于未来更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

表 1 扬斯敦市空置住宅状况评估分级与依据

|      |         |  |  |  |  |  |
|------|---------|-----------------------------------------------------------------------------------|-----------------------------------------------------------------------------------|-----------------------------------------------------------------------------------|------------------------------------------------------------------------------------|-------------------------------------------------------------------------------------|
| 整体评价 |         | A：优秀                                                                              | B：良好                                                                              | C：一般                                                                              | D：破损                                                                               | F：不安全 / 公共危害                                                                        |
| 评级依据 | 景观 / 草坪 | 草坪整齐                                                                              | 草坪未及时修剪                                                                           | 出现杂草                                                                              | 杂草丛生                                                                               | 杂草丛生以至于难以接近建筑                                                                       |
|      | 窗户 / 门  | 干净且无破损                                                                            | 需要清洗                                                                              | 出现破损，需要修补                                                                         | 被木板封住                                                                              | 消失，或者门洞大开                                                                           |
|      | 外墙饰面    | 干净且不用修补                                                                           | 需要清洗和粉刷                                                                           | 出现破损，需要修补                                                                         | 外墙穿孔                                                                               | 外墙穿孔，或者整面墙消失                                                                        |
|      | 管道      | 干净且无堵塞                                                                            | 部分连接件破损                                                                           | 老旧且出现堵塞                                                                           | 严重破损                                                                               | 不连通，或者消失                                                                            |
|      | 屋顶      | 崭新                                                                                | 无漏洞                                                                               | 陈旧，瓦片破损，漏雨                                                                        | 部分消失                                                                               | 摇摇欲坠，亟须替换                                                                           |
|      | 门厅      | 维护良好且不用修补                                                                         | 出现杂物堆砌                                                                            | 需要修补和重新粉刷                                                                         | 摇摇欲坠，亟须大修                                                                          | 行将倒塌，亟须大修                                                                           |
|      | 车库      | 维护良好且不用修补                                                                         | 基本完好                                                                              | 需要修补，车库门破损                                                                        | 外墙和屋顶穿孔                                                                            | 亟须大修                                                                                |
|      | 入户道     | 维护良好                                                                              | 可以通行                                                                              | 被杂草与杂物部分堵塞                                                                        | 难以进入                                                                               | 已被杂草和杂物完全覆盖                                                                         |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城市收缩时代的规划对策研究

沈瑶 朱红飞 刘梦寒 木下勇

**摘要：**二战后的日本城市经历了“城市化社会—城市型社会—城市收缩”三个过程，其城市规划相关法律和方法也随之不断转型。本文梳理了日本在城市收缩阶段相关规划法的转型、城市变革类型、城市空间问题，着重从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对策角度，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分析日本的空间规划对策。宏观层级主要介绍育儿、养老支援体系和上位法规的转变；中观层级介绍面向少子老龄化的人口收缩的设计理念的转变；微观层级则以案例为核心，介绍近年来社区公共育儿支援设施、老幼共生住区，空屋激活计划，街道复兴策略等面向空间具体问题时的规划设计经验。最终比照中国近年来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归纳日本在城市收缩阶段可供参考的经验。

**关键词：**少子化；老龄化；收缩城市；日本；识别性；可持续性

**引文格式：**沈瑶，朱红飞，刘梦寒，等. 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城市收缩时代的规划对策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47-53. DOI: 10.19830/j.upi.2020.053.

二战后日本城市经历了“城市化社会—城市型社会—城市收缩”三个阶段，老龄化、少子化情况在“城市化社会”中期趋势显现，而在大部分城市都进入“收缩城市”的时期愈发明显。日本城市规

划相关法律和方法也随着城市发展不断转型。比照中国近十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及城市收缩的趋势，日本经验有较强的参考价值。本文将着重从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对策角度，以宏观、中观、微观

三个层次分析日本的空间规划对策。并归纳中国应对城市收缩可参考的经验。

在宏观层面，日本自 1994 年起开始制定一系列育儿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完善了其育儿支援体系，从国家层面树立了全社会对儿童友好及育儿支援需求的充分认知，至今已完成从设施到服务层面较为完整的顶层设计。同样，日本也是较早建立起与生活保护相关的法律基础来保障晚年生活的国家，建构了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生活圈养老在内的全方面养老服务支援体系，重视对老人本体的援助。

在中观层面，日本在城市收缩时代的城市更新规划理念产生了变革。其一是对于城市识别性和可持续性的营造。收缩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起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归属感与可持续的社会联系。建构识别性对于重塑城市精神不可或缺，是收缩城市背景下可持续城市再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

其二是利用空间活化，导入青年力量，填充收缩型城市因为少子老龄化所产生的“蜂窝”。吸引年轻人对空住宅、空店铺等空间进行再整理，将原有的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加以改建，留住青年劳动力，

加强代际交流，激活原来老龄化严重的街区。

在微观层面，政府应对少子老龄化的具体空间举措主要是建造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育儿支援中心、老幼共生据点等。

例如千葉市的复合型育儿支援中心“希望之球”（Qiball）以育儿支援、医疗保健等公共福祉功能为内核，将商业和政府服务等功能融为一体，吸引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构建紧凑的城市人口联系网络。

又如，横滨市的空屋激活老幼共生据点“西柴樱花茶室”，通过居民自发改造空屋，开展社区活动和老龄育儿支援，成功激活社区和街道，促进代际交往和社区融合。

参考日本的经验，我国在现阶段应首先建立以“人的支援”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加强专门支援法以及相关规划法规的建设，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试点实验。其次，营造有识别性和归属感的生活社区，在通过地域识别性的培育与营造建立起个体与地方的联系，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结合旧城改造计划，在收缩较为严重的城市功能中心区促进空间的多功能转型，增加街道活力，塑造老幼共生的全年龄链接活力中心区，促进目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 严寒地区的收缩城市研究——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三个极地城市为例

伊琳娜·巴拉舍娃 冷红 宋世一

**摘要：**城市收缩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国际化现象。以往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城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收缩，这种情况在其气候条件恶劣的北方地区更为严重。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动态分析俄罗斯北部城市的收缩过程，首先对俄罗斯收缩城市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选取过去 30 年中人口总数下降较为明显的三个北方城市——诺里尔斯克、杜丁卡和伊加尔卡作为案例城市，对其反映人均工业产出的经济指数（EI）和反映社会福利水平的社会指数（SI）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该地区北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均衡增长的现象。本研究证实了城市的经济福祉与人口生活水平之间的直接关系，并揭示出俄罗斯当前政策对收缩城市支持性的不足。

**关键词：**北方城市；俄罗斯极地城市；收缩城市；经济指数；社会指数；人口流失；抗收缩

**引文格式：**伊琳娜·巴拉舍娃，冷红，宋世一．严寒地区的收缩城市研究——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三个极地城市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20(2): 54-61. DOI: 10.19830/j.upi.2020.046.

俄罗斯所有北方城市都是在苏联经济活跃增长时期建立的，大部分是矿产资源开发的原材料基

地。1990 年代经济结构调整引发了严重的企业危机，进而导致北方城市长期的收缩趋势；同时，不利的

地理位置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也加剧了北方城市的收缩进程。

近代俄罗斯历史上的两大经济诱因影响了城市的收缩状况：1991 年的苏联解体和 1998 年的经济违约。俄罗斯收缩城市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0 年代—1990 年代初，以收缩趋势的出现为特征；第二个阶段是 1990 年代老工业区危机，与俄罗斯激进的经济改革相关；第三阶段是 1998 年经济违约后的经济和生活的恢复。因此在俄罗斯相关文献中，对收缩城市的研究通常与单一产业城市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主要关注其经济模式的发展。

俄罗斯北部城市应对城市收缩现象的既有政策性方法集中在促进经济增长复苏、气候适应性规划，以及提升城市形象定位等方面。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促进北方收缩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复苏。气候适应性规划层面主要指采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塑造人性化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改善北方地区的人居环境。通过对当地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等方面进行投资，实现将北方城市的“惰性城市”形象提升为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城市形象，实现城市形象和未来发展理念的有效转变。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Krasnoyarsk Region）是俄罗斯第二大地区，位于西伯利亚中部和东部。1990 年代苏联解体后，政府针对北方城市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快速增长和高投入转为默

默忽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开始出现居民外流现象，这种现象在其北部尤其严重。案例城市的经济指数（EI）与社会指数（SI）的逐年变化状态显示和两个指数的下降/上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EI 的差异造成了城市收缩过程中 SI 的变化差异，这说明城市经济状况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直接影响。

研究发现，俄罗斯严寒地区收缩城市的诱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政治：国家解体带来的剧变

苏联解体引发了社会和人口的剧烈变化，俄罗斯城市人口大量外流，超过

三分之一的城市无法抵御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逐渐走上了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的道路。

（2）经济：单一产业引发的危机

收缩城市现象通常是地方经济、人口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政府职能的有效性。北方地区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不完善的社会和住房基础设施，造成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紧张。

（3）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造成的困境

城市区位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利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加剧了人口流失和经济衰退的进程，也使得居民无法进行个人农业生产，因此无法自给自足。

##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对我国城市适应性转型发展的启示

林伟斌 孙一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最复杂的城市化遗留问题。在生态文明时代背景下，城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应性转型，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必然选择。西方国家在解决城市化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出通过有效管理生态系统来解决复杂的社会、环境、经济问题的新概念和理论。因此，本文首先阐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概念的起源，辨析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阐述现有的研究框架、评价体系和实施流程，并介绍了欧美的成功案例。然后，分析城市化、气候变化、工程化思维、行政体制、人才缺失五个方面给我国城市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阐明在我国城市适应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跨尺度和系统性、基础设施带动、可操作性、开放共享等四个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化；工程化思维；基于自然的的解决方案；适应性转型；启示

引文格式：林伟斌，孙一民.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对我国城市适应性转型发展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20(2): 62-72. DOI: 10.19830/j.upi.2018.43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最复杂的城市化遗留问题。其中，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大城市病、贫富悬殊等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复杂而尖锐。此外，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新问题，已经对社会生态系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洪涝灾害、风暴潮。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同样需要解决与我国类似的问题，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 Nature-based Solutions）便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新发展思路 and 理论，其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将危机转化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人类健康和福祉。在欧美地区，已应用该理论来指导解决自然灾害、环境修复、公共健康等问题。就我国而言，近年来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然而也暴露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在城市建设的进程中，通过管理自然资源来解决城市问题的意识比较淡薄；另一方面，单纯用工程手段所造成的城市问题多而复杂，例如生态破碎、洪涝灾害。

在此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也开始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寻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新平衡，努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存量发展。2018 年 3 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组建自然资源部来统筹管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等核心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以自然资源驱动的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围绕自然资源的空间结构转型调整是未来解决我国城市化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

就国际经验而言，在荷兰诺德瓦德（Noordwaard）的斯特加特堡，为了增加堤防的防洪能力，在堤外种植了宽度 60~80 m 的网格交错排

列的柳树林，每平方米约有 4 个树干和数百个树枝。与传统的加高堤防的方式相比，这一方法不仅节省建设和维护成本，同样衰减 1 m 的浪高可节省 1 550 欧元，还能产生用作生物燃料的碳和柳树枝，改善环境品质。

在荷兰对岸的英国，通过重建盐沼来避免沿海洪水，同时清除部分海堤建立湿地生态系统，增加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安全和韧性。此外，通过人工育滩的方式，能将硬质海岸转变成具有生态效应的软性沙质海岸。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在三角洲地区实施 NBS 策略，能维持三角洲原有的自然物质能量交换，实现长期有效的洪水防护和生态服务。

将 NBS 与我国目前的海绵城市和城市双修政策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性：首先，在时空维度上，NBS 从场地尺度拓展到区域、流域尺度，同时注重自然过程及空间要素流动；注重长期和短期效益的结合，将自然演替过程考虑到整体设计中。其次，从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出发，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 NBS 的应用增加系统应对环境变化的韧性，同时提升环境品质。再次，注重成本绩效、低维护以及地域性材料的应用，精细化监测不同措施的成本投入和效益产出。

综上，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从扩张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内涵式发展，笔者建议 NBS 作为我国转型发展优先选择的策略之一，同时需要转变思维、调整行政体制、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倡多专业融合、多部门合作、多行业协助，实现跨尺度和系统性的转型发展、基础设施带动的转型发展、可操性的转型发展和开放共享的转型发展。

## 公园绿地绩效的概念内涵及评测方法体系研究

周聪惠

**摘要：**绩效衡量评测能为公园绿地布局优化、功能完善和服务提升提供直接依据。但由于影响公园绿地绩效的因素众多且作用方式各异，在界定、衡量和评价上均有一定复杂性。本文首先结合不同视角和标准，

将公园绿地绩效分解为核心绩效与延展绩效、功能运行绩效与空间结构绩效、系统绩效与单体绩效等概念展开内涵及应用特征梳理；其次以处于核心地位的游憩服务绩效为主体对公园绿地功能运行绩效与空间结构绩效的评测方法展开辨析；最后根据各个绩效评测方法的利弊特点对不同方法的组合应用模式以及精度校验途径提出建议。

**关键词：**公园绿地；绩效；指标；规划；评价；大数据

**引文格式：**周聪惠. 公园绿地绩效的概念内涵及评测方法体系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73-79. DOI: 10.19830/j.upi.2018.457.

绩效评测能为公园绿地布局优化、功能完善及服务提升提供直接依据。由于影响公园绿地功能服务的因素较多，且具有较强动态性，加之公园绿地兼具多项功能，且功能作用方式各异，导致界定与衡量公园绿地绩效一直是个难题。本文以公园绿地功能作用的内在机理为基础，从不同视角审视公园绿地绩效内涵构成的特征，同时对其评测方法进行梳理和辨析，以期为公园绿地绩效衡量和调控提供思路和技术支持。

在功能服务视角下，公园绿地绩效主要由核心绩效与延展绩效组成，两者分别是对公园绿地核心功能效应（游憩服务）和非核心功能效应（如生态保护、环境美化、应急避险等）的定量描述。长期以来规划及研究均聚焦于公园绿地核心绩效，但随着城市功能复合化和用地集约化要求凸显，对延展绩效衡量和优化途径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在评测对象视角下，公园绿地绩效可分为功能运行绩效和空间结构绩效。以核心绩效（游憩服务绩效）为例，公园绿地核心功能运行绩效评测对象是游客使用状态信息，核心空间结构绩效评测对象则是城市空间要素。由于公园绿地游客使用状态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其认定、采集和描述均有较大难度，而空间结构绩效可通过空间分析对公园绿地潜在功能运行状态进行推导和预测，有更大稳定性和可测性。

在系统论视角下，公园绿地绩效由系统和单体绩效构成，分别以公园绿地整体和个体属性为基础。系统绩效包含系统总体服务水平指标（如居民游园率、高峰时段城市游园总人数等），也包含系统空间结构合理性指标（如公园绿地布局邻近度、空间均匀度等）。单体绩效指标多用于衡量公园绿地个体

服务状态，适用于高峰时段游客规模调控以及不同公园绿地服务状态比较等方面。

为方便对评测方法体系构成及应用特征展开具体辨析，本文主要围绕核心绩效（游憩服务绩效）评测方法展开讨论。在核心绩效评测中，目前较多研究和实践是围绕功能运行绩效评测来展开，涉及方法既包含常规评测方法，如门票统计法、场景记录法和抽样调查法等，也包含依托大数据（如手机信令、社交媒体及交通信息）等新技术的评测方法。另外，空间结构绩效评测方法研究也呈上升趋势，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有基于可达面积、可达人口以及供需信息对比等。

在功能运行绩效评测中，常规评测方法评测信息类型差异较大，信息间存在较强互补性，组合使用将使评测结果更加完整客观。同时，常规评测方法与大数据评测方法也能相互支持。在核心绩效评测中，常规评测方法采集的游客使用信息精度较高，但广度较低。而大数据评测方法采集的信息则广度较高，但精度较低。因此，在应用实践中可依托传统评测方法采集的高精度数据来检测大数据信息误差产生机制，并找到对应修正方法，实现两者在精度和广度上的互补。

此外，功能运行绩效与空间结构绩效评测在适用领域上也有较强互补性。前者适用对象是建成投入使用公园绿地，侧重对现状公园绿地实际利用状态衡量。后者虽能同时适用于建成使用和规划未建成公园绿地，但由于影响公园绿地功能效应的因素众多，且作用方式复杂，很难全部在空间结构绩效评测方法中完全整合反映。因此，目前空间结构绩效主要应用于系统层面公园绿地布局合理性分析评价，难以准确推导单个公园绿地实际功能状态。

因此，两种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可互为校验工具，为研究和规划调控精准度提升提供保障。

##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比较研究

李艳霞 武玥 王路 王超 石邢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市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在建筑层面，能耗模拟分析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城市层面，进行能耗模拟的难度较大，由于单体建筑数量多、类型多、构造多样，城市设施复杂，必须研究新的方法技术计算城市能耗。本文针对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城市能耗模拟方法，总结出城市能耗模拟的一般性流程，并基于该流程对城市能耗模型的模拟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探索和研究能够为城市能源政策的制定、城市能源安全、城市节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城市能耗；城市能耗模拟；自上而下法；自下而上法；一般流程

**引文格式：**李艳霞，武玥，王路，等.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比较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80-86. DOI: 10.19830/j.upi.2018.150.

城市能耗广义上是指城市中建筑、交通、工业能耗的总和。城市能耗中约 60%为城市建筑能耗，具体包括暖通空调能耗、照明能耗、插座电器能耗等。由城市能耗排放出的碳氧化物占全球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三，建筑能耗排放就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这主要因为建筑行业 80%以上的能源来自化石燃料，其消耗的能源占全球能耗的 40%。因此，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有效避免气候变化和能源进口依赖等风险是目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研究和应对的重要课题。虽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通常设定在国家层面，但必须在城市层面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而城市能耗信息的准确掌握可以有效促进相关政策措施的正确制定，通过城市能耗模拟的方法获得相关数据是一种较为常用的手段。

城市能耗模拟是对城市众多建筑能耗进行模拟，是一新兴方向，具有很大的技术难度，在多个领域引起高度重视。该技术起步于 1960 年代，至今，单体建筑能耗模拟已是一颇为成熟的领域。据美国能源部统计显示，全世界有 400 余种建筑模拟技术工具，典型代表有 EnergyPlus、TRANSYS、DeST 等，这些技术工具在单体建筑的设计和改造，以及绿色建筑标识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城市能耗模拟是在城市层面对能耗进行科学

的计算和分析，对于研究城市能源的优化、安全、管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目前，主要有两类基本模拟方法：自上而下（top-down）法和自下而上（bottom-up）法。

根据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城市能耗模拟方法，可以看出城市能耗模拟的一般性流程分为获取城市数据、建立城市模型、模拟城市能耗、校验模拟结果、结果可视化这五个基本模块。

城市能耗模拟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软件集成。运用必要的计算机技术手段，在 GIS 平台上处理城市建筑的大数据，通过合适的第三方程序，如 Rhino、Grasshopper 等，实现从 GIS 数据到 IDF 数据的转换，从而使用 EnergyPlus 对城市建筑大数据进行能耗模拟，确保计算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二是数据集成。进行城市尺度的能耗模拟基于城市建筑多维度信息，包括表征形态的三维几何信息，以及对能耗规律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非几何信息，例如人流量、围护结构的热工物理参数等。而城市能耗模拟结果将依托 GIS 平台整合进入城市建筑大数据库，进一步完善城市大数据库。

鉴于城市能耗模拟对于城市能源管理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城市能耗模拟以及建模水平，仍处于初级阶

段。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有以下三点。

城市建筑基础数据获取困难。城市建筑基础数据包括建筑形态、高度、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窗墙比等。在建模过程中所需要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等非几何信息具有极大的获取难度。同时，实测数据的缺失会影响模拟结果的校验，进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目前尚没有一款适用于城市能耗模拟的软件，而软件开发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将城市建筑的几何信息、非几何信息以及能耗模拟软件进行耦合。

目前尚没有针对不同城市能耗模拟方法在不同城市尺度上的模拟速度和准确度方面的研究，因而城市设计师难以获得有选择性的参考。

对于不同城市的能耗模拟尺度，本文总结出的

城市能耗模拟的一般性流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针对不同的案例需要在不同的模块上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例如建筑体块模型的简化等，以保证模拟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城市能耗模拟方法的研究需要继续完善，以期未来可以建立兼具模拟、实测、分析功能的城市能耗大数据平台。城市能耗模拟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设计实践中，可以探索空间形态与其他要素及能源利用和消耗的关系；发掘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对能耗的影响机理，评估能耗与城市空间形态因子间的敏感度；研究单体建筑、建筑群之间的能量互动；提高以低能耗为目标的城市形态优化水平；促进能耗大数据与城市规划设计中其他大数据的协同应用。

## 日本城市为何不是千城一面？——基于城郭的城市空间特色塑造

冉奥博 刘佳燕

**摘要：**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较严重的千城一面现象，究其原因是城市空间特色的丧失。本文以日本为例，探讨日本传统城郭本身及其保护与再利用如何塑造了城市的空间特色。通过选取 16 个典型案例，本文从城郭的内部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区位和更新利用历程三方面，剖析了城郭与城市空间特色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从城郭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以及对待历史的态度等方面总结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千城一面；日本城郭；城市空间特色；日本；文化遗产

**引文格式：**冉奥博，刘佳燕. 日本城市为何不是千城一面？——基于城郭的城市空间特色塑造[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87-94. DOI: 10.19830/j.upi.2018.076.

这篇论文是笔者“无心插柳”之作，因为它既不是笔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也不是有意为之的研究。之所以撰写该文，是源于在东京工业大学求学时，授课老师的一句感叹。2016 年秋季学期，我选修了“日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开发”，授课教师是曾任日本城市规划学会会长的中井检裕教授。在结课展示的最后一页 PPT，我放了杭州、重庆两座城市照片，推荐大家去旅游。中井先生问这是不是上海，我回答说不是。中井先生笑道，中国的城市看上去太像了。这句感叹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日本城市不是千城一面？虽然这个问题可分析的角度很多，但因为我在东工大主要研究城市史、土木史，

以及对传统建筑的浓厚兴趣，我选择从传统城郭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城市的空间特色塑造。

也正由于在写作初期没有严格规范，文章初稿在案例选取和分析框架方面不甚严密。一位外审专家对此提出具体且详细的意见，推荐了大量相关文献，并撰写了近 2 500 字的审稿意见，对文章完善帮助很大。写作过程中，补充文献非常困难。一是由于二战前的历史文献居多，二是因为日本文献资料的电子化程度低。东工大的同学们帮忙在国会图书馆复印资料，在日本购买书籍并邮寄回国。在此，笔者衷心感谢论文形成过程提供帮助的诸位。

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着千城一面问

题，其背后是城市空间特色的丧失。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虽然也曾面临类似问题，但总体治理成效较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分析日本塑造城市空间特色有多种角度，本文选取日本城郭（下称“城郭”）作为切入点有两点原因。第一，城郭是日本古代城市的基础，特别是近世以来；第二，城郭能较好地连接起历史与当下。

不同于中国城郭，日本城郭是指利用土木工事或者自然条件构筑的防御空间及空间上的建筑群。城郭研究有五大要素：地选地取（地势及周边地理环境）、绳张（土地相关的要素，如形状轮廓、面积大小等）、普请（土木工事相关，如壁垒、壕沟等）、作事（天守、櫓或屋敷等建筑）【天守是具有瞭望、指挥功能的日式城堡；櫓是起防御、警戒作用的建筑，类似于哨站；屋敷是以居住、行政功能为主的建筑】、城下町设施【以城主居住的城郭为核心的城市，是日本古代城市的主要形式，也是现代日本大部分城市的历史来源。城下町设施是指城下町相关的空间、建筑要素】。城郭研究开创者鸟羽正雄指出多数研究关心作事，对地选地取、绳张、普请的研究不足。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内部结构、空间区位、更新手段三方面通过案例分析城郭如何塑造城市特色。案例选择基于内田顺文的城市意象研究。

在内部结构方面。从地选地取、绳张、普请、作事四方面，分高低、面积、轮廓、垒（大小）、垒（封闭）、堀（护城河）、天守、桥等七小项进行分析。拥有天守的城郭在城市发展中强化其文化功用，控制其周边地区开发，突出天守及其附属建筑物的视角感知。没有天守且垒范围较大的平山城和山城，在设计上突出自然环境，人造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个补充。没有天守，但绳张面积较大的城郭，通常被塑造为都市休闲、观光商业、宗教活动等区域，以提升地区活力和生活品质。

城郭的边界轮廓直接影响到城市整体路网形态：规则轮廓通常带来规则路网，不规则轮廓则会带来比较自由的路网形态，但也可以通过城下町规范路网。垒封闭程度决定空间之间的交流以及功能的互通，堀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当垒的封闭性较强或者堀的规模较大时，城郭与周边空间的交流会受到一定影响，并对设计风格产生影响。桥的总

体作用是连接传统与现代，不论是在直接的物质层面还是在仅存的精神层面，都使人们身处现有空间中，能够产生对于传统的追忆。

在空间区位方面。根据城郭在城市中区位的不同可以分为单中心、双中心、多中心和边缘型。城郭在城市中的不同区位带来差异化的城市内部功能分化和土地开发强度。对单中心型而言，城郭及周围地区会形成多功能复合中心；对双中心型而言，城郭及其周边地区通常担负行政、文化等传统城市职能，火车站及其周边负担交通、生产、新兴商业等现代城市职能；多中心型则包括城郭、火车站等多类型区域，但会通过交通实现功能互动；边缘型中城郭与城下町通常会得到较好保留，保持历史风貌。

虽然城郭的外部空间结构类型与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但都通过“点（城郭）—线（城下町、街巷）—面（城市整体）”的格局丰富和塑造了城市空间特色；都是从保护对象的整体性，保护范围的整片，保护城市历史文化三方面进行了整体性保护。

在更新利用方面。城郭从江户时代就经历不断的更新利用，有破坏性的，也有保护性的；各个历史时期城郭所经历的不同变化深刻塑造了当今日本城市的独特性。更新利用的主要方式，一是改建为园林或公园，既有如金泽城中兼六园那样的江户时期传统造园手法，也有 20 世纪初利用近现代公园设计改建的弘前城（1903 年开始有规划地种植樱花）等，这些公园也成为日本城市绿地和全国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复建城郭，第一次高潮是 1960 年代，源于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复建建筑物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第二次高潮从 1990 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源于各地试图通过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对人居环境的日益重视，以及打造观光名片带动旅游业发展。这一阶段的复建崇尚修旧如旧，多采用木造结构。

无论是破坏、保护还是重建，每个时代的更新利用都在城郭中留下了印迹，而非简单地用重建去代替破坏。这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更新利用的叠加，为日本城市的景观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特质。城市作为一个连续演进的社会空间载体，和谐与冲突并存

其中，不能以一种风貌去完全代替另一种风貌。

## 首尔大都市区职住空间演进规律探究及启示

王超深 赵炜

**摘要：**韩国政府历来重视国土均衡发展，并在政策、规划等制度设计层面予以有效贯彻。以人均 GDP 进行衡量，在 2000 年前后，其国土空间基本实现均衡发展。在全国城市化率达到 90%的情况下，首尔大都市区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导致职住空间分布特征的急剧变化。本文梳理了 1960 年以来首尔大都市区人口总量的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发现在大都市区发展初期和中期，经济逐利是主要影响因素，快捷轨道交通极大地支撑了大都市区空间拓展和大都市区核心区就业岗位密度的提升，加剧了职住分离程度；在大都市区发展中后期，空间增长动力机制由初期的经济逐利向公共服务设施逐利过渡，受益于既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效应、人力资源及技术外溢等诸多条件，大都市区空间演进将遵循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在国土尺度上延续非均衡的极化发展模式。首尔大都市区案例研究对中国大都市区发展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对于人口腹地较大的大都市区而言，试图控制人口规模增长往往是低效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才是调控大都市区人口分布的核心抓手。

**关键词：**大都市区；职住空间；极化发展；公共服务设施；首尔

**引文格式：**王超深，赵炜. 首尔大都市区职住空间演进规律探究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95-103. DOI: 10.19830/j.upi.2018.093.

## 从改革到构建：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发展

张和强 王欢 李晨 盛鸣

**摘要：**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是国家指导空间布局的系统性前提。本文系统梳理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几次重大变动，重点解析其中体系改革和体系构建两阶段法律体系、层级体系和空间管制的转变趋势。研究指出，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发展是从建设空间向全域空间、从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进行的全盘整合过程，表现为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的循序发展。最后，文章基于台湾地区经验，从观念树立、法理保障、体系完善三方面对大陆深化空间规划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空间规划体系；台湾地区；大陆；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

**引文格式：**张和强，王欢，李晨，等. 从改革到构建：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104-110. DOI: 10.19830/j.upi.2019.453.

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是国家指导空间布局的系统性前提。本文系统梳理台湾地区从基于城市规划到基于区域规划，直至基于“国土”规划的几次重大空间规划体系变动，重点解析各个阶段的法律体系、层级体系与空间管制的转变趋势。研究指出，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发展是从建设空间向全域空间、从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的全盘整合过程，表现

为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的循序发展。最后，文章基于台湾地区经验，从观念树立、法理保障、体系完善几方面对大陆深化空间规划改革提出建议。

日据时期，为服务日本经济和战争需求，殖民者建立市区规划制度，开启了台湾地区空间规划的篇章。台湾地区光复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接收并沿

用了日据时期的空间规划制度与体系。以 1974 年、2016 年两次重大空间规划法律颁布为界，本文将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 1945—1973 年的城市规划体系。这一阶段形成了以区域规划、市镇规划、乡街规划及特定区规划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体系，体系改革主要服务工业发展需要，各级规划形成战后台湾地区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雏形。

其次是 1974—2015 年的区域规划体系。在《区域规划法》下逐渐形成四级规划体系结构，体系改革服务于经济腾飞、城乡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等弊端，更加全面的空间规划体系逐步构建起来。自 1974 年《区域规划法》公告实施以来，区域规划体系影响了台湾地区近 40 年的规划管理与土地管制。其包括“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与非城市土地使用规划”三个类别，分为“台湾地区—区域—直辖市、县（市）—城市”四个层级，以部门规划、“国家”公园规划等作为补充。

最后是 2016 年至今的“国土”规划体系。2016 年《“国土”规划法》公告实施后形成三级规划体系结构，标志着“国土”规划体系完成改革构建。此后，空间规划政策转向保护与平衡发展，力图改善后工业化时期加剧的资源分配问题、生活提升不平衡问题、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问题，使经济急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转向稳定。“国土”规划体系包括“国土规划、城市规划”两个类别，分为“台湾地区—直辖市、县（市）—城市”三个层级。“国土”规划的制定，延续了区域规划体系时期的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规划等一系列非法定规划。改革方面涉及管理体系的简化、土地管制的转变、区域协调的加强等。“国土”规划从法源上应对环境、经济和社会三大挑战，强调自然

环境与经济发展平衡下的“国土”永续发展。2018 年《台湾地区“国土”规划》公告实施，各直辖市、县（市）“国土”规划正在加快编制。

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改革构建表现为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循序发展、全盘整合的过程。其改革演进从法律体系、机构体系、规划体系、管制体系四个层面进行，实现了从建设空间向全域空间、从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进行的完善过程，通过空间规划立法、管理权力统一、规划层级简化，实现自上而下的有效管治，对大陆深化空间规划改革极具借鉴意义。

从大陆地区的环境和发展阶段而言，本文提出三方面启示和建议。一是观念的树立，建立保护与开发平衡的自然资源观，通过形成严格的、法定的土地用途管制分区，提高土地管制层级，来统筹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二是法律的保障，加快推进构建空间规划法律体系，通过废止、吸纳整合《土地管理法》为《国土空间规划法》作为，并修正《城乡规划法》，形成“国土空间规划法—城乡规划法”的空间规划法规体系；三是体系的完善，明确各级事权、完善空间规划运行体系，在保持“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空间规划体系维护空间管理刚性的同时，也因应市场经济发展明确地方在空间管理上的自主弹性，以推动形成刚弹结合、行之有效的空间规划。

对于现阶段的大陆而言，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并非简单地合并编制一些规划，也并非简单的规划编制创新或技术探索，而是一项艰巨的改革重任。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应该以保护与开发平衡的自然资源观为指导，加快探索、制定和颁布空间规划法律法规，构建统一而又具有弹性的空间规划体系。

## 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规划与管控：美国圣克拉拉谷地的经验

邢忠 汤西子 顾媛媛 周茜

**摘要：**城市边缘区自然生境的环境胁迫是城市化造成的突出问题，生境保护早在 30 多年前就受到发达国家与地区的高度重视。美国的物种保护经历了特定物种实体保护和重要生态斑块保护，最后回到物种赋存生境保护，可见生境保护的重要性。在增强保护规划与提升管控实效方面，中国还有待发掘系统的应对方案。美国生境保护规划起步时间早、管理体系完善且能充分协调生境保护与建设发展的关系，对我国城市地区全覆盖规划，特别是对提升城市边缘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效与复合服务能力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文

章采用文献梳理及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保护规划制定、开发项目管控和环境影响评估三个方面剖析美国生境保护的思路和管控方法，并提出通过深度链接高层规划、审批管控流程与环境影响评估的适应性用地布局规划，及“硬—软件”要素结合的管控方法，来应对我国城市边缘区环境保护与管控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规划流程引导；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规划；项目流程管控；环境影响评估

**引文格式：**邢忠，汤西子，顾媛媛，等. 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规划与管控：美国圣克拉拉谷地的经验[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111-121. DOI: 10.19830/j.upi.2018.450.

生境保护规划的重点正逐渐由特定物种保护转变为物种群落保护，由单一生境保护转变为生境网络构建。本文以美国加州生境保护规划为例，剖析其如何通过规划流程引导、项目流程管理及环境影响评估三方面工作，实现生境有效保护与建设。

城市边缘生境区具有潜在的城市服务功用，其景观形态丰富，可安排游憩空间等公益性产品，而城市化进程正严重危及城市边缘高价值生境区的健康演进。我国当前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的主要问题是保护目标模糊，以“划线式”被动保护为主，生境保护的规划与管控路径存在相关环节的缺失，主要表现为：（1）简单的“留白”或“泛绿规划”埋下了深层的生境问题隐患；（2）忽视保护客体相关过程及关联要素；（3）环境影响评估与规划、建设和监管脱节，重视“硬性”保护措施，而“软性”保护手段不足。

在国际上，欧洲部分地区实施环境影响设计，在保护生境的同时，致力于公共产品产出，涵盖休闲场所供给、食物的战略储备以及野生食物供给等内容。在美国，生境保护规划（habitat conservation plan / natural communities conservation plan）被认为是保护濒危物种的有效方法。美国国会于 1973 年签署通过了《濒危物种法》，1982 年，生境保护规划被正式写入上述法案。

本研究的对象是圣克拉拉谷地生境保护规划，其涵盖了城市、乡村建设、战略保护等领域，将生境保护措施融入项目许可和建设中止许可的审批过程中，生境保护规划方案的制定、建设项目审批及用地管控与环境影响评估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规划的有效性，文章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生境保护规划的制定。规划文本包括编制、实施、监控及项目管理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八个流程环节。全部过程共涉及 15 项重要的决策，生境保护规划已成为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技术依据。依照“程序法”规定了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及特定管控内容。四大机构相对独立并相互监督制约，规避“黑箱”运作的可能性。

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是链接圣克拉拉谷地生境保护规划与项目开发管控程序的重要环节，将生境保护及管控措施整合到用地布局和建设开发许可证审批的过程中，涉及环境、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具体评估内容确定需根据项目影响预判得出。

对中国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规划与建设管控的启示。流程式管控与环评双管齐下，即生境保护规划、项目管控和环境影响评估协同，在保护生境本身的要求外，还需兼具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旅游休闲产业、为城市储备发展用地等复合服务功能。圣克拉拉谷地生境保护规划的第一个借鉴价值在于它是主动式前置规划（proactive plan）。另一重要启示则是在制度及规划内容上协同保障生境保护规划的实效性。

研究总结：“生境保护规划的制定流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程序法保障下的项目审批及管控”，是确保生境保护实效不可或缺的“生境规划—建设环评—项目审批”全链条管控方法。针对我国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建设问题，有必要（1）制定基于特定生境保护目标导向的保护规划审批流程和相应的规划编制办法；（2）明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内容、指标和影响避减措施，采用硬件与软件结合、刚性与弹性结合的项目管控方式；（3）以适应性项目管控审批程序，护航规划、评估、管控三大环节，促进城市边缘区生境保护实效提升。

## 大都市公交导向开发的规划与政策：深圳与西雅图的对比

林雄斌 徐媛 董美璇 林培楠 黄赞 徐可

**摘要：**当前，大都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推进公交导向开发（TOD）和公交都市建设成为国内外大都市空间发展与交通战略的焦点。理解公交导向开发的融资、规划和政策等制定机制是评估其实施效果的重要前提。受限于不同的空间和体制差异，TOD 政策及实施通常呈现不同侧重点，进而导致不同的实施效果。本文以深圳和西雅图的 TOD 政策为对比案例，探讨中美不同空间和体制背景下 TOD 在发展理念、融资结构、物质形态等方面的异同，有助于深入理解公交都市建设的内涵和优化路径。研究表明，与深圳市相比，西雅图 TOD 政策注重轨道交通与低收入社区的融合，以政府补贴或鼓励市场参与来推进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保障性住房建设；在规划、融资及实施等环节，注重“谁受益、谁支付”原则来推进轨道交通的多元融资，且注重利益相关主体的深入参与，以提升方案可实施性。基于此，我国未来公交导向开发应加强轨道交通与低收入群体的空间融合，推进轨道交通多渠道融资，并加强融资政策和规划方案制定的公众参与。

**关键词：**公交导向开发；交通规划与政策；公交都市；大都市；深圳；西雅图

**引文格式：**林雄斌，徐媛，董美璇，等. 大都市公交导向开发的规划与政策：深圳与西雅图的对比[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2): 122-128. DOI: 10.19830/j.upi.2018.407.

大都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推进公交导向开发（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和公交都市建设是国内外大都市空间发展与交通战略的焦点。尤其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再加上机动化的快速发展，对城市交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理解公交导向开发的融资、规划和政策制定等的机制，是评估其实施效果的重要前提。受限于不同的空间和体制差异，TOD 政策及实施通常会呈现不同的侧重点，进而可能导致不同的实施效果。美国是最早兴起公交导向开发和新城市主义规划研究的国家，那么中美城市的 TOD 政策与实践效果究竟存在哪些区别，各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笔者 2016—2017 年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建筑学院开展博士联合培养研究，为了解美国西雅图公交发展和 TOD 的政策实践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该研究主要聚焦影响 TOD 政策的三个重要因素：TOD 战略理念、融资来源与结构、物质形态规划控制，以深圳和西雅图的 TOD 政策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美不同空间和体制背景下 TOD 政策与实施的异同，这有助于深入理解公交优先的内涵和优化路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阅读、实地调研、规划报告收集和

分析。

选择西雅图市作为案例有其特殊意义，它是华盛顿州、普吉特海湾区域委员会（Puget Sound Regional Council）和金县的核心城市，不同层级政府对西雅图市均有较详尽的规划方案和规划研究。

研究发现，深圳市和西雅图市的 TOD 政策在规划理念、融资结构和物质形态规划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

第一，西雅图更注重轨道交通与低收入社区的融合，通过政府补贴或鼓励市场参与来推进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交通可达性的提升通常会对周边的房地产带来增值效应，对一些非常依赖公共交通的社会群体来说，可能会降低其住房可支付性。因此，促进轨道交通与保障性住房的空间协同能促进中低收入群体享有更平等的发展机会。

第二，在规划融资环节，西雅图更注重采用“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来推进轨道交通的多元融资。目前土地税收、特殊评估区和税收增额融资等溢价回收（value capture）工具已经在西雅图 TOD 规划建设中得到应用。虽然溢价回收作为实现 TOD 可持续融资的重要方式已经在深圳得到实施，但仍需注重相关制度的优化。

第三,在规划实施中,西雅图更注重利益相关主体的深入参与,以此提升方案可实施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城市在人口规模、开发密度和产权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城市交通发展任务亦有差别。如中国的高密度城市的交通任务集中在缓解交通拥堵和提升交通效率,而美国

一般城市的交通问题主要体现在交通优先及社会公平等。不同“空间—制度”下 TOD 呈现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实施效果,本研究能反映中美城市公交投资与土地开发的一些差异,但关于中美公交优先和 TOD 的对比研究仍需深入开展。

## 城市废弃铁路更新的融资机制解析——以美国亚特兰大环线税收分配区政策为例

李泽 侯英裕

**摘要:**后工业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以废弃铁路改造推动城市更新的热潮中,美国亚特兰大对连接市内 45 个街区的废弃铁路线改造利用,有效带动了地区复兴。本文以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切入点,探究其背后机制,聚焦重要融资保障机制——税收分配区政策。通过解读与税收分配区政策相关的经济、法律文献,文章梳理了该政策的发展历程、制定过程和作用特点,并以亚特兰大环线为例,讨论了该政策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划定环线周边的税收分区,将分区内的房地产所得税用于建设,从资金来源角度保障了项目得以顺利实施。这提高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环境质量,进而吸引了更多私人投资,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复兴。税收分配区政策在亚特兰大环线中的应用研究为我国废弃铁路更新的实施及其经济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废弃铁路更新;融资机制;税收分配区政策;亚特兰大环线;城市再开发;规划实施

**引文格式:**李泽,侯英裕.城市废弃铁路更新的融资机制解析——以美国亚特兰大环线税收分配区政策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20(2):129-135. DOI: 10.19830/j.upi.2018.506.

近年来,以美国高线公园(the High Line)为代表的废弃铁路更新项目为各国城市提供了经验借鉴,然而,跨越不同街区、地区的废弃铁路的更新并非仅是铁路线本身的更新改造。美国高线公园、法国巴士底—凡塞纳铁路的成功改造,证明废弃铁路更新的背后通常需要有较为完善的政策保障机制作为支撑,才可确保设计从图纸变为现实,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基于美国亚特兰大环线规划构想的成功实施,本文探讨了美国以推动废弃铁路更新实施为目的的环线再开发的融资保障机制——“税收分配区”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借款融资的一种方式,它以预期增加的财产税为担保进行融资,能够吸引债券融资、政府拨款、慈善捐款等公共及私人资本的投入来提升地区价值,从政策和资金来源角度保障了设计的实施,为我国废弃铁路更新提供了具体思路。

税收分配区(TAD: Tax Allocation District)指

在一个指定的地理范围内涉及的“税收增长融资”,在这一范围内,房地产的应纳税价值(即税收基础)被冻结在开发前的水平,随着开发而增加的房地产税则被用于支持该地区的发展。税收分配区政策具有地方政府自主、资金建构多元、资金使用灵活的特点,能够为亚特兰大环线项目不同阶段提供有效的支撑。

在亚特兰大环线项目的先期启动阶段,政府依据 TAD 政策制定了环线 TAD 的划定及其资金覆盖计划。2005 年,亚特兰大发展局(The Atlanta Development Authority)制定完成了《亚特兰大环线再开发规划》,划定了 6 545 英亩(约 26.5 km<sup>2</sup>)的亚特兰大税收分配区,预估了 TAD 的税收融资总量及环线建设支出(表 1),设定 TAD 的存在时间为 25 年。亚特兰大市和亚特兰大发展局共同制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亚特兰大环线 TAD 与资金覆盖计划是一种可行的机制,区内的税收融资可

表 1 《亚特兰大环线再开发规划》中预计的 TAD 资金在各类项目中的分配

| 项目       | 面积、数量或占比                         | 总成本 / 亿美元   | TAD 资金 / 亿美元 | 其他资金 / 亿美元 |
|----------|----------------------------------|-------------|--------------|------------|
| 经济型住宅    | 5 600 套                          | 2.2~2.6     | 2.4          | —          |
| 土地收购     | 1 280 英亩（约 518 hm <sup>2</sup> ） | 4.8~5.7     | 4.26         | 0.54~1.44  |
| 环线步行绿道   | 22 英里（约 35.4 km）                 | 0.5~0.6     | 0.34         | 0.16~0.26  |
| 步行绿道连接   | 11 英里（约 17.7 km）                 | 0.25~0.3    | 0.19         | 0.06~0.11  |
| 公园设计与建设  | 1 794 英亩（约 726 hm <sup>2</sup> ） | 2~2.5       | 1.2          | 0.8~1.3    |
| 公交运输系统建设 | 22 英里（约 35.4 km）                 | 7~10        | 5.3          | 1.7~4.7    |
| 步行道改善    |                                  | 2.35~2.7    | 0.9          | 1.45~1.8   |
| 路面改善     |                                  | 0.7~1.05    | 0.30         | 0.40~0.75  |
| 亚特兰大公立学校 | 5.5%                             | 0.8~0.95    | 0.88         | —          |
| 激励项目     |                                  | 1           | 1            | —          |
| 行政与计划管理  | 2.0%                             | 0.32        | 0.32         | —          |
| 总计       |                                  | 21.92~22.72 | 17.09        | 5.11~10.36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亚特兰大环线再开发规划》数据绘制

以为环线项目中的重要部分提供资金，并可能吸引额外的公共和私人资金进行建设。

在项目运营阶段，TAD 政策保障了相关资金的使用及管理。在亚特兰大环线项目实施的近 10 年时间内，基本已建成的项目包括 8.7 英里（约 14 km）的永久性的步行小径、412 英亩（约 166.7 hm<sup>2</sup>）新建和更新的公园绿地，超过 274 英亩（约 110.9 hm<sup>2</sup>）的已修复棕地，数百栋经济适用房等。亚特兰大环线公司作为 TAD 的资金管理机构，负责监督规划执行，并与亚特兰大市各部门密切合作，确定计划的细节。TAD 产生的增量税收则可用于这类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费用，使环线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从实施现状来看，TAD 政策有效带动了地区复兴，但同时也容易产生房地产投机问题。在亚特兰大环线使用 TAD 政策之前，由于该地税基较低，亚特兰大环线沿线的大部分房产处于空置及持续贬值的状态。随着 TAD 的划定及资金的投入，亚特兰大环线地区得以复兴，过去未充分利用的房产得到了增值，产生了更多的税收，使其足以支付更多的亚特兰大环线建设投资，而项目的建设又将促进地区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一些研究证实了环线部分地区房屋保险费的大幅增加，表明了该政策

可能引发的投机和绅士化现象。

根据未来的发展计划，TAD 政策将继续促进公共拨款和吸引私人投资，保障地区更新的可持续运营。2013 年制定的《亚特兰大环线 2030 策略实施规划》预计，在未来的 17 年，TAD 产生的资金将仅占总资金收入的三分之一，与 2014 年的数据相比，政府专项基金、私人投资、慈善捐款等所占比重预计将增加 10%，表明了亚特兰大当局对 TAD 政策促进公共拨款及吸引私人投资方面的信心。

税收分配区政策作为美国地区更新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机制，其成功运用的依据在于“税收增长融资”这一经济政策对税收资金的灵活运用。以“税收增长融资”这一配套经济政策为保障，政府将区域内预期增长的税收作为担保，向社会发行债券进行融资，有效利用社会资本来启动更新项目的实施，并能够在实施过程中依托已实施的项目进一步吸引投资，使区域内房地产税收总量得到提升，确保政府能够以增加的税收偿还先期的社会资本。在这一经济政策的保障下，政府通过对更新区域内房地产税收对象和时间的再分配，构建了项目启动、运营、发展的资金闭环，实现了“地区反哺式”的循环、持续的资金供给方式，从资金来源角度为我

国废弃铁路更新实施提供了经验借鉴。

尽管我国的地方财政体系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在国家逐步推进房产税的政策趋势下，税收分配政策所体现的税收转移机制、公私合作模

式以及地方自主性有助于地方政府在城市再开发过程中探索新的融资来源，建立更完善的公私合作机制，为推动我国探索工业废弃地更新的新经济模式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 香港空中步行系统的规划实施运作研究

肖锐琴 刘雷

**摘要：**香港空中步行系统建设从规划设计、制度安排、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实践探索，其积累的经验对内地空中步行系统精细化设计和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香港空中步行系统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规划实施运作机制，它的建设实施可分成规划要点提取、开发建设、后期管理运营三大过程，涉及立项决策、土地契约及土地交易、设计、图则审查、施工建设、竣工验收、后期运营管理七大阶段。其建设实施推进并不是政府全盘操办的过程，而是具有灵活多样的实施操作方式。同时，在高品质的空中步行系统不断优化过程中，完善的配套制度设计，如“认可人士”制度、建筑面积奖励政策、建筑图则制度、监督审查制度、物业管理制度也发挥了关键的保障作用。然而在建设协调过程中，香港空中步行系统也遭遇了“未能完全体现公共空间价值”和“无法保障综合效益”等问题。香港空中步行系统的经验，可为内地空中步行系统的规划与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香港空中步行系统；规划；建设模式；制度保障；实施

**引文格式：**肖锐琴，刘雷．香港空中步行系统的规划实施运作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20(2): 136-143. DOI: 10.19830/j.upi.2018.067.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了“下半场”，高质量发展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香港空中步行系统建设从规划设计、制度安排、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的系统性探索，对国内空中步行系统精细化设计与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香港空中步行系统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规划实施运作机制。它的建设实施可分为规划要点提取、开发建设和后期管理运营三大过程，涉及立项决策、土地契约及土地交易、设计、图则审查、施工建设、竣工验收和后期运营管理七大阶段。其中，规划要点提取过程的工作核心是将“公共通道与周边场地关系的共识”落实到土地契约条文中，明确政府与业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开发建设阶段中，屋宇署通过建立责任制度并严格执行法例来保障公共通道的建设；地政总署、屋宇署履行后续程序进行工程竣工验收以确保土地契约条文的全面落实，业主或物业公司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进行运营维护。

香港空中步行系统的建设并不是政府全盘操

办的过程，而是具有灵活多样的实施模式和完善的制度保障。按照不同建设条件，可分为未建成地区政府自上而下主导、建成地区业主自下而上申请建设和政府自建高架公共通道三种模式，它们从实施机制上赋予空中步行系统建设更大的弹性和可能性。香港政府通过核心区的连廊建设展现积极的商业效应，从而引导业主主动加入空中步行系统建设，进而形成立体渗透、高效便捷的空中步行网络。同时，香港空中步行系统建设配套的“认可人士”制度、建筑面积奖励政策、建筑图则制度、监督审查制度成为空中步行系统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香港空中步行系统尤其关注公共空间环境品质的塑造。该系统是高密度城市的重要公共空间，从运输署对交通选线的论证与后期交通管理、路政署对街道设施的整合、认可人士对接入空中步行系统的开放设计，到后续公共空间的指引，都将塑造良好的空中公共空间环境作为发展目标，强调公共空间品质、促进公共生活。衡量空中步行系统的好

坏，不在于审批数量的多少或提供定额定量的面积，而在于是否提供高品质的公共场所。

在精细化建设管理过程中，香港空中步行系统面临“公共空间价值”与“城市综合效益”的现实问题。一是空中步行系统未能完全体现公共空间价值，市民无法享用地契条文中定义为“公共通道”的活动场所，后续引发了“私人发展公众休憩空间”

（POPS: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的讨论；二是与业主收益密切相关的建筑面积奖励政策无法保障城市环境的综合效益。单一的“鼓励积极性”的建筑面积奖励政策往往带来对高度、体积、密度

管制的突破，对空气流通和建筑景观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城市规划管理“失控”，无法保障城市环境品质的综合效益。由是，私人发展公众休憩空间设计与管理指引、建筑面积奖励政策等制度也随着现实进行灵活的创新与完善，试图在公众利益、法理制度、规划设计、管理运营和公共责任之间找出平衡点，鼓励业主建设的积极性，探讨实现高品质公共场所。

精细管理，需作于细。香港空中步行系统的建设实施贯穿于规划设计到建设管理的全过程中，为今后国内空中步行系统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

## 艾伦·雅各布斯的复合型林荫大道

蒋敏 卢峰

**导读：**进入 21 世纪，全球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街道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出台了相关的街道设计导则。作为美国 20 世纪中后期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的重要人物，艾伦·雅各布斯（Allan Jacobs）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充分肯定了复合型林荫大道的高效性、安全性和宜居性，他主持完成的奥克塔维亚林荫大道（Octavia Boulevard）改造项目是一次拆除高速公路，修建复合型林荫大道的创造性实践，其核心理念在于改变项目周边的交通状况和人们的出行方式，从而创造优美的街道景观、多样的街道活动和富有生活气息的街道氛围。该项目在投入使用后不久就荣获多个奖项，并且带动了后来的市场街—奥克塔维亚区域改造，对于我国城市街道研究和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引文格式：**蒋敏，卢峰．艾伦·雅各布斯的复合型林荫大道[J]．国际城市规划，2020(2): 155-159. DOI: 10.19830/j.upi.2019.228.

作为美国 20 世纪中后期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的重要人物，艾伦·雅各布斯（Allan Jacobs）在街道方面著述颇丰，并在北美多个城市完成了多项具有开拓性的城市设计项目。其中，发表于 1994 年的《林荫大道：关于安全性、行为和有效性的研究》（Boulevards: A Study of Safety, Behavior, and Usefulness）分析了世界各地林荫大道的设计和使用，证明了林荫大道安全性，并提出“人车混行”的可能，发表于 1995 年的《复合型林荫大道：案例研究、设计和设计导则》（Multiple Roadway Boulevards Case Studies, Designs, and Design Guidelines）基于先前的研究，对旧金山及周边地区 5 条尺度各异、颇具代表性的街道进行了改造设计，总结出林荫大道的设计导则。

1998—2005 年，雅各布斯和麦克唐纳的事务所（Jacobs Macdonald: Cityworks）在旧金山完成了将原中央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改造为奥克塔维亚林荫大道的项目。

改造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它并不需要负担与原有高速公路相当的交通量，而是将其中一部分车行转变为步行或自行车，从而创造更为复杂多样的街道活动，正如麦克唐纳在书中写道的那样，“林荫大道研究的核心发现可以概括为一种‘整体的不可预测性’（the elusiveness of wholeness）。过分专注于潜在交通事故或不良交通行为，或是试图通过拓宽车道宽度、增大转弯半径、增大行道树退距、限制通行来解决问题，都是对复杂而富有生活气息的林荫大道的误解”。

改造后街道周边出现了显著的士绅化，就业机会相比周边区域显著增加，土地价值有所提升。同时，该项目也改变了周边的交通状况和人们的出行方式。林荫大道于 2005 年投入使用，开放 6 个月之后的调研表明，工作日该路段的机动车平均交通量由 1995 年的 93 100 辆下降至 44 900 辆，减少了 52%，这些“蒸发的”交通意味着人们减少了不必要的驾车出行，改用了其他方式——如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通过长时间观察，研究人员发现车行交通量的下降带来了慢行交通的增加。

混乱、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低品质的城市环境，使得一种“分门别类”“重建秩序”的思想蔓延在 20 世纪初期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到世纪末，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分离哲学，逐渐转向追求以“混合”“活力”和“多样”为特征的可持续、宜居环境。

艾伦·雅各布斯等人对复合型林荫大道的研究和实践，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街道层面的“混合”思

想，这也是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中的重要内容。复合型林荫大道在强调步行环境安全和品质的基础上兼顾快速交通，融合公共交通系统、街道绿化景观与朝向街道开放的各类建筑，旨在创造宜人的空间体验，引入丰富的人群、触发更多的社交活动，恢复机动交通占领城市之前的传统街道的生机活力和社交功能；它实现的是多方的共赢：“或许没人百分之百地心满意足，但每个人都从中收获良多”。

目前，复合型林荫大道的街道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各地的规划文本和实践中，为人们所熟悉。因此，比起街道形式本身的改变，奥克塔维亚林荫大道实践带给我们的更重要的启示，或许是对人们观念和行为的改变：鼓励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将城市街道交还给真正参与城市生活、创造城市活力的步行者，将在城市地面上自由行走的权利交还于他们。

## 2020年第3期文章目录

### 特稿

王一名, 伍江, 周鸣浩 / 城市更新与地方经济: 全球化危机背景下的争论、反思与启示

### 城乡研究

李凌月 / 转型时期欧美及中国城市重构研究——基于西方文献的解读

吴小凡 / 难以兑现的承诺——美国新城市主义理论发展困境刍议

郭磊贤, 吴唯佳 / 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组织的“自主性”原则: 国际实践与本土探索

金一, 王绍博 / 高速铁路的空间效应及其热点问题

焦健, 王德 / 从出行到活动: 国外时空行为调查的演变与发展

曹哲静 / 城市商业中心与交通中心的叠合与分异: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东京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耦合研究

刘泉, 赖亚妮 / 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在中国的功能演变

张祥智, 崔栋 / 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的演变特征及其社会空间效应  
——兼论对我国居住区规划的启示

### 规划研究

张书海, 王小羽 / 空间规划职能组织与权责分配——日本、英国、荷兰的经验借鉴

魏伟, 刘畅, 张帅权, 王兵 / 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

石清, 王骏, 张照 / 中国规划经验在尼日利亚园区道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莱基自由区为例

刘云刚, 陈林, 宋弘扬 / 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日本的经验与借鉴

冷红, 宋世一 / 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赵丛霞, 朱海玄, 周鹏光 / 英国规划许可中的公众参与——以英国谢菲尔德市为例

郭湘闽, 冀萱, 王冬雪, 颜晓娜 / 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台湾都市更新中的权利变换制度及其启示

曾敏玲, 毛媛媛, 廖良 / “问题修复”和“提前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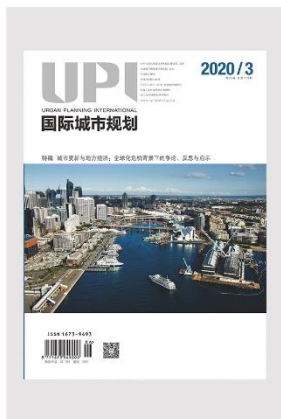
法国广场设计中对环境犯罪预防的探索及其启示

### 专题研究

孙森, 奚雪松, 王策 / 澳大利亚文化景观遗产的认定方法

### 案例集萃

姚栋, 张侃 / 文化设施集聚区伦敦展览路的街道改造



2020年 第3期

## 城市更新与地方经济：全球化危机背景下的争论、反思与启示

王一名 伍江 周鸣浩

**摘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更新长久以来发挥着吸引外来流动资本的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出现危机，城市更新活动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西方学者对城市更新的作用提出了质疑。本文以西方学者围绕城市更新是否能促进地方经济所展开的争论为切入点，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角度反思全球化进程从蓬勃发展出现危机这一过程给城市更新活动带来的重要变化，分析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指出全球化危机使得城市更新作用和价值取向发生转变。是否能够重塑旧城形象、提升土地价值不再是判断城市更新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城市更新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承担了更多元的经济和社会职责。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西方学界争论对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更新；地方经济；新自由主义；资本累积；全球化危机；建成环境

**引文格式：**王一名，伍江，周鸣浩. 城市更新与地方经济：全球化危机背景下的争论、反思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1-8. DOI: 10.19830/j.upi.2019.540.

自 19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带来了全球化浪潮。资本流动导致全球城市间相互竞争。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政府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全球市场上吸引投资的能力。在建成环境方面，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需要建造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以激发欣欣向荣的城市景象。因此，通过对已有建成环境的提升和大规模再造来重塑城市景象，成为全球化时代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特征。而城市更新则作为最重要的城市景象再造方法，加入资本全球化进程，并成为实现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模式的重要工具。

而同时，旧城和城市衰败区域里的大部分居民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工作机会被外来人口夺走，土地被征收，诉求被排除在城市开发决策者的考虑之外。而大约在 2007 年之后，全球化出现危机，资本的全球流动受到明显制约。2007—2018 年间，全球流动资本总量在 GDP 总量中的占比从约 5% 锐减到 1.5% 左右。全球化危机使得城市更新在地方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

其一，以吸引全球流动资本为目标的城市更新活动给地方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逐渐凸显。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 19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流动资本而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兴建了大量“经济空间”，却忽视了“生活空间”的建设。而全球性资本在流动到一个城市后仍然会不断在世

界范围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一旦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它便会抛弃自己创造的建成环境，去追逐更高的利润。地方政府在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更新过程中过于重视对“经济空间”的创造，而忽视建设有吸引力的“生活空间”为城市吸引足够的人口并为其提供土地需求。那么当资本撤出后，大量失去使用价值的建成环境会使地方经济快速陷入危机。

其二，在全球化受阻、民粹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不少西方国家开始强调城市更新的社区属性，即通过城市更新来强化城市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的壮大一方面可以协调城市空间过度商品化带来的地方经济结构失衡，降低经济风险；另一方面，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通过强化当地社区力量来构建反消费政治（anti-commodification politics）是降低弱势社会群体在全球化浪潮中所受伤害的最有效途径。

对于处在全球化危机中的中国，城市更新活动在我国城市地方经济中同样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城市更新在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在我国地方经济中发挥创造“经济空间”、吸引流动资本的重要作用。而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绅士化、社会隔离等弊端已经开始在中国大城市逐渐凸显，因此，中国将来的城市更新也需要营造“生活空间”，在抵抗流动资本对地方经济、文化侵袭方面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鉴于城市更新在中国目前城市发展过程中所

表现出的不同状态，我们需要对发挥不同作用的城市更新采取有区别的治理模式。发挥社区属性的、以创造“生活空间”为主要目的的城市更新活动，在抵抗地方经济遭受全球化冲击，维持稳定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类城市更新创造出来的空间却往往难以吸引投资，因为它们难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类城市空间的特征类似于“公共品”（public goods）。在这类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并提供公共资金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创造“经济空间”为主要目的

的城市更新项目虽然能为地方带来经济增长，但为私人投资者和开发商牟利是这类城市更新项目不可避免需要承担的职责。该类更新项目创造的城市空间具有“私人品”（private goods）的特征。对于这类城市更新项目，政府应该控制公共财政投资，尽量发挥市场机制来筹集项目需要的资金，以避免在外来资本大量流出或投资流入受阻的情况下给地方财政带来压力和危机。同时，为避免投资者完全按照资本逻辑来塑造、使用城市空间，在这类城市更新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该更加强调公众参与的作用。

转型时期欧美及中国城市重构研究——基于西方文献的解读

李凌月

**摘要：**“城市重构”是转型时期的热议词汇，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城乡规划理论与实践。本文在简要介绍城市重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以 19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和 1978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政策背景，对转型时期欧美和中国城市重构路径及研究进展进行阐述。文章重点从城市空间变革和城市政府转型两方面揭示城市重构路径，并分别对城市重构近期文献进行概括、分析和评述，以期有益于城市重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城市重构；空间变革；政府转型；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

**引文格式：**李凌月. 转型时期欧美及中国城市重构研究——基于西方文献的解读[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9-14. DOI: 10.19830/j.upi.2018.428.

欧美新自由主义进程始于 1970 年代，涉及全球秩序、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福利国家再私有化。1980 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政府采取货币主义政策并大幅削减财政中的福利支出，试图扭转滞涨现象，表现为以去监管为特征的政府收缩型新自由主义（roll-back neoliberalism）。1990 年代，随着克林顿和布莱尔当选，公共开支开始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并通过对国家和私人资金进行再分配，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呈现出以活跃的国家建设和监管改革为标签的政府扩张型新自由主义（roll-out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将“空间”作为“特权工具”（privileged instrument），通过超国家尺度的空间整合（如跨国自由贸易区、欧盟一体化）和城市（地方）尺度的空间收缩与重组（如美国“锈带”和大

型复兴项目），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地方发展轨迹。城市政府亦随之发生深刻转型。伴随福特凯恩斯累积体制的瓦解和后福特政体的登场，新的规制政体支持供给侧创新，创造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国家层面，权力在多层化的治理体系中上移至超国家尺度，下放至次国家层面，并侧推至非政府组织；城市层面，政府遂摒弃福特时代规模生产的“管理主义”，转向后福特弹性生产的“企业主义”，显示了城市政府从单一的再分配向再分配与增长两个方面的转变。

不同于东欧休克疗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呈现渐进特点。改革初期，“去国有化”和分权化占据主导。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赋权并重新界定了公私职能，分权化则重塑了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城市和区域成为确保规制下资本积累的重要

尺度，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活跃。1990 年代，持续分权形成“弱中央”的央地格局，国家遂通过分税制改革保证顶层执行力，同时启动对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保护大型国企（即抓大放小），自上而下的干预逐渐增强。地方政府在分税制背景下面临财政压力，不得不通过土地财政充盈资金，引发激烈的地方竞争。分权与市场化使得参与城市发展的资本变得多元，并通过寻求地方保护获得非正式竞争优势，城市政府亦寻求与多元市场力量合作，以强化其对市场的调控力，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应运而生。

计划经济时期，遵从于均等主义（egalitarianism）目标，规划建设大量借鉴微街区（microrayon）模式的单位综合体，城市形态改变缓慢。随着市场机制

的引入，城市空间发生巨变。单位综合体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再开发和城市扩张中被蚕食，低效产出的计划经济空间转变为高效产出的市场经济新空间，资本得到快速积累，空间构成异质化特征越发明显。

欧美与中国的城市重构虽然在路径上有诸多相似（例如城市空间总体上趋向更加碎片化和异质的特征，城市政府都更加外向），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不可简单将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用于理解中国城市发展。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城市研究领先于乡村研究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催生乡村研究新理论的直接动力亦来自于新马派对空间规划的反思。开展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丰富反全球化时代尺度下移范式下的城乡规划话语体系，将成为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 难以兑现的承诺——美国新城市主义理论发展困境刍议

吴小凡

**摘要：**兴起于 1980 年代的美国新城市主义运动将打造价格合理、混合功用、步行友好的社区作为开发理念，以对抗郊区低密度无序蔓延。本文就这场运动的影响及社会评价进行分析，指出这场运动最初带有实验的目的，其所标榜的一些理念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实现，但这场运动引发社会各界反思当下生活方式并开始讨论新的社区开发标准，有许多新的理念与设计在这场运动中纷纷登场。新城市主义的发展历程是当代美国社区规划思潮的缩影，也为社区规划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新城市主义；郊区蔓延；社区规划；传统邻里；公共交通

**引文格式：**吴小凡. 难以兑现的承诺——美国新城市主义理论发展困境刍议[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15-19. DOI: 10.19830/j.upi.2018.401.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大力开发郊区独栋住宅，推动美国社会迈入郊区时代，同时也带来了郊区低密度无序蔓延问题，造成了地方行政巴尔干化【郊区不断扩展，造成市、镇和各种独立行政区不断增多。在美国“地方自治”的传统文化下，郊区多采用合并的方式独立建市，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地方政府。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和郊区市镇在行政上互不相属，都是平等而独立的政治实体，导致美国各大都市区的行政区划相当破碎，好像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众多小国，被学者们称为政治“巴尔干化”。——编者注】，不同阶层、种族间居住隔离加重，公共空间萎缩带来的公共生活衰落，出行过度依赖私家车造成

的污染和浪费等现象。

兴起于 1980 年代的美国新城市主义运动将打造价格合理、混合功用、步行友好的社区作为开发理念，以对抗郊区低密度无序蔓延。作为一场社区规划实验，新城市主义运动的设计理念在刚被提出时并非没有瑕疵。自 1981 年杜安尼（Duany）夫妇设计规划海滨镇以来，质疑与批判的声音始终伴随着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

总体而言，对新城市主义的批评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就新城市主义社区具体项目而言，未能实现房价可负担的承诺，新城市主义开发项目的房价超出了一般家庭的可支付能力；其次，新城市主

义在理论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缺陷，试图单纯运用技术手段、回归传统的设计规划作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第三，从社会环境角度来说，新城市主义未能扭转汽车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出行习惯，并且，阶层和种族间隔离的状况也未得到改善。

新城市主义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在于发起者们及时观察到了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新城市主义社区是一个试验场，建筑师、设计师们将他们的新理念融入了社区实践中。作为一场有意义的探索，它必然会经历一些失误。从各界对新城市主义运动的批评和质疑来看，它确实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这也令其在社区规划与开发过程中，能够及时获得反馈，并对各种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总体而言，这场运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反思当下生活方式并开始讨论新的社区

开发标准。

新城市主义运动为城市生活绘制了美好蓝图，也引发了人们对城市生活本质的思考。当代城市发展的现实状况是“城市生活”方式长期受到压制，长期以来对城市生活缺点的夸大使不少人坚信只有在郊区才能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新城市主义理论的出现，重新树立起城市公共生活的正面形象。一个好的城市发展理论，其出发点是相信城市在包容多样性、重视个体诉求的同时，还有能力表达某种共同的精神特质。城市不是建筑的堆砌，它也具有伦理功能，它把我们从每天的生活中唤醒，唤起我们去实现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应有的价值；它驱使我们寻求更好的生活，更接近我们的理想。新城市主义最大的启示，或就在于保持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 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组织的“自主性”原则：国际实践与本土探索

郭磊贤 吴唯佳

**摘要：**当前，各类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在我国广泛开展。从海外经验看，超地方组织和社会资本对城市事务的介入缓解了因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导致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压力，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自主性”为原则、在激励与监测机制下保障地方主体自主权和公共投资绩效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组织模式，其中数欧盟城市社区倡议最为完善。我国相关政策具有在行政体系内部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的惯性，但近年来的实践已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色彩。本文通过调研分析上海 M 区的社区提升实践案例发现，基于“自主性”原则的项目组织架构能够适应我国城市发展制度环境并获得良好的项目实施效果，对于促进我国区域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有借鉴意义，可从基层社区为起始逐步推广。

**关键词：**人居环境提升项目；自主性；公共投资；空间治理；欧盟城市社区倡议

**引文格式：**郭磊贤，吴唯佳. 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组织的“自主性”原则：国际实践与本土探索[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20-26. DOI: 10.19830/j.upi.2018.079.

本文成文于 2017 年秋。彼时，住建部提出“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指导意见已过半，而且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持续指导与推动下，一大批以“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为目标的规划设计与建设更新行动正在全国各地开展，城市建成区环境整治与品质提升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一项技术实践，“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早已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我们对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却尚未拥有足够的认识。

除了根据上级有关部门指示按轮次开展建设行动的传统模式以外，如何使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实现协调统筹、资源共担与良性积累，切实提升国家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也需要对相关公共政策及其组织机制开展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借助超地方组织和社会资本来支持地方政府，使其具备提升城市人居环境所需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欧盟在该领域拥有长期经验，已形成在激励与监测机

制下保障地方主体自主权和超地方组织公共投资绩效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组织模式，其中数欧盟城市社区倡议最为完善。该模式体现了一种“自主性”（subsidiarity）的理念，即某一级组织机构只可开展较低层级组织机构无力完成的工作。但是近年来的跟踪研究也表明，欧盟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在一些南欧国家的实施效果欠佳，这些国家的体制与以德、法为核心蓝本的欧盟体制的差异是关键原因所在。这也说明，体制文化是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政策设计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

尽管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的体制惯性对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近年来一些地区有关实践的组织模式已经自发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色彩。本文通过调研分析上海 M 区的社区提升实践案例发现，以社区为地方主体并基于“自主性”原则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项目组织架构同样能够适应我国的制度环境并获得良好的项目实施效果。可见，我国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在公共政策与项目组织层面还存在可观的创新空间。

高速铁路的空间效应及其热点问题

金一 王绍博

**摘要：**高铁目前的职能主要是旅客输送，其开通运行不断推动着人口在区域间流动，进而对“人地”综合系统产生一连串的空间效应。高铁的飞速发展吸引了经济地理和城市规划学者的普遍关注，然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某单一视角探讨时空压缩背景下高铁对整个区域或者对某一行业产生的空间影响，缺乏从整体视角对高速铁路的空间效应进行的科学系统的梳理。基于此，文章在梳理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内高铁发挥的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对其背后引发的相关议题，如高铁新城与高铁新区、高速铁路与区域空间结构、高速铁路与旅游业、高速铁路与航空运输、高速铁路与城市规模等进行系统归纳总结，识别以往研究的不足，并对新时期高铁飞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提出研究展望。本文在建构高铁空间效应理论架构的同时，希望对未来高铁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高速铁路；空间效应；人口流动；时空压缩效应；空间尺度

**引文格式：**金一，王绍博. 高速铁路的空间效应及其热点问题[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27-33. DOI: 10.19830/j.upi.2019.424.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 3 万 km，惠及地从主要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延伸，基本网络架构由“四纵四横”向“八纵八横”转变，高铁网络化布局已基本显现。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交通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因此，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快速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势必会对“人地”综合系统产生系列空间效应。然而，以往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对高铁时空压缩背景下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等表面现象的分析，对高速铁路产生的内在空间效应揭示程度有限。鉴于此，本文从站点城市、边界、区域等不同空间尺度，兼顾高铁正负两面性，系统归纳高速铁路对不同尺度空间的重构效应及其引出的热点研究问题。

1 站点城市层面

中国高铁站点的布局，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站点城市空间扩张的现实需求，也为站点城市推动郊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抓手。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基本同步，大规模的高铁新城、新区开发已成为沿线城市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站点城市尺度下，如何依托高铁站点打造高铁新城、新区，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高铁站点依托交通节点效应，实现了城市交通要素的集聚；另一方面，高铁站点因其高度可达性，发挥了更强的场所效应，集聚并呈现出更多城市功能。同时，与高铁开通之前相比，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提升了乘客对于市内出行方便程度的敏感度，“城市内外”

之别的感受被彻底颠覆,最后 1 km 效应问题凸显。

## 2 边界层面

高速铁路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正在逐步弱化地理空间距离对临界区域城市的影响,行政边界接壤的城市间要素流动更加频繁,同时空间的持续蔓延扩张使得相邻城市间行政边界逐渐模糊,边界突破效应、同城化效应显现。这使得城际高铁与跨界融合发展问题成为边界尺度下的热点问题。一方面,高铁对居民城际出行行为产生了重要的空间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两地居民跨城消费、工作和经营往来的需求,催生了“跨界钟摆族”群体;另一方面,高铁作为串联居住、工作、游憩等居民基本生活功能的纽带,强化了跨城经济、功能联系,使得居民生产、生活空间范围大幅拓宽,基本活动空间逐步扩散到相邻城市。居住在一城市,就业、休闲在相邻城市;或者居住、就业在一城市,休闲在相邻城市等双城生活模式将更为盛行。同时,与高铁开通前相比,城市间的合作将改变因距离限制而局限于本地或周边合作的发展模式,跨市际、跨省际合作模式将更为普遍。

## 3 区域层面

高速铁路的中长途运输优势,使得其常常被视为助推都市圈、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手段,因交通一体化架构“等时圈”“等日圈”范围成为许多学者识别都市圈、城市群现实边界的依据。与城市层面、边界层面的相关研究相比,高铁区域层面空间效应的相关成果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按照“交通可达性变化—对区域的空间效应—区域空间结构与格局演变”的研究脉络探究高铁对区域空间结构的重构是当前研究的主流,以揭示高铁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多重效应特点(如叠加效应、过道效应、极化效应等)。其次,高铁的主要职能是旅客输送,其线路走向势必会对客流量需求较大的旅游业产生明显的空间影响,相比其他产业,高铁

与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多围绕高铁与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旅游模式、旅游行为、市场发展空间格局等多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三,新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势必会对交通运输市场的其他运输方式产生挤出效应与替代效应,因此高铁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竞合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研究一方面从旅客出行选择行为视角,基于综合效用理论,探究旅客出行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变化特征;另一方面,架构经济计量模型测度高速铁路对其他运输方式的替代效应和诱增效应。同时,高铁产生的集聚、扩散效应,引导要素在城市间流动,不断重构着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影响城市规模的变化,在增长与收缩并存的今年,高铁对于城市规模的空间影响不容忽视。

## 4 展望

高铁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发热,未来高铁空间效应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欧亚高铁、泛亚高铁或中亚高铁等将成为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通道,正重塑“地缘政治”新格局。未来应站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下,对高铁的地缘空间战略、高铁外交属性、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和国家利益与安全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伴随着高铁新城、新区开发建设的热潮,许多高铁新城建设并不像预期的那么乐观,“鬼城”现象频繁出现。在此背景下,亟须系统总结国内外高铁新城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开发、形态、功能等方面系统评估高铁新城的开发建设,为未来高铁新城规划提供经验借鉴。

第三,继续深入对高铁时期新现象的系统揭示,跨城通勤、双城生活等新生活、生产模式在规划中应予以重视。同时,在研究中应结合大数据、空间计量等技术手段,结合地理学、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等开展交叉学科研究。

## 从出行到活动：国外时空行为调查的演变与发展

焦健 王德

**摘要：**居民时空行为数据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城市空间、交通需求的重要定量依据。我国时空行为调查一般以交通出行调查为主,对居民活动信息的调查尚未建立起相应机制,而国外已经发展了家庭出行

调查、活动日志调查、时间利用调查等丰富的时空行为信息采集方法。本文回顾了国外居民时空行为调查的演变与发展,以期为我国时空行为调查机制的发展与完善提供经验借鉴。时空行为调查的发展受交通研究范式演进、居民时间利用与活动模式研究的影响;调查内容重点经历了由出行到活动的转变;调查问卷包括出行日志、活动日志、时间利用日志等多种类型;调查方法与技术由横断面调查发展为重复横断面调查、固定样本调查,由纸笔调查等传统调查技术拓展为计算机辅助调查、网络调查、定位技术辅助调查等多种技术形式。

**关键词:** 出行; 活动; 时空行为数据; 日志调查; 调查技术; 演变发展

**引文格式:** 焦健, 王德. 从出行到活动: 国外时空行为调查的演变与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34-41.

DOI: 10.19830/j.upi.2018.195.

时空行为数据是研究居民日常活动行为规律及其与城市空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定量依据。尽管近年来“大数据”已成为时空行为研究主要应用的数据源之一,但由于难以获取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具体活动内容信息,大数据仍无法替代时空行为调查在空间—行为互动机理研究中起到的数据支撑作用。本文从发展背景、调查内容及重点、日志类型、调查方法与技术四个方面回顾了国外居民时空行为调查的演变与发展,以期为我国时空行为调查机制的发展与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时空行为调查受交通规划、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等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发展的影响,演化出多种调查类型,调查内容重点经历了由出行到活动的转变。彼特·琼斯(Peter Jones)将交通研究范式演变总结为由机动车(vehicle-based)的范式扩展至基于出行(trip-based)、基于活动(activity-based)、基于态度(attitude-based)、基于动态模型(dynamics-based)的四次转变,每种范式都有其数据采集要求;调查从机动车出行调查发展为家庭出行调查,从采用出行日志(trip-based travel diary)到开始应用活动日志(activity diary),关注个体移动出行的决策过程。社会学、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等领域则在时间预算与活动分析法的框架下,基于时间利用日志(time-use diary)与活动日志获取活动数据。在调查内容上,机动车和人的出行、活动与时间利用、行为态度与偏好、行为决策过程及活动同伴选择等方面是时空行为调查的主要内容。

日志调查是时空行为调查的核心构成部分,不同类型日志对“活动”“出行”等行为要素的界定存在差异,并影响问卷问题的设计与组织。活动日志和时间利用日志相对出行日志填写负担更重。除以上三种日志类型,还有关注活动空间信息的地点出行日志(place-based diary),在采集短距离出行和交通换乘信息方面具有优势的阶段日志(stage-based diary)等多种日志形式。

在调查方法与技术上,行为动态研究的范式需要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的支撑,调查方法由一个时间截面的横断面调查转变为多个时间序列的重复横断面调查与固定样本调查,日志填写的时间由一天拓展为多天或多周。在技术形式上,由纸笔调查等传统调查技术拓展为计算机辅助调查、网络调查、定位技术辅助调查等多种技术形式。通过综合性的技术形式弥补单一调查形式的缺陷,增大调查样本量,提高数据精度,是当前时空行为调查的发展趋势之一。

国外居民时空行为调查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调查制度,并在交通需求预测、城市模拟与政策评价等城市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时空行为调查以出行调查为主,具有较强的交通规划目的导向;当前需发展对空间研究与规划更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居民日常活动调查机制,为规划工作提供一手的空间行为数据,从而真正将人的活动纳入规划分析与编制中,提升生活空间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 城市商业中心与交通中心的叠合与分异：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东京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耦合研究

曹哲静

**摘要：**轨道交通站域的规划建设需考虑交通网络的结构，使站域的商业开发与轨道交通网络的节点特性形成耦合协同。本文以东京 23 区为例，通过衡量轨道交通的复杂网络特性，探索了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的叠合分异关系、原因机制、建设原则，以期对我国作出启示。研究通过测量平均路径长度、聚类系数证明东京轨道交通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的高通达性和聚集性特点；同时识别了轨道交通网络中站点的度中心、介数中心、接近中心，并与东京一主三副的商业中心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商业主中心东京站及邻近区域与轨道交通网络的接近中心叠合，主要由于商业设施对可达性依赖较高；商业副中心池袋、涩谷、新宿与度、介数中心叠合，主要由于大量换乘客流带来商业潜力；地区级商业中心多位于快车站点，与城市其他功能区衔接便捷。据此本文剖析了东京商业中心在结合轨道交通网络节点特性方面的开发原则：商业主中心通过高密度轨道交通站点对高容积率的商业开发进行疏解与分流；商业副中心以综合体整合多线路换乘，以簇状商业开发形成区域联动；地区级商业中心以站域复合化开发实现功能的集聚与辐射。东京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的耦合模式对我国高密度大都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需进一步建立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结构和运输服务体系，加强对外交通枢纽和商业设施的资源整合，合理强化主要换乘站点商业开发并营造良好的步行换乘环境，优化近郊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和土地开发，完善公私合营的开发机制。

**关键词：**商业中心；交通中心；复杂网络分析；轨道交通网络与站点；城市形态

**引文格式：**曹哲静. 城市商业中心与交通中心的叠合与分异：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东京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耦合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42-53. DOI: 10.19830/j.upi.2018.157.

城市的交通网络中心是否是商业中心，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如何，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

城市的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存在着叠合和分异的现象；若将不同的中心混为一谈往往会形成规划设计的误区；比如城市主要商业中心和交通换乘中心的叠合易造成商业客流和换乘客流的空间冲突。此外，针对近年来 TOD 理念的过度泛化和轨道交通站点开发同质化的现象，学界和业界也进行了批判与反思，站点不应盲目地遵循同等模式的高密度开发，而忽略了所属城市区位环境和交通节点特性。因此不同层级商业中心的设置应考虑轨道交通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作用，使站域的城市开发形态与轨道交通的网络结构形成恰当的耦合与互动，并在规划设计层面形成不同层次的都市景观。如何解读站点在轨道交通网络中的节点作用，以及在站域规划设计和商业开发时如何考虑站点的节点特性，是本文探索的核心出发点。

东京作为亚洲典型的高密度大都市，是世界上轨道交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在 2018 年轨道交

通出行分担率达到 51%。同时，东京的轨道交通网络也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轨道交通网络之一，在东京 23 区内包含了由 16 家主体运营的 59 条线路和 488 个站点，形成三个层级的网络体系：第一层级为 JR 东日本旅客铁路，是衔接东京重要城市节点和东京大都会区其他城市的区域干线，其中 JR 山手线是东京市中心重要的环状通勤廊道；第二层级为公营地铁，主要以网状分布在环状 JR 山手线的内部；第三层级为私营铁路，由于开发权限制无法进入市中心，主要衔接山手线上的站点到山手线外部的区域，在空间上呈放射状分布。东京的商业中心呈现以东京站邻近区域为主中心，以池袋、涩谷、新宿为副中心的“一主三副”的结构。文章以日本东京 23 区为例，基于复杂网络分析，解读东京轨道交通网络结构特性，辨别不同类型的交通中心，并与商业中心进行空间叠合与分异的比对，从而归纳东京商业中心在结合轨道交通网络节点特性方面的开发原则，以期对中国大城市有所启示。

研究方法方面，首先通过测量平均路径长度、

聚类系数衡量东京轨道交通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其次，识别东京轨道交通网络中站点的度中心、介数中心、接近中心，进而与东京一主三副的商业中心进行比较；其中站点度中心性反映了站点与其他站点相联系的程度，介数中心性反映了站点作为桥梁的重要性，接近中心性刻画了站点在空间上的可达性。最后，通过对站点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站点客流量、站域商业设施、人口密度等的相关性分析，揭示东京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叠合与分异的机制。

研究发现：

（1）东京轨道交通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的高聚集性与连通性，少数站点为重要的多线路换乘枢纽，JR 山手线环状通勤廊道形成了重要的通过性界面，线网可达性以轨道交通网络重心为核心圈层递减。

（2）商业主中心东京站及邻近区域与轨道交通网络的接近中心叠合，主要由于商业设施对可达

性依赖较高。商业副中心池袋、涩谷、新宿与交通中心的度、介数中心叠合，主要由于大量换乘客流带来商业潜力。地区级商业中心多位于快车站点，与城市其他功能区衔接便捷。

（3）据此，文章剖析了东京三类商业中心在结合轨道交通网络节点特性方面的开发原则。其中商业主中心通过高密度轨道交通站点对高容积率的商业开发进行疏解与分流；商业副中心以综合体整合多线路换乘，以簇状商业开发形成区域联动；地区级商业中心以站域复合化开发实现了功能的集聚与辐射。

东京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的耦合模式对我国高密度大都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包括建立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结构和运输服务体系，加强对外交通枢纽和商业设施的资源整合，合理强化主要换乘站点的商业开发并营造良好的步行换乘环境，优化近郊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和站点开发，以及完善公私合营的开发机制。

## 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在中国的功能演变

刘泉 赖亚妮

**摘要：**1990 年代以来，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受到政府部门、规划机构和开发商等不同主体的重视，影响了公共设施的规划标准修订、规划实践以及住区配套商业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工作。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与中国住区公共设施规划层级结构近似，但功能设置关注的重点存在差异，这使得新加坡模式的方法与内容在中国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相应的异化现象，形成保障公益性设施建设为主、引导经营性功能策划为主以及公益性和经营性功能并重三种应用方式。为此，本文对邻里中心功能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原因以及功能组织综合化发展的作用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邻里中心；住区；社区服务；公共设施规划；中国化；新加坡；规划历史

**引文格式：**刘泉，赖亚妮. 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在中国的功能演变[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54-61. DOI: 10.19830/j.upi.2018.058.

近年来，我国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较多受到了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的影响，应用范围较为广泛，涉及新城区概念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及规划技术标准修订等不同方面，也被部分开发商或所谓城市运营商作为拓展社区商业模式和塑造服务品牌的手段与卖点。

不仅如此，在 15 分钟生活圈、智慧社区、未来

社区等当前热门的规划理念中，依然可以看到邻里中心模式的影子（邻里中心模式并非新加坡独有，但新加坡模式对我国近年来的规划建设影响较大）。如《雄安新区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指南》所提出的“十全十美”的服务设施概念就与新加坡模式中的十二项基本服务功能模式类似。

笔者好奇的是，邻里中心可以被用来调整公益

性设施规划建设,也可以被用来建设社区商业综合体。规划设计师、规划管理部门、开发商等不同主体均能从这一理念中得到所需要的内容,而应用的方向和效果又如此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值得思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新加坡的邻里中心与我国住区公共设施规划的异同对比谈起。

本文对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在我国实践中的功能组织方式进行分类梳理,并对其中国化发展的演变特点进行探讨。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在结构上与我国住区公共设施规划的体系接近,均具有按照不同层级进行设施配置的特点,但在功能上,二者存在区别。我国住区公共设施规划中更加关注公益性设施的安排,但如何规划落实存在不足,同时公共设施规划较少对经营性设施提出刚性要求。新加坡模式则是一套以商业服务设施为主要内容的规划配套标准。邻里中心是城市商业服务中心层级体系的一部分,以商业功能为主,同时对公益性设施进行兼顾。

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与我国住区公共设施规划存在结构近似性和功能差异性,这使得新加坡模

式在中国化的应用中必然发生变化。国内不同主体对邻里中心进行借鉴的视角并不相同,重点存在差异,因而造成了这一模式在我国实践应用中形成多种类型,本文重点探讨三种:保障公益性设施建设为主、引导经营性功能策划为主,以及公益性和经营性功能并重。

这三种模式各有侧重。其中,公益性和经营性功能并重的综合发展模式值得重视,其优势在于:第一,这种模式有利于综合保障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功能的落实;第二,高强度开发背景下多种设施集中布局的可行性较高;第三,有利于可持续运营。

未来我国住区公共设施规划在借鉴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时,应重视公益性设施与经营性设施并重的总体原则,并进一步探讨邻里中心如何建设和持续运营等课题。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主义规划理想模型的变体,在网络社会和共享经济的冲击下,邻里中心模式及住区公共设施规划能否适应未来生活方式可能发生的新变化,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 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的演变特征及其社会空间效应——兼论对我国居住区规划的启示

张祥智 崔栋

**摘要:**随着封闭社区这种居住模式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被相继否定,我国的居住模式正处在从封闭向开放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新加坡的封闭公寓社区体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其利弊得失可资借鉴。本文介绍了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的概念及私人公寓、执行共管公寓、中等入息公寓三种主要类型;分初步发展阶段、波动发展阶段、多元发展阶段梳理其演变过程;从空间分布、建设方式、驱动因素三方面阐释其演变特征。最后,本文分析了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在社会空间影响方面体现出的矛盾特征与积极效应,并对我国的居住区规划提出了建议,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开放街区的内涵,渐进实施既有住区的“类街区化”更新,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并尽快完善、修订配套政策。

**关键词:**新加坡;封闭社区;公寓;演变特征;社会空间效应;居住街区

**引文格式:**张祥智,崔栋.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的演变特征及其社会空间效应——兼论对我国居住区规划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20(3):62-70. DOI: 10.19830/j.upi.2018.062.

国内以往对新加坡住房的研究多集中在公共住房领域,而本文的视角聚焦于其封闭公寓社区。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封闭公寓社区造成的社会空间分异程度较低,并且在某些方面体现出积极

效应。目前我国的城市居住模式正处在从封闭向开放转型的关键节点,新加坡与我国同属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都致力于发展高人口密度下的宜居环境,研究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形成与发展的利弊得失,

对于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居住区规划模式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新加坡的封闭公寓社区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初。随着住房短缺得到有效缓解，政府开始关注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并选择了公寓社区这一用地经济高效的居住区形式，从公共住房和私人住房市场两方面鼓励建设封闭公寓社区。在经历了 1980 年代的波动发展阶段后，从 1990 年代初开始，封闭公寓社区进入了快速与多元发展阶段，不仅私人公寓社区进一步发展，中等入息公寓完成了私有化，政府与开发商还合作推出了执行共管公寓（executive condominiums）这一颇具新加坡特色的封闭社区模式。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封闭公寓社区成为新加坡整体住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寓与公共住房、有地住宅一起，在存量市场中形成了有效的市场分层。

与发展的时间轴相对应，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的空间分布大致呈现从中心区—郊区—外围地区逐步扩展的趋势，并形成和公共住房穿插分布的空间格局；从建设方式来看，对于新区建设，采取分散混合建设与集中建设两种方式。旧城区的再开发则主要采取填充式更新与替换式更新两种方式；从驱动因素来看，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政府主导下的“门禁联盟”的产物，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始终通过政策工具调控其发展节奏。

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在社会空间影响方面体

现出一系列近乎矛盾的特征：居住分异与混合居住、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有助于社会流动与强化了社会分层、有利于社区意识的形成与减少了社会联系，表明这种居住模式兼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封闭公寓社区的积极效应更值得关注：新加坡政府将封闭社区建设纳入住房政策框架，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了更高质量的住房和环境，其演变过程体现出政府对社会分层现实的积极回应，顺应了中产阶级的住房愿望，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发展。

进一步分析则发现，封闭社区的隔离或融合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模、分布和建设方式等规划要素，关键在于寻找适宜的居住区规划模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封闭公寓社区所体现出的积极效应与政府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

最后，对于我国的居住区规划，本文提出了三方面的启示和建议。首先，“开放街区的核心并不在于围墙是否完全开放”，关键在于把握好封闭与开放的尺度。应进一步明确开放街区即“小封闭、大开放”的居住街区，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小封闭、大开放”的居住街区规划理论与方法，从而有效地指导居住区规划实践；其次，应渐进实施既有住区的“类街区化”更新，对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功能更具现实意义，有利于缓解城市中的“毗邻隔离”与“绅士化”程度，逐步引导形成“小封闭、大开放”、“小聚居、大混居”的混合居住模式；最后，应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尽快制定、颁布相关配套政策与实施细则，以推动开放街区的理念真正贯彻落实下去。

## 空间规划职能组织与权责分配——日本、英国、荷兰的经验借鉴

张书海 王小羽

**摘要：**自然资源部的成立实现了空间规划管理职能的合并，然而从提升空间治理效率的角度来看，大一统后的空间规划行政机构仍然面临整合管理职能、协调央地权责等挑战。本文通过对日本、英国和荷兰空间规划职能组织的梳理，探索其在空间规划管理机构、中央一级规划职能设置和央地权利责任分配上的特征，认为其相对独立的规划建议反馈机构、多维度的规划职能划分、规划事权的动态调整对于改革背景下我国空间规划职能的深度整合具有借鉴价值。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我国空间规划职能组织和权责分配应考虑设立独立的规划建议反馈机构；从空间划分和问题导向两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规划职能分配；合理调整央地权责关系。

**关键词：**空间规划；机构改革；组织设计；央地关系；经验借鉴

**引文格式：**张书海，王小羽. 空间规划职能组织与权责分配——日本、英国、荷兰的经验借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71-76. DOI: 10.19830/j.upi.2018.323.

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立“多职能合一”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是我国规划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改革举措，有望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规划内容和规划管理职能不协同问题。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规划体系和机构的建立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如果简单做加法、“新瓶装老酒”，原来的问题依然无法避免。

如何对整合后的空间规划职能进行结构优化，以更好适应新时期自然资源管理的要求，是自然资源部门当前并将长期面临的新挑战，也是提升我国空间治理能力的关键。本文以日本、英国和荷兰等空间规划体系较为健全、空间管理机构较为完善的国家案例研究对象，探讨并吸取其在空间规划职能组织与权责分配中积累的经验，旨在为规划职能的横向结构优化和纵向结构协调提供建议。

横向上，空间导向与问题导向并行的规划职能分配。日本空间规划职能分配呈现出依国土功能分区划分的特征，根据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确定国土空间五大类地区（城市区、农业区、森林区、自然公园区、自然保护区），由不同职能部门进行相应地区的规划编制和管理。英国和荷兰的规划职能分配则体现了问题导向的理念，依据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来设置和调整规划职能，例如英国的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荷兰基础设施和水管理部门的交通、环境、基础设施、气候和可持续发展职能部门。我国规划职能整合时可借鉴空间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一方面将不同类型的国土地区进行空间上的划分并确定独立部门负责规划编制和管理，例如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城市区域；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特别突出的综合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设立专门部门承担规划职能和协调职能，例如生态文明战略下国土空间修复问题，可考虑设立专门的委员会进行部门协调，必要时直接编制综合规划。

纵向上，动态调整央地权责关系。三国规划设

置呈现出分权框架下保留中央干预权的特征。20世纪末以来，各国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面临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等挑战，纷纷开始了地方分权化的改革进程，但各国均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央对地方规划的干预权，并持续进行动态调整。如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国务大臣的部分直接决定权，荷兰的介入性用地规划和环境值等。借鉴上述经验，一方面，应适当赋予地方规划自主权，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自由制定和调整部分空间范围内的规划，例如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建设用地；同时，中央通过清单制度保留自上而下的干预权，对于清单重大事项涉及的空间、要素持有否决权和规划编制权。另一方面，完善自上而下的干预工具，在指标管控的基础上考虑加入介入性用地规划和环境值，以提升规划管控的效率。

体系上，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议反馈机构。日本、英国、荷兰三国在机构设置上不尽相同，但是在中央一级负责规划事务的职能部门都下设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议反馈机构，即日本的国土审议会、英国的规划审查署、荷兰的环境评估局。日本的审议会和荷兰的环境评估局均为委员会性质的第三方机构，对规划行使建议权；英国的规划审查署虽为中央政府机构，有着较之前两者更大的权力，但是更多对地方规划行使审查和建议权，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随着我国进入存量规划时代，规划的综合性及其涉及的利益主体权利愈发复杂，专业领域知识不足和多主体利益难以权衡是摆在规划改革和实施面前的巨大挑战。一个相对独立的规划建议反馈机构有助于规划信息公开，强化规划机构的社会服务职能，降低规划实施难度，是完善空间规划职能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这样一个独立机构的设立可纳入更多的社会智力资源，降低和消除规划决策带来的主体间不合理的利益冲突。

## 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

魏伟 刘畅 张帅权 王兵

**摘要：**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活力的集中体现，研究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手段对提升城市品质、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城市的文化空间现状，并基于城市整体发展、文化功能分区、文化基础服务三个层次，从战略引导、功能塑造与集聚、设施均等化和氛围营造等角度，提取国际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经验。在我国大城市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提出规划层面健全文化规划体系、理念层面提升文化供给、空间层面集聚与均等并重、公众参与层面落实城市与公众互动等适用于我国大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策略与手段，以期打造城市特色文化空间，提升城市与社会活力，引领城市全面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城市；文化空间；文化产业；文化设施；城市更新

**引文格式：**魏伟，刘畅，张帅权，等. 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77-86. DOI: 10.19830/j.upi.2019.213.

随着城市发展逐步向以包容为核心的可持续、繁荣、公平、公正、平等、安全的多维度转变，全球城市展现了文化聚合的强大动力。城市文化逐渐成为当前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力量，大量城市更新与复兴的规划与实践不断开展，承载着文化资源的城市空间成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焦点。在文化的引领和创新层面，国际城市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样本，本文选取在国际城市排名报告中颇具代表性的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个国际城市作为研究案例，探究其城市空间与文化发展的互动过程及演化机制。

结合文化规划“从宏观到微观、引导城市整体发展”的多层次目标，将城市文化空间界定为三种尺度。

- 宏观尺度——城市整体发展，是指城市整体风貌、城市精神、城市意象与城市空间的耦合关系等，包括城市整体文化意象、城市文化空间格局和城市文化轴线；
- 中观尺度——文化功能分区，是指具有相似文化功能要素的空间集群，表达区域性空间文化特质，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保护空间、教育型文化空间、创意及文化产业空间、生态文化空间和特色商业文化空间等；
- 微观尺度——文化基础服务，是指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文化基底空间与其承载的城市文化活动，主要包括文化设施及场所和文化氛围的营造。

基于城市整体发展、文化功能分区、文化基础服务三个层次，梳理国际城市文化空间的城市建设物质要素和其所承载的城市文化精神要素，发现每个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既具有独特个性，也具有相似之处。

特性源于差异化的城市精神与人文脉络，共性则体现在包容多元的空间形态及其塑造机制。总结国际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经验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 (1) 统筹城市远期发展，建立统一全面的文化规划体系；
- (2) 以文化大事件触媒，提升城市文化供给能力；
- (3) 整合空间服务功能，塑造多样化文化空间；
- (4) 社会公平主导设施布局，营造城市文化氛围。

在我国大城市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基于这一现状与国际城市文化引领发展的前沿经验，本文从规划体系、文化理念、空间布局和公众参与四个层面提出适用于我国城市文化塑造的策略与手段。审视国际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现状与塑造手段，有助于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反思，为我们的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城市多元化文化空间营造与多层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供经验参考。但是，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模式并无唯一性，重点在于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的优势资源，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 中国规划经验在尼日利亚园区道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莱基自由区为例

石清 王骏 张照

**摘要：**针对中国规划输出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本文探讨了向外方有限理性验证中国规划标准合理性的方法。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规划经验输出面临的价值取向、“规划文化”、战略意义等方面的问题，以及编制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总规和控规过程中面临的外方质疑；然后引入有限理性理论，选择苏州工业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卢萨卡赞中合作区、约翰内斯堡米德兰地区、拉各斯奥科多和阿贾哈地区等典型案例，进行个案、图底、量化分析；最后分别比较分析了上述案例与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的道路网结构、人均道路面积、道路密度、道路宽度等指标，类比实证了中国规划标准与外方实际建设需求的内在一致性，验证了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所采用的中国规划标准的合理性。这对于加强中国规划经验的研究和指导项目实践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中国规划经验；有限理性；园区规划；道路设计；莱基自由区

**引文格式：**石清，王骏，张照. 中国规划经验在尼日利亚园区道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莱基自由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87-93. DOI: 10.19830/j.upi.2018.334.

在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伴随大型企业的资本和技术输出，国内不少大型规划设计机构承担了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园区规划设计业务，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1）价值取向问题，非洲地区与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继而在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分歧；（2）“规划文化”问题，面对不同“规划文化”背景的对象，如何检验规划所采用标准的合理性？（3）战略意义问题，除了规划设计和建设项目本身，技术标准的引入和建立无疑更具有战略意义，这往往是国内规划设计机构不够重视的。

文章以非洲尼日利亚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总控规编制中的道路网规划问题为例，介绍了如何面对外方对中国规划标准和经验的质疑。外方围绕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规划道路网方案的主要疑点有：

（1）规划方案采用的道路网形式迥异于尼日利亚当地的道路网，是否能匹配园区的功能布局？（2）方案道路网划分出“超大地块”，总道路面积必然减少，相应的规划道路指标是否足够？（3）方案道路网密度大大超过欧美国家和拉各斯旧城区的一般经验，未来能否满足园区交通需求？（4）倘若不增加街坊级别道路，主要依靠主、次干路能否承担相应的交通量，现有规划道路宽度是否足够？针对上述质疑，项目组梳理了国内已有相关研究后，引入

有限理性理论，构建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语境”。

基于有限理性理论，在前期广泛搜集中国和非洲相类似案例的基础上，选择了苏州工业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赞比亚卢萨卡赞中合作区（Lusaka Subzone）、南非约翰内斯堡米德兰地区（Midrand）、尼日利亚拉各斯奥科多（Okota）和阿贾哈（Ajah）地区等典型案例，进行个案、图底、量化分析。

文章最后分别比较分析了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与上述案例的道路网结构、人均道路面积、道路密度、道路宽度等指标，达成了以下规划共识：（1）相对合理的道路网结构。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工业区采用了与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相似的方格路网，生活区水系丰富，规划结合水系进行了道路线型变化。（2）基本相当的人均道路面积。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产业类型以石油化工、产品物流和普通产品加工为主，居住和就业人口密度均相对较低，因此规划人均道路面积指标取值高于中国的苏州工业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与拉各斯奥科多、阿贾哈等地区相当。（3）局部差异明显的道路网密度。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工业区规划道路网密度取值高于苏州工业园区，略低于所有个案的平均值，但剔除产业类型的差异影响因素则基本相当；生活区采用低密度开发形式，其规划道路网密度取较低值。（4）无明显区别的有效道路宽度。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的规模在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外高

桥保税区之间，采用双向 6 车道；次干路与其他案例一致，采用双向 4 车道。这一类比实证了中国规划标准与外方实际建设需求的内在一致性，验证了

莱基自由区西南区块所采用的中国规划标准的合理性。这对于加强中国规划经验的研究和指导项目实践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日本的经验与借鉴

刘云刚 陈林 宋弘扬

**摘要：**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是日本各地近年来十分关注的新型乡村再生战略。本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导入乡村支援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等人才支援政策的背景、内容、主要成果及实施评价。其次从乡村振兴的本质、人才回流支援、乡村组织模式等视角探讨该策略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日本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交流不断深化，以及面向乡村的财政补助政策重点转移到“人”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推动了人由城市向乡村回流并在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乡村的活化和振兴，形成了促进乡村就业与人才回流的良性循环。虽然日本与我国存在一定社会差异，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在促进人才回流、乡村治理以及城乡共生关系的形成上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支援；回归田园；乡村自组织模式；日本

**引文格式：**刘云刚，陈林，宋弘扬. 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日本的经验与借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94-102. DOI: 10.19830/j.upi.2019.102.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战略。近年来，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乡村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如何吸引人才进入“头脑”日益枯竭的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关于这一议题，北京大学的于鸿君教授曾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虽然其提出的做法值得商榷，但丰富乡村的人力资源对振兴我国乡村来说意义重大，也迫在眉睫。日本与我国许多方面的国情相似，在乡村问题的应对策略上走在我国前面，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国学习。因此，我们尝试借鉴日本解决乡村问题的经验，在研究日本导入乡村志愿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等人才支援政策的背景、内容、主要成果及实施评价的基础上，试图从乡村振兴的本质、人才回流支援、乡村组织模式等视角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才回归乡村的可行做法。

1970 年代，在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期，乡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并定居。进入 21 世纪，日本逐渐步入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时代，乡村空心化问题严重。为构建具有持续活力的乡村，日本开始主动出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吸引人才进入乡村，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进乡村振兴，并形成三者的良性循环。

提高乡村活力是日本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其要求乡村以开放的姿态去接收信息、接纳外部人才。城乡交流作为乡村增强活力的重要手段，于 1970 年代登上舞台。初期的城乡交流以利用财政资金（即补助金）于乡村建设促进交流的基础设施为主；1990 年代后期，物质建设退出主流，转向以人为主（即补助人）的交流活动。21 世纪以来，城乡交流进入城乡居民“协同”时代，交流方式从观光访问升级到城乡间的主动交流与合作。这种形式更加重视交流质量，注重以城市人的视角实现对乡村魅力的再发现与再评价。同时，为解决结构改革下乡村面临的各种困境，日本亟须活用人才支撑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背景下，日本导入“乡村支援员”和“乡村振兴支援队”等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重视挖掘乡村“内部人才”和吸引“外部人才”参与乡村建设。这一战略推动了人由城市地区向乡村回流并在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实现了乡村的活化和振兴，形成了促进乡村就业与人才回流的良性循环。

基于对日本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制度的系统梳理,我们认为其在促进人才回流、乡村治理以及城乡共生关系的形成上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与时俱进地不断赋予乡村新价值。新价值无法在封闭的内部环境中产生,只有通过与外部异质系统的不断交流,乡村才会发现新的发展模式,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日本大力开展多层次的城乡交流活动,作为乡村与外部系统交流的重要手段,此类活动的深化和外部人才对乡村振兴活动的不断加入,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再生。

第二,能否成功吸引人才回流是人才支援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日本的人才支援乡村振兴战略启示我们,在接纳外部人才的过程中完善乡

村内部建设是乡村可持续振兴的重要保障。乡村与支援人才间缺乏交流、互动、共享等容易导致冲突,也会使得人才支援制度难以实现其设定的目标。因此,建立囊括乡村多主体的立体协作网络来帮助解决引进人才的“工作”“居住”“社区”三大问题尤其重要。

第三,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以激发村民主体性为基础的乡村振兴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巩固与发展乡村组织模式是十分必要的。乡村自组织不代表其与外界的隔离,反之,它注重在与外部的不断交流中巩固加强各类纵向和横向网络,以提升乡村自主管理和自主经营能力,进而与时俱进,持续赋予乡村新价值。

## 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冷红 宋世一

**摘要:**建筑能耗是城市能耗的主体。在城市规划层面进行大尺度建筑节能,能够在宏观层面有效把控城市尺度建筑能耗水平,降低建筑总体能耗;能够灵活协调现有城市空间环境建设管理与城市节能的关系,有效减少能耗花费,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制定科学有效的规划决策。本文对比了伦敦、纽约、东京、多伦多四个发达国家城市在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方面的专项规划策略、规划政策管理、技术研究以及节能规划效果四方面经验,详细阐述了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微气候环境以及用能行为这三个影响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的主要因素,并从规划框架建构、数据收集处理和跨学科技术支持三方面探讨了当前进行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最终提出在宏观专项规划体系、社会监管、数据信息及跨领域合作等四方面的思考。

**关键词:**城市节能;建筑能耗;建筑节能规划;城市模型;可持续发展;国际经验

**引文格式:**冷红,宋世一.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20(3):103-112.  
DOI: 10.19830/j.upi.2018.460.

城市建筑节能一直是各个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环节,基于城市尺度进行建筑节能规划工作对城市总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城市规划手段对城市总体的建筑能耗表现进行优化和提升,其影响范围及效果远远大于仅对建筑单体进行能耗控制及优化。同时依托城市尺度的建筑节能规划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灵活的管理措施,可以协调现有城市空间环境建设管理与城市节能的关系,有助于缓解城市经济压力和综合考虑多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得到更为科学的规划成果及决策。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都在逐步开展针对城市尺度的建筑节能规划工作。英国伦敦的“重·新”(RE:NEW)计划、美国纽约的“一个城市:建成就要持久”(One City: Built to Last)计划、加拿大多伦多的“区域能源策略”(District Energy)以及日本东京“智慧能源节约”战略等城市尺度建筑节能专项规划不仅在其所在的地区产生了可持续的节能效果,也为其他地区城市的节能规划及实施积累了大量经验。

灵活的规划管理措施也确保了最终的节能效

果。伦敦政府针对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管理的措施（RE:FIT）偏重于多方合作，将公众参与的程度最大化，以确保最终的节能效果更为明显；东京则鼓励居民调整生活方式，并将公共建筑能耗需求可视化；纽约的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管理注重数据的分析和公示；多伦多则实行政府追踪识别能耗数据的方式，达到监管及改造识别的目的。

城市空间形态（urban morphology）、城市微气候环境（urban microclimate）和城市居民用能行为（energy using behavior）被普遍认为是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城市形态通过影响城市通风、城市热环境等影响城市总体能耗，通过影响城市局部地区微气候环境而影响区域内部建筑能耗。而人群用能行为是城市总体能耗波动的主要原因，其既取决于城市居民活动类型，又受到城市气候、政策干预、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规划框架构建、数据获取与处理以及跨学科技术支持等方面。城市尺度建筑能耗问题的不确定性较强，且不同的国情和政策体系对于城市节能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建立一个成熟、完善、普适、科学的准确的理论体系和规划研究框架难度较大。在技术层面，数据的获取和处理、多学科交叉的模型模拟研究方法均对规划者提出严峻的挑战。

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目前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建筑总量激增的背景下，亟须尽快建立完整成熟的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体系。在中国复杂的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尺度建筑节能规划研究与实践不可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而应差别化、层次化地汲取适于国情的先进经验。

## 英国规划许可中的公众参与——以英国谢菲尔德市为例

赵丛霞 朱海玄 周鹏光

**摘要：**英国的城市规划实施管理采取规划许可制度，并有着鲜明的公众参与特色。自1960年代开始，公众参与就是西方社会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此后城市规划进一步发展的动力。2007年我国《城乡规划法》修订，确立了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法律地位。但是我国的公众参与还仅限于规划编制阶段，规划实施阶段的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一书三证的公示，没有更多的内容，而规划实施阶段恰恰是社会矛盾集中、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地带”。本文首先挖掘英国公众参与规划许可的根源，然后介绍了英国开发许可申请程序中公众参与的环节，探寻其国家与地方层面公众参与规划许可的法律依据，进而剖析了英国公众参与规划许可的四个特征，即信息公开有诚意、公众拥有发言权、参会议员当众决策、维护规划许可公信力等，最后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和对我国的启示。期望本文能为我国完善城乡规划公众参与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乡规划管理；规划许可；公众参与；发言权；决策；英国

**引文格式：**赵丛霞，朱海玄，周鹏光. 英国规划许可中的公众参与——以英国谢菲尔德市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113-118. DOI: 10.19830/j.upi.2017.567.

## 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台湾都市更新中的权利变换制度及其启示

郭湘闽 冀莹 王冬雪 颜晓娜

**摘要：**在土地和房屋产权多元化且得到严格保护的背景下，都市中心区的更新问题成为国际性的城市治理难题。台湾的都市更新也面临着产权多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主要表现为更新基地内产权业主多元化且其

权益诉求难以协调。为此台湾经过多年探索,发展演进出了权利变换制度,力图以灵活的权益分配方式解决上述难题。本文结合实地考察与专业访谈,对台湾权利变换制度的实施背景、演进历程、操作方式、实施特色等进行了分析,解读了其实施成效并与大陆城市进行比较,指出权利变换制度对于解决产权多元化背景下的都市更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供大陆相关城市参考。

**关键词:** 台湾;都市更新;权利变换制度;产权多元化;权益分配

**引文格式:** 郭湘闽,冀萱,王冬雪,等. 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台湾都市更新中的权利变换制度及其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119-127. DOI: 10.19830/j.upi.2017.550.

## “问题修复”和“提前介入”:法国广场设计中对环境犯罪预防的探索及其启示

曾敏玲 毛媛媛 廖良

**摘要:** 城市广场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市民户外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治安问题是公众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采用犯罪预防设计是目前国际上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回顾了法国情景犯罪预防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以里昂市在城市广场中的犯罪预防设计探索和实践为案例,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设计或改造项目治安问题、预防技术、应用效果等方面的异同,分析法国在情景犯罪预防理论在探索实践中的经验得失,以此作为未来我国开展相关理论实践研究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 城市广场;广场设计;犯罪预防;公共空间;法国里昂

**引文格式:** 曾敏玲,毛媛媛,廖良. “问题修复”和“提前介入”:法国广场设计中对环境犯罪预防的探索及其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128-136. DOI: 10.19830/j.upi.2018.341.

城市广场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市民户外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治安问题是公众关注的重点。而要保证公共空间的安全,一方面有赖于公共治安管制和使用者素质提高,另一方面也需要公共空间环境设计的优化和监控设施的增设。后者,即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采用环境犯罪预防设计,是目前国际上一项重要的发展趋势。该理念自 20 世纪末传入我国,但目前以理论研究为主,尚未有系统的应用实践。

相似地,法国也于 20 世纪末开始关注情景犯罪预防理论,目的是要解决当时凸显的城市治安问题,如城市暴动等。该理论迅速得到学术界和警界的强烈关注,并在 1995 年和 2007 年被修订在法律条文之中。根据相关的法令,法国的建设项目必须在设计过程中开展“公共保障及安全研究”(ESSP: Etude de Sécurité et de Sûreté Publique)。法国里昂市是 20 世纪末受城市暴动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法国最早关注情景犯罪预防的城市之一。在国家立法之后,里昂在 1998 年便启动了情景犯罪预防

政策的探索和应用实践,较具代表性的是 1999 年路易斯·普拉代勒-科梅迪(Louis Pradel-Comédie)广场的安全研究项目(LC 项目)和 2003 年朱塔-拉斯帕伊(Jutard-Raspail)广场的规划项目(JR 项目)。前者是针对已建成问题空间的“问题导向”型研究项目,后者则是着重考虑环境潜在风险的“提前介入”型规划设计项目。这两个项目的经验为里昂市政府随后出台相关的情景犯罪预防工作指引打下重要的基础,同时也对我国未来开展类似的探索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LC 广场位于市中心,其治安问题主要来自广场选址和场地设计:在选址上,广场位于市政厅、歌剧院等几个重要公共建筑周边,并邻近酒吧街等场所;在设计上,广场中设有较高台地和斜坡。上述原因导致广场日间吸引社会团体集会或青少年滑板、街舞等活动,常有发生冲突或不文明现象;夜间会有由夜生活引起的酗酒、毒品相关的犯罪。但针对已建成的空间,项目只能采用环境微改造的方式应对,如增设城市家具、加强照明及活动监控

等。实践表明，方案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由于环境所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但相关警务工作者认为，由于场地无法重建，这已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JR 广场位于一个衰落的街区，改造前的场地由于是立交桥下的下沉广场及桥底通道，具有较多灰色空间，成为不少犯罪活动的温床，也为居民带来了不安全感。项目计划对场地整体拆除重建，以解决现有或潜在的安全问题，在方案中综合运用各种环境设计犯罪预防的技术和措施，实现最佳的效果。具体包括可视性设计、领域感营造、自然监视、空间社会化和景观参与等设计手段。从方案实施效果上看，项目所运用的技术措施成功地改善了地区环境，创造出的一处较为安全的城市空间。但由于项目

设计过程中未有警务工作者的介入，部分设计的效果未如理想。

法国经验和案例可以给我国的相关实践带来以下启示：

- 环境设计犯罪预防的目的在于主动防御，需要在项目整体建设之初提前介入，对已建成空间的微改造难以实现理想的犯罪预防效果；
- 环境设计预防的工作范式应是多领域实践者的合作，仅靠设计师或警务人员均难以发挥最佳效果；
- 可视空间与活动支撑是城市广场中有效的犯罪预防设计手段。

## 澳大利亚文化景观遗产的认定方法

孙淼 奚雪松 王策

**导读：**1975 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法》（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 Act 1975），并依据该法设立了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AHC: 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和国家遗产登记册（Register of National Estate）制度。1992 年，第 16 届世界遗产大会提出文化景观类别，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中。自此，澳大利亚景观保护产生重大转向，景观的关联性文化意义在 1999 年《巴拉宪章》（Burra Charter）的修订中得到确认。由此，澳大利亚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文化景观遗产认定体系，成为该国文化景观遗产实现登录、管理及保护的先决条件。这一完整体系对澳大利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也值得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体系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思考借鉴。

**引文格式：**孙淼，奚雪松，王策. 澳大利亚文化景观遗产的认定方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148-151. DOI: 10.19830/j.upi.2017.396.

文化景观一直是国内外遗产保护领域讨论的热点，而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福勒（Fowler）却指出，亚洲尤其是中国入选文化景观遗产的数量屈指可数。本文以澳大利亚文化景观遗产认定体系为例，从遗产判别、评价和登录三个阶段出发，对认定体系中各步骤的重点进行详细阐释，并总结该文化景观遗产认定体系中值得中国借鉴的几个方面。

1975 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法》（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 Act 1975），并依据该法设立了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AHC: 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和国家遗产登记册（Register of National Estate）制度。1992 年，第十

六届世界遗产大会提出文化景观类别，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中。景观的关联性文化意义在 1999 年《巴拉宪章》（Burra Charter）的修订中得到确认。在澳大利亚，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文化景观遗产认定体系，成为该国文化景观遗产实现登录、管理及保护的先决条件。

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规定文化景观的判别与评价由定位历史背景、界定景观、场地调查与记录、引入历史研究、分析及重要性评价六个步骤组成。并在判别与评价后实行遗产登录制度。

- 定位历史背景：判别文化景观的主题与相关的重要历史时期，进一步认识文化景观

的特征要素，解释场地重点表象。

- 界定文化景观：通过系统研究，对主题区域的文化景观及特征要素进行界定。
- 文化景观的调查与记录：从定位、描述、现状、威胁四个方面对文化景观进行调查和记录。
- 历史研究：在文化景观相关的一系列资源中遴选出重要历史信息。
- 文化景观分析：将文化景观的特征要素与历史时期、历史主题关联起来，有助于文化景观的判别。
- 遗产评价：在《巴拉宪章》引导下，结合学者研究制定评价标准，对文化景观进行重要性评价与陈述。

- 遗产登录：遗产登录制度实行三级政府负责制，基于遗产判别与评价将文化景观遗产列入不同名录，依制实行保护依据和保护要求。

对我国的启示：（1）在文化景观遗产认定的理念方面，注重人类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下形成的重要景观特征；（2）在文化景观遗产认定体系框架构建方面，在判别后引入自上而下的检验佐证判别过程，提高判别体系的正确及完整性；（3）在文化景观遗产判别层面，使用场地调查与历史沿街相结合的方法；（4）在文化景观遗产评估层面，使用重要性界定与完整性影响相结合的方法；（5）在文化景观遗产登录体系方面，制定严格规范的登录体制和法定保护管理责任。

## 文化设施集聚区伦敦展览路的街道改造

姚栋 张侃

**导读：**旧城中的文化集聚区作为重要的城市资源，面临着因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可达性差和设施间难以协同的突出困难。伦敦展览路改造的历史经验显示，单一建筑改造、整体片区改造和地下空间改造都很难解决上述矛盾。依据共享（街道）空间理论和肯辛顿高街的改造经验，展览路在 2011 年完成了街道改造。改造强调行人优先并要求车辆减速通过，工程取消了车行与人行的边界并将 2/3 的道路面积留给行人。这次改造有效解决了可达性与协同效应的问题，带动了沿线建筑的自发更新和地下空间开发的新机遇。展览路的经验证明街道改造是旧城文化集聚区协同更新的有效途径；交通和场所评估是共享（街道）空间理论的实施基础；包含用后评估的全过程参与是可持续更新的保障。

**引文格式：**姚栋，张侃. 文化设施集聚区伦敦展览路的街道改造[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3): 152-158. DOI: 10.19830/j.upi.2018.315.

在步行范围内集中博物馆、剧院、图书馆等文化教育设施的文化集聚区是促进城市活力的重要资源，也常常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如纽约的博物馆一英里、维也纳的博物馆中心等。在城市空间结构和交通方式发生巨变的今天，建成区的文化集聚区往往面临着设施可达性差、馆际协同效应弱和整体更新困难的局面。本文以伦敦展览路为例，讲述了其街道改造的过程与结果，为我国旧城中的文化设施集聚区更新提供参考。

展览路位于伦敦市内城西部肯辛顿一切尔西区，该区域集聚大量文化教育设施，如维多利亚与

艾尔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帝国理工学院、皇家艾伯特音乐厅等，因此被称为伦敦的文化之心。然而，机动交通对于地面步行空间的侵占和过街穿越的阻隔造成了该区域文化设施可达性与协同性不足的问题，阻碍了活力的进一步提升。展览路曾试图通过单一机构改造、多设施综合改扩建和地下空间拓展的途径进行地区更新，但遭遇了经费不足、难以多方协调利益等困难而无法实现。

基于肯辛顿高街改造的成功经验，展览路改造设计竞赛于 2003 年举办，迪克逊与琼斯事务所胜

出，应用共享（街道）空间（Shared Space）理念，对街道做出了极简化的改造。街道上原来的交通标识、护栏、路缘石都被移除，整个路面完全平整一体化，人行道宽度大幅增加。车速被限制在 20 英里/小时（约 32 km/h），行人和各种交通工具在慢速状态下共享路面。路面铺装为菱形棋盘图案，意在暗示机构之间穿越的对角线捷径。街道家具也被极简化处理，高耸的路灯限定道路的中心，座椅、自行车停车架、行道树等则被用来暗示车行区和步行区的划分。为协调多方矛盾，设计过程包含大量公众参与的部分，合理的妥协也不可避免。改造工程于 2010 年 2 月启动，次年 12 月完工，2012 年 2 月正式开放，各个路段根据所在场所氛围不同而有所差异。

改造完成后，过去东西分裂的展览路被整合为

一体。人流回到了地面，排队等候的游客不再拥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过街到达对面的设施也更加自由，周边的建筑也随之自发启动了更新工作。多次的用后评估显示，展览路步行活力提升的同时，交通事故也得到了减少。尽管受到诸多赞誉，民众对于安全性的担忧和审美的分歧仍旧存在。

作为珍贵的城市公共资源，位于旧城的文化集聚区是提升城市文化活力和吸引力的良好切入点。展览路的改造证明，共享（街道）空间改造不仅大幅提高了区域内不同类型设施之间的步行可达性，更通过街道改造促进并形成了设施协同更新的趋势。同时，准确的交通和场所评估与适宜手段的选择是街道改造成功的关键。此外，城市公共空间改造需要包括使用后评估在内的全过程参与，民众监督和批评都是空间不断优化基础。

## 2020 年第 4 期文章目录

### 本期主题 历史制度主义的空间规划研究

罗震东 / 空间规划研究的新视角：历史制度主义的缘起和应用

安德烈·索伦森，著；罗震东，饶叶玲，方鹏飞，译 / 重视路径依赖：规划史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议程

安德烈·索伦森，著；金盼盼，张怀予，傅舒兰，译 / 城市化、制度变迁和制度化：

复合关键节点的城市转型

马辛·东布罗夫斯基，卡塔知娜·皮斯雷克，著；金盼盼，傅舒兰，译 / 中东欧战略空间规划的发展：

以路径依赖、欧洲影响和国内政治

为研究视角

傅舒兰 / 传统、路径与影响——日韩近代城市规划体系发展与形成的比较研究

曹康，章怡 / 空间战略规划与中国规划制度——制度变迁与关键节点

侯丽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中国规划史研究方法

### 城乡规划

王懿宁，陈天，臧鑫宇 / 城市营销带动城市更新——从“古根海姆效应”到“毕尔巴鄂效应”

陈玉洁，李紫晴，丁凯丽，袁媛 / 国外城市研究期刊近年研究热点及趋势（2010—2017 年）

——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研究

杨希 / 近 20 年国内外乡村聚落布局形态量化研究方法进展

### 规划研究

李亚洲，刘松龄 / 构建事权明晰的空间规划体系：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韩文静，邱泽元，王梅，张正峰，万成伟，杨昔 /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美国区划管制实践对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改革的启示

杨柳青，陈雯，吴加伟，孙伟，李艳 / 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研究进展：内容和方法

李志明，姚瀛珊，宋彦 / 响应公共健康的美国城市规划教育：历史、培养模式与启示

高晓明，王志鹏，赵继龙，毛晓天，刘长安 / 城市代谢导向下的荷兰可持续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探析

杨家文，段阳，乐晓辉 / TOD 战略下的综合开发土地整备实践——以上海、深圳和东莞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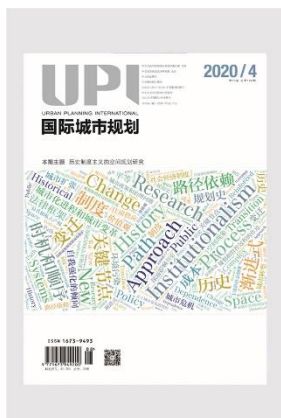
刘泉，史懿亭 / 轨道交通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的整体管控

### 案例集萃

倪剑波，宋彦，闫整，赵虎 / 美国生态村的建设实践

卜义洁，张尚武 / 柏林—勃兰登堡大都市区轨道交通演变

王波 / 美国尤金市单行道系统应用



2020 年 第 4 期

## 空间规划研究的新视角：历史制度主义的缘起和应用

罗震东

**摘要：**城市是多种制度的密集集合，城市规划史是城市制度建构的历史，研究规划就是在研究制度。历史制度主义是研究规划史的良好工具。当今中国的规划制度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期，历史制度主义的引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专辑旨在通过对这一国际规划学前沿方法的全面解读，为中国空间规划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规划史；空间规划；制度；理论创新

**引文格式：**罗震东. 空间规划研究的新视角：历史制度主义的缘起和应用[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4. DOI: 10.19830/j.upi.2020.316.

## 重视路径依赖：规划史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议程

安德烈·索伦森 著 罗震东 饶叶玲 方鹏飞 译

**摘要：**本文概述了规划史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议程。对于理解制度、路径依赖、公共政策的正反馈效应以及制度变迁的模式化过程，历史制度主义方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同时为分析公共政策中的连续性和变迁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概念性分析工具。然而到目前为止，规划史研究还没有系统地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因此，笔者首先论述了规划史研究中的一些定义，诸如制度、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变迁过程等，概述了应用和扩展这些概念的最新的历史制度主义文献，并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问题。结论部分探讨了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在规划史研究和国际规划比较研究中的潜在应用和影响力，并提出了一个研究议程。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关键节点；渐进变迁；规划史

**引文格式：**安德烈·索伦森. 重视路径依赖：规划史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议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5-16. DOI: 10.19830/j.upi.2020.182.

## 城市化、制度变迁和制度化：复合关键节点的城市转型

安德烈·索伦森 著 金盼盼 张怀予 傅舒兰 译

**摘要：**本文提出运用制度主义方法对城市化、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生产过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聚焦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第一，城市转型不仅包括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及新城市空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也包括与城市产权体系相适应的制度变迁、制度创造和空间制度化的过程。第二，由于城市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且城市产权体系具有支持路径依赖的多种自我强化特性，因此在城市转型期间作出的选择往往在各个地方都会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其中一个证据是，当城市化高峰期一过，许多地区的人口便开始减少，削弱了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制度变迁的推动力。第三是对于类似研究的一点建议，即制度主义理论可以为研究发展路径中的历史变迁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提供宝贵的视角。

**关键词：**城市化；制度主义；发展路径；城市产权体系；比较研究

**引文格式：**安德烈·索伦森. 城市化、制度变迁和制度化：复合关键节点的城市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7-24. DOI: 10.19830/j.upi.2020.172.

作为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即便翻译时作了很大的努力，也会由于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在逻辑展开和表述构成上的巨大差异，导致阅读和理解的难度。为了使读者更快进入语境，在以下作三点背景介绍。

阅读本文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作者对“城市化”问题的关注点和基本认知。从大背景来看，城市化是一个有限度的发展过程。已有证据显示，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80%及以上），并且正在经历城市净人口下降，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预计会在 21 世纪上半叶结束。从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基本认知来看，作者认为“城市空间是制度密集的存在物”，并且当前的城市化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空间逐渐制度化的过程”。因此，将发源于政治学领域的历史制度主义引入规划研究中，有助于理解城市转型和城市产权制度建立的具体过程。

其次，是安德烈·索伦森的学术背景。这位目前在多伦多大学人文地理学系执教的作者，有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理专业学习研究、东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后工作的经历。早期成名作有《都市日本的生产》（*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随后涉猎东西方比较、政策制度对城市影响等方面的研究。2018 年他针对欧洲空间规划制度改革的背景，在国际规划史学会学刊《规划视野》（*Planning Perspectives*）上组织了题为“欧洲空间规划”（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特辑。这个特辑除了内容上契合当时需求，梳理了过去几十年间欧共体（EU）以及相关国家地方层面的“欧洲化”（Europeanisation）实践及机制变化，还在研究方法上令人注目，可以说是将擅长历史比较和变化过程

分析的历史制度主义（HI: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研究方法运用于规划历史研究的集中体现。罗震东教授正是在《国际城市规划》的“期刊导航”栏目引介该特辑的过程中，萌生了组织本期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专辑的想法。

第三，这篇文章是作者应本专辑邀约写作的特稿。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有两个目的：阐述和补充以往的方法论，通过论证思考和提示出新的研究方向。从方法论上来看，在历史制度主义之外，增加了历史比较分析法（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从启示上来看，有文末总结的 6 点问题：

（1）在不同的国家或城市，有哪些制度来规范城市空间和财产的生产，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2）在不同情况下，城市产权制度，包括塑造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系列规则，以及每个行政区内的公共和私人产权和基础设施，是如何通过城市化进程发生转变的？谁是主要的行动相关方？

（3）在不同的行政区内，城市化进程的时机、顺序和速度的差异如何导致了制度发展以及城市、产权的空间模式、类型和分布的差异？

（4）城市规划和产权制度是如何影响住房建设的？

（5）现有的一系列的规范城市化进程的制度会产生怎样的分配影响？它们如何塑造制度的连续性和变革的模式？

（6）城市产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未来的可能性和选择？城市产权制度在哪些方面对未来的可能性保持开放？

顺着以上三点线索，应能更好地理解 and 阅读《城市化、制度变迁和制度化：复合关键节点的城市转型》这篇文章。

## 中东欧战略空间规划的发展：以路径依赖、欧洲影响和国内政治为研究视角

马辛·东布罗夫斯基 卡塔知娜·皮斯雷克 著 金盼盼 傅舒兰 译

**摘要：**本文讨论了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这三个中东欧国家的空间规划体系演变历程，以及这三个国家自 1990 年代初的后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引入的战略规划及其实践。研究以历史制度主义概念的视角来解释战略空间规划的演变过程，并阐明加入欧盟在变革中起到的催化作用。研究特别指出并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的关键节点，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区域和地方决策者在适应欧盟凝聚政策框架及参与战略规划的设计和执行时的能力。

**关键词：**战略规划；欧洲化；欧盟凝聚政策；历史制度主义；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

**引文格式：**马辛·东布罗夫斯基，卡塔知娜·皮斯雷克. 中东欧战略空间规划的发展：以路径依赖、欧洲影响和国内政治为研究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25-35. DOI: 10.19830/j.upi.2020.173.

## 传统、路径与影响——日韩近代城市规划体系发展与形成的比较研究

傅舒兰

**摘要：**本文在日韩城市规划史既有研究基础上，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基本思路对两国近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发展与形成作一梳理。比较梳理结果，可见两国发展路径十分相似，均相继经历了模仿和学习外国的探索期、地方自治体以改良既有城区为主的“市区改正”期、国家主导推进的“都市计画”立法和制定期。同时，由于近代韩国经历了长时期的日本统治，两国的制度来源和技术特征也十分近似。但是，由于两国在制度引入、形成、发展和定型的关键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具体的发展层面呈现出不同发展成果：日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都市计画”与“国土计画”组合的二重城市规划制度体系；韩国则只颁布了简化的战时地方法令，形成了以《朝鲜市街地计画令》为主、配合大型项目推进的近代城市规划特征。

**关键词：**日本；韩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路径；历史制度主义

**引文格式：**傅舒兰. 传统、路径与影响——日韩近代城市规划体系发展与形成的比较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36-43. DOI: 10.19830/j.upi.2020.171.

虽然有着相当时间的留日工作经历，我也很少愿意写作比较类的文章。因为太容易就落入简单罗列、为比较而比较，或者拿着某一国的惯用认知系统去硬套另一国来比较的主观陷阱。之所以能够写成本文，首先得益于赴韩工作的一年，积累了相应的素材和思考。

现在想来，最早赴韩也没有特别清晰的意图，无非是由于建筑史专业出身的东亚三角情结，无论如何都想补上朝鲜半岛这只角。当然到了韩国，有着首尔大学奎章阁研究院、建筑系建筑史研究室提供的极好的工作环境，多多少少也得有点儿进步。虽然韩语学得磕磕绊绊，但一年时间至少可以把韩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脉络大致摸个清楚。可能是因为察觉了我的积极性，建筑史研究室的田凤熙教授和他的博士生们，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指点和帮助。而期间不时产生的疑惑，也因有了这些可以及时开展讨论的交流对象，不但没有阻碍反而成为促进工作开展的有利因素。还记得田教授说过一句很有启发的话，也与本文有关，“韩国学者做研究，总是从比较开始寻找自己的定位。”

当然正式写作本文，还是源于罗震东教授的邀请，以及对“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的兴趣。这个较早形成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概念，近来被国际学界引入城市规划的研究，通过对制度形成和变化的分析，揭示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其中比较核心的观点是，“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功能，使得扭转或者推出制度的成本不断增加。”为此，制度发生变化（制度选择）的历史节点，是研究首先关注的重点。在文章中是以二级小标题的形式，予以强调，比如“1.1 触发点——东京大火（1872年）”，破折号前是作用定位，破折号后是具体时间节点和关键事件。一连串的历史节点，形成发展路径。

至于进而展开比较，不仅是因为东亚国家在近代化总体路径上呈现出的相似性，更是主要源于分析所得出的日本与韩国的强烈关联性。早期主要体现在主导朝鲜末期近代化的开化派政治家，因留日和亲日背景带来的日本影响；后期主要体现在日本逐步夺取在朝主导权，最后吞并朝鲜，将其作为日本的一个外省展开近代化建设和制度设计的方式。

因此，通过两国的比较，不仅有利于明确单个国家的发展特质（不同），也能很好地促进对历史选择的原因分析（即进一步分析和揭示某个特定历史节点上作出相应选择的原因），同时还可以对历史制度主义中“制度适应”的主要观点作一验证。

若用较为凝练概括的语言对文章主体内容作一概括的话，可有如下结论——日韩两国城市规划发展路径十分相似，均相继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模仿和学习外国的探索期、地方自治体以改良既有城区为主的“市区改正”期、国家主导推进的“都市计画”立法与制定期。另外，由于近代韩国经历了长时期的日本统治，两国的城市规划制度来源和技术特征近似。但是，由于两国实际触发变革的目的、背景等不同，因此在决定制度引入、形成、发展和定型的关键节点上，体现出较大差异。同时，也因这些关键节点的差异及其影响，日韩两国最终

体现出不同的近代化发展路径：日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都市计画”与“国土计画”组合的二重城市规划制度体系；韩国则只颁布了简化的战时地方法令，形成了以《朝鲜市街地计画令》为主、配合大型项目推进的近代城市规划特征。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例如日本国土规划的产生背景、《朝鲜市街地计画令》颁布理由等间接指向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因此文章中还用一个小节专门讨论了描绘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路径的初步设想。

总的来说，这次使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还是得到了许多预期之外的收获，是令人满意的。同时，再次深刻体会展开比较研究时，素材本身可比的前提，以及方法恰当的重要性。

## 空间战略规划与中国规划制度——制度变迁与关键节点

曹康 章怡

**摘要：**具有持续创新特征的空间战略规划自产生以来一直助力中国规划体系的演进。以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为依据，本文分析了中国规划的制度变迁、关键节点以及空间战略规划在制度变迁中演进的基本逻辑。认为空间战略规划产生后经历了三个变迁时期：前两个时期中空间战略规划助推了规划制度的微调；在第三个时期规划制度出现断裂，空间战略规划也要作出相应的转型发展。

**关键词：**规划制度；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空间战略规划；历史制度主义

**引文格式：**曹康，章怡．空间战略规划与中国规划制度——制度变迁与关键节点[J]．国际城市规划，2020(4): 44-49. DOI: 10.19830/j.upi.2020.199.

##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中国规划史研究方法

侯丽

**摘要：**本文梳理了当前中国规划史研究所面临的研究方法适用性的困境，提出借鉴社会学科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包括有限理性、路径依赖，以及制度连续和断裂的相关概念，用于研究当代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演进和变革。文章提出通过应用这些制度主义的理论工具，可以提高规划史研究的诠释能力；将规划视为一种制度，规划师作为有限理性的专业人和社会人，关注制度和社会结构对规划行为的影响，探寻规划在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位置及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历史比较分析；路径依赖；规划史

**引文格式：**侯丽．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中国规划史研究方法[J]．国际城市规划，2020(4): 50-54. DOI:

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挖掘、记录、再现与重构过去。对中国规划史研究而言，达成其中任何一项目标都不轻松。历史信息的挖掘已然非常困难，因果关系的建立则始终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难点，更不用说依据获取的信息碎片所呈现出的事件去建立跨越时空的因果链，探寻时间、波动与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在国际和国内的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同样存在。

在中国开展规划史研究，在史论的薄弱之外，还存在史料的匮乏与偏颇。近代规划史料集中于租界或殖民地城市；只有少数城市的当代城建档案对研究人员开放；国家的、宣传的和技术成果类档案可获得性远远高于地方的、民间的和过程类档案；与官方资料相对应，媒体报道、回忆录等民间材料多聚焦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点城市，更容易获得的是所谓“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史。要重现规划与建成环境的互动，书写社会历史，发掘来自“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和“未建成的空间”十分困难，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个体的收藏和回忆，史料的发现有着极大偶然性——这给需要如期毕业的研究生选择这一领域的题目尤其造成额外的风险。规划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匮乏，即使找到了，也往往是分散的、片段的和片面的，易导致历史再现的失真；有的研究者不加辨识地接受有限的材料内容，没有意识到其中隐含的偏见和主观性。由于难以通过广泛的史料挖掘还原历史叙事，很多规划研究喜欢选择以论代史的“捷径”，事实不详而结论和认识就层出不穷的论文并不鲜见。材料和事实的苍白，叙事的单薄，洞见的匮乏，使得中国规划史领域的研究虽然逐渐增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仍寥寥，历史研究对当下发展缺乏深刻的介入，规划史研究存在着学术小圈子内自我循环的危险。

社会科学善于归纳出共时性的，或者在受控的时间框架之内的理论架构，史学从中颇受启发，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倾向在近年来渐成气候。以往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规划学界，如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多着眼于分析规划“应该怎么

做”，而没有以此来解释中国的规划制度变迁。比如说，中国规划制度在土地产权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推动了中国规划制度的变革？谁是改革的动议者？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中国规划与国家—社会—市场的结构性关系跟其他国家有何不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规划师等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针对如上疑问，本文通过引介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与概念，主要是历史制度主义学派的路径依赖、关键阶段和有限理性等，以求对扩展中国规划史的研究视野有所启发。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前一个阶段的政策选择对后一个阶段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规划制度具有强烈的启发。在既往的中国规划史研究中，时间更多是作为一种不同历史时期的标记、背景而存在，却没有成为影响事件变化的直接因素。此外，对规划理念、技术、成果的讨论多于对规划制度变迁、对主要行为人的行动逻辑分析。未来的规划史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分析研究对象的专业认知能力及行为规范，包括其专业背景、经历、所掌握信息、判断依据等；因为认可人具有天然的认知局限，所以理解社会规范、传统、合法性等多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制度框架下的个人行动及其背后逻辑。

规划不是跨越国界的纯“客观”的科学技术，其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它的发展受到国家制度、社会结构的约束，受到本国规划行业历史发展路径特征及其主要行动者视野与能力的影响。要总结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探寻规划在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位置及其结构性关系演变，既要关注既定的制度结构和有关规范对规划的约束，同时应将规划行业及其主要行动者看作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个体。行业和学科发展的过程与制度约束、观念变迁、文化模式的影响存在着丰富的互动关系。期待引入新制度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工具，涌现出更多关注规划体系演进的研究，而有所收获。

## 城市营销带动城市更新——从“古根海姆效应”到“毕尔巴鄂效应”

王懿宁 陈天 臧鑫宇

**摘要：**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城市更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城市营销作为城市发展的催化剂，可为城市更新规划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以经典的古根海姆效应为例，分析古根海姆博物馆营销带动毕尔巴鄂长期更新的作用机制，评估近 20 余年其对毕尔巴鄂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起到的作用。研究表明，协调高效的组织管理、动态长效的更新机制、专业国际化的营销策略和根植本土的内生动力是毕尔巴鄂模式成功的关键，这为我国城市更新活动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城市营销；城市更新；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效应；城市文化

**引文格式：**王懿宁，陈天，臧鑫宇. 城市营销带动城市更新——从“古根海姆效应”到“毕尔巴鄂效应”[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55-63. DOI: 10.19830/j.upi.2018.382.

随着资源、人才流动性的日益增强，城市的更新与发展不仅要提升城市硬件环境，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提升文化软实力，以获得更多外部发展资源，城市营销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毕尔巴鄂城市再生可谓世界范围内通过城市营销促进城市更新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1993 年毕尔巴鄂地方政府决定与古根海姆集团合作，由世界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主持设计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分馆（GMB: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从而带动了一系列城市更新举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种由旗舰博物馆带动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的现象被称作“古根海姆效应”。

GMB 的建设成为毕尔巴鄂城市更新的“触媒”，这个巴斯克地区的中心城市早已从当年一座环境问题严重、经济结构陷入危机的城市，转变为生活、旅游、投资俱佳的理想城市，并获得了“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欧洲年度城市奖”等多个奖项。毕尔巴鄂市市长胡安·马里·阿武尔托（Juan Mari Aburto）称，这种以艺术文化带动地区整体经济和产业转型、实现长效更新的现象与其叫作“古根海姆效应”，不如称之为“毕尔巴鄂效应”。

在“古根海姆效应”的影响下，世界各地兴起了以博物馆作为文化旗舰，带动地区更新的风潮，我国大小城市也建起了各式造型前卫的博物馆，然而多数收效甚微。这些不高明效仿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结合城市具体的发展条件进行正确的城市营销，也没有认识到“古根海姆效应”的成功是建立在毕尔巴鄂整体城市更新战略之上的。虽然毕尔巴

鄂的案例说明城市营销有助于促进城市更新，但二者之间绝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本文通过回顾城市营销与文化导向城市更新策略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毕尔巴鄂城市更新案例，评估城市营销对城市更新的作用，解读毕尔巴鄂模式成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建议。

城市文化产业是实现城市营销与城市更新联通的媒介，从 1980 年代由欧洲兴起的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到如今的“创意城市”理念，城市营销的目的也从推广旅游、刺激消费、销售房地产转向吸引人才、强化城市文化软实力等。近年来，我国各类城市排名的兴起，媒体广告中的城市宣传，地标性明星建筑的建造，各类城市大事件的举办以及近几年社交媒体中的网红城市等都反映了城市营销意识已成为当今我国城市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但综合看来，我国的城市营销仍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还存在着组织和营运不完善，营销内容碎片化，营销活动与城市发展缺乏统筹等问题。

毕尔巴鄂在全球产业结构洗牌的背景下启动城市更新步伐，重建了应对复兴需求的城市管理组织体系，成立了集合了政府关键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公私合营的机构“毕尔巴鄂都市 30”（Bilbao Metropoli 30）、致力于将老工业工地用于新投资项目的城市发展公司“毕尔巴鄂 ria-2000”（Bilbao ria-2000）等机构以加强公私部门的紧密合作，促进更新规划的实施；构建了多层次的更新规划体系，通过制定动态连续的规划和及时的规划评估，始终抓住时代赋予城市经济复兴的契机（表 1）。

城市重点更新项目均采用了举办国际建筑竞赛的方式，以吸引国际知名建筑师参与毕尔巴鄂的城市建设，其中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事务所设计的毕尔巴鄂地铁站，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航站楼、步行桥等

都是具有地标意义更新项目。此外还修建了地铁、有轨电车线路及多座桥梁，对滨河工业区进行了整体改造，并在老城区通过以点带面的重点更新项目和滨水开放空间营造，提升了城市整体空间品质（表 2）。

表 1 1979—2016 年间毕尔巴鄂重要城市规划

| 规划类型 | 颁布时间 | 规划名称            | 负责机构          |
|------|------|-----------------|---------------|
| 总体规划 | 1989 | 毕尔巴鄂大都市区城市复兴计划  | 巴斯克政府和比斯开省议会  |
|      | 1992 | 复兴计划            | 毕尔巴鄂都市 30     |
|      | 1995 | 毕尔巴鄂城市总体规划      | 毕尔巴鄂市议会       |
|      | 1999 | 2010 年毕尔巴鄂：战略反思 | 毕尔巴鄂都市 30     |
|      | 2001 | 2010 毕尔巴鄂战略     | 毕尔巴鄂都市 30     |
|      | 2016 | 2035 年毕尔巴鄂大都会战略 | 毕尔巴鄂都市 30     |
| 专项规划 | 1979 | 内维翁河综合卫生计划      | 毕尔巴鄂比斯开水务联盟   |
|      | 1987 | 城市交通铁路规划        | 毕尔巴鄂市议会       |
|      | 1992 | 河口地带全局排水规划      | 毕尔巴鄂市议会       |
|      | 2015 | 巴斯克气候变化战略 2050  | 巴斯克政府         |
| 片区规划 | 1996 | 阿班多尔巴拿区总体规划     | 毕尔巴鄂 ria-2000 |
|      | 2004 | 佐罗扎里半岛总体规划      | 佐罗扎里半岛区管委会    |
|      | 2012 | 佐罗扎里半岛特别城市规划    | 佐罗扎里半岛区管委会    |

表 2 毕尔巴鄂主要更新项目发展列表

| 单体项目（建成年份）                                                                              | 局域项目（建成年份）                         | 综合系统                            |
|-----------------------------------------------------------------------------------------|------------------------------------|---------------------------------|
| 古根海姆博物馆（1997）<br>尤斯卡尔杜那宫音乐和会议中心（1998）<br>省图书馆（2002）<br>德乌斯托大学图书馆（2008）<br>伊比德罗办公塔（2012） | 阿班多尔巴拿滨水区<br>综合开发（2012）            | 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产业兴起，产业转型升级，达到高等创新国家水平 |
| 阿梅索拉联运站（1997）<br>卡拉特拉瓦白桥（1998）<br>新机场航站楼（2000）                                          | 毕尔巴鄂地铁（1995）<br>滨水步行系统更新（2000 年至今） | 升级对外交通，完善公交系统，构建慢行体系            |
| 圣马梅斯球场（2012）                                                                            | 佐罗扎里半岛综合开发（2004 年至今）               | 不断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发展创新经济               |

古根海姆效应

毕尔巴鄂效应

通过分析城市更新前后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一系列更新措施的作用下，毕尔巴鄂的旅游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地区整体经济状况好转，1996—2012 年间毕尔巴鄂市人均 GDP 快速增长，从低于欧盟国

家的平均水平到 2005 年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同时，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失业率显著降低，由于城市衰退导致的人口流失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毕尔巴鄂的经验表明，通过整体组织、综合规

划城市营销能够成为城市更新的催化剂，助推城市长期可持续更新的进程。总结其成功经验，针对我国城市营销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点启示：协调高效的组织管理、动态长效的更新机制，专业智

联的营销策略，根植本土的内生动力——这既体现了其他成功的城市营销所具有的共性，也凸显了毕尔巴鄂自身城市个性，可以为我国的城市更新和营销活动所借鉴。

## 国外城市研究期刊近年研究热点及趋势（2010—2017 年）——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研究

陈玉洁 李紫晴 丁凯丽 袁媛

**摘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期刊的理论和实践等内容是我国城市研究的重要借鉴来源。基于 Citespace 软件，本文对城市研究领域的四种期刊——《城市》《城市研究》《国际人居》和《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发文时间分布、载文数量、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研究内容等方面梳理了 2010—2017 年间城市研究领域的文献。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研究，人文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管理、制度和法规，城市更新和绅士化，微观视角下的邻里和社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六方面综述了主要内容，以期对中国的城市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市研究；研究综述；Citespace 软件；可视化分析；学术期刊

**引文格式：**陈玉洁，李紫晴，丁凯丽，等. 国外城市研究期刊近年研究热点及趋势（2010—2017 年）——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64-71. DOI: 10.19830/j.upi.2018.107.

## 近 20 年国内外乡村聚落布局形态量化研究方法进展

杨希

**摘要：**随着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开展，规划行为开始深度介入村落空间，乡村聚落布局形态研究正在从描述性阶段向量化研究阶段迈进，以求空间规律的深度认知并借以辅助空间决策。本文基于近 20 年国内外村落空间形态量化研究，从静态研究方法和动态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对诸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评述，判断各种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探讨研究中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的不足和研究的发展趋势，以为后续村落形态量化研究和实践提供有效的参考。

**关键词：**乡村规划；乡村聚落；空间布局；量化研究；研究方法

**引文格式：**杨希. 近 20 年国内外乡村聚落布局形态量化研究方法进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72-80. DOI: 10.19830/j.upi.2018.340.

与村落实践中出现的空间“同质化”和“异化”问题相对，中国乡村形态规划理论研究领域已对“尊重村落的原有形态”形成共识，明确强调地域文脉的保护与传承。因此，中国村落空间实践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于文化价值取向，而在于村落空间理论与方法对历史挖掘的深度，对空间规律阐释的准确度，以及对于空间实操的指导效度。乡村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需要明确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

提取空间规律，以阐释既存现象，完成空间认知；二是如何利用规律，借以评判或演绎空间形态从而辅助空间决策。由此可见，定性描述类研究的深度和精度已经难以支持实践需求，乡村聚落布局形态研究需要借助量化方法来辅助空间的解读与演绎。

在尝试动态量化空间分析之前，学者们已经在静态空间量化分析方面完成了坚实的基础工作，村落布局研究大致经历了由形态分析转向因子关系

分析的过程，并逐渐探求数据的可视化表现。

随着村落形态地域差别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开始在欧氏几何层面运用抽象的形态指数表达村落的形态特征。基于这些基础指数，一些研究借用景观形态学中的统计方法，引入多种衍生性指数。更进一步，针对集聚性较为明显的村落，研究者亦采用分形几何中的形态指数对村落外部边界与内部公共空间形态的复杂性进行评判（表 1）。

形态研究的重要目标是探寻形态本体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国内外乡村聚落形态研究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已从定性描述发展至量化解析。在量化解析阶段，村落形态可用形态变量或指数来描述，外部因素可代之以各种地理关系变量或经济变量，研究的主要思路或通过观察法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或借用某数学模型辨析两者相关性，而后者有赖于近几十年数据相关性分析辅助工具的开发，常用者如 SPSS 统计数据分析平台和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

前述的空间变量或空间形态指数分析尝试将具象的形态转码为某种数据或数学关系，而在村落

空间实践中，抽象量化的认知有必要被再次还原为直观可感的形态。为了提高空间形态分析对实践指导的可操作性，静态空间形态量化模型应运而生。近年来，在村域尺度空间分析和规划层面，出现了基于空间句法的模型和基于 CityEngine 平台的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模型。针对较大尺度的村落体系，研究者亦尝试运用引力模型以及层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复合模型辅助空间重构（表 2）。

随着静态量化分析的深入，人们渐渐对村落空间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自组织性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意识到动态空间演绎对村落研究的重要性，并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思想，运用空间动力模型完成村落特征的认知以及基于认知的发展决策。其中两种模型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一为适用于乡村系统情景规划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一为适用于村落形态规划的元胞自动机模型。

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不仅逐渐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究，并且在研究方法的逻辑属性以及方法适用的对象特征上亦有所变化（表 3）。

表 1 村落研究常用形态指数

| 理论支撑  | 常用形态指数类别                                               | 形态评价意义                            |
|-------|--------------------------------------------------------|-----------------------------------|
| 欧氏几何学 | 平均面积                                                   | —                                 |
|       | 平均最近距离                                                 | —                                 |
|       | 与住居面积、间距和方向相关的求心量                                      | 寻找村落核心空间位置                        |
| 统计学   | 斑块面积（patch area）                                       | —                                 |
|       | 斑块密度（patch density）                                    | 评价村落的密集程度                         |
|       | 斑块面积的均值（mean patch area）                               | —                                 |
|       | 斑块面积的标准差（patch area standard deviation）                | 评价村落个体间规模差异大小                     |
|       | 斑块间的平均最近欧氏距离（Euclidian mean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 评价村落的离散程度                         |
| 分形几何学 | 边界形状指数（shape index）                                    | 评价村落边界的凹凸程度，即村落布局的紧凑度             |
|       | 分形维数（fractal dimension index）                          | 评价内部公共空间图斑形态的致密程度与结构化程度，体现空间的组织效率 |

表 2 静态量化模型法及其空间可视化分析技术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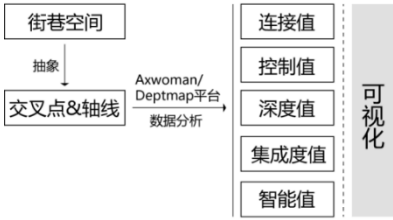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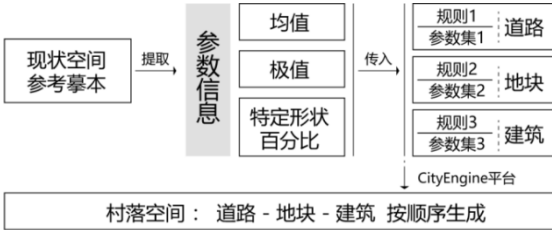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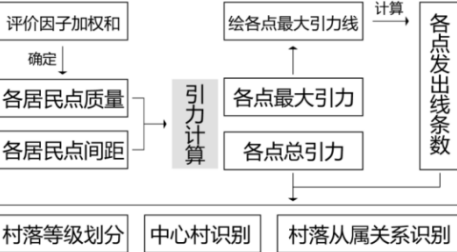
| 方法名称             | 适用研究尺度 | 技术路线                                                                                 |
|------------------|--------|--------------------------------------------------------------------------------------|
| 空间句法             | 村域尺度   |    |
| 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法      |        |    |
| 引力模型法            | 村落体系尺度 |   |
| 层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复合模型法 |        |  |

表 3 诸量化研究方法特点比较

|      | 方法               | 逻辑属性 | 适用对象特点                     | 作用   |
|------|------------------|------|----------------------------|------|
| 静态研究 | 形态指数分析法          | 归纳   | 村落系统尺度或区域尺度                | 方案评价 |
|      | 形态指数—影响因子关系分析法   | 归纳   | 区域尺度或跨区域尺度                 |      |
|      | 空间句法             | 归纳   | 村域尺度；布局紧凑的村落街巷空间           |      |
|      | 空间参数化解析与重构法      | 演绎   | 村域尺度；布局紧凑的完全重构性村落          | 方案前导 |
|      | 引力模型法            | 归纳   | 村落系统尺度                     |      |
|      | 层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复合模型法 | 归纳   | 村落系统尺度                     |      |
| 动态研究 | 系统动力学模型法         | 演绎   | 区域尺度以下多尺度普适                | 方案前导 |
|      | 元胞自动机法           | 演绎   | 区域尺度以下多尺度普适；连续性生长的村落空间（目前） |      |

数据问题是乡村聚落布局研究由静态量化分析向动态量化分析发展的一个较大的障碍。鉴于历

史空间过程的复建缺乏直接资料，众学者通过综合利用各种非图像化的数据资料、采用多种计算方法，

为历史空间的复建提供了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以历史形态本体为终极目标，在辅助数据不足的情况下遵循大致可能的规律，从现时形态推测历史断面的形态，所得形态属于一种相对合理的猜想。第二种思路是以历史时空规律为终极目标，为达到该目标需要追求所复建形态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总体来看，村落历史空间的复建工作已经引起乡村规划领域研究者的重视，但既往相关工作的研究尺度仍较为宏观：在空间尺度方面，主要针对市辖或省辖区域内的“乡村系统”展开工作，尚未深入至村域尺度；在时间尺度方面，主要倾向对千年以上跨度的空间变迁展开研究，时间分辨率偏低，且对影响当代乡村文化根基的近几百年内的村落空间发展过程细化研究不足。

从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因形论形”，而希望更进一步探索形态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村落空间的地域性暗示了形态影响因素种类与敏感度的地域性。因此，在进行空间量化分析之前，有必要根据地域自身发展的时空社会环境辨识可能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空间控制力分析对影响因素的特征变量加以取舍。而这一项工作，恰在村落空间形态量化研究中常被忽视。在既往各村落研究中，与空间影响因素分析范围的扩展不不同步的是，空间特征变量的选取较为趋同，忽视特征变量本身应具有的地域性，使相应的量化分析与实际空间不能获得较好的特性匹配，从而可能导致乡村地域文化保护工作在“空间特征辨识”过程便开始偏离地域文脉。

构建事权明晰的空间规划体系：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李亚洲 刘松龄

**摘要：**我国空间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多规”并行格局下的事权不明和冲突。日本在完备的法律指导下，形成了“多规”并行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作为我国空间规划优化改革的重要借鉴对象。在分析大量一手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的国土形成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和专业土地利用规划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重点探析各类型、各层级规划的主要内容和事权关系。认为日本空间规划之所以能保证顺畅运作，是因为其在明确法律法规保障下，上下层级、相关部门事权具有明晰的边界和完善的协调机制。我国空间规划一直以来存在多规并行却缺乏统筹甚至矛盾冲突的问题，对此，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事权的划定、空间规划立法、规划协调机制等角度提出空间规划体系优化改革的三点建议。

**关键词：**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多规；事权划分；规划协调；日本

**引文格式：**李亚洲，刘松龄. 构建事权明晰的空间规划体系：日本的经验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81-88. DOI: 10.19830/j.upi.2018.277.

2018 年自然资源部设立并强调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后，如何协调我国原有“多规”体系，解决其缺乏统筹甚至矛盾冲突的问题，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同样作为东亚地区的单一制国家，日本在空间规划体系形成背景和发展历程上与我国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日本也有类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土形成规划；日本也是从最初的城市、农业、森林等地区各自为政、各自规划到国土利用规划统筹管制、统领规划；并且跟我国一样，其空间规划体系也相当庞杂，涉及多层级、多部门。那应

对这样一个庞杂的体系，日本在各类规划事权边界、政府部门协调上是否明晰，进而能否保障整个体系的顺畅运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对我国又有什么启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研究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经验进行了总结。

纵向上，日本各级政府的空间规划权责分明，有很明确的分工。其中国家的主要职责是定战略，即编制国土形成规划和国土利用规划（全国），制定国土保护利用的战略方向和基本方针。都道府县的主要职责是划分区，通过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将国土

划分为五类地域，以此作为衔接上层级宏观战略和下层级具体实施的抓手。市町村的主要职责是定方案，以城市规划等为手段，主导各类国土资源的开发建设和保护利用。总体上，空间规划形成“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规划”的架构，三级政府权责明晰。

横向上，主管部门相对统一，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综合性的国土空间规划（包括国土形成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均由国土交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管理，管理主体单一明确，使得并行的“多规”在组织阶段即实现了规划的合理统筹。而不同用途的专业土地利用规划，则是在明确

划分五类地域的基础上，由各相关部门分头开展，五类地域间一般互不重叠，所以各部门土地发展权和规划管理边界也少有冲突。

为了保障上述“纵横”规划体系的顺畅运行，日本构建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支撑，其各类空间规划均已纳入法规体系，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划的编制层级、主体、程序流程和主要内容等，从法理上明确各级政府的权责。而针对可能存在的规划冲突，日本还通过跨部门、跨层级的协调机制，搭建国家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对话平台，在规划各阶段、全流程协调各方利益。

##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美国区划管制实践对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改革的启示

韩文静 邱泽元 王梅 张正峰 万成伟 杨昔

**摘要：**控规在过去的城市用地管制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转轨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所要求的对城市空间用途的高效管制。本文以回顾控规的前身——美国区划管制的运行背景和发展为起点，从体系地位、法律效力、管制内容、实施程序等角度对美国区划管制（以纽约为例）与我国控规的已有实践进行对比，并结合新形势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对控规提出的新要求，从探索综合性“地块化”分区分管制机制、探索多样化弹性管制工具、促进治理多元化、提升控规成果法律效力等方面提出未来控规的改革思路。

**关键词：**国土空间规划；土地用途管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区划；空间治理

**引文格式：**韩文静，邱泽元，王梅，等.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美国区划管制实践对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改革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89-95. DOI: 10.19830/j.upi.2019.210.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是在借鉴美国区划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土地管制工具，在中国已有 30 余年的实践历史。作为引导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核心工具，控规在中国城市用地管制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控规在过去的城市用地管制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随着我国已步入高质量城镇化转型阶段，控规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转轨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对城市空间用途高效管制的需求。本文在回顾了控规的前身——美国区划管制产生的运行背景及发展基础上，总结了由于中美政治体制与社会背景差异，我国控规与美国区划管制实践在体系地位、管制内容、法律地位等方面的显著差异。

（1）体系地位方面。区划是美国城市规划体系中土地利用管制的核心执行工具，具备法律效力。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前，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市详细规划的类型之一，其在总体规划框架下设计并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在编制与实施管理上体现为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

（2）管制内容方面。美国区划管制范围只包括城市私人土地的开发建设，其以地块（plot）为核心管制单位，管制内容主要集中在用途性质、建筑体量、环境景观等方面。我国控规借鉴美国区划编制技术，其在管制内容上与美国区划管制有相似性，但与美国区划对城市用地管制效力的排他性与权威性不同的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施之前，除

了控规，我国城市土地的使用和管理还会受到来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的多重管制。

(3) 法律效力方面。美国区划的本质是法律，是城市用地分区利用中唯一的法律依据；对中国城市而言，虽然《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包括原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内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法定”性质，但从本质上看，以往控规成果仍属规划行政部门编制的技术文件，其强制力与严肃性受到限制。

(4) 编制及实施程序方面。美国区划法规从内容编制到修改程序上，均采取了“自下而上”、多层次吸收民意的逐步审查模式，既体现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又可确保管制内容被广大居民更好地接受并得以顺利实施；中国城市控规的编制与实施程序都还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缺乏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效参与途径，又因为控规指标的灵活性较差，由于矛盾冲突而引发规划调整的现象频繁发生。

基于上述分析，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新形势下，基于反思和自适应视角，本文为未来控规改革方向提供以下新思路。

(1) 实施对城镇开发边界内外全域全要素的综合管控，探索“地块化”综合分区管制机制

为适应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对城市开发边界内外全域全要素的管控要求，可以参照美国区划“地块化”管制模式，以控规为分区管制载体，丰富以地块为分区单元的管制规则，探索以全域全

要素为管制对象的综合化、精细化管制模式。

(2) 探索多样化弹性管制工具，提高控规管制动态灵活性，促进控规从“空间覆盖”向“时空覆盖”转型

为适应未来中国高质量城镇化转型发展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于全域全要素时空管控的需要，有必要在未来控规编制中留有一定弹性空间。美国区划体系中的弹性管制工具，如激励性分区、叠加/浮动分区、发展权转移等，可被有选择性地纳入控规管制体系中，并值得进一步研究。

(3) 从“用地管理”到“空间治理”，推动控规治理体系多元化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是实现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顺应国土空间改革体系改革思路，控规也应在升级原有编制技术时相应调整实施管理路径，提升治理效率和层次，有必要在各环节探索各利益相关者表达及协调机制，深度引导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到空间治理中来。

(4) 完善控规法律形式，提升控规成果法律地位

为确保空间规划成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工作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考虑到控规作为实施性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传导性地位，建议在未来编制的《空间规划法》中提高控规成果的法律效力。

## 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研究进展：内容和方法

杨柳青 陈雯 吴加伟 孙伟 李艳

**摘要：**气候变化给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空间规划被广泛认为是适应气候变化和防备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城市安全问题的有效策略之一。本文聚焦“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对气候变化的整合”，通过文献追踪，从规划的目标、内容、技术方法三个维度出发，梳理了国内外空间规划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由此得出，在空间规划目标制定上，应将韧性城市的理念与适应气候变化相结合；内容制定上，需要增加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并将评价结果整合到基础设施选址布局、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形态引导和调控、地方法规政策创新以及与现有规划的整合协同等规划内容中；技术方法上，需要加强情景规划、动态循环调整、社区参与等规划方法的运用。此外，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这一研究领域欠缺学科交叉，研究尺度和研究对象不完整；未来还可以从气候变化对空间影响的评估，能适应气候变化的理想的空间结构、格局、形态特

征，国外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最佳实践，以及空间规划随气候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的合理化合法化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内容；方法；研究进展

**引文格式：**杨柳青，陈雯，吴加伟，等. 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研究进展：内容和方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96-103. DOI: 10.19830/j.upi.2019.164.

气候变化给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随着对解决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城市安全问题的重视，空间规划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已经被广泛接受。本文聚焦“如何将气候变化整合进空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通过文献追踪，从目标制定、内容制定、技术方法三个维度出发，综述国内外城市区域各尺度下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以期补充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完善空间规划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提供政策参考。

**1 目标制定维度**

应将韧性城市的理念与适应气候变化相结合，不同研究领域关注点各异。

- 城市生态领域：生态安全、宜居的城市，可持续的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布局与空间形态。
- 城市规划领域：在规划程序中纳入不确定性风险，思考增强气候韧性的空间策略。
- 城市治理领域：包容性的决策过程，鼓励在规划过程中开放对话。
- 城市社会领域：反映各阶层的空间发展诉求，体现“生态民主”，关注非正式社区和弱势群体。

**2 内容制定维度**

增加气候变化影响评价，回答“在哪里适应”以及“适应什么”，并将结果整合到以下几方面。

- 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空间选址趋利避害、建立防护设施、多元布局形式，以及更加灵活的应急管理。
- 生态空间布局优化：通过城市生态要素的保护、恢复与重建，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空间形态引导和调控：宏观布局适应地域

气候特征，通过通风、降温、驱散污染的城市设计调节局部气候环境。

- 地方法规与激励政策：匹配自身发展阶段，借鉴欧盟的《洪水指令》《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美国《清洁水域法案》，澳大利亚《海平面上升规划指南》《海洋房地产管理法》等。
- 规划的整合与协同：通过主流化（mainstreaming）促进适应气候变化与现有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减少规划之间的重复和矛盾；通过双赢策略（win-win strategies）为适应提供广泛的政治支持和实施保障。

**3 技术方法维度**

- 加强情景规划

为什么？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行为具有情景依赖的特征。

如何做？气候变化影响评价阶段，通过设置若干种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情景，帮助决策者考虑不同气候情景对空间开发适宜性的影响，对未来的空间选址布局提前做出适应性调整。适应方案的识别和评估阶段，通过将备选方案分别代入到相应情景中进行“预演”和“测试”，辅助决策者识别出必须要执行的“无遗憾”适应选项（no regret option）和需要权衡排序的“低遗憾”适应选项（low regret option）。

- 进行规划动态循环调整

为什么？气候变化对区域影响的规模、位置和强度会不断变化，故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也需要动态调整。

如何做？“动态适应性政策途径”（dynamic adaptive policy pathways）决策方法，使用瞬态情景表示各种不确定性及其演化方向，预测并纠正适应行动，以降低系统脆弱性和利用机遇，描述不同评

估标准下的最佳适应路径，并通过监测反馈、采取修正行动使计划始终保持在首选适应路径的轨道上。

- 运用社区参与规划方法

为什么？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可以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需求，充分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提升规划决策科学性、适应行动可

持续性。

如何做？规划师致力于开发社区参与平台，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民主协商平台。例如：社区会议或讲习班（community-based workshop），基于情景的参与式景观规划（participatory scenario-based landscape planning），“社区共识会议模型”（neighborhood consensus conference model）。

## 响应公共健康的美国城市规划教育：历史、培养模式与启示

李志明 姚瀛珊 宋彦

**摘要：**培养具有公共健康意识和知识技能的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对于我国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三个历史阶段简要梳理和回顾了 20 世纪以来美国城市规划教育界对公共健康的认知以及专业人才教育培训的响应历程；并以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为例，阐述了其在联合教育培养模式、教学体系和课程内容方面的实践经验，揭示了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联合教育的国际发展趋势与前景，力求为我国培养这一跨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城市规划；公共健康；历史；联合教育；启示

**引文格式：**李志明，姚瀛珊，宋彦. 响应公共健康的美国城市规划教育：历史、培养模式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04-113. DOI: 10.19830/j.upi.2019.114.

面对方兴未艾的健康城市建设，在进一步整合城市规划和公共健康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方法基础上，培养面向这一跨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对我国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哈佛大学为首的一批美国规划院校其实早在二战后就开始反思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美国规划院校在培养具有公共健康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方面已形成了多样化的教育模式，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总体来看，响应公共健康的美国城市规划教育经历了起步（20 世纪初—1930 年代）、发展（1940 年代—1970 年代）、多元化（1980 年代—2010 年代）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只通过非常有限的课程向学生传授公共健康方面的知识，旨在增强城市规划工作者对公共健康领域立场的了解和合作以协调城市建设。

第二阶段，美国城市规划教育开始积极响应城市发展实践中的公共健康需求，通过课程、研究项目、学术会议和研究方向等多种途径向学生传授公共健康领域的相关知识。

第三阶段，美国城市规划教育界逐渐形成了课程、讲座、研究方向和双学位等多元化的联合教育模式。这一响应历程也恰好证实了美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与规划实践和政府项目密切相关，同时规划教育中健康规划的出现，促进了城市规划学科领域的专业化。

目前，美国“规划与健康”联合教育已经形成了双学位、硕博研究方向和相关项目或课程三种模式，且都是在偏社会科学或综合型的规划院系开设。截至 2014 年，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的 105 所院校中有 40 所美国规划院校开设了“规划与健康”联合教育项目，其中 15 所设置了双学位，14 所设置了硕博研究方向，17 所开设了与公共健康相关的项目或课程。本研究选取了课程体系相对完善、

办学历史较悠久的 4 所院校：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响应公共健康的美国城市规划教育的教学体系与特色（表 1）。

与国际城市规划教育界风生水起的理论研究和多元化联合教育相比，国内城市规划教育界对公共健康问题的响应显得有些迟钝，对这一跨学科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问题还鲜有研究，鉴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公共健康面临的严峻形势，亟待探索响应

公共健康的中国城市规划教育模式。在我国 50 所已通过专业评估的城市规划院校中，提供公共健康硕士学位的 10 所院校可以根据自身发展优势，整合校内资源和教学力量，率先尝试为城市规划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开设公共健康研究方向，或开设相关项目与课程，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然而，受我国研究生学位制度的制约，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硕士双学位项目尚未在我国开展。

表 1 美国 4 所规划院校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双学位项目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 学校名称 | 哥伦比亚大学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南加州大学                       |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
|------|--------------------------------------------|-----------------------------|-----------------------------|---------------------------------------------------|
| 学位体系 | MSUP-MPH                                   | MCP-MPH                     | MPL-MPH                     | MCRP-MPH<br>MCRP-MHA<br>MCCRP-MSPH                |
| 院系隶属 | 建筑、规划、历史保护学院<br>梅尔曼公共健康学院                  | 城市与区域规划系<br>公共健康学院          | 索尔普莱斯公共政策学院<br>凯克医学院        | 城市与区域规划系<br>健康行为系<br>健康政策与管理系                     |
| 实践要求 | 第二年在公共健康学院的秋季、春季两个学期学习                     | 暑期实习                        | 200 小时规划实习<br>健康提升跟踪实习      | 健康学位：12 周实习                                       |
| 学时   | 5 学期                                       | 3 年                         | 3 年                         | 3 年                                               |
| 学分   | 城市规划：45<br>公共健康：39<br>共计：84                | 城市规划：36<br>公共健康：42<br>共计：78 | 城市规划：36<br>公共健康：43<br>共计：79 | MCRP-MPH：89/81<br>MCRP-MHA：81/79<br>MCCRP-MSPH：81 |
| 备注   | 1、2、5 学期在建筑、规划和保护研究生院学习，3、4 学期在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学习 | 参加健康城市计划以及健康影响评估项目          | 规划专业学生在第一学年申请双学位            | —                                                 |

资料来源：各院校官方网站

城市代谢导向下的荷兰可持续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探析

高晓明 王志鹏 赵继龙 毛晓天 刘长安

**摘要：**目前，城市代谢这一源于生态学的概念已逐渐渗透至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并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城市生态危机的关键手段。面对此新兴议题，荷兰较早地展开了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并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果。因此，在解读荷兰城市代谢理念缘起和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代谢应用研究的归类和总结，提出基于物质流分析的空间优化、基于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整合以及基于循环代谢机理的潜力发掘理念和方法，从而为我国生态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城市代谢；城市规划与设计；资源循环代谢；物质流分析；城市生态系统

**引文格式：**高晓明，王志鹏，赵继龙，等．城市代谢导向下的荷兰可持续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探析[J]．国际城市规划，2020(4): 114-123. DOI: 10.19830/j.upi.2018.534.

## TOD 战略下的综合开发土地整备实践——以上海、深圳和东莞为例

杨家文 段阳 乐晓辉

**摘要：**土地整备工作是 TOD 综合开发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然而，国内大部分城市都缺乏相关具体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结合上海、深圳和东莞的探索实践，将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分为增量开发和存量开发两种类型：在增量开发类型中，关注未批让土地一级使用权的取得以及车辆段（停车场）的复合利用；在存量开发类型中，对已批未建用地的协议调整和轨道沿线的更新改造进行研究和总结。文章为其他需要开展综合开发的城市进行土地整备工作提供了可参考的实施路径选择。

**关键词：**公交导向开发；土地整备；增量开发；存量开发；城市更新

**引文格式：**杨家文，段阳，乐晓辉. TOD 战略下的综合开发土地整备实践——以上海、深圳和东莞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24-130. DOI: 10.19830/j.upi.2018.190.

实施公交导向开发（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市发展共识。围绕轨道交通推进 TOD 能够为我国城市创造多样的价值，其要点之一是通过交通投资使得土地和物业增值。该过程应遵循的一个逻辑是：谁创造价值，谁就应该成为受益人。按照这一逻辑，将地产溢价反哺于公共交通运营和建设，需要政府具有前瞻性地将土地攥在手里，掌握开发建设的主动权并创造具有价值的设施，从而进行开发收益的再分配。

我国轨道交通建设早年以满足客流需求为主，周边大多是已建成的用地，难以推进 TOD 开发。政府在 TOD 开发项目中没有土地，也难以推进土地溢价回收。近年来，各地地铁开发建设均开始借鉴国外海外的一些开发和溢价回收经验，同时为 TOD 试行土地整备（land preparation）。

按待整备土地的现状分类，可以简单地将地块分为增量和存量两类。一般地，空地、集体用地是相对来说比较直观的增量土地整备来源，车辆段上盖则是较有想象力的增量开发空间。已批未建的存量用地可以通过用地或开发量调整置换出土地，而城市更新可谓是“无中生有”的存量手段。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的急剧消耗，城市更新和综合

整治将成为城市建设的新常态，因此这一土地整备来源也需要被重视。

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土地整备，都需要克服制度障碍以获取土地。其基本矛盾在于，直接划拨的公共设施用地不可以用于物业开发，想要用于开发的用地不能够直接划拨到地铁集团手中。我国各地政府在实践中，灵活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政策配套克服了这一困难，完成 TOD 开发土地整备工作。

通过对上海、深圳和东莞的经验归纳，我们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对于站点周边未批让土地，地铁集团获取开发权的方式有定向招拍挂、土地作价出资、协议出让和授权经营四种方式可供参考，各城市根据自身土地资源、融资需求等实际情况来确定合适的选择。（2）对于车辆段用地，立体空间的使用权分割和获取是关键，这类项目应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并制定相对完善的制度规范开发行为，使得这类开发能够常态化。（3）对于存量开发，需要摸查具有开发潜力的已出让用地，腾挪和调整用地所有权，捕获由轨道交通建设带来的溢价。（4）TOD 综合开发项目与城市更新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依靠城市更新项目获取土地受到更为复杂的政策影响，应尽可能在项目选址阶段提前推进。

## 轨道交通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的整体管控

刘泉 史懿亭

**摘要：**TOD 规划强调塑造集约紧凑的空间形态，但不同实践中的实际形态各不相同。在 TOD 规划管理中，

开发强度管控是促进轨道站点地区紧凑集约开发的重要方法，可以划分为四个步骤，包括整体视角的 TOD 密度分区，TOD 节点内外的差异化强度管理和容积转移，TOD 节点内部不同圈层的分区分类差异化控制，以及 TOD 规划的容积奖励等。通过对上述方法进行总结，本文提出 TOD 规划应该在空间上重视开发强度管控的整体性，在时序上因应阶段性发展需求重视开发强度管控的针对性，并在机制上进一步重视构建完善的规划管控机制的综合性，以促进 TOD 规划紧凑形态布局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公交导向开发；城市形态；开发强度；容积率；规划管控

**引文格式：**刘泉，史懿亭. 轨道交通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的整体管控[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31-137. DOI: 10.19830/j.upi.2017.597.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管控工作重要而敏感。特别是在城市整体层面，开发强度管控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影响重大。笔者在规划实践工作中，多次听到规划管理部门的领导及管理人员提出与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管控相关的问题，如在珠三角地区的城际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建设中，部分规划管理部门的领导即质疑，为什么很多站点建成之后会呈现围绕一个孤零零的综合体的小节点与一大片农田相邻的局面？为什么很多方案与 TOD 规划描绘的婚礼蛋糕状的中心高、四周低的理想模式不同？这些实践是否符合 TOD 规划的原则，能否发挥预期的规划效果？笔者也遇到过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大建快上的背景下，轨道选线并不怎么考虑开发强度提升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了 TOD 开发的价值。这些问题关注的核心是开发强度或容积率，开发强度应该如何管控，达到什么效果，值得深入思考。

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的 TOD 规划中，并非所有实例都表现为卡尔索普描绘的标准模式，而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强度分布形态，包括巴西库里蒂巴的 BRT 沿线形成的高强度开发的 TOD 廊道以及新加坡新市镇 TOD 开发形成的外高内低的阶段化发展形态等。这些形态均与 TOD 的标准模式形态不同，这些差异不仅仅是规划设计的

直接结果，也与开发强度管控的政策和模式密切相关，体现了不同的规划意图。

基于上述认知，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发现 TOD 规划中开发强度管控的方法多样，既有城市层面 TOD 规划与密度分区规划的结合，又有单独依托 TOD 规划进行开发强度引导的尝试，还有进行容积率转移和奖励等方法创新。

因此，笔者尝试总结城市层面 TOD 规划的开发强度整体管控方法，将其划分为四个步骤，即：整体视角的 TOD 密度分区—TOD 节点内外的差异化强度管理和容积转移—TOD 节点内部不同圈层的分区分类差异化控制—TOD 规划的容积奖励，以便为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工作提供方法借鉴。

总体上，TOD 规划的开发强度管控涉及空间组织、时序安排和机制设计等多方面要素的影响。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为了使 TOD 规划建设中的开发强度管控要求得到落实，规划管理部门应该构建系统的开发强度规划管控技术方法作为保障，充分重视不同空间尺度下开发强度管控的整体性、不同时序下开发强度管控的针对性以及现有规划管理体系下调控机制的综合性，从而促进 TOD 规划理想目标的实现。

## 美国生态村的建设实践

倪剑波 宋彦 闫整 赵虎

**导读：**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推向历史性高度，从战略层面确立了未来乡村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当前，我国正进行大规模的生态村建设，对国外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埃斯俄文(Earthaven)生态村、纽约州的伊萨卡(Ithaca)生态村、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Los Angeles)

生态村以及田纳西州的“农场”（The Farm）生态村作为案例，从生态产业运营、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社区营造和生态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总结美国生态村建设经验，以期为我国生态村建设提供参考。

**引文格式：**倪剑波，宋彦，闫整，等. 美国生态村的建设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47-151. DOI: 10.19830/j.upi.2017.536.

根据全球生态村网络（GEN: 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定义：“生态村是理念化的、传统的或城市社区，通过本土化、全过程的参与方式，全面整合经济、自然、社群和文化等可持续发展要素，以促进社会进步与生态恢复”。从全球范围看，当前尚无公认的生态村建设标准，其被认为是一种朝向理想目标不断演进的新型动态社区。

近年来，我国正进行大规模的生态村建设实践，多采用“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美化和村庄整治建设措施。与之不同的是，国外众多生态村建设则是一种自下而上、“草根式”（grass roots）的生活选择。

我国生态村建设虽与国外存在诸多差异，但其价值导向都是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健康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美国生态村是全球生态村的代表，借鉴其建设理念和实践经验，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生态村建设内涵，从生态产业运营、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社区营造和生态文化教育四个方面，选取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埃斯俄文（Earthaven）生态村、纽约州的伊萨卡（Ithaca）生态村、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Los Angeles）生态村以及田纳西州的“农场”（The Farm）生态村等实例，通过调研访谈和文献查阅的方式，总结其建设实践经验。

北卡罗来纳州的埃斯俄文生态村基于经济生

态建设导向，借鉴永续栽培的设计理念，力促农业种植高效化；发展绿色小微经济，打造三产循环链条化；推广多元有机生产，满足产品供应自足化，以创造一个具有自我维持和演化能力的生态住区。

纽约州的伊萨卡生态村基于自然生态建设导向，利用合作居住（co-housing）形式组织建筑紧凑布局，又通过分区保护与修复措施、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适宜的建筑技术等方式，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降至最低。

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生态村基于社群生态建设导向，借助良好的基础条件，实行多元混合的股权合作制度、全程参与的共识决策机制、共享集约的绿色生活方式，将生态村营造成为氛围和谐、资源节约、健康乐活的生态社区。

田纳西州的“农场”生态村基于文化生态建设导向，采用盖娅教育（Gaia education）体系进行宣传教育，利用环保意识培养、绿色行为体验、生态价值观塑造等方式，将生态村的建设提升到了生态文化层面。

总体来看，美国生态村建设是以生态产业发展为支撑，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以生态社区营造为抓手，以生态文化教育为保障，整合了经济、自然、社群和文化等可持续发展要素，形成的一种和谐、健康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 柏林—勃兰登堡大都市区轨道交通演变

卜义洁 张尚武

**导读：**轨道交通作为一种运量大、能耗低的公共交通模式，在大都市区发展中具有疏解人口、支撑空间结构的重要作用。柏林—勃兰登堡大都市区的轨道交通综合性能突出，轨交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对同步，线路网络覆盖地域广、层次多，与柏林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契合度高。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柏林轨道交通系统受不同影响要素引导发挥相应作用，可为我国大都市区发展提供参考。

**引文格式：**卜义洁，张尚武. 柏林—勃兰登堡大都市区轨道交通演变[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52-155.

DOI: 10.19830/j.upi.2018.200.

## 美国尤金市单行道系统应用

王波

**导读：**中小城市紧凑的街道空间与快速增长的机动车出行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味拓宽道路造成了街道空间环境被破坏、大宽马路穿城等问题。本文以美国尤金市的单行道应用为例，从单行道的历史起源、层级和功能、建设经验、延伸影响等方面探索其应用的成功经验，以期为我国中小城市的规划建设和交通发展提供实例借鉴。

**引文格式：**王波. 美国尤金市单行道系统应用 [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4): 155-158. DOI : 10.19830/j.upi.2018.317.

## 2020年第5期文章目录

### 本期主题 德国乡村内生型发展与功能活化

格哈德·汉克尔, 著; 马媛, 译; 干靓, 钱玲燕, 校译 / 德国村庄的历史与现状

钱玲燕, 干靓, 张立, 蒋薇 / 德国乡村的功能重构与内生型发展

霍尔格·马格尔, 著; 董菁, 译; 钱玲燕, 校译 / 乐乡、愁乡亦或兼而有之?

——论城乡生活条件等值化

干靓, 钱玲燕, 杨秀 / 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测评——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实践与启示

克里斯廷·戈特, 蒋薇, 丁宇新 / 内生型发展导向下德国乡村地区存量空间的潜力激活

——以巴登—符腾堡州 MELAP 项目为例

托马斯·布特纳, 孔洞一 / 文化景观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认知、方法与实践

玛塔·岛乐·巴扎地, 孔洞一 / 城乡融合的营造实验

——德国国际建筑展图林根州“未来城市化乡村”项目

### 城乡研究

陈洁 / 西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以伦敦和悉尼为例

董玉萍, 刘合林, 齐君 /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

吴一洲, 杨佳成, 陈前虎 / 健康社区建设的研究进展与关键维度探索——基于国际知识图谱分析

刘红萍, 李剑峰, 安东尼·沃德 / 发达国家合作性住房研究进展与启示

杨洁莹, 张京祥 / 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资本下乡”利益格局检视与治理 策略

——江西省婺源县 H 村的实证研究

### 规划研究

姚瑞, 于立, 陈春 / 简化规划程序, 启动“邻里规划”——英格兰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李冬雪, 王兴平, 柏露露, 刘诗芳 / S-CAD 政策评估方法在城乡规划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 实践综述

陈泳, 吴昊 / 让河流融于城市生活——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蒋正良 / 何塞普·路易斯·塞特的国际建筑组织活动和城市理念



2020年 第5期

## 德国村庄的历史与现状

格哈德·汉克尔 著 马媛 译 干靓 钱玲燕 校译

**摘要：**与 200 年前的传统村庄相比，德国现今的典型现代村庄在村庄风貌、社会及经济结构、基础设施、村镇自治、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村庄共同体中的高参与度、合作互助和亲近自然等传统得以保留。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对德国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规划政策在近 20 年间发生了范式转变，由集中式、标准化、“自上而下”命令式的理念转变为内生型、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乡村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与城市具有同等价值且互相依赖，构成利益与责任共同体。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共存至今仍是德国重要的国家目标。

**关键词：**传统村庄；现代村庄；村镇自治；城乡生活条件等值；空间规划；地方政策；乡村发展；区域管理的民主性

**引文格式：**格哈德·汉克尔. 德国村庄的历史与现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1-5. DOI: 10.19830/j.upi.2020.320.

作为本专辑的第一篇文章，《德国乡村的历史和现状》一文由被称为“乡村教皇”的德国著名乡村研究专家格哈德·汉克尔（Gerhard Henkel）教授所著，这是他的文章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呈现给读者。在这篇文章中，汉克尔教授对近 200 年来德国村庄的发展历程做了细致的梳理，比较并归纳了传统村庄与现代村庄的差异与共性，为我们展现了德国村庄的全貌。

在过去 200 年间，德国传统乡村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经典的“村庄”定义已无法涵盖现代乡村所囊括的社会及文化内涵。在 1800 年前后，传统乡村尚未进入现代转变时期，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农民和封建领主之间牢固的劳务一租佃关系基本阻断了阶级跃升通道；农业和林业是乡村经济的核心，手工业多作为农业的补充，乡村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模式由此得以形成；当时的基础设施尚在起步阶段，水源及能源的供给多依靠当地资源；政治上施行村镇自治，乡村协会已经产生，不同地区的治理方式及水平差别很大。

如今，德国乡村在经济、社会及乡村风貌上经历了巨大变迁，传统的农业社会已不复存在，现代乡村与传统乡村之间的共同点寥寥无几。当代的农业活动主要由建于 1955—1975 年间的移民农庄经营，村内就业岗位大部分消失，基础设施虽数量大减，但科技含量大大提高，体育、休闲及文化设施建设取得成功。虽然村镇自治被打破，身份认同消

失，但村民仍积极参与村庄事务，乡村协会、紧密的亲缘关系、邻里联系及社交圈依旧存在。另外，现代乡村更为开放，村民成为环游世界者。然而，村庄共同体中的高参与度、合作互助和亲近自然等传统在现代乡村中得以保留。

德国乡村的发展受到政策的极大影响。如今，乡村失去自治权，由联邦和联邦州远程治理，德国空间规划及各种专项政策也对乡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下列四种空间规划工具对乡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分别促成了正式的空间划分：中心地概念（Zentrale-Orte-Konzept）、居民点与发展轴（Siedlungs- und Entwicklungsachsen）、优先区与更新区（Vorrang- und Sanierungsgebiete）、空间划分与区域类型（Raumgliederungen beziehungsweise Gebietstypen）。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德国空间规划并未有效解决优势与弱势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因而，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德国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规划政策在近 20 年间发生了范式转变，由集中式、标准化、“自上而下”命令式的理念转变为内生型、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内生型发展”在 1990 年德国空间规划报告中首次出现，如今更是成为官方理念；2006 年发布的新版《德国空间发展理念和行动战略》将“保护和塑造增长型文化景观”作为空间规划的重要宗旨，从而赋予了乡村空间以中心地位。要实现这些理念，

联邦需要给予区域及地方政策更大的发挥空间。

乡村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经常被低估。而事实上，乡村不但为全社会提供了高价值的文化景观、商品及食物，也为全社会及大城市提供了贴近人与自然的生活方式。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而言，城市和乡村具有同等价值且互相依赖，二者构成了利益及责任共同体。在德国，为所有区域创造等值的生活

条件已经成为政治宗旨，被写入了《基本法》以及联邦和各联邦州的《空间秩序法》中。这意味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区域都应得到国家同样的尊重和认可。国家和社会将从城乡之间的交流、互相给予和接受中获益。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共存至今仍是德国重要的国家目标。

## 德国乡村的功能重构与内生型发展

钱玲燕 干靛 张立 蒋薇

**摘要：**德国乡村经历了长时间的功能重构，通过落实内生型发展理念，提升乡村空间质量，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减少土地消耗，从而确保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梳理了 21 世纪以来德国乡村多元功能的重构特征，分析内生型发展政策的产生背景、法律框架、调控工具和促进项目。最后，基于德国内生型发展的经验总结，为我国当下的乡村振兴和乡村规划工作提供启示。

**关键词：**乡村地区；功能重构；内生型发展；德国；调控工具；公众参与

**引文格式：**钱玲燕，干靛，张立．德国乡村的功能重构与内生型发展[J]．国际城市规划，2020(5): 6-13. DOI: 10.19830/j.upi.2020.341.

伴随着我国乡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地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乡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大量宅基地闲置浪费。与此同时，乡村的农业生产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的服务功能也在衰退。乡村功能处于重构进程中。德国的乡村在土地整理、村庄更新、自然保护、城乡融合以及社区营造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期以来被其他国家广泛学习和借鉴。二战后，德国的乡村发展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历程，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耕作模式的变革使乡村的功能从二战后以粮食生产为主逐步发展为满足生态、文化、休闲旅游等多元需求。本文梳理 21 世纪以来德国乡村多元功能的重构历程和特征，分析由此带来的村镇中心萎缩、房屋空置以及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在此基础上，阐释德国乡村内生型发展政策的产生背景、法律框架、调控工具和促进项目，提出对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规划工作的启示。

21 世纪以来，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带来了农业生产模式和农民从业模式的转型，引发了德国乡村多元功能的重构。目前，德国乡村主要具有生活居住、

就近就业、休闲旅游三方面的功能。乡村功能的重构使得乡村就业模式发生改变，低出生率、老龄化及部分地区人口的流失又进一步影响了乡村的发展，由此带来本地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减少，以及基础教育、文化和体育设施的减少，随之引发失业率持续增长、区域发展丧失活力等连锁反应。乡村功能的转型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德国不同的乡村地区也呈现出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村镇中心的萎缩、房屋空置、公共服务的就近供给不足等三方面。

为应对乡村功能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下的问题，德国乡村更新的重点逐渐调整为提升空间品质的内生型发展（Innenentwicklung）。内生型发展是指“改善内部存量的质量，同时限制居民点向外部边缘地带扩展”。在此过程中，核心目标兼顾量和质两个层面，旨在通过激发城镇内部区域和其他建成区域的使用潜力，促进城镇在建设、功能和社会方面的发展。

有效的乡村内生型发展需要明晰的思路和科学合理的方案。对此，德国的村庄改造行动方案通常包括战略层面和实施层面两部分内容，并且配合

多种调控工具。在战略层面，其调控工具主要是村庄发展构想；在实施层面，其调控工具主要包括规划、用地管理、建造设计及保护。此外，组织形式方面的调控工具主要是参与式规划，以及建构跨村镇的合作网络。

尽管中国与德国的乡村发展阶段和差异很大，乡村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环境也不尽相同，但两国乡村社区都面临着乡村功能重构趋势下的人口流失、经济活力丧失、村庄衰败等问题。德国的经验主要带给我们三方面的启示。

首先，内生型发展需要多层级的乡村政策框架支撑。德国乡村地区内生型发展政策体系由欧盟、联邦、联邦州、地方等各层级共同协商推动。欧盟和联邦层面主要明确规划和发展的逻辑与目标，联

邦州和地方在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方案和措施方面具有较为充足的空间；

其次，内生型发展是综合性管理任务，需要有相应的调控工具。德国为内生型发展的实施配备了比较全面的调控工具，各联邦州也针对自身实际问题研发了针对具体实施层面的适用工具。合理选择并运用此类工具是有效推进内生型发展的重要保障。

最后，公众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内生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内生型发展要求战略性、小规模的方法步骤，只有获得土地产权所有人和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并激发“自下而上”的创新，才能有效实现目标。

## 乐乡、愁乡亦或兼而有之？——论城乡生活条件等值化

霍尔格·马格尔 著 董菁 译 钱玲燕 校译

**摘要：**关于德国城乡生活等值化的讨论备受瞩目。德国巴伐利亚州凭借其空间公平性模型提出了基于伦理基础的科学提案，特别是着力加强受危害乡村地区的发展。现今，重中之重在于承诺之后是否采取了连贯的客观上可理解且可评估的行动，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体味乐趣丛生的乡村生活，而非对乡村失望或逃离乡村。如此，该政策才可能在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时代符合人们心中所期许的对减速空间与共鸣空间的需求，因为这些空间给人们带来安全感。乡村管理与发展将成为推动社会潜力的手段。

**关键词：**乡村空间；城乡生活条件等值化；空间公平性；减速；共鸣乐土；乡村发展；村庄更新；社会潜力；家园

**引文格式：**霍尔格·马格尔. 乐乡、愁乡亦或兼而有之？——论城乡生活条件等值化[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14-22. DOI: 10.19830/j.upi.2020.290.

## 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测评——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实践与启示

干靓 钱玲燕 杨秀

**摘要：**科学评测乡村发展活力，研判乡村发展问题，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有着重要意义。德国巴伐利亚州食品农林厅乡村发展管理局推出的乡村活力测评新工具——“以内生型发展目标的村镇活力测评”（简称“村镇活力测评”），旨在基于全面客观的评价，为地方政府与规划师制定村庄更新、乡村社区发展及跨地域社区间联系的前瞻性策略提供依据。本文以巴伐利亚州乡村发展新趋势作为村镇活力测评推出的背景，详细介绍村镇活力测评的工作任务、测评范围、内生型发展潜力识别及评价指标与结果表达，以跨村镇联盟“上韦恩河谷”（Oberes Werntal）为例分析村镇活力测评的应用成效，总结巴伐利亚州乡村活力测评工具的经验，提出对中国乡村活力测评及激活策略的启示。

**关键词：**村镇活力测评；内生型发展；土地管理数据库；发展潜力；供应；巴伐利亚；上韦恩河谷

**引文格式：**干靓，钱玲燕，杨秀. 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测评——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实践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23-34. DOI: 10.19830/j.upi.2020.286.

保护和激发乡村活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取向。目前我国自然资源部正组织开展中国乡村活力评价研究，科学评测乡村发展活力，研判乡村发展问题，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有着重要意义。

21 世纪以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乡村发展面临着人口数量与结构转型、用地模式变化、气候变迁威胁、基本服务供给萎缩、基础设施成本上涨等新挑战，内生型发展逐渐成为核心议题。2006 年，该州针对其乡村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推出了一套名为“以内生型发展目标的村镇活力测评”

(Vitalitäts-Check zur Innenentwicklung für Dörfer und Gemeinden, 简称 Vitalitäts-Check[村镇活力测评])的新工具,该工具的工作步骤由四个阶段构成:

(1)确定基础数据;(2)记录内生型发展潜力;(3)图文表达;(4)评价和提出行动可能性。基础数据和内生型发展潜力由村镇政府独立收集,主题领域的数据库主要来源于巴伐利亚州环境厅土地管理数据库中已存储的公开数据。规划师的作用主要在于利用专业知识解释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专题制图和综合评价,并提出可能的行动方案。

巴伐利亚州乡村发展管理局公布的操作指南对衡量内生型发展潜力的研究空间进行了界定,并将乡村内生型发展的潜力空间按照来源分为四类:

(1)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萎缩或转换空间;(2)既有住宅和公共建筑;(3)建筑间空隙、闲置地和建设未饱和地块;(4)未来高空置风险物业四类,通过对土地管理数据库信息的识别划定其具体的潜力空间信息类别,分别在管理、人口、用地、供应与可达性、公众参与、经济与就业六大主题领域,对村镇的内生型发展进行测评。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村镇活力测评可以快速、客观地概述本地结构、功能和社会状况,为地方决策者提供翔实的决策辅助数据,针对房屋空置和建筑间空隙建设等问题提供差异化策略,同时有针对性地建设引导规划和举措,实现内生型发展。巴伐

利亚州下弗兰肯(Unterfranken)行政区的跨村镇联盟“上韦恩河谷”(Oberes Werntal),长期致力于内生型发展,遵循优先利用地方建筑空隙及空置房屋的原则,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村镇活力测评作为一种以测评和激发乡村内生型发展活力为目标的工具,通过全面客观的评价,为地方政府和规划师制定村庄更新、乡村社区发展以及跨地域乡村社区间联系的前瞻性策略提供依据,对中国乡村发展活力测评及激活政策制定具有如下启示。

(1)超越物质空间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不拘泥于物质空间环境,除了对内部资源的挖潜,还提供了涵盖社会服务、经济产业、公众参与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强调乡村“自下而上”内源动力要素的发掘和培育。本地设施供给可夯实乡村生活基础,良好的企业营商环境可吸引更多居民留驻和就业,而广泛且深入的社会参与可激发居民对于乡村建设的浓厚兴趣,从而给乡村建设无尽的动力。

(2)充分挖掘潜力空间资源。严格遵循联邦与州确定的“内生型发展优于外延型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对乡村用地和房屋资源的详细清查和盘点,在不增加新建设区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存量潜力空间,也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空置风险空间位置,以详细的类别记录在土地管理数据库中,为乡村盘活既有资源,实现精明收缩提供物质空间基础。

(3)重视乡村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可达性。服务与可达性占据了村镇活力测评指标体系的最大份额。幼托、小学、足球场、面包房、肉铺、药房和生活必需品零售商店作为日常生活设施,是德国巴伐利亚乡村和镇区能否留住居民的关键。在实地调查中还发现某些村镇为了保障本地中小商铺的存活,营造良好的本地企业经商环境,不允许大型超市入驻,同时也鼓励本地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动力。

(4)建构基于数据库的乡村科学决策平台。基

于巴伐利亚州环境厅的土地管理数据库中的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自行研发的乡村活力数据库进行评价，为乡村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编制乡村规划和区域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乡村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薄弱地区，更需要在国家推行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契机下，充分整合政府相关部门的数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构建一套适合中国的乡村活力数据库，为科学编制乡村空间规划和合理实施精细治理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 内生型发展导向下德国乡村地区存量空间的潜力激活——以巴登—符腾堡州 MELAP 项目为例

克斯廷·戈特 蒋薇 丁宇新

**摘要：**相比以德国东部为代表的人口收缩地区，位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经济分布虽整体上较为合理，但现阶段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乡村经济结构重构、村镇中心空心化、传统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以及生活品质降低等新的发展趋势和挑战，而这促使现有的政策条文相应发生改变，并催生出了新的战略措施。为了应对乡村发展的新问题，巴登—符腾堡州乡村地区和消费者保护部近年推出了“通过激活内部空间潜力减少土地开发的示范项目”（MELAP），旨在通过盘活村镇中心存量空间来吸引本地居民回归，提升村镇生活品质并激发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本文通过探究 MELAP 的由来、目标和实施，并以米歇尔巴赫村为例进行成效分析，阐述内生型发展对激活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存量空间潜力可能产生的作用，以期为中国乡村地区存量空间发展开拓思路，提出建议。

**关键词：**内生型发展；乡村地区；巴登—符腾堡州；MELAP；米歇尔巴赫村

**引文格式：**克斯廷·戈特，蒋薇，丁宇新. 内生型发展导向下德国乡村地区存量空间的潜力激活——以巴登—符腾堡州 MELAP 项目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35-44. DOI: 10.19830/j.upi.2020.328.

虽然中德两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城镇化水平、城镇结构体系，以及城镇和乡村地区规模都有较大差异，但乡村地区都具有人口老龄化、青壮年人口外移、村镇空心化、经济活力衰退和生活质量下降等现象。因此，本文以巴登—符腾堡州乡村地区和消费者保护部近年推出的“通过激活内部空间潜力减少土地开发的示范项目”（MELAP）为例，通过探究它的由来、目标和实施，结合对示范村之一米歇尔巴赫村（Michelbach）的成效分析，阐述了内生型发展对激活乡村地区存量空间潜力可能产生的作用，以期为中国乡村地区存量空间发展开拓思路。

巴登—符腾堡州共有 1 101 个城市和村镇，其中的 655 个位于乡村地区，占总数的 59%。乡村地区面积占州总面积的 69%，居住人口占州总人口的 34%，就业人口占州总就业人口的 30%。为盘活村镇中心存量空间、提升村镇生活品质，并激发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由州乡村地区和消费者保护部

的“乡村地区发展计划”提供资金，MELAP 项目从 2003 到 2015 年分两期运行。其中在二期的 MELAP PLUS（2010—2015）项目框架中，入选的 14 个示范村中总共审批通过了 214 个项目的实施申请，投资总额约为 3 900 万欧元，其中 760 万欧元为州资助金。

这些项目的实施给示范村带来了质的变化——土地的使用得到了有效控制，诸多空置的建筑物被重新激活并得到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内道路、公共空间以及整个村的吸引力，加强了居民对中心区域的认同感，为其他乡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以示范村“米歇尔巴赫村”为例，这个人口数 510、总面积 2.9 km<sup>2</sup> 的小村在 MELAP PLUS 框架内共有 5 个政府项目和 14 个私人项目得到实施，涉及住房、居住环境、公共机构等不同领域。

其中，村中组织管理机构的改善尤其值得借鉴：

作为 MELAP PLUS 项目的专项议事机构，米歇尔巴赫村特别设置了“开放式村委会”，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共同为该村的发展决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除每月会议外还举办了 11 次专题讨论会，重要的项目在开放式村委会中得到探讨，通过工作坊对其深化，然后在村委会以及村民大会上向公众传达最终结果。此外，大量相关活动的开展有效地加快了公众对该项目的认可和接受、避免了潜在的质疑，同时激发了当地村民对村中历史中心地区的兴趣。由此，学校改建成村民之家、教堂和宫殿周边

公共空间的设计等均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支持。

中国乡村地区近年来也涌现了不少既具地方文化特色、解得了“乡愁”，又使用了现代建筑技术和设计手法的改造和新建项目。这一令人欣喜的发展可采取 MELAP 中所使用的推广手段，得到更好的普及和展示，如在当地节日庆典活动上进行宣传、设立开放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进行展示、组织参观活动等等。在许多中国城镇已经“千人一面”的今天，挖掘本地特色、保护和建设地区文化更是紧迫而长远的任务。

## 文化景观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认知、方法与实践

托马斯·布特纳 孔洞一

**摘要：**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性概念。德国罗恩生物圈保护区的乡村发展策略以文化景观概念为引导，对资源要素进行清单化盘点、识别、描述及评估其要素和结构，并显示其历史景观变化过程。同时，利用“文化景观数据库”技术，每个文化景观信息都会有基于自身特色的发展定位。这些信息强化了关于当地历史和文化的意识，也通过历史和故事、人与风景之间的协调增强了文化认同与社区联系。借助于对文化景观的认知和分析，人们可以对乡村地区所具有的历史、社会和美学的综合性的区域特征达成共识。基于这一共识，以保护和培育文化景观为出发点的乡村可持续性策略、研究项目和经济发展计划在罗恩地区展开，其概念可为中国的乡村发展提供思想和方法上的借鉴。

**关键词：**乡村可持续发展；文化景观；生物圈保护区；清单盘点与区域化；文化景观数据库；地方学习小组；LEADER

**引文格式：**托马斯·布特纳，孔洞一. 文化景观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认知、方法与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45-52. DOI: 10.19830/j.upi.2020.314.

随着“两山理论”的提出，与乡村发展和可持续资源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急需创新。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本文着重从文化景观概念的视角来理解乡村可持续资源这一复杂的跨学科内容，选取德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优秀示范区——罗恩生物圈保护地内的乡村地区为研究案例来阐述该地区乡村发展内在的理论和方法。

文化景观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始终处于变化的过程中。这样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进而作为文化历史发展的一部分而影响景观的感知和审美评价乃至社会经济发展原则。这种变化看似令人难以捉摸，但人们却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对其加以分析，以解释其历史的内在逻辑

与趋势，为潜在的未来发展可能性作出预估。

文化景观概念与罗恩地区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高的研究契合性。罗恩地区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类干预自然的生产利用方式，呈现出高度的本土多样性和不同生态系统的差异化互相作用的特征。这为该区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景观认知研究对象。1991 年，罗恩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与生物圈计划”示范区项目。它是具有环境保护功能、经济开发功能和研究与教育功能的综合性保护与发展地区。

历史性文化景观的收集与分析方法是基于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形态和内涵意义，以一种整体的方法来归纳收集分析文化景观资源的类型、区域划

分和历史演变过程。空间区划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尺度的地区进行空间划分，可以分为区域尺度（比例尺 $\leq 1:50\,000$ ），中尺度（ $1:25\,000 \leq \text{比例尺} \leq 1:5\,000$ ）和小尺度（比例尺 $\geq 1:5\,000$ ）。在不同尺度上，对文化景观的分析也有不同步骤。总的来讲，研究者需要通过文献和信息查询来完成文化景观发展历史的综述性报告；在文化景观历史报告的基础上，以“文化景观要素调查表”为措施来实现“文化景观分类目录”；最后，对文化景观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分区进行描述和评价。

基于文化景观信息库，每个文化景观信息都会有基于自身特色的发展定位。这些信息最终都可以归纳为关于地方性历史和文化、人与风景之间的联系的历史经验上来。在多次公共讨论过程中，人们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构成了具有可持续性的“文化景观意识”，从而影响着规划讨论决策。

罗恩地区的乡村资源保护与利用主要体现在设立维护区和发展区上。罗恩维护区的空间结构是由物种丰富、结构丰富的开放土地和近乎天然森林的大片连续区域所构成的，其间也镶嵌着为数众多的分散式传统农牧业区域和斑块状的村镇建筑。根据其自然保护意义和维护性开放意义，将该区域划分为维护区 A 和 B。维护区 A 强调生态优先的控制性利用；维护区 B 是具有生态价值的区域，但同时对于乡村旅游业也非常重要。发展区位于罗恩地区的最外围，往往是在文化景观资源的评估基础上

与城镇发展规划相结合，特别鼓励保留具有传统特色的经济生产方式。

借助于文化景观数据库可以更加高效地收集、分析信息。罗恩的巴伐利亚片区已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景观数据库项目。例如，（基于 GIS）建立（罗恩）文化景观数据库，整合（罗恩）多维度地情电子地图集，与巴伐利亚州舆情公共数据平台联网；“上法兰克地区开发计划”也利用公共数据平台，发动当地居民的参与来收集、记录和展示历史文化景观的各种资源信息等。

为了确定乡村可持续发展资源及其保护和利用策略，必须确定自然保护和景观管理、乡村发展和区域规划领域的合适的社会协调方案。这样的协调方案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的人与自然协调的共同利益，例如，将产品销售到德国各个城市的生态连锁店；保持传统建筑风格而改建为民宿；兴建有机奶制品加工厂等等。

从德国罗恩地区的案例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可以通过文化景观的视角来认知乡村可持续发展资源；（2）通过“清单盘点和空间区划、步骤流程、公共讨论”等文化景观的分析方法，乡村发展规划可以在科学的框架下进行；（3）这样的文化景观研究在罗恩地区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资源保护与利用、文化景观数据库建立和当地经济发展项目中都有所体现。

## 城乡融合的营造实验——德国国际建筑展图林根州“未来城市化乡村”项目

玛塔·岛乐-巴扎地 孔洞一

**摘要：**秉承百年实验传统的德国国际建筑展在图林根州项目中提出了“未来城市化乡村”的概念。在“再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基于当地的小聚集聚落空间结构特点和老龄化的社会结构，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市不能仅以地理范围来界定，而应该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种城市化的社会状态；乡村与城市的界限可以被打破；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提升生活品质。德国图林根州“未来城市化乡村”项目代表了对定居点与开放空间和资源系统之间的新的协调关系的探索，其试图摆脱过去对固定的城乡关系和依赖全球化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为新的城乡融合的社会发展机制提供可能。本文通过对图林根项目管理及其两个案例项目的讨论，尝试为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提出启示。

**关键词：**德国国际建筑展；未来城市化乡村；分散化城乡聚落结构；营造文化；城乡融合统筹；乡村复兴

**引文格式：**玛塔·岛乐-巴扎地，孔洞一．城乡融合的营造实验——德国国际建筑展图林根州“未来城市化

本文着重介绍的是以“未来城市化乡村”(Zukunft StadtLand)为发展概念的图林根 IBA 项目,这一项目致力于城乡融合的营造实验,提出打破城乡界限,以小规模的聚居结构和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以及社会化组织形式来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在德国中部农业地区基础设施不足和人口流失的城镇萎缩背景下,以乡村与城镇融合发展的模式,呈现创新的发展图景模式。

在 2008 年后,欧洲出现了再城市化过程。一些衰退的中心城市再次吸纳了来自乡村地区由于缺乏就业机会而流入的人口,乡村地区出现了萧条。这一现象在德国图林根州尤为突出。在图林根盆地,分布了众多的历史悠久又各具特色的小城市。这样的背景为发展新型的城乡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个地区不具备典型的城市化所形成的高密度集中化的都市空间结构,而更偏城乡交织的空间结构,只能按照城镇分布密度划分为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地区。这样的空间模式与图林根州复杂的地理环境结合,在不同的空间密度上,呈现出“城市—乡村—景观—连接体”的结构特征。

基于对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反思,欧洲很多城市研究者意识到: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的完全城市化,导致了城市区域不可阻挡地扩张和资源消耗。于是,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的大城市集中性特权,放弃了对乡村的刻板认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人指出: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从未存在过,而只是被现代性思维人为割裂开了,城市与乡村的合作意味着更加精细而微妙和多样的功能网络及其合作与分工的深化。

“未来城市化乡村”概念,即传统的工业与农业劳动界限的消失,传统的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的打破,其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习惯和价值观也会得以重构。由此而产生乡村和城市文化结构以及功能的改良与发展,形成未来城市化乡村的发展模式。

图林根 IBA 项目针对乡村发展问题开展具体的项目试验。例如,为了抑制乡村经济下滑,采取区域管理制度,培育专业技能和开放性文化,发挥员工的创新力量;为了引进人才,采取私营与国有经济协调与合作等措施;为了乡村利益群体的协作制定协作制度和公共参与计划等。在区域与乡村发展计划和研究方面,也可以分步骤完成。IBA 图林根项目的运营需要建立区域网络,制定区域发展概念,并开展项目咨询、项目评估、过程控制、监督,以及项目管理等工作。实践证明,这些项目都取得了良好的城乡融合效应。例如,在图林根核心城镇带边缘的阿波达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人口结构问题而衰退的工业城镇。在这里,IBA 图林根化“空置”为“资源”,将其改造成一处乡村发展孵化器。通过与大学和乡村发展机构紧密合作,开展乡村创意、社区服务、教育培训、餐饮旅馆等,为企业团体和自由职业者提供免费的创意产业办公场所。另外,图林根南部的舒瓦兹河流域具有小型聚落结构和乡土特色浓厚的建筑群和田园景观。在 IBA 的支持下,这里成立了“舒瓦兹河流域未来工作室”,为应对老龄社会带来的高空置率和基础社会匮乏的现象,寻找发展动力和人才吸引力。

IBA 图林根的“未来城市化乡村”项目秉承了德国国际建筑展(IBA)对营造文化的实验传统,对分散化、小聚落结构下的城乡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和实验探索。通过对城乡割裂思想的反思,从城乡空间结构、社会人口和生活品质等方面加以分析,综合城市规划、社会学等学科的哲学思辨讨论,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路。图林根的地理环境和城镇格局为这样的“未来城市化乡村”提供了天然的实验环境,依靠丰富而多元的乡村环境资源,从生活方式、产业创新等方面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依托于 IBA 百年项目实验的传统和现代企业的运营管理制度,对图林根地区的乡村发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规划策略和措施。

## 西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以伦敦和悉尼为例

陈洁

**摘要：**结合文化策略的城市更新已经出现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旧城开发中。西方学者提出了城市更新的改进式、创意式和商业式文化策略，并提出文化策略的四方面主要特征。本文梳理西方相关文献，将文化策略的四方面特征发展为七方面，即：对应的空间类型、所产生的潜在效益、具体目标、参与角色、受益群众、配备的文化项目和设施，以及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结合伦敦和悉尼的相关实践案例，归纳总结城市更新中三种文化策略的具体特征，以期补充现有的理论框架并对中国当前城市更新的文化实践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城市更新；文化策略；改进式策略；创意式策略；商业式策略；西方城市；伦敦；悉尼

**引文格式：**陈洁. 西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以伦敦和悉尼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61-69. DOI: 10.19830/j.upi.2018.343.

结合文化策略的城市更新已经出现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旧城开发中。学者格罗达克和卢凯特-斯德里斯（Grodach & Loukaitou-Sideris）归纳出城市更新的改进式（progressive strategy）、创意式（creative class strategy）和商业式（entrepreneurial strategy）三种文化策略。他们对文化策略分类的标准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特征：目标、配备设施、地理分布和受益群众。本文将格罗达克和卢凯特-斯德里斯提出的文化策略四方面特征扩展为七个方面：对应的空间类型、所产生的潜在效益、具体目标、参与角色、受益群众、配备的文化项目和设施，以及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下文结合伦敦和悉尼的实践案例，对改进式、创意式和商业式三种文化策略的具体特征展开讨论。

改进式文化策略源于 1960 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追求平等权利的公众政治运动，其中文化是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和谋求福祉的载体。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组织，比如以社区委员会的形式向政府和开发商提出改善社区环境、维护居民生活方式和促进邻里和睦等诉求。该策略目前成为政府保障公共福利的重要内容，其重点是为公民提供、维护和争取广泛平等的公共利益，减少经济差距和社会不公。改进式文化策略通常适用于小型的城市更新项目，将废弃的小型码头和厂房改造为城市公共景观空间，比如遗址公园、社区广场、街心公园等；或者再利用为城市公共建筑，比如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社区艺术中心等。该策略的主要实施者是地方

政府和政府文化部门，其目标受益群众是本地普通市民。

创意文化在近 30 年的城市发展中得到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 1980 年代出现的新社会群体和创意文化产业。一方面，新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城市中产阶层和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从业者和创意文化产业者。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加大，并逐渐持有重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创意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地方营销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创意文化产业包括电影和视听艺术、设计与工艺、媒体艺术、音乐表演等产业。创意式文化策略侧重文化效益，其目标为支持城市中产阶级和创意阶层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促进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提高文化经济效益。配备的文化设施有创意产业机构（如艺术家工作室、创意产业公司、文化传媒机构等）、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如画廊、剧院、博物馆、电影院等）和城市休闲娱乐空间（如特色餐馆、咖啡厅、俱乐部等）。埃文斯（Evans）将创意式文化策略的建筑空间分为文化街区（cultural quarters）和创意产业集聚区（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s）两类。文化街区是满足经济较富足的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区域，侧重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以及保护和鼓励手工业。创意产业区是集聚高密度城市创意阶层的区域，侧重创意文化产业和展示城市文化的创造。

商业式文化策略关注经济效益，综合发展文化、商业和旅游产业来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在激烈的城

市竞争背景下，城市企业化已经渗透到各地政府的城市治理和规划中，而文化项目则被视为建立城市品牌、营销城市形象以及加强城市地位的重要手段。当地政府通过一系列城市营销的策略和规划设计，比如建设大型文化设施和旗舰项目、提供高规格的商业综合体、举办大型文化节等，将城市形象营销为“可以去玩的地方”（a place to play）。商业式文化策略的特征是：侧重商业效益，适用于市中心和新区的大型城市更新项目，目标群众为本地经济富足的市民、外地游客和大型企业，推动者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公司以及大型私人房地产公司。国际知名建筑师通常被邀请来设计标新立异的建筑项目和打造高规格的标志性场所，以实现城市营销的效果。最终目的是吸引私人投资项目，推动城市旅游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和增加政府税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此类型的城市更新

备受质疑，虽然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促进城市和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但是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该策略过于重视商业利益，对城市有“象征性的破坏”（symbolic devastation），建筑的巨大尺度和奇特造型与城市的历史文脉格格不入。

伦敦和悉尼的经验表明，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类型和内涵并非能一概而论。文化策略的应用对于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的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城市形象塑造和城市经济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策略的价值内涵体现在社会效益、文化价值和商业利益方面。改进式、创意式和商业式文化策略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容。根据不同的受益群众、主要目标和侧重的潜在效益而采用不同的文化策略，配备相应的文化设施和项目，鼓励不同的角色参与，支持多样化的文化活动。

##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

董玉萍 刘合林 齐君

**摘要：**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城市居民亚健康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具有健康促进功能。因此，近年来有关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成为健康城市领域研究的热点。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包括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影响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以及绿地促进健康的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基于此，文章对当前有关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述评。研究进展表明：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直接因素包括城市绿地的可获得性、可达性和绿地的自身特征，其作用机制包括文化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支持服务。同时，健康效益受到相关调节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并未涉及绿地产生健康效益的完整作用路径，在研究中涉及的指标选取、数据获取、分析方法和研究单元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于采用多源新数据和新的分析技术予以解决。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关城市绿地与健康关系的七个方面问题，在城市规划领域需要进行深入而务实的研究。

**关键词：**城市绿地；居民健康；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引文格式：**董玉萍，刘合林，齐君. 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70-79. DOI: 10.19830/j.upi.2019.651.

由于城市环境对健康状态及生活方式影响的增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城市政策制定者开始探索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早期是将健康与城市环境联系在一起，旨在解决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欧洲工业城市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然而，今天重新关注健康与城市规划关系的热潮，

映射了不断累积的研究证据：环境与遗传特征及社会经济变量共同决定了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在这种热潮下，人们不仅意识到差的环境品质，如噪声污染、空气污染、热岛效应等会对人的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一些好的环境品质，如设计良好且利于步行、城市绿地均衡分布等

会对人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在发达国家，大量的研究表明住在绿化水平高的居民，其心理、生理及社会健康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体力活动水平更高，更倾向于接近自然。随着自然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得到证实，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期望通过“增加绿地”“提高绿地服务质量”等相关政策引导，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公共健康。如2016年10月提出的《新城市议程》，尤其强调了创造、维持绿地的网络分布与连接对改善居民身体、心理健康、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加强城市应险能力的重要性。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研究成果的积累，也使居民意识到提高与自然的接触、在绿地中进行体力活动及社会交往，可以缓解、改善因久坐的生活方式及长期的压力产生的亚健康问题。但快速城镇化与城市致密化发展，造成城市绿地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在空间格局上面临破碎化风险，导致其可达性和服务质量随之降低，居民对绿地的多样化需求也因城市绿地的分布不均及绿地服务不平等日渐凸显。

作为建成环境的绿色组成部分，城市绿地既是增强体力活动、缓解压力、促进社会交往等文化生态服务的重要催化剂，又是提高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局部气候等生态调节服务的重要载体。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暴露于自然、半自然环境中，均能产生一定的健康促进效益。因此，关注和重视城市绿地及其健康促进效益，对于保持和改善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城市绿地规划中过于强调绿地总体空间形式，将景观、美学功能及生态价值作为规划的重点，导致对使用者真正的需求考虑不足，建成绿地未能有效发挥提高体力活动水平、缓解心理压力、促进社会交往等健康促进功能。此外，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及其差异化的研究现状，使得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因切入点不同而呈碎片化发展态势。在“健康中国”与“健康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绿地如何规划和管理，成为间接改善公共健康的关键问题。因此，基于城市规划视角，梳理和述评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重新审视现有绿地规划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厘清当下研

究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

然而，创造、优化具有健康促进功效的自然环境，并将其以更好的方式融入建成环境，需明确：哪些健康结果最有可能受到绿地的影响，哪些绿地特征影响居民的绿地使用，哪些接触途径对使用者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以及从根本上说，健康与绿地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绿地如何影响健康及健康促进行为等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述评：第一，城市绿地对居民可产生哪些健康效益？第二，城市绿地哪些特征影响其健康功效的发挥？第三，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产生促进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概括而言，根据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所采用的健康结果衡量指标，绿地的健康促进效果主要包括促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及总体健康四个方面。目前，相较于绿地产生的社会效益，研究更多地关注接触绿地能够产生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效益。相关研究多属于横断面研究，缺乏纵向追踪，无法得出绿地在时间维度上对健康的促进效果，且普遍采用调查问卷、采访等方式获取相对主观的健康指标数据，这可能会因“霍桑效应”等原因，导致数据产生偏差。

经梳理，上述健康促进效益的发挥，受绿地的可获得性、可达性、自身特征三个维度的因素影响，与居民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其所处的建成环境特征的调节。多数研究主要分析绿地的量化指标，尤其是绿地可达性对健康的影响，而对于绿地的质量、管理等自身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此外，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绿地与健康效益之间的正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所以不同影响因素对健康结果的解释力度以及各指标发挥健康促进作用的阈值范围均未得到充分探索。

虽然各学者已立足于本学科研究视角，基于本学科研究范式，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与分析，但大部分研究并未涉及绿地的完整作用路径，即仅聚焦于绿地作用机制的部分环节，而且绿地健康效益的发挥具体涉及哪些机制，以及哪条途径起主要作用等问题仍不明确。而从指导我国规划实践的角度来看，相较于绿地的可获得性或绿量的供给，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及绿地质量、维护管理状况等自身特征

指标，尤其是绿地的质量等定性指标，目前并未在我国的城市绿地建设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更多强调的是绿地的生态调节服务。

综上所述，基于城市规划视角，论文从分析绿

地自身特征对绿地使用及居民健康的影响、验证国外已发现的具有健康促进效益的绿地特征在中国的适用情况等 7 个方面提出未来可进一步开展、深化的研究方向。

## 健康社区建设的研究进展与关键维度探索——基于国际知识图谱分析

吴一洲 杨佳成 陈前虎

**摘要：**自世界卫生组织 1986 年启动健康城市促进计划后，健康社区作为健康城市营造的微观单元，逐渐在西方国家掀起热潮，并蔓延至日本、新加坡、中国等诸多国家。本文借助 CiteSpace 工具进行了健康社区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分析发现：健康社区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四个国家；研究聚焦在人的作用与感受、环境与自然、社会作用、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社区公园、老龄化等领域；研究的演进脉络可概括为物质环境—心理健康—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社区自调节（社区韧性/社区恢复力）的过程。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和中国实际，本文概括了健康社区的内涵，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健康社区建设的六大维度，包括健康住宅、健康环境、健康交通、健康设施、健康活动以及健康社会，旨为中国城市乃至其他国家建设健康社区提供依据。

**关键词：**健康社区；知识图谱；内涵；关键维度；引文空间

**引文格式：**吴一洲，杨佳成，陈前虎. 健康社区建设的研究进展与关键维度探索——基于国际知识图谱分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80-90. DOI: 10.19830/j.upi.2019.463.

## 发达国家合作性住房研究进展与启示

刘红萍 李剑峰 安东尼·J·沃德

**摘要：**合作性住房建设有助于缓解我国各级别城市持续上涨的房价，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缓和由于居住隔离所产生的社会冲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本文系统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合作性住房的产生、发展，从合作性住房的界定、效率评估、社会影响、合作性住房的建筑与设计几个方面概括了当前该领域研究的进展，并结合我国国情，从合作性住房产权形式、建设模式、政府支持、居民参与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发展合作性住房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合作性住房；可支付住房；社区包容性；共有产权住房；合作共享；共有空间

**引文格式：**刘红萍，李剑峰，安东尼·J·沃德. 发达国家合作性住房研究进展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91-97. DOI: 10.19830/j.upi.2018.425.

住房市场租购结构失衡、住房保障发展不充分已成为制约我国当前城市居民住有所居的现实障碍。合作性住房在平抑房价，防止住房投机，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提高住房建设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故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合作性住房对破解我国当前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需

失调难题，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不失为一种补充。

合作性住房是为降低建设成本，共享公共设施，增加社区互动而兴建的一种住房类型。关于合作性住房的定义差别主要表现为共享的空间数量、方式、目标等方面。当前的住房合作共有三种类型：因共同的理想而合作；为分担日常的家务而合作；为降

低住房建设成本而合作。

合作性住房最早诞生于 1840 年代的丹麦、瑞士、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范围的住房短缺，合作性住房建设发展迅速。至目前，全世界共有 60 多个国家成立了住房合作社。由于发达国家住房自有率的上升，以及保障性住房的集中建设产生的弊端，20 世纪末期合作性住房的建设一度陷入停顿。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居民住房条件趋于恶化，合作性住房重新得到重视。

当前对合作性住房的研究集中于效率评估、合作性住房的社会影响、合作性住房的建筑与设计三个领域。配套设施越齐全，居民参与度越高的合作性住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也越高。合作住房成本的节约主要体现在开发成本的节约，每月运行费用的节约和住房维护费用的节约。

合作性住房的可持续性表现为亲环境性行为、减少资源消耗、福利水平的提高、可支付的生活方式、可支付的住宅。对于合作性住房小区的包容性培养，当地政府部门的角色至关重要。合作性住房

达到可持续目标主要来自于成熟的社区设计、居民的共同努力、政府的有效干预以及良好的管理与运作。

居民参与住房的设计，将有助于居民融入社区，有效减少入住后的冲突，提升居住满意度。偏大或偏小的合作社也可以运行，但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与教训，发展合作性住房的启示为：（1）在选择住房合作类型时应明确住房合作的目的，是为实现住有所居，还是让居民能分享住房的财富效应。针对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所面临的住房问题，采用不同模式；（2）应明晰政府职能，搭建服务平台，提高合作性住房效率。不同主体的合作是合作性住房项目成功建设的前提条件。在具体的组织上，应明确不同主体在合作性住房建设中的责任与义务；（3）我国合作性住房应以高层住宅为主，合作性住房的模式选择随不同时期市场的需求呈动态变化；（4）居民在合作性住房建设前期以及全过程的参与对于减少合作性住房后期的冲突，以及合作社居民融入合作性住房均十分重要。此外，合作性住房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 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资本下乡”利益格局检视与治理 策略——江西省婺源县 H 村的实证研究

杨洁莹 张京祥

**摘要：**如何善用资本是乡村振兴难以回避的话题，村民能否在资本下乡后持续获益是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而村民获益的持续性与利益主体间的连接格局密切相关。基于法团主义视角，本文以江西省婺源县 H 村为例，从组织架构、制度架构、利益架构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并研究它们之间的交互关联。结果显示，政府作为“公正人”的角色定位，有利于缓解村民和企业的冲突，最大化社会效益；村委会、合作社等中介主体的嵌入，能构建交流平台，维护村民利益；企业担负社会职责，能更紧密地联系村民群众；企业村民互动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有利于可持续收入。因此应加强政府管控指引，制定利民政策方针；建立中介组织嵌入式治理格局，协助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双向反馈模式；提高村民的认知意识，解决“非对称风险”；通过制度约束企业担负社会责任，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研究可为资本下乡建构公平可持续的利益格局提供建议。

**关键词：**资本下乡；法团主义；利益格局；乡村治理；婺源

**引文格式：**杨洁莹，张京祥. 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资本下乡”利益格局检视与治理 策略——江西省婺源县 H 村的实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98-105. DOI: 10.19830/j.upi.2019.158.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难以单纯依靠村集体或村民力量的“内闭循环”实现，乡村的发展越来越多

地依赖于外部市场资本。但是由于资本具有双面性，在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鼓励资本下乡、如何让资本下乡等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资本下乡争论的关键，在于村民在资本入驻后的收益情况。因此，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善用资本，使村民实现在资本下乡后的收益共享十分必要。

在公共治理领域盛行的“法团主义”，是指通过国家机关与社会关系间的一种制度安排，以政府为主导将社会不同利益团体进行有序集中，实现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和协调，从而达到多方共赢、维护社会团体效益的目的。这一点与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非常一致，对于我们辨析、探究“资本下乡”的态度与方式很有启发意义。

法团主义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具有很好的应用环境：首先，中国拥有权威的政体。在中国的城乡治理传统中，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乡村的发展与有关社会矛盾的解决离不开国家的强力影响；第二，乡村具有稳固的中介化组织。按照中国现行的制度安排，在乡村实行村民自治，“村两委”承担着帮助国家、村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实现双向传达的中介作用；第三，政策鼓励多元互动合作。在乡村治理中涉及多元主体，国家的政策支持各利益主体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

基于法团主义的治理格局，即以相关主体为核心，通过制度决策和利益分配的治理结构，主要包括：（1）相关主体，如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不同类型行动者等；（2）制度决策，主要指政府的具体决策所形成的制度保障；（3）利益格局，指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情况。

本文基于法团主义视角，以H村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其中包含了各种“中介化”的机制嵌入。一是组织嵌入，中国广大的村委会既是政府的基层代理人，也承担着村民利益表达的责任，在H村开发过程中，村委会协助政府鼓励村民向山下搬迁，宣传“以房换房”的标准，同时也积极向上级政府反映村民的诉求；另一个中介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则构建了村民和企业间的交流平台。二是制

度嵌入，在H村景区开发阶段，政府在住房安置、就业安排和资源使用费等方面制定了规章制度，用以约束企业行为，保障村民的居住、工作等权益；同时，政府也为企业发展提供积极的支持，如政府通过“招拍挂”方式将集体用地转为国有用地，协助企业获取古村建设用地。三是利益嵌入，如政府通过新农村建设、民政搬迁扶持、国土地质灾害整治等项目资金，解决了新村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问题，村民居住水平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政府还利用权威化解企业与村集体矛盾，成为企业发展的隐形保护伞。

资本的入驻使得村民获取了现代住宅、租金收入和返聘工资等直接的收入来源，同时基于景区影响力的扩大，村民获得了许多外部性收益，例如向游客提供农家乐、租车服务等等。在资本入驻的初期阶段，政府以及村委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积极介入，在村民和企业中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然而当企业完成了经营用地流转后，企业则与村民直接对接，村委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平台出现缺位，整体格局愈来愈呈现以利益为主导的市场化趋势。加之因为原住居民搬迁而裁撤了原有村委会，H村改归距离较远的村委会管辖，新迁至山下的村民与新村委会之间存在距离、情感的双重隔阂，社会连接、集体组织协调陷入失灵状态，社会矛盾凸显。

资本下乡解决了乡村振兴中的金钱问题，实现了市场与村庄的快速链接。然而利用经济手段解决乡村社会困境，存在市场利益导向和社会最佳效益的冲突，容易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有企业主体嵌入的传统乡村治理结构，我们需要警惕政府过分的“经纪人理性”思想，将招商引资作为“符号性政绩”，使乡村治理结构脱离村民主体，造成“善治”的失效。在治理格局中，政府应巩固主导地位，积极对资本下乡的全局进行掌握，确定乡村振兴不仅仅是“造村”更是“造人”。值得强调的是，乡村振兴不应该回避资本，而需要利用现代方法，创新治理模式，以达到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使资本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 简化规划程序，启动“邻里规划”——英格兰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姚瑞 于立 陈春

**摘要：**2010年英国联合政府上任之初就面临着国民经济衰退和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的种种挑战。因此联合政府于2011年颁布了《地方主义法》，希望通过撤销“区域空间战略”，启动“邻里规划”，简化规划程序，推动地方主义实现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来消除传统规划缺乏应变能力及效率低下等弊端。本文重点分析和研究了此次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中简化规划程序和启动“邻里规划”等措施，探讨新的举措潜在的或已经产生的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地方主义；简化规划程序；邻里规划；英格兰

**引文格式：**姚瑞，于立，陈春. 简化规划程序，启动“邻里规划”——英格兰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106-113. DOI: 10.19830/j.upi.2019.314.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英国城乡体系及实践的研究是国内学术届和规划界最早关注的国外规划及体系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缺乏参与英国规划实践等，对于英国城乡规划以及其目前的空间规划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例如过去20年我国有许多留学生到英国学习规划，虽然也知道了英国规划中的“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地方规划”(local plan)、“区域空间战略”(regional spatial strategy)、“发展规划”(development plan)等词汇，然而不少人一直没有明白这些专业词之间的区别，经常有人问“发展规划”是什么？与“结构规划”和“地方规划”有什么不同？当然其中不少规划词汇如今在英国不再使用了，但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词汇，要真正了解其含义并不那么容易，这也显示了对各国规划了解的难度。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通过分析英格兰推动规划权力下放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特别是对新出现的“邻里规划”存在问题的探讨，为国内学者和规划师提供一些参考。

### 1 空间规划改革方向：地方主义

英格兰/威尔士规划体系及相关空间规划语境始于《2004年规划和强制性收购法》。然而这套空间规划体系存在权力层级僵化、政策文本繁文缛节等诸多弊端。在为各地发展提供服务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体现了过去几十年社会各界，包括规划界自身对规划一个永久批判的主题，即，规划的僵化。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重创各国经济。在英国，规划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但是重新推

行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的“弃规划化”措施也不合理，因为在撒切尔夫人政府期间又重拾了规划。因此英国联合政府找到一条新路子，通过颁布并实施《2011年地方主义法》，推动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其目的是：（1）简化规划程序，例如撤销了“区域空间战略”，将之前总计1300多页的中央政府“规划政策公告”(PPS)缩减为仅60多页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NPPF)，力图减少规划对开发建设的干扰；（2）让规划更接近“受到规划决策影响的人群”，引入“邻里规划”这一新的规划方式，以实现规划权力的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邻里社区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当然规划事权的下放需要与经济财权相配套，为此《2011年地方主义法》改革了地方当局的权限范围，特别是税收政策。

2011年英格兰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1）简化审批制度。其一，免除一定规模内的扩建项目的申请规划许可；其二，任何的项目申请，在审批时首先默认项目是可行的，仅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明显大于积极作用时才驳回；其三，未被地方规划部门许可的项目或地方规划部门未按时审批的项目，开发商可直接向规划督察提交申诉，规划督察有权及时作出最终裁决。

（2）变更方案审查制度。将“可持续性评估”作为评价地方发展规划发展目标和战略方向的重要手段，要求评估规划提出的方案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可持续性目标实现的支持度和积极影响程

度，并强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特质。

(3) 调整公众参与机制。鉴于规划审批过程中冗长的公众参与和评审会流程影响了项目的落实进度，此次空间规划改革中，英国政府提出对公众参与机制设置一定的限制条件，包括公众对某些项目的审批意见的有效期长度，对《2004 年规划和强制性收购法》所规定的“任何时间任何项目都可进行参与”进行了更改。

(4) 明确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高度自由裁量权是英国规划体系的特点，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地方规划方案进行决策时的灵活性。地方规划机构在一般情况下须遵守地方发展规划的政策和方案，对提出开发规划申请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但是在某些超出预期的重大项目上，地方政府有权决定不遵循地方发展规划的方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5) 启动邻里规划(neighbourhood planning)。这是本次空间规划改革中最能体现地方主义的措施，英国政府希望社区居民能真正有机会决定社区的发展方向。邻里规划允许社区居民、社区雇员和社区内企业自行商定新的住宅地、商业地和商店的具体位置和外观形象，但需要与地方规划基本保持一致。

## 2 改革后规划体系的问题

我们在文中探讨了邻里规划分权模式的弊端，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原文。但由于文章主题、篇幅所限及其他原因，我们所讨论的英格兰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内容并不完整。例如，英格兰废弃“区域空间战略”(regional spatial strategy)后，区域间各地区(城市与乡村)

的协作方式及其问题无法展现；“地方发展规划”

(local development plan)作为英国最主要的法定规划，虽然在每次规划体系改革中都保留下来，但名称和内容有变化，这次变革的内容也没机会向读者介绍；另外，邻里社区居民如何在国家规划战略、地方规划部门和社区利益之间围绕邻里规划制度展开的博弈未能详细阐述。为了弥补一些缺失，我们在此对文中提到的案例提供一张规划图，以展现这个社区的做法，作为文章的补充。面对牛津郡(Oxfordshire)地方政府新建 600 套住房的目标，泰姆(Thame)社区根据法律要求不得不遵守地方规划战略目标和方案，在其规划方案中保留了住房计划的数量目标，却将住房分散在数个零碎地块中，以此阻碍和对抗政府发展规划来保障自身社区利益。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提示，不同的社区编制和实施邻里规划的能力存在差异，亦导致不同社区之间的不均衡。

空间规划绝不是单纯地解决空间布局和建设问题，必须要构建一个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综合发展目标的长期战略和愿景，以此指导国家各区域和各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和规划权力的配置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和能力，尽可能保证整体社会能够通过规划体系改革，在追求规划效率提升的同时，实现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公平和公正，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能够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之中得以实现。希望英格兰空间规划改革的经验，特别是教训，能够为我国规划的改革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提供些许借鉴与启示。

## S-CAD 政策评估方法在城乡规划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李冬雪 王兴平 柏露露 刘诗芳

**摘要：**随着我国城乡规划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开展，规划评估逐渐涵盖规划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维度，但评估过程仍然缺乏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本文基于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尝试将梁鹤年先生提出的 S-CAD 政策评估方法应用于城乡规划评估：一方面直接应用于规划编制评估，考察规划文本的逻辑、效率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借助 S-CAD 政策评估框架，对规划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从文本和实施政策两个层面监测规划薄弱环节，准确剖析实施评估结果的形成原因。S-CAD 政策评估方法的引入，有利于从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全面构建评估框架，评价规划的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促进评估过程中规划政策

属性的表达，并为规划评估提供科学理性的定量评估工具。

**关键词：**S-CAD 政策评估方法；城乡规划；文本评估；实施评估；定量分析

**引文格式：**李冬雪，王兴平，柏露露，等. S-CAD 政策评估方法在城乡规划评估中的应用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114-123. DOI: 10.19830/j.upi.2018.376.

## 让河流融于城市生活——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陈泳 吴昊

**摘要：**河流往往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居民与自然水系的长期磨合中，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形态、生活模式与文化品格。美国南部城市圣安东尼奥市通过市中心区滨河步道的持续建设，充分发挥河流的生态、景观与休闲的综合价值，将原本解决城市防洪问题的普通河道转化成繁荣而又绿意盎然的公共活动场所，并带动城市复兴，成为当代中小尺度河道保护性利用的典范。本文追溯圣安东尼奥河及其滨河步道的历史演变过程，探讨河道功能转型、地方文化遗产与自然生境修复等更新设计理念与策略，并从空间形态设计、功能活动组织、滨水场所塑造、城市联动发展和建设运作机制五个方面剖析其成功制因，为国内城市存量更新背景下的河道环境综合治理、活力复兴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与启发。

**关键词：**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滨水空间；城市复兴；要素整合；多方协同

**引文格式：**陈泳，吴昊. 让河流融于城市生活——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的发展历程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124-132. DOI: 10.19830/j.upi.2019.103.

河流往往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源头，在居民与自然水系的长期磨合中，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形态、生活模式和文化品格。圣安东尼奥河是美国南部城市圣安东尼奥的母亲河，凭借其滨河步道的成功建设，将原本解决城市防洪问题的普通河流转化成繁荣且绿意盎然的公共活动场所，成为当代中小尺度河道保护性利用的典范。

圣安东尼奥河最初是蜿蜒流过市区的自然溪流，受地形因素的影响，河道狭窄多弯，在市中心区呈半环状的“大弯曲”河段经常在雨季遭遇水患，严重威胁着市民的正常生活，市政工程师多次提议覆盖“大弯曲”河段来发展地产项目，但均遭到市民反对。

1929 年，本地建筑师哈格曼提出将本地特有的西班牙文化融入滨河步道中，结合绿化公园和休闲商业来为河道营造缓慢慵懒的怀旧氛围，河面上来回穿梭的游船可为人们提供闲适的水上体验，与街道层面紧张而喧闹的现代生活形成对比，这个大胆而浪漫的构想激发了市民对河道未来场景的想象。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方案直到 1938 年才得以实

施。建成初期，滨河步道使用率极低，原设想的滨水商店和餐馆的建设并没有实现，滨水区被长期闲置，一度成为污物堆积场。

1968 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为滨河步道带来新的生机。由沿河业主及商家组成的滨河步道联合会成立，有效促进了沿河地块商业和旅游设施的建设，并开展了一系列河道延伸工程，带动了城市复兴建设。其中，河道东侧延伸段将新会展中心、滨河商业综合体和万豪酒店连为一体，促进了东部新区的发展；东北角通过景观步道连通阿拉莫遗址公园；西侧河道则通过公园建设衔接圣费尔南多大教堂，从而形成了以水为核心的城市公共空间网络。

近期的滨河步道南北延伸项目旨在实现整体流域层面的生态系统修复和绿色走廊建设，净化水质，涵养水源。通过滨河步行和自行车道的南北贯通，将圣安东尼奥河沿河周边的 817.5 hm<sup>2</sup> 国有土地串联起来，打造全美最大的城市公园（纽约中央公园 341 hm<sup>2</sup>；旧金山金门公园 412 hm<sup>2</sup>；芝加哥滨河公园 583 hm<sup>2</sup>）。

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的成功建设与哈格曼当

初卓越而超前的设计理念密切相关，他认为“城市历史文化和河流的自然之美应当被保留，并且需要留出发展空间来展示圣安东尼奥的独特之处”。其设计巧妙地利用了 5~6 m 的地形高差进行人车立体分流，将亲水的休闲、商业和文化设施布置于冬暖夏凉的河谷中，与街道的快速车辆相隔离，营造出了舒适、连续且安全的全步行场所。

在建设过程中，他严格保护原始的高大柏木和自然的堤岸形态，将河流、街道、桥梁和建筑等要素组成一个令人愉悦且相互关联的整体，并通过动静分区和主题活动的设定，使各区段的滨河步道呈现不同的空间特色和活动场景。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安纳森露天剧场。该剧场利用河道转弯处的缓坡地形设计了一处跨河的观演场所，舞台与观众席分设于河道的凸岸和凹岸，通过石拱桥联系，每当游船从桥下缓慢经过，乘客与分处两岸的舞台表演者及观众发生短暂互动，三方互为彼此的表演者和观众，形成浪漫有趣的活动情景。

此外，为了保证步行道尽量亲水，通过双层水坝的修建，将水位高差从原来的 2.1 m 缩减至 0.3 m，实现人亲近水的愿望，同时也保证了游船的缓慢前行，游客可以尽情体验两岸的美景。

目前，市区约 4.5 km 长的滨河步道上，人们可以轻松地漫步在咖啡馆、博物馆、酒店和桥梁及大柏树之间。这里每年会举办超过十多场公共庆祝活动，个人或团体的小型纪念活动也可在此举办。

圣安东尼奥河作为城市资产而存在，离不开本地市民、政府、营利组织及设计师等多方团体的共同关注和长期努力。市民在河道的保护与发展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在历次的河道填埋或侵占事件中，都是市民首先站出来抵制和呼吁，并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开展拯救河流的活动。政府在滨河步道发展中起到了项目策划、组织建设和开发管控的作用，前期主要利用联邦财政支持、城市债券发放等方式获得项目启动资金，带动私人资本投入，并通过申办“世博会”来助推项目发展和中心区复兴；后期则主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引导项目开发，例如通过颁布相关的城市管理条例和整体规划，对空间治理、特色保护和商业业态等方面进行管控。营利组织，特别是沿河土地所有者和商家，发挥了资金支持、项目运营、市场宣传等作用，他们往往具有敏锐的市场眼光和高效的项目执行力，对滨河步道的启动与振兴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设计师主要是在建设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圣安东尼奥的滨河步道建设既是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也是 90 年来多方利益协同与思想碰撞的渐进过程，体现的是一种系统整合发展的城市理念与智慧。中国城市正处于注重生态优先与内涵发展的存量更新阶段，如何通过河道滨水环境的修复和治理促进人、自然环境与地方文化的和谐发展，既需要城市建设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也需要向世界各个典范城市借鉴和学习更多的经验和知识。

## 何塞普·路易斯·塞特的国际建筑组织活动和城市理念

蒋正良

**摘要：**何塞普·路易斯·塞特是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国际建筑运动第二代领袖和教育家。他创立了“加泰罗尼亚现代建筑艺术家和工程师团体”，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了十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主席；1956年起，他召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城市设计会议，逐渐奠定了当代城市设计领域；此后还对联合国人居 I 的形成有重要贡献。本文沿着塞特在四个重要国际建筑组织的活动轨迹讨论了若干话题，涉及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从创立到解体，现代建筑运动从欧洲国际化到全球化，新老建筑师理念碰撞，以及塞特主导创立的城市设计领域和平衡人居等。一方面较完整地展示出当代现代建筑运动的整体历程和战后现代建筑运动的突出特点：在世界范围深入发展，抛弃国际式和统一范式走向以地区和国家内部的交流，关注于特定文化和地域性等；另一方面，能看到塞特作为现代建筑运动第二代领袖，在不同时代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对各

种现代建筑前沿主题的选择，以及延续现代建筑运动大方向的努力。

**关键词：**何塞普·路易斯·塞特；加泰罗尼亚现代建筑艺术家和工程师团体；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城市设计；市镇设计；平衡人居

**引文格式：**蒋正良. 何塞普·路易斯·塞特的国际建筑组织活动和城市理念[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5): 133-144. DOI: 10.19830/j.upi.2018.270.

这篇文章的写作，缘于 2017 年笔者参加国际城市形态论坛（ISUF）西班牙瓦伦西亚年会期间的巴塞罗那旅行。在一个精彩绝伦的城市中，米罗美术馆被赋予崇高地位，其设计者因此更加令我们关注，那就是拥有至高成就的西班牙现代建筑师塞特。

囿于西班牙语文化圈的小众性，我国读者对塞特的故事所知有限，且多为片段化、案例式的，仅以建筑师的定位介绍他的经典作品而已，这无疑忽视了塞特在城市设计方面的诸多成就。

对于他的生平，纵观中外文献，自然聚焦于他显耀的身份——十年的 CIAM 主席，他被认为是早期现代建筑师和年青一代的“过渡人物”，对现代建筑理论思想的传承发扬有较高贡献。然而，荣辱同源，CIAM 在他卸任后不久即告终结，弗兰普顿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即将他置于十次小组同 CIAM 矛盾的漩涡中心，并将他作为批判的对象，无形中也给塞特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而塞特召集创立的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会议，同 CIAM 的终结仅相隔一年时间，并在此后一直持续到塞特去世，两者关系怎样？显然是塞特个人学术重心转移使然，但这又对现代建筑运动和建筑学学术界有何影响？上述疑问推动了本文的研究和写作，而将对塞特思想的研究置于不同的国际建筑组织活动的背景下，显然是一种适合的研究视角。

在 CIAM 和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会议之外，加上塞特早期参与创建的 GATCPAC，晚年参与的伊朗

建筑师会议，构成了塞特较完整的学术历程，本文抽取其中持久稳定的城市思想，也对照时代洪流，查找塞特城市思想的变迁轨迹。

从文中可以看到，塞特的城市设计思想发展自古老的欧洲市镇设计传统，也是他地中海文化背景使然。他将其中重视城市公共性质和文化传统的理念在当代城市设计中加以延续，并据此完成了一系列“市镇综合体”的设计实践。

塞特早期投身现代建筑运动，以及他同柯布西耶的密切关系，使他自始至终都坚持现代建筑运动的最初理念——倡导建筑简化和住房工业化，并坚信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应通过工业化解决民众住房问题。这是塞特一直坚持的现代建筑运动“大方向”，也是他参与国际活动的动力；同时他又对其“国际式”理念进行变通和改革。CIAM 早期革命而激进，导致了对传统文化因素的舍弃。国际式一经出现也意味着各国建筑中民族特征的消失，这是现代建筑突出的通病。在世界出现多元化趋势后，塞特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药方是“平衡”，平衡人居也成为他的另一核心理念。平衡人居理念兼顾了城乡之间、诸多功能间，以及传统与现代间等的各种矛盾。塞特最终将“平衡人居”载入联合国文件《人居一》。塞特通过城市设计和平衡人居延续了 CIAM 的使命，使现代建筑运动和国际式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并通过联合国《人居一》为其找到归宿。

## 2020年第6期文章目录

### 本期主题 国际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模式研究

田莉, 夏菁 / 国际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的模式与启示——基于15个国际大都市的分析

陈杰 / 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内在逻辑——以纽约和柏林为例

邵挺 / 中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困境与政策突破

张昕艺, 夏菁, 孙斌栋 / 德国社会市场模式下“单一制”租赁住房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以柏林为例

焦怡雪 / 荷兰社会住房“租转售”机制探索

王紫荆, 梁印龙, 邵挺 / “居者难有其屋”: 香港公屋政策发展演变与启示

### 城乡研究

张晨, 肖大威 / 从“外源动力”到“内源动力”

——二战后欧洲乡村发展动力的研究、实践及启示

范炜, 金云峰 / 基于类型对比的城市中心区紧凑型绿轴特征研究

——开放空间尺度、构成与慢行友好型边缘分析

杨昌新, 黄瑞茂 /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变迁与高校课程建设的关联性——以淡江大学为例

唐山, 李泽, 王凯来, 崔建强 / 全球整合与地方响应——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嵌入特征分析

### 规划研究

荆锋, 王世福, 莫浙娟 / 中间城市的“反击”——“平等”理念下的法国国土整治实践

赵文宁 / 后社会主义转型: 爱沙尼亚城市规划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郝皎如, 铃木萨琪, 王江波 / 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张颖, 宋彦 / 美国城市设计专门教育的进展和现状——以六所大学为例

柯磊, 翟国方, 施益军, 周姝天 / 基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绿色雨洪基础设施选址研究  
——以加拿大魁北克市博波尔区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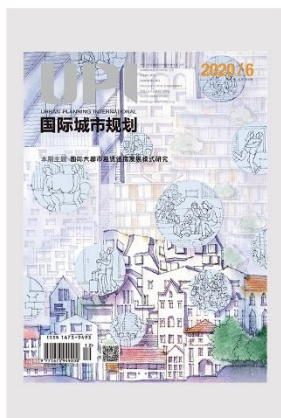
### 实践综述

蒋希冀, 叶丹, 王兰 / 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的演进及城市规划的作用辨析

高雅, 杨兵 / 规划赋能下伦敦东区科创驱动式城市更新实践

### 案例集萃

刘翔, 张亚津 / 荷兰新型海防工程的探索



2020年 第6期

## 国际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的模式与启示——基于 15 个国际大都市的分析

田莉 夏菁

**摘要：**为了解国际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的历程、模式和政策，本文选择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汉堡、慕尼黑、苏黎世、东京、首尔、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 15 个国际大都市，选取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和租赁住房发展的关键性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大城市租赁住房发展模式的特点，根据住房负担、租金负担、政府市场关系等进行分类，并从聚类指标和住房政策发展视角对其发展模式进行总结，最后从发展战略、机构培育、法规政策等方面总结对我国特大城市租赁住房发展的借鉴与启示，推动我国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关键词：**租赁住房；国际大都市；政策；模式；住房可支付性

**引文格式：**田莉，夏菁. 国际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的模式与启示——基于 15 个国际大都市的分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1-7. DOI: 10.19830/j.upi.2020.346.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调整、房地产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带来的泡沫效应、金融风险与对社会民生支出的挤出效应日益凸显。近年来，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超过居民收入增幅，不仅显著加重了居民购房负担，而且金融资源过多投入房地产部门将带来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也增大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难度。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后，租赁市场的重要性凸显。但总体来看，我国城市租赁住房市场发展滞缓，仍处于“租售一只腿长、租赁一只腿短”阶段。

为充分了解发达国家/地区城市租赁住房发展与建设的历程、政策设计及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本文选择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 15 个大都市，包括美国纽约、洛杉矶，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汉堡、慕尼黑，瑞士苏黎世，日本东京，中国北京、上海、香港、深圳，介绍各城市的租赁住房结构、政策和建设体制等，分析总结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其他国际大都市与我国住房问题突出的大都市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大城市租赁住房的发展有所借鉴与启示。

鉴于 15 个城市在面积、人口密度、租赁住房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较大，本文主要采用聚类分析结合定性分析进行分类。我们主要选择四个维度，分别是（1）人口密度：单位建设用地上的居住人口密度；（2）经济发展阶段：用人均 GDP 作为衡量变

量；（3）租房市场维度覆盖 4 个指标：房价收入比、租金收入比、售租比、租房比例；（4）政府干预维度主要选择公共住宅占比和可负担住房的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对 8 个关键指标的聚类结果表明，15 个大都市的租赁住房模式呈现四类集聚特征。

（1）住房负担重、租赁住房发育不足、政府干预弱的高密度大城市，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

（2）住房负担重、政府干预较强的高密度大都市，以香港为代表。

（3）住房负担较重、租赁市场发达、政府放松干预的较高密度大城市，以东京、首尔、巴黎、洛杉矶、伦敦、纽约、阿姆斯特丹、苏黎世为代表。

（4）住房负担略重、租赁市场发达、政府干预力度较高的较低密度大城市，以柏林、汉堡、慕尼黑为代表。

租赁住房发展涉及复杂的规划、财政、金融、管理体系，仅靠简单的指标难以说明各大城市租赁住房模式的特点。我们对 15 个特大城市从 1940 年代至今（主要是二战以来）租赁住房政策的演变，现阶段政府对公共租赁住房、社会租赁住房和市场化租赁住房的政策进行了总结，将本文研究的 15 个案例城市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1）“二元化”体制下的政府主导供应租赁住房模式。在香港，高昂的房价收入比与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屋并存，后者占比达到 40% 以上。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采用的也是典型的“二元化”模式，

而且政府建设的公租房主要对有户籍人口的本市居民开放，绝大多数非本市户籍人口没有租赁资格。

(2) 市场主导供应租赁住房模式。市场主导的租赁住房供应与“二元化”体制的差别在于，前者更多依靠市场化方式而不是靠政府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来解决问题。这种模式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东京和首尔为代表的放松规划管控模式。第二类是以伦敦、纽约、洛杉矶等为代表的需方补贴模式。

(3) 非营利组织主导的租赁住房供应模式。以瑞士和德国城市为代表。政府从鼓励多元建设主体、多种建设模式等方面着手，以增加租赁住房房源，并稳定住房的自有率。

15 个案例大都市的租赁政策变迁，在时间上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 (1) 二战后供给严重不足阶段；
- (2) 1980 年代左右供需缓和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住房自有率逐步提升阶段；
- (3) 21 世纪初以来的金融危机与住房品质提

升阶段。

总体上大都市租赁住房供给呈现两大特征：适应不同阶段的租赁住房发展策略转型；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住房策略。

综上，1970 年代末以来，以“里根—撒切尔”新政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席卷全球。受其影响，通过自由住房市场发展解决住房问题，政府救济型的公共住房建设规模逐步最小化，成为补充市场住房的社会安全网的认识，逐步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应该说，中国住房政策的制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和住房市场的“金融化”导致房价飞涨，住房问题日益尖锐。

借鉴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租赁住房的发展有如下启示：

- (1) 从“二元化体制”向多元化体制转型；
- (2) 培育专业租赁机构，增加租赁住房供应；
- (3) 完善租赁市场的立法与管理制度，保护租赁群体权益。

## 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内在逻辑——以纽约和柏林为例

陈杰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解释城市租房发展模式差别性的相关理论，包括住房—福利替代理论、“一元制 vs. 二元制”理论和金融化理论，揭示出租房发展模式和租房部门内部结构受经济制度、社会理念、福利体系、金融结构等组成的宏观背景约束而决定。之后，本文以纽约和柏林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性考察，并重点研究了这两个城市近年来租房金融化的不同表现特征和产生的经济社会后果。最后，基于这些理论分析和案例考察，为国内大都市租房发展模式选择和租赁市场治理提出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租赁住房；国际比较；城市治理；金融化；住房政策

**引文格式：**陈杰. 大都市租赁住房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内在逻辑——以纽约和柏林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8-15. DOI: 10.19830/j.upi.2020.349.

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目前全球约有 20% 的人口通过市场化租房来解决房问题。国际大都市的住房因为投资收益的稳定性和可交易性好，更是国际热钱投资竞相争夺的对象。原来这些热钱主要对可售住房感兴趣，但由于金融产品创新，近年来它们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国际大都市的租赁住房领域，甚至这些城市的社会租赁住房领域。

本文重点以纽约和柏林为国际大都市案例进行考察。从两个案例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在租房领域遭遇金融化冲击的差异以及所产生影响差别的内在逻辑。

1990 年代，纽约涌入了约 100 万移民。21 世纪初出现的互联网热潮带来了经济高度繁荣，世纪之交的房地产市场景气上升很快，租赁住房空置率

很低，加上之同期的金融自由化加快，让纽约哪怕受到严格管制的租赁住房也极大地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与此同时，在房地产业利益集团的游说下，严厉的租金管制逐渐松动，例如将租金管制与空置情况挂钩，让没有人入住的高价位租赁住房得以逃避租金管制，大量出租房源因此脱离了租金管制。

由于贷款证券化的支持，投资者在收购项目时资金充沛。这些投资者非常具有侵略性，买入后就想方设法降低维护成本，同时尽可能利用政策空子，包括“空置率奖励”和加大资本投入，来规避租金管制，提高租金。这些私人资本的租房投资策略，可以概括为机会主义的“低买高卖”投资策略。纽约租房金融化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大量中低收入租客被迫搬离低价租赁房。

相比之下，柏林租房金融化有更特殊的背景。两德统一之后，原东德掀起了市政公房私有化浪潮，柏林首当其冲。在 1990—2012 年的 12 年间，柏林私有化了 20 万套公房，政府公房下降到 27.35 万套，占全市住房比也下降了一半，只剩下 14.4%。但柏林 1990 年代的租房市场萎靡，租金走低，租房空置率高涨，给投资者以诱惑，认为租金会在不久后迎来上涨。21 世纪初互联网资本泡沫破灭之后，过剩的国际热钱资本需要重新进行全球化配置资产以分散风险，看上了柏林等德国大都市，认为其

未来增值潜力很大。

比较意外的是，柏林的租房金融化并没有像纽约那样将中低收入租客驱逐和替代，反而是私人投资者所持有的租房接纳了更多的中低收入租客。其主要原因在于，2007 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房地产市场衰退让那些在危机之前进入的资本无法退出，加上柏林的租赁管制，资本不得已采取了一种经营策略，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结果。然而，这一投资策略的代价是，这批租房品质迅速恶化，退化为近乎贫民窟，租客的居住环境十分糟糕。柏林近年来的房价和租金都出现快速上涨，显然与其住房金融化不断深化有密切联系。

本文的最主要的启示是，租房领域同样要防范资本牟利驱动的过度金融化的冲击。纽约和柏林的案例都显示，在当代的全球化背景下，租房领域同样有极高的金融化可能性。即使在我国大都市的租房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以“轻资产型”长租公寓和“租金贷”等为代表的高度金融化趋势，而且多个城市出现长租公寓爆仓事件，还多次引发了群体事件，显示了租房市场领域过度金融化的潜在经济风险和社会危害都很大。租房发展需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但也要防范过度金融化，不能让租房的开发和运营过度以资本牟利为导向。

## 中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困境与政策突破

邵挺

**摘要：**1998 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居民的住房问题主要通过购房来解决，租赁市场发展相对滞缓。十九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住房租赁市场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从现实看，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和政策困境。本文在分析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租赁房源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机构化发展不充分、市场秩序混乱、立法滞缓等六方面困境，最后提出建立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和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租赁住房；租售并举；发展困境；政策突破；租售同权

**引文格式：**邵挺. 中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困境与政策突破[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16-22. DOI: 10.19830/j.upi.2020.351.

## 德国社会市场模式下“单一制”租赁住房发展的经验与启示——以柏林为例

张昕艺 夏菁 孙斌栋

**摘要：**与大部分国家发展的“二元化”租赁住房体制不同，德国在社会市场模式下发展了“单一制”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德国对这一体系的坚持，表现在其住房市场拥有的低自持率、高租赁比例、低房价收入比，维持了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对非营利市场与营利市场的整合，这极大地确保了租赁市场的多样化与竞争性，为成本型租赁住宅的供给提供了市场吸引力，也为租房的供给端应对各类需求变化预留了弹性。本文就“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中的“两层租金管理制度”、住房合作社、“租同权”三项内容做实施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柏林的租房发展现状展开具体描摹，以期作为“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的运作案例典范，并提出了对我国完善大城市租赁住房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市场模式；单一制；成本型租赁住房；德国；柏林

**引文格式：**张昕艺，夏菁，孙斌栋. 德国社会市场模式下“单一制”租赁住房发展的经验与启示——以柏林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23-30. DOI: 10.19830/j.upi.2020.347.

德国租赁住房体制十分成熟，其租赁市场呈现租住比例高、租房供给主体多元、租房市场结构相对稳定等特征。我国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及租房可负担能力较差的“夹心层”群体，缺乏完善权益保障的租房市场使其不但难以获得租金友好的租住房源，而且在房屋质量、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可获得性也不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那么，德国健全完善的租赁住房体系对我国大城市加快形成“租购并举”新格局有何启示？

自 20 世纪中叶至今，德国发展了一条不同于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租房模式，它没有选择将效率导向的市场化租赁市场与公平导向的保障租赁市场分开的“二元化”(dualist system)租赁制度。德国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需求之间的理性平衡。这在租赁住房体系中表现为：市场供应带有社会公平属性，公共租赁融合了效率导向的竞争机制。在这种“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导向下，德国租赁住房市场鼓励利润驱动和非营利导向两种性质的房屋租赁企业进行竞争。具体而言，其实施策略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推进“两层租金管理制度”。“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的关键是维持一定比例的成本型住房，而不论其供给者是政府还是市场，其以约束与调控成本型住房为出发点，并建构了两层租金管理制度：第一层的租金约束针对是否享受政府资助而

设定；第二层的租金秩序规则是针对所有其他类型租赁住房设定的。

其次，推进住房合作社(housing cooperatives)建设。住房合作社是德国租赁住房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接受政府支持并受法律与章程保护，成为市民以低成本获得稳定生活的重要选择。德国住房合作社的直接作用是扩大了成本型住房在住房存量中的占比，进而通过调节住房与租房需求以维持房价与租金的稳定。

最后，推进“租同权”。为了确保承租人的权利，“单一制”住房体系的重要政策目标是保有权中立，推进实现“租同权”。德国政府以《民法》为基础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保护租客的居住权利。此外，德国政府还建立了完善的住房安全与健康标准评估体系，提升了成本型租赁住房的质量。对承租人的权利保障可吸引新兴中产阶层选择租赁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进而抑制了潜在的购房需求。于我国推进租购并举政策而言，完善“租同权”的相关保障体系，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时，可降低不确定的居住群体阶层替代风险。

柏林被德国民众称为“居住成本低的乌托邦”，其因低廉的租金和具有活力的城市面貌产生了国际吸引力，也是德国“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实施的典范。2018 年，柏林的租房比例在德国各州中最高，其租金水平也远低于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等城市。

综上，德国“单一制”租赁住房体系对我国大城市租赁住房发展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增加成本型租赁住房的供应；二是建立灵活的租金管制体系；三是推行“租同权”与“租购同权”。

## 荷兰社会住房“租转售”机制探索

焦怡雪

**摘要：**荷兰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推行社会住房的“租转售”，在多年发展中，政府对用于出售的社会住房的类型、数量进行严格监管，以保证社会住房总量基本稳定，以及能够满足低收入家庭租住要求。本文聚焦于荷兰社会住房“租转售”的背景与目的、出售的对象与条件、出售方式等，并以阿姆斯特丹为例对社会住房“租转售”的成效和风险进行了剖析，以期为我国公共租赁住房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荷兰社会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出售机制；出售方式；社会融合

**引文格式：**焦怡雪. 荷兰社会住房“租转售”机制探索[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31-37. DOI: 10.19830/j.upi.2019.461.

荷兰从1901年颁布《住房法》以来，就开始推行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低租金社会住房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荷兰社会住房以其所拥有的较大市场份额和较高住房品质而著称。2015年，荷兰社会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达到30.3%，在欧洲是最高的，保障对象涵盖了低收入群体和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质。

荷兰社会住房从形成之初就是租赁型住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租不售。但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在住房短缺问题基本解决、社会住房供需总体平衡、新增社会住房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作为推进住房自有化政策的辅助措施，荷兰启动了社会住房的“租转售”机制，即将原有租赁型社会住房面向个人、其他住房协会或第三方出售。

荷兰社会住房的“租转售”政策以促进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的社会目标为主，兼顾增加住房协会收入、保障社会住房资金运营的经济目标。不同于英国大规模出售社会住房的方式，荷兰政府对社会住房的“租转售”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用于出售的社会住房的类型和数量均受到政府严格监管，出售社会住房数量总体低于新增社会住房数量（含新建和收购），在总量中所占比例控制在1%左右，以保证社会住房总量保持稳定，且能够满足低收入家庭租住要求。

荷兰在社会住房的“租转售”过程中采取了多

样化的方式，在价格上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多种折扣选择方式，向购买者提供多种选择，同时对已售社会住房的再出售给予了详细明确的规定，确定了社会住房购买者和住房协会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

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实践情况来看，荷兰社会住房的“租转售”政策在提升住房自有率、促进混合居住和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主要是优先出售优质住房的问题，以及部分城市可能面临存量社会住房数量不足的风险。此外，尽管社会住房的出售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但具备支付能力的已居租户主要为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家庭难以从“租转售”政策中受益，在一些区位和住房品质较高、住房需求旺盛的社会住房社区已呈现出明显的绅士化趋势。而随着住房自有化的推进，租赁住房的总体供给数量和比例降低，供需关系趋紧，不仅社会住房更加难以获得、轮候时间更长，市场租赁住房的价格也在上涨，导致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压力加大，不得不向城市外围迁移，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选择权实际上也受到一定损害。

我国的公共租赁住房是面向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与荷兰的社会住房有相似之处。在2014年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承租人连续租赁保障性住房不少于5年，且符

合保障性住房配售条件的，经出租人同意，可以购买承租的保障性住房”。虽然正式的法规文件尚未出台，但可以看出，随着住房供需矛盾的缓解，我国公共租赁住房的出售已提上议事日程，何时启动、

如何开展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转售”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荷兰社会住房社会目标优先、严格监管的“租转售”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风险，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 “居者难有其屋”：香港公屋政策发展演变与启示

王紫荆 梁印龙 邵挺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大城市普遍面临房价过高和住房短缺的双重挑战，尤其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长期难以获得可支付性住房，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香港从 1950 年代开始，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租赁为主、出售为辅”的公屋政策体系，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矛盾。本文首先梳理了香港公屋政策的内容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然后分别评价了公屋政策“被迫干预”“积极干预”“消极干预”“适度干预”这四个阶段的实施成效，从中总结出香港公屋政策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以期为内地大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住房短缺；高房价；中低收入者；公屋政策；居者有其屋；香港

**引文格式：**王紫荆，梁印龙，邵挺．“居者难有其屋”：香港公屋政策发展演变与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20(6): 38-44. DOI: 10.19830/j.upi.2020.355.

当前，我国大城市普遍面临“房价过高”和“住房短缺”的双重挑战，尤其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难以获得可支付性住房，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香港从 1950 年代开始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租赁为主、出售为辅”的公屋政策体系，一度被誉为“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市民居住问题的成功范例”，内地一些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开始借鉴香港公屋经验。

然而，时至今日，香港并未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住房问题及其衍生的社会隔离、城市贫困等矛盾却愈发严重，这种与政策预期严重不符的现实反差令人深思。香港公屋政策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公屋政策实施效果的大起大落？

从发展历程来看，香港公屋政策经历了“徙置大厦”“十年建房”“长远房屋策略 1.0”“八万五计划”“长远房屋策略 2.0”五大阶段。60 多年来，公屋的整体居住品质、设施配套水平、室外环境质量等不断提高，受益人群也不断扩增，从只针对“灾民”到“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群体”，到现今基本涵盖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

深入研究发现，政府干预态度对公屋政策起着关键性作用，而经济社会背景、住房供需、公私住房市场博弈、政府市场关系等因素的变化也影响着政府决策。香港政府对公屋政策的干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从“被迫干预”“积极干预”到“消极干预”，再到“适度干预”的过程。公屋发展的前三阶段由于积极的政策干预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后两个阶段则经历了金融危机所致的公屋发展停滞，政府为了拯救房地产市场，几乎中断了持续近 50 年的公屋制度。被迫消极干预的一系列政策对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给 2008 年后房价报复性反弹以致住房矛盾更加尖锐埋下了隐患，从而导致前三阶段逐渐改善的居住问题重新恶化。

香港公屋政策发展演变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首先，政府需要对公共住房市场保持积极有效的干预态度，注重政策的延续性；

其次，特别需要重视“政府干预的公共住房市场”与“市场主导的私人住房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建设模式上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双轨平衡；

再次，公共住房政策应加强与就业、公服设施等的有机匹配，促进混合居住，避免出现大规模的

租赁住房集聚区，防止城市内部出现社会隔离；

最后，重点关注外来流动人口的租房保障，研究如何解决外来人口的住房资格问题，建立起一套积极、完整的外来流动人口住房保障政策。

总之，保障外来流动人群、中低收入者等城市弱势群体的住房权利，不仅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镇化的核心议题，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和温度。

## 从“外源动力”到“内源动力”——二战后欧洲乡村发展动力的研究、实践及启示

张晨 肖大威

**摘要：**全球化的快速步伐推进着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国际流动，跨国的知识借鉴可为地区发展中遇到的同类问题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在我国城乡快速转型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本文试图从乡村发展动力视角出发，追溯欧洲乡村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对动力来源和组成要素认知的转变历程，以期为我国乡村发展困境提供思路。欧洲乡村发展总体经历了对城市资金、技术和政府政策补贴等外源动力要素的过度依赖向强调乡村自然、历史、人文资源和社区发展能力等内源动力要素的转变过程，伴随这一过程，乡村发展方式由政府干预下的乡村现代化转向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多元化。当前，我国的乡村发展仍需依靠外源动力要素的大量介入，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忽视了乡村社区的主体力量，而后者才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欧洲的经验为我国乡村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社区主体回归以及多样化路径探索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欧洲乡村；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外源动力；内源动力

**引文格式：**张晨，肖大威. 从“外源动力”到“内源动力”——二战后欧洲乡村发展动力的研究、实践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45-51. DOI: 10.19830/j.upi.2019.117.

在城乡快速转型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乡村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乡村发展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其中，影响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要素是什么，来源于哪里，如何才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答案决定着国家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也影响着政策对乡村发展的推动方式。全球化的快速步伐推进着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国际流动，跨国的知识借鉴可为地区发展中的相似问题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因此，本文试图从乡村发展动力视角出发，追溯欧洲乡村研究及政策实践中对动力来源和组成要素认知的转变历程，以期为我国乡村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欧洲乡村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从对城市资金、技术和政府政策补贴等“外源动力”要素的过度依赖向强调乡村自然、历史、人文资源和社区发展能力等“内源动力”要素的转变过程。在欧洲乡村研究中，外源动力下的乡村发展认为解决乡村边缘性问题需要依靠城市中心向其乡村腹地转移先进的技

术、发展经验和资金；而内源动力下的乡村发展则是以乡村内部自然、人力和文化等资源为核心，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内源动力要素包括当地社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利用本地资源促进发展的能力，地方性知识、技术和资本（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环境资本等）（表 1），这些要素能够促使乡村区域的发展目标更符合当地人利益，发展的收益也能更多地保留在本地以进行资本积累和再循环。

伴随对乡村发展动力的认知转型，乡村发展方式则由政府干预下的乡村“现代化”转向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多元化”，这在欧洲的政策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政府干预下的乡村现代化表现为乡村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发展。

（1）就农业现代化而言，欧洲各国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强力推动政策资金、科学技术等外部动力要素投入乡村。以英国为例，其 1947 年颁布的《英国农业法案》（British Agriculture Act）通过市场干预、提供生产补助金和补贴，以及强化技术应用等政策手段，增加乡村粮食产量，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

创造稳定高效的农业产业。

(2)在乡村工业发展方面,通过完善乡村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采取税收减免及补贴的措施鼓励制造企业向乡村搬迁或建立分厂,促进乡村的工业发展。如爱尔兰于 1949 年成立工业发展局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其主要职能是在爱尔兰西部乡村地区实施购地战略和推进工厂建设,以刺激其制造业发展。这些政策实践都将关注点放在乡村外源动力要素上,认为依靠外部的资金、技术和资源输入可以解决乡村发展滞后的问题。

而社区主导下的乡村多元化则通过增强自我内源动力发展的道路,以更多地关注乡村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价值为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 欧盟乡村地区发展行动联合系列计划”(LEADER: 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Rurale / Links Between the Rur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Actions)。欧盟委员会在 2006 年发布的《乡村地区发展行动联合计划:基本指南》(The Leader Approach: A Basic Guide)中,明确了乡村发展方法的七项特征和六个行动步骤[1]。其中,七项特征(表 2)包括:

- 基于区域 (area-based) 的地方发展策略;
- 自下而上的方法;
- 公私合作关系即地方行动小组 (LAGs: Local Action Groups);

- 促进创新;
- 多部门综合行动;
- 建立网络 (networking);
- 合作。

而六个行动步骤包括: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召集当地参与者→区域分析→审核现有项目或倡议→建立合作关系→制定地方发展战略 (表 3)。这些行动步骤充分强调乡村内源动力要素的重要作用,以及要素在乡村区域内的流动和传播。

尽管我国与欧洲国家乡村在历史传统、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对于乡村发展采取的具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是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广大的乡村区域都面临着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的共同困境。在探索乡村发展的道路上,各国的经验可汇集为“智库”,为解决相似的问题提供多样化思路。当前,我国的乡村发展仍需依靠外源动力要素的大量介入,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忽视了乡村社区的主体力量,而后者才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欧洲经验可为我国政府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转换、社区主体的重新回归提供借鉴。同时,国家在强调乡村现代化发展这一主流路径的同时,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推动乡村对“自下而上”内源动力要素的发掘和培育,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下的“多元化”路径。

表 1 乡村发展内外源动力特征对比

| 动力类型 | 来源     | 构成动力的要素                                                                                               | 推动方式                                                                                                                                     |
|------|--------|-------------------------------------------------------------------------------------------------------|------------------------------------------------------------------------------------------------------------------------------------------|
| 外源动力 | 乡村区域外部 | (1) 政府政策补贴;<br>(2) 城市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转移                                                                     | (1) 政府政策干预;<br>(2) 城市企业扶持                                                                                                                |
| 内源动力 | 乡村区域内部 | 乡村本地的自然、人力和文化资源, 包括:<br>(1) 社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br>(2) 社区利用本地资源促进发展的能力;<br>(3) 地方性知识、技术和资本 (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环境资本) | (1) 社区主导 (community-led) 发展;<br>(2) 地方参与式民主 (local participative democracy);<br>(3) 建立公私合作关系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br>(4) 乡村社区培训 |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表2 乡村发展方法的特征和内容要点

| 序号 | 特征            | 内容要点                                                                                                                                                                                                               |
|----|---------------|--------------------------------------------------------------------------------------------------------------------------------------------------------------------------------------------------------------------|
| 01 | 基于区域的地方发展策略   | (1) 政策执行的目标区域通常具有共同的传统、地方身份认同、归属感和共同的需求；<br>(2) 区域的界定有助于认知当地的优势和劣势、威胁与机会、内生潜力以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br>(3) 区域范围不需要与既定的行政管理边界对应，可基于“本地”特点划定，且该范围具有动态变化性                                                        |
| 02 | 自下而上的方法       | (1) 本地参与者参与发展策略的决策、选定优先事项和项目实施的全过程；<br>(2) 多元的地方行动者包括当地经济和社会利益相关方、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br>(3) 制定最适合当地乡村区域需求的发展策略和实施方式；<br>(4) 注重地方参与者的能力建设                                                                             |
| 03 | 公私合作关系：地方行动小组 | (1) 地方行动小组凝聚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和志愿者的可用人力和财政资源，将当地参与者与集体项目和多部门行动联系起来，实现协同效应；<br>(2) 地方行动小组应形成公共和私人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平衡协调与该地区不同经济社会部门的关系，与之共同代表当地利益；<br>(3) 在决策层，私人合伙人和协会的所占比例至少为 50%；<br>(4) 地方行动小组的任务是确定和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对财务的分配做出决策和管理 |
| 04 | 促进创新          | (1) 给予当地创新更大的灵活度和自由度；<br>(2) 将传统形式的知识现代化，可对其他地区的乡村发展实现创新的转移和适应；<br>(3) 为持续存在的乡村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br>(4) 实现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乡村更广泛创新的基础作用                                                                                           |
| 05 | 多部门综合行动       | (1) 地方战略整合多个活动领域，战略所包含的行动和项目应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进行连接和协调；<br>(2) 整合可能涉及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参与者与所涉及部门之间的联系                                                                                                                           |
| 06 | 建立网络          | (1) 网络形成了人、项目与乡村区域之间的联系；<br>(2) 通过多行动者网络可以传递实践经验和创新知识；<br>(3) 网络类型包括机构组织网络，国家、区域和地方组织网络。                                                                                                                           |
| 07 | 合作            | (1) 合作可包括各地方行动小组之间的联合项目，以加强当地活动；<br>(2) 可分为区域间合作和跨国合作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leader approach: a basic guide[R].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6.绘制

表3 乡村发展方法的基本步骤

| 序号 | 步骤名称    | 相关内容                                                                                                |
|----|---------|-----------------------------------------------------------------------------------------------------|
| 01 | 能力建设    | (1) 地方参与者需获得项目构想的知识，致力于特定活动的人力资源以及管理活动的财务技能等能力；<br>(2) 积累能力的方式可以是“边做边学”，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其他沟通工具获取            |
| 02 | 召集当地参与者 | (1) 通过组织会议或研讨会，将感兴趣的主要参与者聚集在一起，以产生新的想法；<br>(2) 以研讨会、讲习班、公开会议、媒体网络以及博览会与展览会的方式聚集本地参与者，了解其对该地区项目的不同意见 |
| 03 | 地域分析    | (1) 对相应乡村区域的资源，包括人力、项目、地貌、遗产和知识技术等进行汇                                                               |

|    |           |                                                              |
|----|-----------|--------------------------------------------------------------|
|    |           | 总，分析该区域可开发的独特功能；<br>(2) 对本地区未来发展的不同“愿景”和最佳策略进行公开讨论，获得共识；     |
| 04 | 审核现有项目或倡议 | 对目标乡村区域现有的、正在实施的乡村发展项目或倡议进行审查，可避免重复，同时优化已有项目；                |
| 05 | 建立合作关系    | 将地方行动者召集在一起，进行地域分析后，有助于识别出加入公私合作关系并管理实施项目的人员，进而建立当地行动小组；     |
| 06 | 制定地方发展战略  | (1) 包括确定目标、战略重点以及采取行动计划的优先顺序；<br>(2) 地方发展战略成为地方行动小组申请基金支持的基础 |

资料来源：同表 2

# 基于类型对比的城市中心区紧凑型绿轴特征研究——开放空间尺度、构成与慢行友好型边缘分析

范炜 金云峰

**摘要：**中国部分城区中心区有大量绿地，但缺乏有人性化尺度、亲切性和步行活力的场所。中轴线式“绿轴”是各地中心区规划中常见的开放空间，但其类型、尺度、特征和内涵有待梳理。本文在集约紧凑发展、慢行优先导向的中心区规划理念下，对 33 个绿轴样本进行尺度统计和调研，发现并聚焦于“紧凑型绿轴”这一独特类型。通过案例调查、比较分析，本文得出“紧凑型绿轴”接近人性化场所尺度和小型街区尺度阈值的典型宽度，接近社区化步行圈单元尺度阈值的典型长度，具备慢行友好的边缘场所构成特征，包括街—景边缘适度“融合”、零售功能在边缘“共享”。紧凑型绿轴适合规划于窄密路网、慢行优先的、紧凑发展的中心区核心地段。

**关键词：**城市中心；紧凑城市；绿轴；慢行友好；开放空间；风景园林

**引文格式：**范炜，金云峰. 基于类型对比的城市中心区紧凑型绿轴特征研究——开放空间尺度、构成与慢行友好型边缘分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52-61. DOI: 10.19830/j.upi.2019.641.

考察中国大量新中心区建设，会使观察者感到一种矛盾：一方面到处是崭新的绿化、大面积广场——往往有长数百米至数公里的公园或广场，组成一条壮观的“景观轴线”——一种常见的规划“大手笔”；另一方面，却往往缺乏老城区中心活跃的人气和亲切感。尤其是作为步行者行走其中，更感到舒适感欠缺。这固然是人气的积累需要时间。但同样也是因为缺乏有人性化尺度、亲切性与步行活力的场所。

在“慢行优先”“集约紧凑”发展理念下来考察这些中心区“景观轴线”，不得不让人思索：在城市形象功能、与步行场所的亲切和活力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冲突？能否取得平衡？

这些景观轴线有时被含混地归为一类名称，即“CBD 中央公园”或“中央广场”。或被城市规划

方案称为“绿轴”“中央绿轴”“CBD 绿轴公园”等。其名称显然与所谓“中央公园”有密切联系。

名称的含混和多义性，可以掩盖规模与类型的真正差别。同一类名称，可能指称不同的类型。

例如，作为广为引用的案例，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对中国许多新中心区规划影响深远。但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规模之大却可称独特：它宽达 805m、长 4000m 以上，穿过大量不同街道和功能区，且并非作为“景观轴线”来规划。在中国城市中心区案例中，只有极少数真正与之接近。大部分与中心区其他街区和功能区的规模关系十分不同。

实际上，这些中心区景观轴线式开放空间，多为中小型带状公园绿地或广场，强调景观轴线式布局，本文统称为“中心区绿轴”，是一组特殊的研究对象。

本文对 33 个中心区绿轴的典型样本进行了统计和调研，发现：多数绿轴样本的宽度集中在两个区间内。两组样本存在不小的差异。参考可持续城市形态理论、人性化开放空间、TOD 等理论研究成果，我们选取了多种指标特征来比较。发现的确存在一类绿轴，（相比其他样本）在 8 项特征上都更有利于促进中心区步行场所的亲切感与活力（表 1）。

在研究结论中，这类绿轴被称为“紧凑型绿轴”。它们的宽度集中分布在 40~180 m——尤其集中在 40~130 m 区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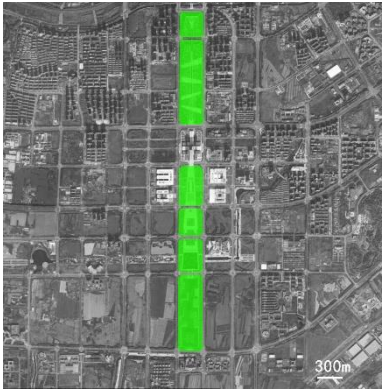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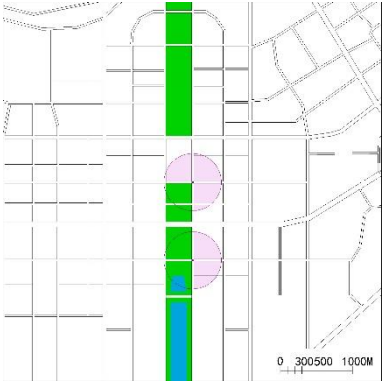
“紧凑型”绿轴的尺度接近两个尺度阈值：（1）人性化场所尺度阈值——宽度不超过理想的中心区小型街区边长；（2）社区化单元尺度阈值——形成一个步行圈长度或两个轨交站点 TOD 单元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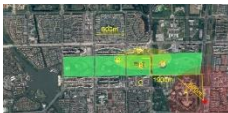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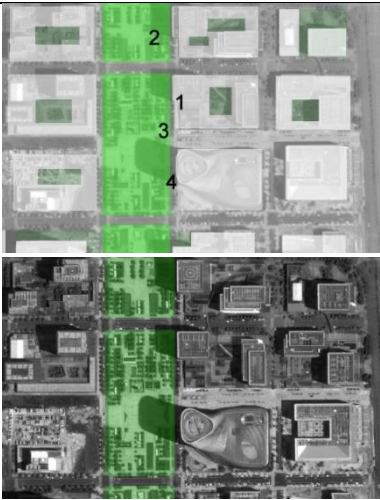
连接的长度。相反，非紧凑型绿轴的宽度远超过中心区小型街区边长。

“紧凑型”绿轴穿越中心区商办功能街区的核心地段。除休闲游赏使用，还可承载广场聚会、节庆、集市和零售餐饮活动，在服务商办功能街区方面有一定优势。

“紧凑型”绿轴是一种步行友好的开放空间类型。其边缘多为窄密路网肌理和紧贴街道的围合型建筑界面；具有慢行友好的边缘特征：绿轴与街道边缘适度“融合”，零售功能在边缘“共享”。与之对比，由于非紧凑型绿轴边缘常被规划为更高级别的机动车道路及大型街区，阻碍步行，更适合布局在中心区外缘。“紧凑型”绿轴类型的特征，与窄密路网规划下的中心区肌理及慢行系统匹配度更高。

表 1 两种尺度的典型绿轴案例特征比较

| 特征       | 对照组绿轴（宽度 300~350 m）                                                                                                           | “紧凑型”绿轴（宽度 40~180 m，以 40~130 m 为主）                                                                                            |
|----------|-------------------------------------------------------------------------------------------------------------------------------|-------------------------------------------------------------------------------------------------------------------------------|
| 尺度比较     |  <p>（沈阳浑南新城绿轴）<br/>宽度 300 m，长度 4 000 m</p> |  <p>（宁波东部新城绿轴）<br/>宽度 80 m，长度 1 300 m</p> |
| 边缘街区尺度比较 |  <p>街区边长 270~330 m</p>                     |  <p>街区边长 90 m</p>                         |

|              | 宽度                                                                                                                             | 长度      | 边缘街区边长    | 宽度 300~350 m 区间绿轴样本                                                                              | 宽度                                                                                                                    | 长度      | 边缘街区边长 | 宽度 40~180 m 区间绿轴样本                                                                                 |
|--------------|--------------------------------------------------------------------------------------------------------------------------------|---------|-----------|--------------------------------------------------------------------------------------------------|-----------------------------------------------------------------------------------------------------------------------|---------|--------|----------------------------------------------------------------------------------------------------|
| 部分绿轴样本尺度比较   | 300 m                                                                                                                          | 2 500 m | 300 m     | <br>1) 宁波鄞州新区绿轴 | 70 m                                                                                                                  | 1 000 m | 70 m   | <br>4) 南京南部新城绿轴 |
|              | 300 m                                                                                                                          | 2 000 m | 500 m     | <br>2) 上海松江新城绿轴 | 70 m                                                                                                                  | 880 m   | 130 m  | <br>5) 南京河西新城绿轴 |
|              | 300 m                                                                                                                          | 2 100 m | 220~270 m | <br>3) 上海嘉定新城绿轴 | 100~170 m                                                                                                             | 1 500 m | 120 m  | <br>6) 广州珠江新城绿轴 |
|              |                                                                                                                                |         |           |                                                                                                  |                                                                                                                       |         |        |                                                                                                    |
| 边缘街区功能比较     | 70%居住功能街区；17%办公与商业功能街区；13%文化公建功能街区                                                                                             |         |           |                                                                                                  | 100%办公与商业功能街区，容积率达 5~10                                                                                               |         |        |                                                                                                    |
| 轨道交通服务比较     | 1~2 个地铁站<br>大型公建功能街区距离地铁站 800 m 以上                                                                                             |         |           |                                                                                                  | 2~3 个地铁站<br>边缘街区全部位于地铁站 600 m 服务半径内                                                                                   |         |        |                                                                                                    |
| 边缘街道典型尺度比较   | <br>40 m 宽，双向 6 车道                          |         |           |                                                                                                  | <br>10 m 宽，1~2 车道                 |         |        |                                                                                                    |
| 边缘街区典型边界形态比较 | <br>1 近 50 m 建筑退线；<br>2 地面停车场、附属绿地和内部机动车环路； |         |           |                                                                                                  | <br>1 裙楼贴线，沿街道形成连续街墙；<br>2 地下停车场； |         |        |                                                                                                    |

|            |                                                                                                                                            |                                                                                                                                                   |
|------------|--------------------------------------------------------------------------------------------------------------------------------------------|---------------------------------------------------------------------------------------------------------------------------------------------------|
|            | 3 道路附属绿地;<br>4 主次干道与交叉口辅道                                                                                                                  | 3 边缘开放场地;<br>4 支路与慢行道                                                                                                                             |
| 内部软硬质景观比较  | 大量水域、开阔草坪与林带                                                                                                                               | 大量硬质广场、林下活动场地                                                                                                                                     |
| 内部使用活动特点比较 | 休闲游赏                                                                                                                                       | 存在广场聚会、节庆、集市、商业推广、餐饮使用                                                                                                                            |
| 与边缘街区步行联系  |  <p>绿轴边缘出入口相距较远;<br/>由于宽阔道路和附属绿地阻隔,绿轴与周边街区难以产生活跃的步行联系</p> |  <p>绿轴边缘有大量的开放步行场地和自行车停车点;<br/>绿轴边缘配套多处零售和餐饮功能小建筑,服务于周边办公街区</p> |

注:图中红色点为地铁站,浅红色圆形为 600 m 半径步行圈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图片为作者拍摄或源自谷歌地图

##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变迁与高校课程建设的关联性——以淡江大学为例

杨昌新 黄瑞茂

**摘要:**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经验,对于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本文以淡江大学为例,从社区营造课程建设的角度梳理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演化的轨迹,认为其内涵提升经历了乡村环境美化、社区认同、人本溯源三个阶段,其脉络与“社区营造服务”课程建设和发展轨迹相辅相成,从而肯定了高校产学研对于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建设和深化的意义,以此为乡村振兴和社区重塑与高校互动的创新思维带来启发。

**关键词:**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变迁;关联性;淡江大学;课程建设;产学研;乡村振兴

**引文格式:**杨昌新,黄瑞茂.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内涵变迁与高校课程建设的关联性——以淡江大学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20(6):62-70. DOI: 10.19830/j.upi.2020.188.

兴起于 1994 年的台湾社区营造,是一项应对当时社会环境和时局变迁的策略调整,也是对 1960 年代台湾社区发展政策的反思与承袭。社区营造源自日本的“造町运动”,倡导社区建设体制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方式转变。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因台湾高校的积极参与和创新实践,使社区营造逐步实现了从舶来品到在地化的蜕变。台湾高校的参与行为主要表现为两个导向,一是师生走向了社区服务,二是社区营造课程走进了课堂。凭借着“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势,台湾高校为社区营造

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并成长为社区营造内涵建设的核心力量。回顾淡江大学“社区营造服务”课程的建设历程,将其与社区营造运动互动脉络概括如下。

### 1 台湾社区营造政策的功效

社区营造相关政策的出台是淡江大学“社区营造服务”课程从无到有、内涵建设从量变到质变的动力来源和重要标志。

1993—1994 年,由“文建会”所推行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和“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促发了淡江

大学建筑学系“淡水社区工作室”的成立；

2008—2010年，台湾当局的“新故乡社区总体营造第二期计划”促成了淡江大学“专业知能服务学习课程”的提案，同时，随着“农村再生计划”的提出，淡江大学建筑学系开设了“社区营造服务”课程；

2017—2018年，“教育部”启动了“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和“高教深耕计划”，进一步促进了淡江大学建筑学系“社区营造服务”课程的综合化和在地化。

## 2 社区营造课程建设的意义

高校是输送社区营造专业技术力量的主要来源，课程设置为社区营造在地化实践建立了一个产学研的平台，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回应社会的需求，输送社区营造的技术力量；

二是回应政策的倡导，探索社区营造在地化的经验；

三是执行学校服务计划，促进高校定位与职责的转变。

总之，在产学研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社区服务的共同经验，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服务观念的培养，实现了从强调环境改造的设计身份，到强调沟通交流的协调身份，再到强调价值培育的传播身份转变，这个转变也清晰地刻画出社区营造内涵深化的轨迹。

## 3 台湾社区营造内涵的深化

伴随着课程建设的深化，台湾社区营造经历了以环境建设、社区意识和人文价值为主题的阶段性探索，每个阶段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势是走向了创造生态健康、可持续生活的乡村振兴目标。

乡村环境美化阶段。以环境改造为切入点，维系乡村特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完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整治和改善社区环境，修

复生态系统，发展农旅休闲产业，创造优质的发展环境。

社区感重塑阶段。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融入共同参与的行动模式，集合民众力量，保护和利用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建设地方文史人物主题展示馆，策划民俗活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突显社区特色，塑造归属感，从精神文化层面唤醒大众对家园的共同体意识。

人本塑源阶段。在社区营造深化过程中，意识到人气是活力的根本，人是环境品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塑造的本源力量。以人本塑源为切入点，传播生态健康、永续生活、乡村振兴等教育理念，并植入中小学教育、社区教育和平民教育，从人文观念培养的角度落实社区营造，凝聚社区的共同体意识，使之内生动力和活力。

综上，回溯台湾社区营造与高校互动的轨迹，便可精准判断大陆地区乡村振兴所处的阶段，藉此明辨未来努力的方向。大陆对于乡村发展路径的探索，有着与台湾类似的轨迹，在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之前，曾经历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两个阶段，重点在于解决农民住房建设、乡村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等问题。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与台湾社区营造的“人、文、地、景、产”五个面向不谋而合，因此，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对于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反观大陆地区乡村发展进程，乡村环境美化阶段已基本完成，而在社会认同和人本塑造方面，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基于此，本文引入高校课程建设的视角，目的在于启发乡村振兴与高校产学研互动的创新思维，旨在倡导政策性地鼓励和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让跨领域的高校师生走向社区场域，寻找社区重塑和人本塑造的真实议题，以探索在地化的乡村振兴之路。

## 全球整合与地方响应——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嵌入特征分析

唐山 李泽 王凯来 崔建强

**摘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下，全球开设的国际分校数量快速增长。中国通过建立中外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式开设国际分校，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跨国教育实体——中外合办大学。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外合办大

学的嵌入性特征,研究其发展现状和空间嵌入机制,并运用“全球整合—地方响应”范式对四所典型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特征进行分析,从教学模式移植、校园文化融入、功能组织交互、校城空间衔接四个方面,解读全球整合和地方响应作用下的内、外部网络对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产生的影响,为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外合办大学; 嵌入; 国际分校; 跨国空间; 空间特征

**引文格式:** 唐山,李泽,王凯来,等. 全球整合与地方响应——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空间嵌入特征分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71-78. DOI: 10.19830/j.upi.2020.073.

国际分校数量的增长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跨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截至 2017 年 12 月,共有 76 个国家设立了 263 所国际分校。中国的国际分校是以正式的中外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被认为是中国教育体系内的独立实体。中国是设立国际分校最多的国家,目前共设立了 32 所国际分校,其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 9 所,称为中外合办大学。

中外合办大学是一种典型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外方合作院校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嵌入性是其重要特征。跨国空间是在城市环境中产生的一类连接“地方”与“全球”的枢纽区域,是跨国经济联系、社会流动、文化交流以及政治相互作用的密集区域。在跨国空间内,外部世界与地方发生着频繁的互动作用和连接,具有非本土特征的跨国要素和跨国行为体不断嵌入特定的城市空间,形成了区别于本土空间景观和职能的嵌入性空间特征。“嵌入”(embeddedness)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系统内部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适应,形成一个各取所需、趋于稳定的新系统的过程。嵌入理论起源于新经济社会学,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是一种用以阐明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理论工具。曼彻斯特学派学者赫斯(Hess)将嵌入理论赋予了空间关系的研究视角,提出全球网络和地方网络共同嵌入,空间与网络叠合形成了跨国空间。

中外合办大学的嵌入主体包括中外合办大学、外方院校和地方城市三类跨国行为体,它们集聚在校园这一特定的城市空间中,形成了中外合办大学与外方院校联系的内部网络和中外合办大学与地方环境互动的外部网络,并在“全球整合—地方响应”范式的作用下建构跨国教育网络,通过功能要

素重构、空间网络再建构孕育出特色的跨国教育空间。

本文选取 4 所具有完全独立校园或一期已经建成并使用的高校作为典型案例,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从教学模式移植、校园文化融入两方面分析内部网络对 4 所大学校园空间的影响,从功能组织交互、校城空间衔接为切入点解读外部网络对 4 所大学校园空间的作用。具体包括:(1)在外方院校“精英化”和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导向下,中外合办大学形成了小型教室和非正式学习空间等特色校园空间;(2)在外方院校校园文化影响下,中外合办大学采用完全复制、元素转化和理念表达三种设计手法实现了外方院校文化要素的空间融入;(3)地方城市为中外合办大学提供资源支持,中外合办大学与城市功能单元的互动关系,可被归纳为外溢型、均衡型、内吸型三种嵌入模式,中外合办大学为地方城市提供创新驱动,助力城市建设校城互哺、合作共赢的教育创新高地;(4)在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理念驱动下,地方城市与中外合办大学形成了连续交融的校城空间以及开放共享的空间布局。

“全球整合—地方响应”范式为理解中外合办大学校园的空间特征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日益国际化的大学校园提供了新的规划设计思路。校园空间不再是一个狭隘的、固定的、封闭性空间,而是一个具有跨国连接和超边界网络的开放性空间。随着教学模式、校园文化等跨国要素的介入,校园空间在内部网络叠合作用下出现了重构和分异,产生了特殊的空间类型和独特的校园风貌。同时,校园与地理空间接轨,与城市在功能组织以及空间结构上进行作用和对话,形成了联结和开放的校城空间格局。

## 中间城市的“反击”——“平等”理念下的法国国土整治实践

荆锋 王世福 莫浙娟

**摘要：**20 世纪的法国国土空间发展遭遇了愈演愈烈的大都市极化与中小城市荒漠化的矛盾。伴随着 19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两者的不平衡态势急速加剧，大批中间城市丧失其预设的“国土脊梁”地位。在内外矛盾交织、集权走向分权的形势下，根深蒂固的“平等”理念引发法国社会全面思考：平等不是平均，也不是抑强扶弱，而是让城市具备基于自身特质的主动发展权和动态平衡的协调能力。国土空间领域则呈现出中间城市对大都市的“反击”：通过精准的定位与产业重构，重拾城市活力和人口流动性，重新成为国土功能体系中的重要“铰链”。法国诸多中间城市的反击已处于起步与全新探索阶段，而我国大量城市研究仍仅关注“城乡”两极。在我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面临原有发展动力亟须转型，中小城镇几乎集体“失语”的学术与现实语境下，借法国之石，管窥其“中间”层级的国土发展新理念，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定与行动，可作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发展与探索的良好借鉴。

**关键词：**中间城市；平衡大都市；国土空间整治；平等；国土节点；都市圈

**引文格式：**荆锋，王世福，莫浙娟. 中间城市的“反击”——“平等”理念下的法国国土整治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79-88. DOI: 10.19830/j.upi.2019.300.

## 后社会主义转型：爱沙尼亚城市规划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赵文宁

**摘要：**爱沙尼亚于 1990 年代苏联解体后恢复独立，成为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为适应迅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需求，其城市规划体系经历了市场化改革，从苏联时期中央计划体制转为 1990 年代的“专案式规划”，又于 2000 年代建立了市场化的法定规划体系。本文剖析了爱沙尼亚规划体系改革的主要制度基础：地方自治的行政体系、以私有化和地方化为核心的产权改革，以及基于所有权的土地税制度。在此基础上，依据其 2003 年颁布的《规划法》对改革后的规划体系进行梳理，并深入讨论了其中具有显著市场化特征的政策安排，包括上下调整的规划等级体系、基于“产权所有者协商制度”的详细规划简化程序，以及临时建设禁令和部分采用规划等。对爱沙尼亚规划体系市场化改革的研究，有助于开拓研究视野，理解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地区城市规划发展问题，从而为我国规划体系发展提供启示。

**关键词：**爱沙尼亚；城市规划体系改革；市场化；地方自治；产权改革

**引文格式：**赵文宁. 后社会主义转型：爱沙尼亚城市规划体系的市场化改革[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89-96. DOI: 10.19830/j.upi.2018.384.

1990 年代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及独联体各国从中央计划体制迅速转向自由市场体制，称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爱沙尼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爱沙尼亚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土面积约 4.2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30 万，1991 年独立，2004 年加入欧盟，目前人均 GDP 超过 1.7 万美元，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首都塔林人口约 40 万，是波罗的海地区门户城市，中世纪老城 1996 年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是欧洲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爱沙尼亚以及中东欧地区在国内城市规划领域的过往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但由于独特的发展历史，其转型历程对我国的规划体系改革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苏联统治时期，爱沙尼亚土地国有，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中央政府依靠指令、通告、计划来安排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地方机构作为中央

计划的执行者。规划目标在于发展生产力，建设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军事设施，并进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层级性空间布局。在此期间，爱沙尼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建设了超过 20 个工业城镇。

独立初期，苏联式综合规划体系被立即废除，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干预手段的合法性也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因此 1990 年代爱沙尼亚并未建立新的法定规划体系，全国各地都没有有效的城市总体规划，地方规划机构根据具体建设项目提案进行审批，具有极大灵活性，被称为“专案式规划”（ad hoc planning）。

2000 年以后，随着城市发展和郊区化，交通拥堵等问题加剧，城市规划的价值得到了再认识；在此背景下，2003 年爱沙尼亚颁布新的《规划法》，建立了“国土规划—县规划—地方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法定规划体系。这一规划体系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政策设计。一是“上下调整”的规划体系，允许下位规划申请调整上位规划，这在实践中使得详细规划能够调整总体规划，从而弹性灵活地适应具体情况，但其过度使用也受到损害总体规划权威性的批评。二是“产权所有者协商制度”，即在一定

情况下允许规划地块的所有者和周边地块相关产权所有者协商一致后，无需协调、讨论等正式环节而执行简化程序，直接颁布详细规划。

爱沙尼亚市场导向的规划管理体系，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基础。首先，转型后爱沙尼亚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并不受到中央政府任命，而是通过选举产生，城市规划和建设属于地方政府事权；其次，在产权改革中，通过私有化和地方化，中央政府所有的土地和房产被归还、出让或拍卖给私人部门，另一部分国有土地则划拨至地方政府所有，成为后续拍卖和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空间；第三，在产权改革基础上，建立了土地税制度，税收归地方财政收入，禁止或限制开发权的地区则免除或部分免除土地税。上述制度安排深刻影响了地方治理逻辑，也为市场导向的规划管理体系提供了基础。

爱沙尼亚的实践表明，自由主义导向下，规划的作用更多的在于为所有者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博弈提供协调机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和对城市整体发展的战略引导作用则相对有限。本文通过对爱沙尼亚规划体系改革的研究，对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加以关注，也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以期为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建设提供启示。

## 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郝皎如 铃木萨琪 王江波

**摘要：**本文以三个巨灾后典型受灾市镇——中国汶川地震（2008 年）受灾的都江堰市、美国卡特里娜飓风（2005 年）受灾的新奥尔良市、东日本地震（2011 年）受灾的七浜町——的住房重建过程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三个案例的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框架，以通常被忽视的群体视角审视住房重建规划策略对群体安置的影响，并通过“政府方的重建任务”和“受灾居民方的安置选择”两个维度分析各自的框架特点。再通过三个案例框架特点的横向比较，分析其异同、优势及问题、背后成因，为中国的灾后住房重建规划策略在减轻政府负担，完成艰巨的住房重建任务，受灾群体的安置选择更具自主性、多样性、灵活性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关键词：**灾后住房重建；居住安置路径；群体选择；国际比较研究；汶川地震；新奥尔良飓风；东日本地震

**引文格式：**郝皎如，铃木萨琪，王江波. 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97-105. DOI: 10.19830/j.upi.2019.193.

近年来，气候变化及加速的城市化发展导致巨灾频发。据联合国减灾办公室报告，1998—2017 年

间，世界各国因巨灾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美国最高，为 9 448 亿美元；中国其次，为 4 922 亿美元。房

屋损失占受灾者财产损失的最大部分，密切关系到民生，且对住房的恢复重建需在复杂的既有城市规划体系中进行，因此，住房重建是各国灾后重建的重点及难点。

中国 2008 年发生的汶川地震的灾后住房重建仅用三年完成，其重建效率及工作推进力度在各国的灾害历史中均是惊人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可以充分调动资源，统一决策，保证重建效率。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质疑，认为“全国之力”在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会影响受灾地决策的自主性，难以满足受灾居民的需求。在防灾减灾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科米里奥将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尼、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重建活动中政府角色的强弱进行了排序，汶川地震的住房重建在“政府作为”一轴中被置于极强一端。虽然研究者表明，此观点是基于中国自上而下的重建体制得出的推论，并期待后续研究的验证，但是，中国高效的重建模式在广泛关注“地方决策”“社区参与”的国际重建领域中并不受欢迎（politically unpopular），且被质疑由于体制使然，难以变通、完善、复制并在国际范围内推广。但实际上，现有研究缺少从受灾者维度展开的对汶川地震住房重建过程的审视，无法明确其重建规划决策

是否，或者如何限制了受灾群体的安置选择，无法系统回应上述质疑。

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汶川地震都江堰市、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新奥尔良市、东日本地震七浜町三个极端灾害的典型受灾市镇，分别构建三个案例的因灾群体居住安置路径选择框架，以被忽视的群体视角审视住房重建规划策略对群体安置的影响。通过“政府方的重建任务”及“受灾居民方的安置选择”两个维度分析框架的模式特点，并通过案例间的横向比较，分析其异同、优势与问题及其背后成因。

文章认为，中国的居住恢复重建的确体现出政府的推进力度与群体选择空间之间的矛盾，但这并非中国重建制度的必然结果。在以群体视角构建安置路径后，居住恢复重建的规划流程同时得以还原和分解，基于美日经验，可分步提出优化策略：建立灾害保险制度，多渠道补充重建资金的供给；通过优惠政策，调用 NGO、开发商等多元主体的力量，辅助组织管理及工程建设；借助优惠政策、技术支持、售租金额调整等非实体项目手段，引导而非代替居民做出符合重建预期的选择；于灾前建立完善的房屋租赁及保障性住房体系并准备为灾害之时所用；适度为居民开放调整安置意向的渠道等，使受灾群体的安置选择更具自主性、多样性、灵活性。

## 美国城市设计专门教育的进展和现状——以六所大学为例

张颖 宋彦

**摘要：**本文考察和引介美国城市设计教育的经验。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等六校为例，审视其城市设计专门教育的发展变化和特色，包括培养模式、组织管理、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成效等；并归纳其成效和经验，进而讨论对我国高校的借鉴意义，涉及人才培养模式选择、教育项目组织和管理、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方法优化、教研相长和实践发展等方面。

**关键词：**城市设计；高等教育；美国经验；课程；教学

**引文格式：**张颖，宋彦．美国城市设计专门教育的进展和现状——以六所大学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20(6): 106-119. DOI: 10.19830/j.upi.2020.035.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理念及模式的变化，城市设计的作用更为凸显，城市设计教育

也需与时俱进。本文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

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六校为例，考察和引入美国城市设计教育的经验。

当前美国城市设计教育培养模式呈现多层次发展、学术与专业兼顾的总体格局，以硕士阶段为主，按照专门化程度可分为四个层次：专门学位、专门化学位、专门化方向和专长证书。

组织方式为分散型和集中型并存。学术型教育以专门化方向分散培养为主，依托建筑、规划、景观等相关学科开展。专业型教育中的学位和证书教育，形成“依托建筑强院的规划系组建跨学科教育平台”集中培养模式——由偏重设计的规划系组织管理，在师资上依托强建筑系为主的多学科背景和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师团队；此外，专业型教育在相关学科专业教育的专门化方向培养中依然有相当的比例。

在课程体系和内容方面，学位和证书培养中以设计课为核心，“设计—理论—方法技术”构成知识能力的“核心三角形”，再加实践和研究，共同形成五个重要方面。课程内容呈现整合性、序列性、同期课程的关联性特征。课程总门数为 8~10 门，其中设计课 2~3 门（单门学分为其他课程的 2~3 倍），必修和限定范围选修 4~6 门，自主选修 1~2 门。专门化培养的课程依所在专业各有不同。

在教学方法和教研主题方面，设计工作室（studio）教学法是主导，在传统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讲座课和研讨课是支撑，融合工作坊（workshop）、案例教学、城市旅行、媒体制作等多样化方法为补充。研究论文指导课程化，将系统训练、同伴学习、专家指导等与导师指导相结合。教研主题注重前瞻和实验性，可持续（sustainability）、健康（health）、包容性（inclusiveness）、韧性（resilience）等议题是近年的重点，各校都建立了众多与社会前沿议题紧密关联的实验室、中心、组织等，整合教学和研究活动。

借鉴美国经验思考我国城市设计教育发展，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其专业与学术型兼顾，学位、专

门化、证书多层次的培养模式值得借鉴，特别是证书教育，对于培养“双 T”型人才，兼顾人才培养口径和专业水平，促进城市设计在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很有意义。在教育项目组织管理方面，集中和分散两种模式都有其适应的方面，对我国而言，集中型无论设置在建筑或规划系，都宜建设为跨学科的培养平台；分散型在学术和专门化培养中有重要作用，也需要强化。在课程体系方面，宜在现有“理论课+设计课”模式基础上发展方法技术单元，拓展实践和研究内容，建立纵向历史和横向多角度的知识基础网络，加强课程阶段的序列性设计和同期课程的关联性设计。在和教学方法方面，进一步发展设计课教学方法，在模块安排、阶段划分、方法技术规范 and 多种教法融合方面走向精细化，提高研讨课等其他课程的学习效果。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需重视高水平、高阶段专业能力的培养，通过前瞻复杂问题的研究探索提升学生领导力和创新精神。与此同时，重视教研相长、未来引领也是值得借鉴的方面。

此外，也要看到两国的差异，美国有其发展阶段和国家制度等背景，专业教育集中于硕士阶段，且城市设计尚未形成职业团体，学生先要考虑教育项目的专业协会认证和今后的专业资格取得，其城市设计教育规模相对较小，且偏重面向市场的设计型人才培养，学术与实践有一定分离。我国的专业教育以本科阶段为主，且社会需求和职业资格取得与美国有较大差异，在培养阶段上不一定局限在硕士阶段，适当发展本科教育形成多层次的人才梯度具有合理性；在专业培养顺序上，也不一定局限为美国学位教育的“后专业”定位，重要的是夯实人才的知识基础与能力；在学科发展上，需避免学术与实践的脱节，面向广阔的社会发展场景，发挥制度优势，拓展跨学科领域在专业和学术上的发展空间，提高引领实践并与相关学科共同解决社会深层问题的能力。

# 基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绿色雨洪基础设施选址研究——以加拿大魁北克市博波尔区为例

柯磊 翟国方 施益军 周妹天

**摘要：**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回流、雨污溢流和水质恶化等一系列雨洪管理问题屡见不鲜。绿色雨洪基础设施因其多功能性而受到关注，但现有的绿色雨洪基础设施选址方法通常聚焦于雨洪削减这一特定效益，而忽略了其社会和环境效益。加拿大魁北克市博波尔区的绿色雨洪基础设施选址决策系统将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多种效益统筹考虑，有助于提升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社会认可度和实施效果。本文在界定绿色雨洪基础设施及其效益的基础上，以加拿大魁北克市博波尔区的实践为例，详细介绍选址决策系统的设计与应用，以期为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中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规划选址、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绿色雨洪基础设施；效益；多功能性；气候变化；脆弱性；选址；海绵城市；博波尔区

**引文格式：**柯磊，翟国方，施益军，等. 基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绿色雨洪基础设施选址研究——以加拿大魁北克市博波尔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120-127. DOI: 10.19830/j.upi.2018.349.

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回流、雨污溢流以及水质恶化等雨洪管理问题屡见不鲜。依靠传统灰色基础设施的“硬排水”模式难以应对复杂的城市雨洪问题。随着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城市雨洪管理的目标从单纯的实现“雨水快排和内涝控制”向“污染削减、源头控制、城市景观改善、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等综合目标转变。绿色雨洪基础设施因其多功能性而受到关注。

尽管绿色雨洪基础设施具有较高的综合效益，但其建设成本高昂，且性能发挥受设计、安装以及场地条件影响较大，因而面临着资金和舆论的双重压力。因此，在规划和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时，审慎选择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布置场地，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现有的选址方法往往聚焦于雨洪削减的单一目标，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在选址过程中并未凸显。

加拿大魁北克市博波尔区（Beauport, Quebec City）在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探索出一种参与式决策系统，该系统旨在帮助城市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优化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选址，以降低城市脆弱性作为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目标，统筹考虑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多种效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提升项目实施的社会认可度。

试点区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市博波尔区，地处圣劳伦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沿岸的河谷地带，地势低洼、地形平坦。

项目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地图的选址决策系统，该系统由四个步骤组成：一是排除不宜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地段；二是根据水文调整目标确定可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地段；三是确定优先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场地；四是确定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类型。其中，步骤三是关键环节，其基本思路是依据潜在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社会脆弱性（social sensitivity）和区域脆弱性（territorial sensitivity）确定需要优先实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场地。

在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微观层面绿色雨洪基础设施规划一般包括现状调研、目标设定、用地选择与优化、设施比选、设施布局与确定设施规模等关键环节。现状调研阶段，规划区域基础分析及数据库构建上主要依据水文气象、地形地貌、竖向设计、土地利用和雨水管网等工程技术领域的数据资料；目标设定阶段，规划围绕“雨洪调蓄”的核心控制目标，注重径流总量控制、径流污染控制、排水防涝和雨水资源利用；用地选择与优化阶段，规划遵从节约用地、兼顾其他用地、综合协调设施布局的基本原则；设施比选阶段，基于“成本—效益”评估的核心逻辑，规划在考虑设施的场地适宜性的同时，注重经济成本和控制功效。

由于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起步较晚，建设成本较高，当前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以中央和省两级住建和财政部门组织遴选部分城市、项目先行先试的试点模式为主。在先行先试的试点城

市或项目中，借鉴博波尔区的选址理念，将绿色雨洪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在选址时予以考虑，完善绿色雨洪基础设施选址指标体系，有助于提升我国绿色雨洪基础设施项目的综合效益及社会认可度。

## 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的演进及城市规划的作用辨析

蒋希冀 叶丹 王兰

**摘要：**随着“健康中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健康城市规划与建设成为重要内容，但在推进上存在难点与挑战。30 多年的全球健康城市运动是理念与实践相结合、不断迭代演进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建设成果。本文基于事件流分析方法，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报告和文献，总结健康城市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历程、特点和实践经验，并探析城市规划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本文针对国内健康城市建设面临的挑战，结合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经验，提出我国健康城市规划推进的建议。

**关键词：**健康城市运动；城市规划；发展历程；经验；启示

**引文格式：**蒋希冀，叶丹，王兰．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的演进及城市规划的作用辨析[J]．国际城市规划，2020(6): 128-134. DOI: 10.19830/j.upi.2019.585.

通过梳理健康城市运动的全球发展历程，本文旨在总结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探析城市规划在其中的作用，为当下我国应对健康城市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一定经验与借鉴。自 1980 年代以来，全球健康城市运动持续推进，已构筑起一张涵盖全球和国家内部两个层级的复合网络。城市规划作为一种调配公共资源、营造物质环境的重要公共政策，在该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的发展是理念与实践相结合、不断迭代演进的过程，在每个时代表现出不同特点，总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健康城市”的内涵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不断拓展，其目标和建设路径愈发明晰；

(2) WHO 引领的全球网络架构和地方实践一直在探索如何结合，近期在发展速度和推动模式方面出现地区间差异；

(3) 城市规划对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的认知从一开始便受到重视，并在欧洲健康城市网络第四阶段得到强调，并逐步与实践紧密联系。

1980 年代，主张提出与初步探索。这一年代中后期是健康城市理念萌芽和实践探索时期，为健康城市建设在全球的开展奠定了早期的认知基础。但

健康城市建设的具体对象、边界、目标、方法、程序、保障和评价等内容并不清晰，缺少普适性标准和引导指南。

1990 年代，内涵丰富与实践扩展。这一时期“健康城市”定义得以明确，并颁布了相关指南，健康城市建设实践拓展到全球许多地区。另外，这一阶段还强化了基础数据库建设，为全球实践扩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2000 年代，健康城市全球实践与健康影响评估开展。进入 21 世纪，健康城市运动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地区体现出不同的演进特点，而健康影响评估（HIA: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逐渐成为一项重要政策工具被运用于健康城市规划和建设之中，进一步促进了健康理念的融入。

2010 年代，健康城市内涵拓展、规划实践持续推进与 HIA 深度应用。全球许多城市将“提升公共健康水平”设定为重要发展目标，通过拓展对健康城市的认知、持续开展健康城市规划实践，以及架构 HIA 理论模型并开展评估实践等举措推进健康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在全球健康城市运动中的作用体现在政策、导则和规划编制三个方面。

(1) 政策方面体现在城市规划对健康城市建设的规范和促进作用以及健康融入其他相关政策的引领和纽带作用。

(2) 具有一定普适特征的规划设计导则有助于健康城市思想的传播和健康城市建设的全球实践。在 30 多年的全球健康城市运动中,导则先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早期由 WHO 组织编制的相关指南和近十多年由地方政府基于实践经验、研究证据和本地特征编写的健康城市规划与设计导则。

(3) 随着健康城市运动持续推进,将公共健康纳入规划编制内容的现象愈发明显,总体上表现出普遍性和循证性两个典型特点。在普遍性方面,不同类型规划都有将“健康”作为重要目标以开展策略制定和空间设计。在循证性方面,基于证据的规划编制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融合方法主要是基于专业经验或设计导则,随着 HIA 引入健康城市规划领域,对规划方案(或现状环境)潜在健康影响的分析成为一种更加科学、有效的融合工具。

随着“健康中国”成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健康理念和健康城市建设愈发受到重视。目前我国健康城市推进存在部门协调机制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健康城市运动提供的经验包括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推进 HIA 的应用以及深化部门协同等要点。

首先需要重拾城市规划保障公共健康的初心,明确其基础引领作用。目前健康城市理念融入我国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路径正被探索,哪些空间层面和相关内容应当考虑健康问题仍待明确,而 WHO 所制定相关指南能为此提供一些思路。

另外,HIA 应成为促进健康与城市规划紧密联系的有效工具。向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 HIA 需要针对规划特征构建评估要素体系,从正面、负面和公平等多维视角提出能够直接指导规划设计干预的详细策略。

在机制保障方面,目前我国卫生健康部门主导和部门职能壁垒的问题依然存在。国外采取成立协同部门、立法保障以及促进多元参与等措施以应对这些问题,取得较好成效。这要求我们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高效统领、部门协作、多方参与的运作机制,并制定相关支持性法规,应当成为保障我国健康城市建设有序推进的重要举措。

未来我国健康城市发展需要积极加入地区甚至国际健康城市网络建设之中,承担促进和引领地区发展的重任,大力推进国内健康城市网络建设。同时,2019 年年末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疫情提醒健康城市的规划者和实践者,我们需要在考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同时,推进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应急,通过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构建适合我国城市的健康设计标准,建立健康影响评估机制,使健康城市规划成为构建高品质和高效率的健康城市治理模式的重要支撑。

## 规划赋能下伦敦东区科创驱动式城市更新实践

高雅 杨兵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伦敦东区从制造到文化再到科创的更新历程,总结了其科创特色的城市更新经验,包括结合城市空间发展目标提升地区能级,为科创产业创造发展机遇;通过规划改善城市环境,为科创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进而促进更新区在经济资产、物理资产与社会资产互相作用下自然发展成为创新城区。在当下中国城市从增量转向存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伦敦东区的更新经验启示我们,创新城区并不一定要政府制定专门的创新城区空间发展规划,一个连接性良好,开放、多元、融合的城区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并壮大的基础,而这样的城区是由历年来空间发展战略和更新政策促成的。这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

**关键词:** 城市更新政策; 伦敦东区; 创新城区; 空间规划引领; 科技城

**引文格式:** 高雅, 杨兵. 规划赋能下伦敦东区科创驱动式城市更新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6): 135-143.

## 荷兰新型海防工程的探索

刘翔 张亚津

**导读：**在过去的 30 年里，荷兰海防工程的建设思路发生了显著变化——以筑堤筑坝锐化海陆之间抵抗关系的传统海防策略，正向强调生态与社会属性价值的新型海防范式转变。在满足海防抵御的基础上，海岸线景观修复与生态平衡、城市滨海游憩空间拓展等多重诉求得以实现。海防线不再是面对海洋的强势主体，而是与海洋、生态系统共同建立起一个有机整体，构建统一的空间规划，而其实现有赖于水利工程专家与城市设计师、景观设计师之间的共同合作。

**引文格式：**刘翔，张亚津．荷兰新型海防工程的探索[J]．国际城市规划，2020(6): 153-157. DOI: 10.19830/j.upi.2019.321.

蜿蜒流淌的莱茵河在经过欧洲五个国家后与荷兰的马斯河及斯凯尔德河处汇合流入北海，三条河流的系统冲击与沉淀作用而形成的多组三角洲最后构成了荷兰大部分领土，也深远地影响着荷兰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结构。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文明发展，让之前提出利用超级大坝与防堤来关闭河口的研究提议有了实现的可能，首先推动的须德海工程（Zuiderzee Works），通过 32 km 的大坝创造了 2 500 km<sup>2</sup> 的可开发土地面积。1958 年，国会正式通过三角洲工程（Delta Works），旨在通过兴建 10 座水坝来彻底解决荷兰西部，特别是兰斯塔德地区的水患威胁，虽然此项工程耗费巨大，并且最终实际开支远远超出最初估计，但是大多数荷兰人认为建设成本依然小于洪水带来的灾难性损失。

然而这种“旨在保证荷兰永久性的安全”的里程碑式防洪工程并没有像荷兰人最初设想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海防问题，虽然在工程建设后的半个世纪里，荷兰再也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洪水灾害损失，但以全球变暖为首的当时未能预见的全新气候挑战，还是引起了 1993 年和 1995 年的两次重大洪水事件，以及对传统的不断构筑堤坝来提升防御能力的防洪范式的反思。

人们开始发现，那些拦截洪水的水坝将原有的海湾生态转变为一个不流动的淡水湖泊并带来了灾难性的生态影响。而荷兰农业自治政策在 1970 年

后逐渐瓦解，带着新城建设浪潮的回落一起打乱了原有水利工程与空间规划的联姻。此外，减少公共投资，增强私有部门作用的呼声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愈发高涨，并直接影响到了水利工程公共开支的财政审议速度与执行阻力。

三个背景力量的变化，让荷兰人原本引以为傲的水利工程建设范式走到了一个矛盾的困境，一方面是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对更高防洪能力水利工程的现实要求，而另一面，则是原有水利工程负面影响和阻力的放大。荷兰人不得不开始探索一种创新的防洪工程建设范式，与水共生（building with nature）便是过去 30 年探索过程中的核心主题。

北荷兰省的洪兹波什（Hondsbosse）海岸地区在 2014 年开始了一项名为新洪兹波什沙丘的海堤改造项目。方案充分利用自然，把南北两侧的两个沙丘连接起来，创建一个长 8 km、宽 1.5~5 km、总面积 3 400 hm<sup>2</sup> 的荷兰最长不间断沙丘景观。

如何针对不同岸线类型制定出低成本、高效率、减少人为干扰的方案成为荷兰目前海岸线弹性改造的最新探索方向。荷兰角港（Hoek van Holland）附近海岸正在实施一种人工育滩结合自然进程的新育沙方式——“沙引擎”（sand motor）。工程建造了一个长约 2 km、宽约 1 km，总面积 128 hm<sup>2</sup> 的钩状沙子半岛。传统的育滩模式需要每五年补一次沙，而沙引擎借用海洋动力，在建成后的 20 年时间里，沙丘将被打散、重新分布，海滩将向海中拓宽，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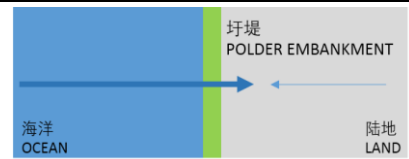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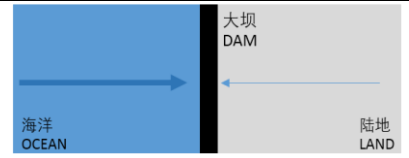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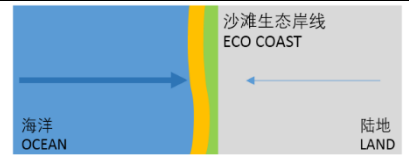
终达到无需进行人工持续补沙、减少自然环境破坏和抵御海洋洪水的作用。

总体而言，荷兰海防工程的创新实践和探索中体现出三级海防岸线效用，逐步从简单的初级职能向复合性三级职能联合关系递进（表 1）。

与海共生的海防体系不仅是一种设计理念或规划愿景，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新动力、新视野和新价值观。海防线不再扮

演面对海洋的强势主体，而是与海洋、生态构建共同空间，通过统一规划建立起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对海洋的利用必须摒弃固化的介入模式，寻找自然、动态、交互的策略。未来，与海共生的理念如果能逐步渗透到滨海城市设计、产业、生活等各个层面，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将不会再以一种抵抗、占有、分离的形象出现，活力、亲近、共融将成为新的人海关系代名词。

表 1 荷兰海防岸线结构类型演变

| 海防岸线类型 | 示意图                                                                                 | 优缺点 |                                      |
|--------|-------------------------------------------------------------------------------------|-----|--------------------------------------|
| 圩堤型    |    | 优点  | 咸淡水交汇的复杂生态圈层；<br>渔业 / 农业 / 海运交通的融汇发展 |
|        |                                                                                     | 缺点  | 陆地安全难以保障                             |
| 堤坝型    |    | 优点  | 设计/施工技术简单，易于施工；                      |
|        |                                                                                     | 缺点  | 生态圈退化；<br>渔业/海运交通受损                  |
| 沙坝型    |   | 优点  | 围绕沙堤可产生新的生态圈；<br>可提供滨海游憩场所和饮用水源      |
|        |                                                                                     | 缺点  | 需不断补沙，对生态环境干预较大                      |
| 沙岛型    |  | 优点  | 利用海洋动力持续性补沙，对生态环境干预较小                |
|        |                                                                                     | 缺点  | 25 年后仍需大规模干预                         |
| 生态群岛型  |  | 优点  | 直接降低了对海岸的冲击；<br>产生新的滨海游憩用地           |
|        |                                                                                     | 缺点  | 巨大的投资和海洋生态干预                         |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欲了解本册更多详情，请联系编辑部。

#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 | 2020